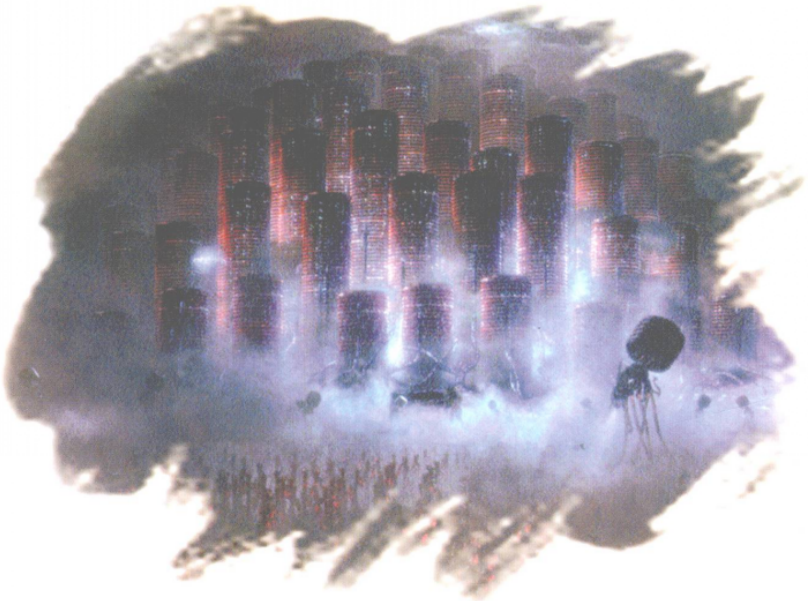
LOSER ECONOMICS

卢瑟[reda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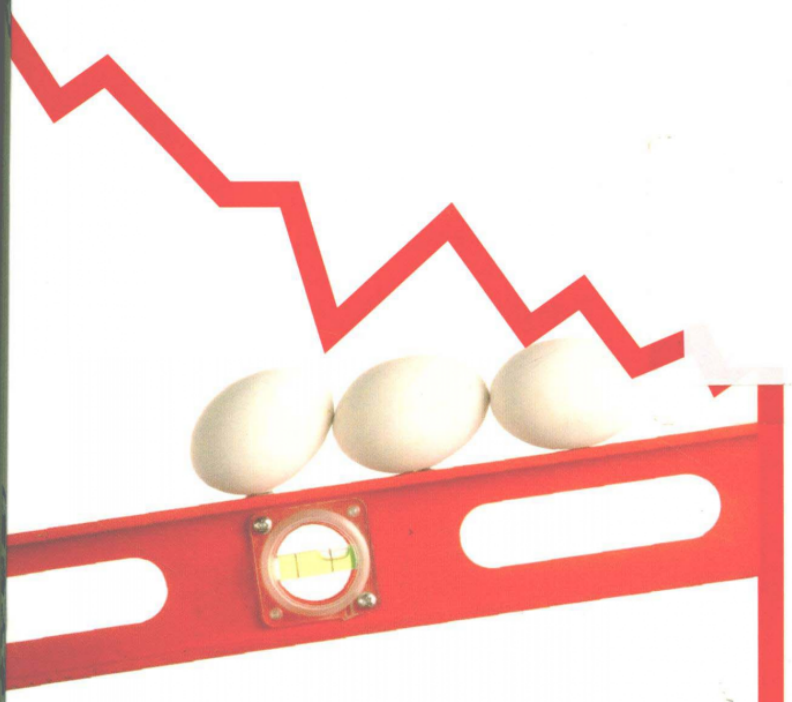
安生⊙著



史上最接地气的经济学

卢瑟是loser，失败者；稳拿是winner，胜利者。卢瑟经济学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并参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卢瑟经济学不敢自称是改变社会的灵丹妙药，但能让读者打开眼界，更多地了解经济规律，至少能少受忽悠。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穷人的《国富论》，经济学中的《君主论》；穷人看钱途；资本主义内生不平衡性；对市场的另类解读；经济学的通俗演义；暴力建立规则，市场登台唱戏；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博弈力量决定市场中的分配结果。本书用另类观点分析经济危机，间杂地叙述了资本之间的兼并，产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对抗。并让弱势群体尽快熟悉经济学要义，好及时面对经济危机做好应对之策。

vivid&victory
提供有价值的阅读

上架建议：经济/畅销

ISBN 978-7-80234-835-6
9 787802 348356 >

定价：35.00元

LOSER ECONOMICS

卢瑟经济学

安生 ⊙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瑟经济学/安生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8
ISBN 978-7-80234-835-6

Ⅰ.卢… Ⅱ.安… Ⅲ.经济学—研究 Ⅳ.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4471 号

书　　名：卢瑟经济学
著作责任者：安　生
出 版 发 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80234-835-6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咨 询 电 话：（010）68990536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10561295@qq.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LOSER
ECONOMICS

前 言

卢瑟，英语中 loser 的音译。loser 者，失败者，窝囊废，废物也。英国、美国的 loser，日本的穷忙族，中国的屌丝，基本都是一类人。稳拿，winner 的音译。winner 者，成功者，胜利者也。卢瑟相对稳拿，从社会地位来看，双方处于社会的两极，卢瑟是社会的底层，稳拿是社会的顶层。从数量来看，卢瑟远远多于稳拿。稳拿与卢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者之间则是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

这个世界究竟是和谐的乐园还是争斗的丛林？人类社会究竟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还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彼此平等合作互利互惠，还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这样的世界究竟会如何发展？是安宁、稳定、永恒地存在下去，还是在运动中螺旋上升？稳拿和卢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在稳拿的眼中，是安宁、稳定、永恒的美好大家庭。在卢瑟的眼中，是在螺旋运动中不断被重建和破坏的金字塔。

这是一本用卢瑟的眼睛观察世界的经济学普及读物，它描绘的是卢瑟眼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并不平等，少数人利用暴力和财产统治多数人。稳拿是统治者，他们靠肮脏的原始积累起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的子孙将继承他们的高贵地位和安逸的生活方式。卢瑟不同于稳拿，是吃苦受累贡献劳动力的人，为衣食住行而疲于奔命。从摇篮到坟墓，他们为徭役而生，忙碌一生仅仅温饱。每当他们稍微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就要背上

更沉重的负担。他们将世代为奴。他们的使命是为稳拿提供劳动力，他们是自由的奴隶，是会说话的牲口，是吃粮食的机器。

《资本论》说明了三件事，解释了三种现象。

三件事是：资本家靠暴力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不断压榨劳动拉大贫富差距；资本对财富无尽的追求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自身的毁灭。

三种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是怎么发家的，为什么他们的发家历程对多数人来说没有可复制性；为什么多数人当牛做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老无所养，少无所依，居无定所，穷忙一生，难以发家；为什么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暴富的经济模式必然走进死胡同。

本书要尝试说明的也是这三件事情：第一，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暴力而不是智力，更不是勤俭，是发家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第二，稳拿利用产权优势赢得稳稳当当，卢瑟吃苦受累输得一无所有；第三、这样的经济模式最终的注定陷入危机之中。

稳拿的富裕更多的是来自于压榨，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常识：资本家压低工资，就能增加利润；垄断企业提高产品价格，上下游小企业的利润就要被挤压；地主提高地租，农民的收入就会被挤压；官僚集团提高税赋，非官僚集团的收入就会被挤压。

阅读本书的人要抛弃一切幻想，但他们应充满希望。因为在本书里，现实的世界虽然是残酷而无情的，但是人类社会是螺旋上升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可以是主动的，可以是被动的，却不可能不动。其运动轨迹，有时进步，有时反动，从长远看终将是进步的。

最后，阅读本书以前，请做一道选择题：有人当牛做马一辈子，有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种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是：A. 天经地义；B. 岂有此理；C. 不太合理，却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

一般来说，选择“天经地义”的人和选择“岂有此理”的人往往是社会对立的两极，选择“不太合理”的人则在两极之间摇摆。两类人的矛盾并不是本书造成的，也不是本书所能弥合的。本书只是揭示两者一部分冲突的前因后果。

选“天经地义”的人，你们是稳拿，读这本书只会让你们血压上升，心

跳加快。为了贵体安康，还是不要阅读的好，本书的内容对你们来说是歪理邪说。更适合你们的是“仁义道德”，或者“自由、公平、竞争、效率和费厄泼赖”。

选“岂有此理”的人，你们是卢瑟，读这本书可以让卢瑟知道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自己。你们虽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由，但是在思想上却不甘心接受稳拿的奴役。希望本书能让你们看到自己早已意识到的却没有归纳总结出来的思想。

选“不太合理，却是不可避免”的人请选择性阅读本书，本书中部分内容让你们有同感，部分内容让你们反胃，请跳过反胃的内容。

本书将分析稳拿经济学隐藏的玄机，剖析资本主义的运转规律，解析为什么多数人永远处于不利的地位，说明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解释经济危机为什么难以治愈，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书中内容以经济为主，却不局限于经济。稳拿为了在经济中取得优势，常常不择手段，但这些手段的绝大多数都不属于经济手段。分析这些手段，自然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卢瑟经济学》看似跨界，但他们并没理解阶级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行为起源于劫掠，从劫掠进化而来。进化的原因，对稳拿来说，是利用私有产权的交易占有别人物质利益的效率更高。

这本书今天能够面世，与许多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他们的处境决定他们对书中的观点心有戚戚然。他们虽然有朴素的感受，却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本书总结归纳了他们的认识，获得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支持，是我写作的动力。他们在网上推动了这本书的传播，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出版可以让这本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为了能让这本书出版，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此，深深地向每一个曾经给予这本书支持的读者和为本书出版反复修改的责任编辑表示由衷地谢意。

安　生

2012年8月1日

LOSER
ECONOMICS

目 录

楔子 开始的话：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与信仰：经济学的阶级性 / 2

经济学的教义：阶级利益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 5

魔教的来历：经济学的历史传承 / 7

卢瑟的信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0

第1章 资本的危机：几种经济危机的解释

经济黑死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 14

绝育集中营：马尔萨斯的“绝对人口过剩论” / 17

谁说卖不掉：萨伊定律与“产品过剩” / 21

自愿的失业：新古典对失业问题的解释 / 26

公器私用的凯恩斯主义 / 31

圣骑士：弗里德曼打了个补丁 / 36

小资有话说：中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 43

本章小结 / 48

第2章 资产的属性：资本“魔鬼”的罪与罚
暴力的兄弟：资产与暴力的关系 / 56
熙熙攘攘为利趋往：资产运动的目的 / 58
帕累托最优：资产运动的极限状态 / 61
多收了三五斗：资产优势在博弈中的趋利避害功能 / 65
通天塔：财富集中与社会分化 / 69
小猪跟着大猪跑：大资本对中小资本行为的影响 / 73
本章小结 / 78

第3章 切大饼：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
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 / 84
拉锯战：争夺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博弈 / 90
劳资博弈：剩余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 96
财富之母：剩余价值中的地租部分 / 104
金融为王：金融在社会总大饼分割中的份额 / 110
元要素：暴力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作用 / 117
本章小结 / 125

第4章 生产与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销售的过程

必然的恶果：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 134

蟹堡王：再生产循环 / 140

自然失业率：简单再生产循环的就业率 / 150

卢积累与扩张：扩大再生产循环 / 157

大崩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 163

不患寡而患不均：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长期停滞 / 171

本章小结 / 178

第5章 垄断帝国：垄断资本主义

春去春回来：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 / 190

你死我活：资本的内部兼并 / 195

超级帝国：垄断企业对经济的统治 / 202

统一战线：产业垄断资本与金融和暴力的联盟 / 210

人造饥荒：垄断资本抑制产能获得最大利润 / 218

无尽的冬天：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的经济停滞 / 225

终极征服者：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 / 231

物极必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趋势 / 240

本章小结 / 247

后记

楔 子

开始的话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与信仰：经济学的阶级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超越政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统一的，不同历史时期，应该有统一的经济学。其实每个阶级都有每个阶级的经济学。哪个阶级掌权，哪个阶级的经济学就流行。

我们所能确定的是，人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利用生产工具，获得一定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在全社会分配，用于消费或投资。至于这些产品为什么这样生产，这样分配是否合理，这就需要有人来解释。

当某人饿得要死，旁边的人撑得要吐的时候，怎么能让快饿死的人安心呢？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力量告诉他，你饿死是上天的安排，是因为你自身的原因没有获得上天的赐福。那个撑得要吐的人由于种种善行，获得上天的垂青。所以，你不应该嫉妒撑得要吐的人，不应怨恨社会，不应考虑现有的分配方式，不应该有任何“非分”的想法，而应该不断按照上天的意志躬身自省，争取早日获得上天的赐福。

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问题是，有人不信宗教，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不那么好欺骗了。这时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出现，这个理论要能让饿得要死的人自惭形秽，安心当牛作马，能让撑得要吐的老爷们心安理得。这种理论就是经济学。

所以，经济学也是一种统治工具。

同样一门基督教，大家都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释。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君王的权力来自上天，这是一种解释。每个人只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就都有权解释宗教，这也是一种解释。两者都认同上帝的存在，却对解释权有不同的阐释。上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解释。如果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那么教皇就是上帝。如果每个人都有权解释，那么人人都是上帝。

怎么能把思想统一起来呢？就需要宗教裁判所。所以，最终的解释权，还是要和暴力结合，尽管许多时候铁腕隐藏在天鹅绒的手套里。换一个角度，看哪种价值观流行，什么分配理论流行，就知道大约是哪个阶级在掌权。

回到经济学。经济理论数不清，经济学家车载斗量，各种论文浩如烟海，让人

眼花缭乱。实际上，用阶级利益一划线，立即一目了然：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符合金融资本家（也就是食利者）利益的经济学、符合官僚利益的经济学等等。

经济学中，价值的概念如同物理中的力的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力的存在才能解释物体运动，价值存在才能解释一切经济行为。大家都承认价值的存在，对价值的解释五花八门。不同阶级掌权，对经济的解释就完全不同。

曾经有一个金融学硕士向我抱怨，经济学中价值的概念太复杂，只能死记硬背。我说，你换个方式去看，其实就很简单了。

大地主掌权的时候，流行的经济学就是重农主义，产品的价值都来自土地。大地主嘛，当然要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国没有重农主义，中国有五蠹之说，商人是五蠹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也排斥商人，因为农业为主的经济，地主和自耕农必然反对要和自己分一杯羹的商人。

商人地位高，流行的经济学说就是重商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在那个时代就是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到亚当·斯密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要挑战贵族（封建地主）和僧侣，这个时候就要提出自由市场和劳动价值论。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社会充分分工，社会财富就能极大丰富。劳动创造价值，商业促进流通，大地主和僧侣都是白吃饱。

到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要造反，于是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干得最多的必然是工人，资本家虽然也劳动，但是凭什么拿那么多啊？资本家拿得多，不是因为他们干得多，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资产剥削工人。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共产主义”的翻译）就一定要实现！

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斗倒了大地主阶级，就要让经济学为自己辩护，要让工人安心。这就需要新的价值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于是就开始青睐边际效用价值论。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都是稀缺的，资本家拿出资产，工人提供劳动力，资产比劳动力稀缺，所以资本家分大头，是理所当然的。每一样自愿交易都是互利互惠的，都是有利于增加双方价值的。工人获得的少，是因为工人的劳动力不值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斗地主的时候，是劳动价值论；坐天下的时候，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此一时，彼一时。夺权与掌权的过程需要不同的价值论，于是经济学就不断的进化。当然，也可以说是退化。

一般来说，统治阶级都喜欢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被统治阶级都喜欢劳动价值论。劳动者创造了社会总产品，这些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垄断核心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分配份额，这是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区别是对这个过程的解释。如果是边际效用论，那么垄断核心资源的人提供了稀缺的资源，自然有资格获得最大的份额。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那么垄断了核心资源的人往往游手好闲，并不参与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或者作出的贡献有限，但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核心资源，所以可以分到大部分的产品，比如地主和掌握暴力的贵族，但是他们却有资格获得产品中的绝大多数。或者，即使参与生产过程，获得的收入也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这时如果用劳动价值论，显然会推导出他们是寄生虫的结论。提出水和钻石价值对比理论[①]的约翰·劳，本人就是职业赌徒，很长一段时间靠赌博的收入过日子，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游惰阶级。反过来，被统治阶级日夜劳作，勉强糊口，自然愿意接受统治阶级都是寄生虫的结论。

两种价值理论激烈争论是表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是本质。那些说经济学发展了，所以边际效用论替代了劳动价值论的人，完全不了解边际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封建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要用边际效用论为自己寻找合法性，产业资本家则用劳动价值论为自己的武器抗衡边际效用论。最终，资产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开始捡起封建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辩护武器。不了解价值理论变迁背后的社会变迁，才会说出“经济学发展了”之类的话。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如同力的概念是物理学的基础。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价值理论，这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善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能确认的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一些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一定产品。至于怎么解释，就要看谁掌握话语权。无论哪个阶级，都要把自己解释为创造价值的阶级——没有哪个阶级会把自己解释为寄生虫。

再比如，不同的经济学，对最终理想社会的解释也不一样。大地主阶级奖励耕战，抑制商品流通，也就是重农抑商，追求的是编户齐民[②]的社会；大资产阶级追求的社会，是大资产阶级高高在上，其他阶级老老实实贡献剩余价值的社会，所以要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发挥最大价值，提高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官僚追求的社

① 水有很大用处，价值却很小，因为水的数量远远大于对它的需求。钻石的用处很小，价值却很大，因为对钻石的需求远远大于钻石的数量。

② 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被西汉政府正式编入户籍的有耕农、佣工、雇农等。

会必然是官僚权力无限扩张、不受约束的社会；社会底层追求的是没有压迫的社会，私有资本消亡了，国家也消亡了。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理想中的社会看起来都无限美好，其实并不像描述的那样，而且是互不兼容的。生活在大地主追求的理想社会，大商人就会很不舒服。生活在大资产阶级追求的社会，劳动者就会很不舒服，因为劳动力是最不稀缺的要素，劳动者的报酬注定很低。反之，在卢瑟追求的社会之中，人们要么按劳分配，要么按需分配，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私有财产就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他们必然很不舒服。

这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天堂。甲之天堂，乙之地狱。

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在衡量经济行为的尺度上与最终的追求目标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各阶级利益不统一甚至尖锐对立，不同的阶级必然有不同的经济学。于是，稳拿有稳拿的经济学，卢瑟有卢瑟的经济学。认为世界应该有统一的经济学的想法，是很幼稚的。

所以，为本阶级提供理论支持是每一种经济学最基本的功能。每一种经济学的背后，都隐藏着本阶级的诉求。把自己宣传为神圣的科学，不过是自我的掩饰。

认为经济学应该超越政治而统一的人，无非是暗示自己支持的经济学是唯一真理，其他经济学都是歪理邪说。换一个角度看，提出这样观点的人，往往推崇的是现任稳拿的经济学，潜在的目的就是封杀卢瑟和前任稳拿的经济学——尽管他自己未必意识到。

本书既然是卢瑟经济学，就要按照卢瑟的方式解释经济。卢瑟，一无所有，吃苦受累，是出力的一方，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劳力者。既然是劳力者，所以必然认同劳动价值论。

历史上最有名的卢瑟经济学家，无疑是马克思。遗憾的是，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卢瑟虽然震撼了世界，却没有建立起英特纳雄奈尔，卢瑟经济学也发展缓慢。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动家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

经济学的教义：阶级利益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经济学就是一种信仰，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都是如此。既然是信仰，就要有教义。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的学科。统治阶级自然不会把自己描述成寄生虫，被统治阶级自然要把对方描述成寄生虫。所以，不同阶级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学，是为统治阶级寻找合法性的。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学，自然

是为被统治阶级申诉的，顺便控诉对方。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两个基本假说：第一是劳动价值论；第二是市场有效说。

先说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不劳动不创造价值。看起来很简单，潜台词很有意思：既然地主、官僚、神父不劳动，不创造价值，自然就是寄生虫。为他们服务的厨师、轿夫、妓女、裁缝等，捍卫他们的士兵、警察、狱卒、刽子手等等也都是非生产阶级。资产阶级领导工人进行劳动，资本阶级就是对社会有益的生产阶级。

再看市场有效说，市场能自动有效地调节供给与需求，使社会利益最大化。潜台词也很有意思：既然市场有效，市场是资本说了算，资本能有效处理一切。只要一切交给资本，就可以上富其君王，下富其臣民，一切万事大吉。或者说，资本家能处理好一切。

如果有人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他能处理好一切，照顾好所有人的利益，大家能相信吗？十有八九大家肯定会怀疑：这家伙说话靠谱吗？他优先照顾的是自己的利益还是大家的利益？

个体的理性一定能推导出群体的理性吗？未必。火灾之中，每个人的理性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到出口，然后就是踩踏伤亡。战场上，每个人的理性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夺路狂奔，然后就是大溃败。何况，像转产那么容易吗？几亿几千万的厂房设备投入进去，说转产就转产？真以为现代的工厂是鲁滨逊种小麦呢？还有，大企业转产小企业的产品的难度，与小企业转产大企业产品的难度能一样吗？

亚当·斯密的时代，最大的工厂不过是小作坊，转产容易，规模相近，没有形成垄断，贫富差距也不大：今天的学徒，可能就是明天的师傅，后天的小业主。亚当·斯密这么说，在他那个时代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到今天还这么讲，如果不是每天在书斋中与世隔绝，就是完全不顾世界的本来情况了。

资本家领导的工厂是主要创造价值的地方，资本家领导的社会是万事大吉的社会。这就是亚当·斯密想告诉读者的。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两点假说：第一是劳动价值论；第二是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第一个假说和亚当·斯密的部分一样。

第二个假说直接就指责非生产阶级了。僧侣、地主和官僚吃得太多了，所以留给资本家的太少，用于创造价值的产品太少了。这些寄生虫的存在，直接影响国家发展。李嘉图就差直接指僧侣、地主和官僚的鼻子骂他们饭桶误国了。

马克思以后，劳动价值论在正统学派就吃不开了。很显然，工人的劳动无疑不

比资本家少。为什么资本家获得那么多，工人获得这么少？正统的学派要维护正统的阶级。这时正统的阶级已经是资产阶级了，所以劳动价值论必须让位。

这时边际效用论就出来了。每样东西都是稀缺的，每样东西都会产生价值，越稀缺越有价值。资本家提供的资本是稀缺的，所以资本家有资格获得大头。问题是，资本的收益似乎是资本越多，单位资本收益越好。这似乎与稀缺性矛盾。这时边际效用论就顾左右言他了。

凯恩斯的学说，简单地说，资本不是万能的，需要官僚帮助介入完善。这对官僚来说简直是救世福音。所以，绝大多数官僚是打心眼里喜欢凯恩斯主义的。

官僚喜欢凯恩斯主义，资本的力量不喜欢。弗里德曼再次站出来替资本家打包票。资本家能处理好一切，官僚少插手。政府每年按照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货币就完了。

市场万能自由选择就是多数稳拿（winner 的音译，指胜利者，全文以下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如果告诉读者，资本家能处理好一切就是多数稳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读者会怎么想呢？

这两派的共性是都不承认劳动价值论，个性是究竟社会由谁掌握最有利。

经济学主流学派，排名第一、第二的，无非这两派。官僚的实力强一点，就是凯恩斯主义流行。资本的力量强一点，就是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流行。在官方内部，到什么时候，都是凯恩斯主义占上风。在民间，资本影响大，自然是货币学派占上风。

市场是不是真的有效论，到底什么创造价值，其实就看谁来解释。话说回来，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吗？

劳动者的意见呢？有人关心吗？看过《黑客帝国》吗？劳动者就是电池。老老实实干活，提供稳定的电流就是了。看母体想让他看的东西，听母体想让他听的东西。不论谁掌权，他们都会幸福。如果他们自认不幸福，说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母体的母性，那么会有两派的力量代表他们幸福。另外，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不许说出来。敢多说少道，小心特工史密斯来登门拜访。

认真你就输了。

魔教的来历：经济学的历史传承

亚当·斯密的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劳动价值论，第二是市场有效说。简单地说，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市场自动调节生产。到李嘉图的时代，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于是李嘉图的理论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市场有效说，认为市场可

能出现结构不合理、供需不对称造成的混乱。到马克思的时代，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丧失了对经济的控制权，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于是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资本家剥削工人，工人和资本家彼此是敌人。

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来说，事情则很尴尬。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无疑最终能推导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论。如果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则无法确定价值。没有价值的概念，如同物理中没有力的概念一样，整个经济学将失去最终的立足点。这时就需要一种新价值说，代替劳动价值论，这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些经济学家，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称为庸俗经济学家。

马克思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市场有效论，提出了资本主义最终崩溃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力存在严酷的剥削，这种剥削最终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奴隶；除了劳动者，大批小资产阶级最终也将破产成为卢瑟；社会顶端极少数稳拿控制惊人的财富，最终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多数劳动者既是被剥削者，也是主要的消费者，劳动者被剥削，对应消费能力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法顺利完成，必将定期发生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大批产品没有销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无以为继。《资本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两点。

庸俗经济学家不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市场有效说，提出一切供需都可以完美自动调节。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加自由市场的制度是永远健康、万寿无疆的。按照他们的观点，社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一切失业都是工人不愿意接受更合理（更低）的工资造成的。社会不存在生产力过剩，一切产品没有销路都是生产者没有获得充分信息的结果。稳拿成为社会顶层的原因，不是控制了资本具有更强的分配权，可以趋利避害，而是稳拿聪明、勇敢、智力过人、善于冒险，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做出别人不敢做的决策。因为否认了资本的力量，所以相信庸俗经济学得永生——每一个奴隶都有机会成为将军。

如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源于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一棵藤上的两朵花：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市场有效说的一脉，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认市场有效说，不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一脉，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

两派经济学的价值论，彼此的阶级性非常明显。两派关于价值理论的辩论，最终的目的就是证明稳拿获得绝大多数产品份额是否合理。

劳动价值论的落脚点是劳动创造价值，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创造价值，价值来自劳动者的劳动。边际效用论的落脚点则是物本身就能创造价值，比如土地、厂房、机器、牲畜、货币都能创造价值。

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那么资本家剥削就是无法回避的。尽管资本家也有劳动

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但是他们获得的报酬与他们的劳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管理100人的工厂和管理10000人的工厂之间的收入也许相差百倍，但是投入的精力却是类似的。事实上，小工厂由于受制于各种条件，管理者投入的精力往往更多。

如果按照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从市场买到，资本家投入各种要素，组织生产，必然有权获得所有的收益。按照稳拿的看法，每样东西都能产生价值。这些东西属于我，我是产权所有者，我就有资格要求产品中的一份，而且往往是关键性的一份。

按照卢瑟的看法，劳动创造价值，然后按照所有权分配。这就是初次分配。农民种地，地主收租子。地主不用种地，但是农民种地主的地，就要给地主缴租子。农民丰收了，地主的租子也涨了。农民生活的处境，完全看地主地租的高低，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情况。所以，所有权不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而是剥削的依据。

所有权是生产过程中价值产生的依据，还是分配要求的依据，是两派价值论对立的根本。如果按照边际效用论，土地所有者、高利贷者、产业资本家，都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则这些人依靠所有权，强行占有工人和生产组织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需要注意，绝大多数资本家身兼两种角色，既是生产参与者，也是剥削者。随着他们拥有的资本额增长，第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第二种身份不断强化。小资本家往往要亲自参与劳动，大资本家则养尊处优。

引申一下，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土地所有者和高利贷者，究竟是社会生产者，还是寄生虫？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这两类人很显然是寄生阶级。但是到了庸俗经济学时代，这些人就都成为对社会生产有益的人了。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初期，土地垄断在大地主或封建贵族手中，货币集中在高利贷者手中，资本家的经济力量很弱小。这个时候如果承认边际效用论，即“物”能创造价值，那么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无疑是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也是最有资格获得最大份额的人。那样一来，大家都炒地皮、开当铺、放高利贷，资本主义就没有发展前途了。与此类似的还有神父和官僚的劳动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承认他们的劳动有价值，那么教会或官场就会成为经济的主宰，资本家的绝大部分成果都要供养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要强调劳动价值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生产劳动，大地主、高利贷者、神父、官僚一干人等，都不创造价值，都是社会的累赘。资本家直接参与而且组织劳动，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阶级。这时，大地主说土地创造价值，高利贷者说放贷货币创造价值，神父说祈祷创造价值，官僚说官办经济创造价值。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岂有此理。

到了资本家坐稳了江山以后，资本家与地主、高利贷者的矛盾已经弱化，这些人已经丧失了社会的主导权，官僚和神父也转而为资本家服务。相比之下，随着资

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组织上都空前强大，成为资本家直接的对手。这个时候就需要边际效用论，告诉全世界，资本家获得最大的份额是天经地义的。这时，地主、高利贷者靠地租和利息获益也是可以容忍的，神父、官僚的劳动也成了社会必须的有价值的劳动了。

资产阶级无论是最早坚持劳动价值论，还是后来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最终的目的都是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社会是在改变的，本阶级的利益是不变的，价值理论是可以根据本阶级的利益不断调节的，符合本阶级的利益就是价值的根本依据。

两派最终争论的焦点落脚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简单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稳还是不稳。

本书不打算深入探讨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深入探讨、争论、辨析两种价值论也没有什么意义。——彼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涉及创造价值，进而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怎么可能彼此说服？这样的争论，争来争去，只能是鸡对鸭讲。正如本书在前面提到的，能够确定的，只有生产出一定的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至于怎么分配，以及这样分配是否合理，各个阶级解释不同。

本书尝试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不稳，以及这种不稳会带来什么后果。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在分析的过程中，并不大量使用价值分析，而是更多分析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内在的联系。

读者记住除了人类必要劳动，什么都不创造价值就可以了：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创造价值，最多是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中。比如棉花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中，棉纱的价值转移到棉布，最终转移到衣服中。

卢瑟的信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既然世界有稳拿的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卢瑟经济学？

首先的目的当然是为卢瑟提供理论支持。比如讲，开发商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不应该有房子住。土地是宝贵的，价值无可衡量，所以房子应该天价。

按照卢瑟经济学，土地没有价值。土地的所有制，使土地所有者有权向在土地上生活工作的人要求贡赋。土地所有权越垄断，要求的地租就越高。土地垄断程度高的地方，绝对地租就高。所以房子的昂贵并不是土地的价值昂贵，而是土地的所有权高度垄断，导致地租昂贵。

再比如年轻人工作不努力，所以不应该有房子住。这个也是很荒谬的。按照稳拿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每样要素都是稀缺的，就是劳动力过剩。所以土地贵，劳动力便宜，年轻人应该努力工作，否则就要被淘汰。

按照卢瑟经济学，那就是另一种解释了。劳动者创造价值，然后在工人、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分配。地主要求得太多，所以年轻人没房子住。按照卢瑟的学说，只能说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导致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收入无法满足最低工资。这里说的最低工资，不是法定最低工资，而是劳动力再循环需要的工资水平。

吃苦受累，还被人指认为因为懒惰、愚蠢等原因导致贫困，这是很荒谬也是很无耻的事情，也是稳拿要达到的目的。经济学是一种信仰，就看使用什么价值论，或者说信仰什么。如果使用边际效用论，就是卢瑟和稳拿的互相作用下，社会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然后卢瑟耍赖，成为反贼。如果使用劳动价值论，就能推导出剥削。如果使用边际效用，就不存在剥削。使用劳动价值论，就是卢瑟被压榨得一干二净，然后起义。既然有稳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应该有卢瑟的“不劳者不得食”。卢瑟要求属于自己阶级的经济理论工具，是大势所趋。按照卢瑟的观点，分析社会经济的运行，为卢瑟辩护，是研究卢瑟经济学的第一个目的。

稳拿解释世界和卢瑟解释世界完全不同。稳拿解释自己的富有，自然是头脑灵活，勇于冒险，抓住机遇，勤奋刻苦，虔诚信佛，等等。卢瑟则喜欢扒下稳拿的遮羞布。他们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别看现在这个稳拿人模狗样，当年靠裙带关系，贪污腐败，坑蒙拐骗，国有资产流失，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然后靠官商勾结，黑恶垄断，制售假货，血汗工厂，管理层收购，从来不懂得虔诚两个字，雇用了一批记者替自己吹捧，掩盖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慈善捐款也是诈捐。等等。

每一个君主，都是虔诚的，正义的，善良的，同时也都是不信教的，邪恶的，卑鄙的。这是《君王论》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君王都在实践《君王论》，每一个却都不承认自己信仰《君王论》，公开场合都要贬斥《君王论》。这种行为换到中国历史就是“外圣内王”。嘴上是孔孟之道，墙上挂的是正大光明，骨子里是韩非子那一套。

刘邦解释自己的地位，是“奉天承运”。他是龙和刘老太太交媾的产物，是龙子太郎。老百姓解释的话，可以看元曲《高祖还乡》。

卢瑟经济学不敢自称是改变社会的灵丹妙药。但是，也许能让卢瑟开阔眼界，更多地了解一下经济的规律，也许能少受忽悠。研究卢瑟经济学，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看到稳拿和他们控制的世界的另一面。

稳拿是皮，稳拿经济学家是毛，毛要依附于皮。如果想谋生，就要小猪跟着大猪跑，毛顺从皮的意志。统治阶级有想法，于是就有人站出来找理论依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情是常态。否则，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世界，不买统治阶级的账却是相对罕见的。这样的歪理邪说发表不了，文集出版不了，研究没有经费，个人

没有教职。这样的学者往往身与名俱灭。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不久，他们的思想也就消亡了。个别不灭的，也往往被阉割。

稳拿解释世界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地位。能不能改善多数的人生活并不重要，能不能解决危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的秩序，或者说让塔尖的利益合理化。对经济学家来说，则是能不能养家糊口。所以，稳拿经济学家的理论必然顺应他们的意志。研究稳拿经济学，往往最终的落脚点，就是维持其稳定的地位。只要维持现状，一切都会好起来。

市场是有效的，只要市场信息充分交流，就不会有经济危机。很明显，这样的描述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从愚弄大众的目的看，这就是稳拿经济学的目标。但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稳拿经济学解释危机的能力一塌糊涂。每次危机对稳拿经济学都是严重的考验，每次的结果都无法让人满意。经济回暖不回暖，向好不向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陷入滞胀的困境？稳拿经济学对这些问题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稳拿的理论支持下，宏观经济政策必定回避经济内部深层次矛盾，注定成为虎狼药。当然，稳拿的经济学家是不会认账的。

虽然没有能力去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但是通过研究卢瑟经济学，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药吃下去，大致会出什么事情。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中国在世界上是出力的一方。怎么崛起取美国而代之，这是许多人都在想的事情。真正渴望中国崛起的人，还是应该看看卢瑟经济学，再看看现任稳拿的发家史。如此，看世界也许能看得更明白一些。

为卢瑟自我辩护，为观察经济现象、宏观经济政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是研究卢瑟经济学的目的。

第1章

资本的危机

几种经济危机的解释

经济黑死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资本论》第三卷

亚当·斯密的时代，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手工作坊进化到手工工场，零散的工匠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由于分工合作，每个工人需要的专业技术水平大大下降，生产效率却大大提高。《国富论》开篇便介绍分工给生产效率带来的提高："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门。我见过一个生产扣针的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三种操作。他们的机械设备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从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000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1/240，就连这数量的1/4800，恐怕也制造不出来。"①

① 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

如果资本仅仅停留在此，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工场，而不是工厂。追求利润的资本显然不会就此止步。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直接消灭了手工工场。“城市周围出现了大批的工厂、冒烟的高烟囱及其夜间发出的火焰，不停震动的机器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像蚂蚁那样匆忙的工人。大工厂集中并且增加了生产资料，使它的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手工劳动的小作坊或者工场不同，大工业使用机器，因为机器能以绝对准确和最快的速度，日夜不停、不知疲倦地完成最复杂和繁重的工作”。①

由于蒸汽或电力使机器开动起来，大工业不再依赖有限的、不稳定的、受自然环境制约的水力或风力，或者微不足道又参差不齐的人力。蒸汽和电力顺从、均匀、不疲竭，可以几乎无限地任意增加（至少在当时看来如此）。大批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大工业集中到一起，他们各司其职，成为复杂的机件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工人和越来越复杂的机器设备构成了大企业，这些大企业构建了工业王国。资本在工人和机械的后面控制着每一个环节的运动，他们是这种巨大运动的原因，也是这种巨大运动的结果。资本被利润所鼓舞，一边不断推动生产，一边不断扩大自己完成自我积累。于是，堆积如山的织物和钢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伴随资本家的势力不断扩张，封建地主势力不断退缩。英国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呢绒商人约翰·温奇库姆，他的富有曾经让国王感到不舒服（他曾经用自己的费用建筑郊区的教堂，盛情款待亨利八世和王后凯瑟琳，还曾经自费武装100名战士带领他们上战场。国王曾经说：“约伯里的小约翰，比我还富有!”）然而相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本家们，约翰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不过是个大工场主，而他的手工工场的产量与机械化工厂相比，完全不足挂齿。这时的封建地主要么主动改行成为资本家，要么逐渐丧失经济地位。

分工的工场取代了小工匠的作坊，使用蒸汽的机械化的大工厂又取代了依靠人力、水力或者风力的工场，资本主义经过两次跳跃，生产力大幅度跃升。工厂规模越来越大，每个工厂产品越来越专一，产量不断以几何级数地提升。同时各种生活用品越来越便宜，许多在封建时代属于奢侈品的廉价仿制品，现在开始逐步进入寻常工人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甚至让人们产生了只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上富其君，下富其民”的美好的幻觉。

好景不长，资本主义在19世纪前后，出现了周期性生产过剩。每次过剩都是一次危机，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

有时危机从企业开始，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产能过剩，没有销路。堆积如山的产品没有人购买，工人大批失业，资本家大批破产。曾经有个小孩问他妈

① ［法］保尔·芒图（PaulMantoux），陈希秦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妈："妈妈，天这么冷，我们家为什么不生火呢？"他妈妈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去买煤。"小孩继续问："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他妈妈说："因为你爸爸的煤矿倒闭了。"小孩接着问："妈妈，爸爸的煤矿为什么会倒闭呢？"他妈妈说："因为没有人买你爸爸的煤矿的煤，煤卖不出去，所以煤矿倒闭了。"

几乎所有的企业全部在一夜之间陷入"三角债"之中。这种史无前例的怪异的现象，似乎很荒谬，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身边。除了个别投机者，每个人都深受折磨。

有时危机似乎从银行开始：一夜之间，处处钱紧，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没有足够的货币维持必要的运转，大量的票据要求贴现，银行没有能力贴现，贷款的要求是如此旺盛，银行却没有能力提供贷款，承兑汇票价格疯狂下跌，许多银行遭到挤兑。银行歇业，货币流动停止，产品没有人买，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破产，工人失业，机器生锈闲置，商品堆积腐烂，整个经济崩溃。钱到哪里去了？仿佛一夜之间全部蒸发了。

当时有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增加纸币供应，增加贷款。当时的政治理念，政府要以守夜人自居，所以并没有实践这种解决方式。不过，20 世纪后，这种方式确实被实践过。短期内，增加贷款的解决方式似乎有效，但是很快就证明无效。不仅无效，而且发生了新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货币短缺。

有时危机从金融投机开始，先是股票或土地价格暴涨，然后突然暴跌。接着银行陷入困境，后面就是金融三角债，接着是企业倒闭，扩散到更多的企业。然后是工人失业，产品滞销，经济停滞的老套路。

危机可能从任何一个环节开始，然后迅速扩展到其他环节。不论从哪个环节开始，表现都殊途同归，无外乎三角债、金融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最终都是大量的商品和生产资料被毁灭，生产力受到打击。

令人恐惧的危机在严重打击资本主义经济后，却莫名其妙地又自动恢复繁荣。每次危机后，都会出现新的繁荣，每次人们沉醉于繁荣的时候，危机又会突然降临。危机如同黑死病，来势汹汹，却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一切好像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几年之后，类似的事情卷土重来。规模更大，伤害更严重。这个幽灵反复折磨资本主义的经济。如同月亮的盈亏，定期发生，周而复始。

几乎所有的经济都可能陷入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生产以小农为主，经常出现生产不足所带来的危机。这种危机的起因往往是自然灾害（旱、涝、蝗灾）或统治者横征暴敛、挥霍浪费、好大喜功干各种工程（修皇陵、修宫殿），或者发动耗费惊人的战争，导致劳动力不足，最终的形式往往是严重的饥荒。历史上常见的"关中大饥，人相食"，结果往往是自然灾害加财政破产，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就可能直接诱发农民

战争。与封建时期的危机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危机的特点首先不是产品不足而是产品过剩，不是劳动力被透支而是劳动力被闲置。直观的感觉不是没粮食吃，而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破产，然后大家下岗，没钱买粮食吃。产能有的是，就是没销路；粮食有的是，就是没钱买；劳动力有的是，就是没活干。其次，这样的危机不是封建年代的危机，某地丰收，某地歉收，丰歉不均，而是同时繁荣，同时萧条，只要在一个经济循环中，危机就基本在各个领域同时、同步发生。再次，这样的危机与天灾人祸的关系不大，不论有没有天灾人祸，到一定的时间节点，该发生就发生。最后，这种危机有很强的周期性，按时袭击沉醉在繁荣之中的经济。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办呢？

绝育集中营：马尔萨斯的“绝对人口过剩论”

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毛泽东曾说过，“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很有哲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不存在无产阶级的物理和资产阶级的物理，或者无产阶级的化学和资产阶级的化学。但是在人文领域的研究中，不同阶级思想确实代表不同的阶级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认识也必然不同。这些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对世界的认识，也必将指导对应的阶级参与改造社会的进程。作为分析指导人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的经济学，自然难逃这个“烙印”。

现在危机出现了，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就涉及到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就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于是各种思想粉墨登场。每个人的思想，都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每种解释都对应相应的解决方案，每种解决方案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至于能不能医治经济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情。

金字塔的顶端往往是既得利益的阶级，维持现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相对保守的，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一切都是完美而合理的，或者只要维持现状，人人安分守己，则整个社会即将合理。一切矛盾都将化于无形，即使存在也是个案，或者是当事人的私人问题，需要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与社会无关，社

会无需做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任何改变的尝试，都将破坏社会的完美，都将是全体成员的灾难，既是“稳拿的灾难”，更是“卢瑟的灾难”。

最早的集中营的雏形是英国的救济院。许多卢瑟被集中到一起，强行分性别和年龄居住，工作繁重，居住拥挤，营养不良，没有看守的书面批准不得离开，不得接见来访者，一旦进入，永难脱身。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有计划地不断减少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需要不断被消除。在这里，他们要进行苦役犯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忘记自己的狗窝和狗崽子，要像狗一样地生存，狗一样地死去。这里不是监狱，不是奥斯威辛，不是达豪，不是古拉格，不是美国的二战日裔集中营，而是英国的救济院。与纳粹集中营的区别是，这里扣押的人不是犹太人或者纳粹的政敌，而是走投无路的贫穷失业工人。

救济院的法律依据是英国的济贫法修正案，也称新济贫法。这种把失业的卢瑟关起来的思想理论来自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两个抽象前提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但几乎保持现状。他认为在这两者中，人口增长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增加更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加，即以1、2、4、8、16、32、64、128、256、512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将以1、2、3、4、5、6、7、8、9、10的算术级数增加率增加。当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自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增加。

在《人口原理》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把原先提出三点结论改为：一是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二是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三是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并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他认为，如果不实行道德抑制，那么由人口增值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无法避免。

希特勒的绝育计划，只是涉及被医生认定有各种疾病的人，或者劣等种族，与种族和生理挂钩。马尔萨斯直接要卢瑟绝育，直接与经济收入挂钩。如果绝育了，日后经济地位改善了，是否还实行恢复手术？如果不恢复，那么这位未来的稳拿，现任的卢瑟是不是丧失了把财产传承下去的权利？卢瑟绝育，稳拿不绝育，稳拿的后人难道不会越来越多？既然是人口过剩，为什么只让卢瑟而不让稳拿绝育？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卢瑟就是卢瑟，永远不会成为稳拿？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绝育是稳定的。一个人及其后代生存的权利，直接与腰包的鼓胀程度挂钩。

马尔萨斯还提出了“让渡利润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

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存在的大量失业和贫困，是卢瑟生孩子太多。这么多人要就业，哪里有那么多岗位给他们？必然要有卢瑟失业；二是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能消费掉多余的产品，是社会经济重要而有益的部分。这是他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按照他的理论解释经济危机，那么解决危机的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了：要解决劳动力过剩就要让卢瑟绝育，要解决产品过剩就要提高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待遇。

马尔萨斯是神父，自然不会把僧侣描述成寄生虫，相反会把自己描述成对社会有特殊价值的人。神职人员的价值就是消费掉多余的产品，这是为资本主义社会作贡献。

既然承认有多余的产品，为什么不能给生产产品的卢瑟去消费，而只能给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消费呢？马尔萨斯的解释是卢瑟会生更多的孩子，导致社会贫困。那么难道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就不生孩子吗？他们生孩子就不会导致社会贫困吗？这是因为他们比卢瑟更高贵，还是因为马尔萨斯本人是神职人员呢？其实，猪比马尔萨斯能更好地完成消费多余产品的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或者说，在这方面马尔萨斯不如猪。

要证明马尔萨斯的解释是胡说八道，也很简单。明明是产能过剩导致工人失业，怎么能说是生产资料不足导致工人失业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不是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导致工人过剩是大量设备闲置，使工人失业。全社会不是因为人口过剩没有足够的消费品，而是工人失业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导致产品过剩。所谓生产资料不足导致人口贫困的现象，是马尔萨斯拍脑门想出来的，与现实完全不符。现实世界并不是没有产品，而是人们没钱去买。不是没有生产资料，而是工厂倒闭，生产资料闲置。马尔萨斯根本不顾现实情况，完全靠自己凭空的想象去解释经济危机。他这么解释的目的，还是要落脚在他暗示的解决方案上——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他要给自己提高待遇，还要拉上地主和官僚作为政治上的盟军。至于卢瑟，属于没有用的人，应该被逐步压缩人口数量。压缩的标准就是钱包的鼓胀程度。

这样的推理尽管与事实不符，但是资本家很喜欢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这么一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失业、贫穷就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造成的。所以，贫困是卢瑟自己的事情，与稳拿无关。马尔萨斯极力反对当时的济贫法，提出对卢瑟的贫困救济只能刺激更多的贫困，政府改善卢瑟的生活，只能让卢瑟生更多的孩子，最终使卢瑟再次陷入贫困。真正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让失业的卢瑟绝育，达到压缩卢瑟人口的目的。他的理论还提出，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育过多的子女。所

以，财产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最根本的落脚点是：第一，工人穷困与资本家无关；第二，政府不能用资本家的钱救济工人；第三，私有财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永恒而不可侵犯。这样资本家当然拥护马尔萨斯的理论。

英国历史上是否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不清楚，不过，通过法律对卢瑟逐步实行隐性的灭绝，确实是发生过的事情。

1834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取代 1601 年发布的济贫法的新法律——《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老济贫法对待饥民相对宽松，一直让稳拿不快。本书开始的那段话，就是一位牧师指责济贫法的大作《论济贫法》（1786）的一部分。这位上帝的仆人的大作中还有一段名言：“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就是稳拿对济贫法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不把卢瑟饿得要死，让他们随时处在饿死的边缘，他们怎么可能拼命工作？失业者越落魄，在职者越有干劲。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要求更少的报酬。

新济贫法废除了“院外救济”，取消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物的救济，只允许一种救济方式，即把他们收容到习艺所中。贫民只有在进入“济贫院”后，方可获得食物救济。而该院实际上是前面谈到的“集中营”。

稳拿安排卢瑟来到这里，是为了逐步灭绝他们。1834 年这项新法律具有把社会无用的人集中起来，逐步压缩人口数量的思想。这比纳粹早了整整 100 年。这是隐性的种族灭绝，划分的标准则是财产的多少。没有财产的人，如果不能为资本家服务，就要被逐步有计划的清除掉。需要工人的时候，就雇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送他们去救济院。工人直接成为资本的奴隶。数量直接受资本的需求弹性波动。在利润面前，资产阶级政府比封建君主专制政府还要贪婪和残忍。

思想的危险在于付诸行动，危险的思想导致危险的行动。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被社会统治阶级认为是无用的废物，甚至蛀虫的人。把这些蛀虫控制起来，逐步压缩数量，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危险的是，划定蛀虫的标准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尔萨斯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人。逐步消灭对统治阶级没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怎么也不像一个神职人员提出的——可偏偏就出自一个神职人员。

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时候，直接提出要废除新济贫法。你们这些官僚要涨工资，却要把我们这些劳动者关进救济院，应该把你们先关进去。

不过，资本家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工人饿死活该，这是因

为他们自己多生孩子，与资本家无关，这是资本家欢迎的。神职人员消费掉多余的产品，资本家肯定不能容忍。资本家需要的是第一部分，不是第二部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保持了长期的争论和友谊，临死还把自己一部分遗产赠送给马尔萨斯。友谊是因为李嘉图赞成工人饿死活该，争论是因为李嘉图不赞成马尔萨斯提出的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对经济的贡献。

马尔萨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存在消费不足的倾向，工人和资本家组成的社会无法消费全部产品，需要存在第三者消费多余的产品。他暗示增加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的待遇以克服消费不足。

相比之下，“萨伊定律”连这一点都否认了。

谁说卖不掉：萨伊定律与“产品过剩”

认为市场商品充斥等等不可能的学说，在抽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被抛弃的空话。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萨伊定律彻底否认资本主义有可能全面生产过剩，是许多稳拿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萨伊定律提出一笔销售之后，必然跟着一笔等额的购买，流通过程不可能中断，因此没有危机也没有生产过剩。只有局部危机，没有总量过剩。一个国家某种商品过剩，只能说明另一种商品不足。萨依定律主要想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

萨伊定律不是萨伊发明的，首创者是英国的詹姆斯·穆勒。他是这样说的：“‘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

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他认为生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这句话的前半段是正确的，谁也不会为了生产而生产。后半段就是胡说了，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资本增值，或者说是挣钱，挣越来越多的钱。

1803 年，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后来在穆勒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段，于是就有了完整的萨伊定律。萨伊提出资本家生产是为了消费，所以资本家只要物而不要钱，钱只是交易一瞬间需要的媒介，最终要体现为商品。在萨伊的描述中，他提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这个就是很值得推敲的事情了。

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手里有大批的存货，都乐不起来。自己的产品卖不动，才有大量的存货。生产面包的食品厂的老板不是为了自己吃光自己的面包，做鞋的工厂的老板也不是为了穿自己的鞋，生产服装的工厂的老板也不是为了自己穿自己的衣服。食品厂一天生产的面包数以吨计，食品厂老板全家能吃多少？所以，即使他们消费自己的工厂的产品，也不过是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产品中绝大部分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就是商品。有没有产品不是商品的？有。历史上的小农经济，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粮食、蔬菜自己种，猪鸡自己养，棉花自己种，线自己纺，布自己织，衣服自己裁缝。但是，这显然不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为别人生产商品，所有的人都消费别人生产的商品。

资本家把商品卖出去以后，要扣除固定资产损耗，要给工人发工资，剩下的钱就是利润。按照萨伊定律，资本家会立即把利润花掉，不是消费就是投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持币观望这个现象了。如果有持币观望，那么就不能得出出售以后立即消费或投资的结论。如果商品销路不好，利润急剧下降，甚至赔钱，那么资本家在售出商品以后，还会继续投入生产吗？他们会选择继续扩大生产还是持币观望？如果智商正常的话，资本家会选择压缩产能。如果智商不正常的话，资本家会破产，资本则会找一个新代理人。

资本家会选择把所有的资本金和利润都吃光花净，或者捐赠出去吗？很显然也不会。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资本量。在上层的时候，生活很惬意，一旦下降一个层次，生活直接面临大量的困难。上层清楚地知道下面的苦难，李嘉图就说过：“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既然知道下层的苦难，就要避免自己跌落到下层。不仅不能跌落，还要往上爬。这就需要资本保值、增值，至少不缩水。

很显然，当社会利润率突然下降的时候，多数资本家会选择压缩产能，解雇工

人，回笼货币，持币观望。而决不是萨伊定律描述的那样：货款回笼以后，马上接着出手。资本家决不会不知死活地继续扩大投资，或者把手中的货币吃光花净，而会想办法保值增值，比如囤积黄金或者现金。

这时候需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利润率会突然下降？为什么大量的产品会在一瞬间卖不出去？萨伊定律始终没有解释这是为什么，只是强调按照萨伊定律，大家不会持币观望，所以产品不会卖不出去，因为产品不会卖不出去，所以就不会有利润率突然下降，也就不会有持币观望。

萨伊定律的逻辑就是，如果大家都不持币观望，就不会有经济危机。只要没有经济危机，大家就都不会持币观望。这就如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谎言，所以没有人撒谎；因为没有人撒谎，所以没有谎言”一样，是诡辩术的一种。

a 命题和 b 命题彼此互为对方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一个命题成立，两个命题都成立；一个命题不成立，两个命题都不成立。那就不能先用 a 证明 b，反过来再用 b 证明 a，然后得出 a、b 都成立的结论。这样的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不能彼此证明，得出任何结论。

卖大力丸的人声称自己刀枪不入，所以不怕刀枪。最好证明他不怕刀枪的方法，是扎一枪、砍两刀，而不是依照他刀枪不入的自吹自擂。如果枪扎不入，刀砍不破，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怕刀枪，而且是刀枪不入。如果枪扎进去了，刀砍进去了，那么这个人就是个江湖骗子。

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但一枪对穿，一刀两断，倒在血泊中，而且定期如此。面对这样的现实，只能得出萨伊定律是胡说八道的结论。

萨伊定律基本对现实社会视而不见，掩耳盗铃，自始至终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中会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被迫压缩产能，而只是说因为大家都不会持币观望所以不会有生产过剩，因为不会生产过剩所以大家都不会压缩产能。

资本主义经济不会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这个结论很合资本家的胃口，至于推导过程是睁眼说瞎话，还是同义反复的诡辩都不重要。

李嘉图按照自己的思路阐述了萨伊定律：“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不能设想，他会长期不了解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获得别的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连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产品。产品总是用产品或劳动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

货币绝不仅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而是资本家生产的目的。资本家把钱投入生产循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而不是其他任何目的。让资本家选择存货或者等额

货币的话，资本家绝对会选择后者。一个有大量存货的资本家决不会喜上眉梢。资本家甚至会为了收回货款主动让利打折，只要能卖出商品，换回货币就可以。让资本家选择货币或投资的话，资本家可能会选择后者。这不是因为资本家喜爱投资，而是他认为投资可能带来更多的货币。如果估计不能带来更多的钱，生意会赔本还继续增加投资，那是犯傻。

李嘉图自己搞金融投机，每天和货币打交道，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还是他追求的目标，其实他很清楚。此外，他自己做投机，肯定不会永远满仓，满仓或空仓决定于他对未来的判断，预期未来上涨，他会满仓；预期未来下跌，他会空仓。只有新手才会不断地买来卖去地折腾。既然自己投机可能压缩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规模，实业资本家怎么就不可能在利润下降、甚至赔本的时候压缩产能呢？

事情关系到自己的时候很清楚，一旦涉及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就不清楚了。

马克思批评李嘉图说："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之口是不相称的。首先，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而进行生产的。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有人把它的产品的某部分用于消费，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但是，李嘉图说的是私人消费。以前李嘉图忘记了产品就是商品。现在他连社会分工也忘记了。在人们为自己生产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一个人已经生产了，出卖还是不出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是非出卖不可。在危机中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他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于费用价格出卖，这对他、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李嘉图甚至忘记了，有人可能是为了支付而出卖，忘记了这种被迫出卖在危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家在出卖时的直接目的就是把他的商品，把他的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他的利润。消费——收入绝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对于仅仅把商品变成生活资料而出卖的人来说，消费确实是主导因素。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每一个人出卖，首先是为了出卖，就是说，为了把商品变成货币。"①

由于货币的存在，买与卖被分为两笔独立的、不同的交易。如果多数人只卖不买，结果就是危机或者生产过剩。

萨依定律主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没有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只有局部比例不合理，没有总量过剩。一个国家某一种或几种商品过剩，只能说明某一种或者几种产品不足。

---

① 马克思，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3～574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另一种或几种产品不足，必然引发这些产品价格上涨。我们应该观察到的现象是上涨的商品总量和幅度与下跌商品的总量和幅度之间有大致相仿的关系。然而，经常观察到的往往是绝大多数产品价格跌停，而不是涨跌互现。

此外，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或者说那种产品利润率超过平均利润率，那么资本家不是傻子，为什么不改行去挣取超额利润呢？难道是看不见的手失灵了？那么至少要承认看不见的手并不是那么灵活，或者说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是黏性的。

这只看不见的手什么时候灵什么时候不灵？普遍的解释是由于外界的干预造成了信息失灵，比如政府的介入。但是，干预不是周期性的，为什么信息却是周期性的不灵？

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危机？是什么引起的危机？成为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是比例不合理还是总量过剩？如果是比例不合理，那么就存在合理的可能。只要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不足的部分就可以（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出，只要将来信息化发展了，就会消灭经济危机。很显然，他认为不存在总量过剩）。如果是产量过剩，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存在内在的问题，最终难免质疑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后一种原因是资本家不能接受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持保留意见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必然存在卖家多，买家少，有全面过剩的倾向。这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源，是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

萨伊定律否认总量过剩的可能，认为买家和卖家必然相等，只要生产了就能卖得出去，目的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先天不足。工人的贫穷并不会导致产品滞销，决不会存在煤矿的煤卖不出去、煤矿倒闭和工人失业没钱买煤的情况。产品滞销、企业倒闭是因为资本家经营不善、不能正确获得信息、政府干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工人的贫困不会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危机、企业倒闭、生产萎缩、工人的失业和贫困便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工厂倒闭，资本家破产，工人失业，都是个人原因。

既然不存在产品过剩，也就不需要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方案，即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去消耗多余的产品。所以，尽管萨伊定律与事实违背，逻辑上也存在问题，但是仍然成为大量的稳拿经济理论的基础。以李嘉图的智力也愿意接受这样幼稚的胡说，并不是李嘉图的智力有问题，而是利益使然。

但是如果没有总量过剩的危机，那么为什么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呢？按照萨伊定律，既然没总量过剩危机，资本家就不会压缩生产，只会把一种生产转移为另一种生产，也就没有非自愿失业，工人的失业都是自找的。

至此，稳拿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探索经济规律还是辩护，就看得很清楚了。

自愿的失业：新古典对失业问题的解释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萨伊定律撇清了多数人贫困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只要有供给就会有需求，只要有卖就会有买，卖不出去是不可能的。萨依定律主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

但是，还是有卖不出去的情况啊，这怎么解释呢？稳拿的解释是，如果卖不出去，那就是供需结构不合理。比如市场需要土豆，某资本家生产了红薯，所以他活该破产，不幸的是倒霉的多半是小资本家。既然不存在全面过剩的可能，那么就不存在全面生产过剩式的危机，也就不会有因此造成的压缩产能，不存在因为全面过剩而导致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不存在工人想找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既然不存在全面过剩，就不存在非自愿失业。那么社会上的失业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稳拿的解释，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了。即所有的失业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失业者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等的报酬造成的。工人要求的货币工资高于资本家愿意支付的报酬。现行的货币工资的水平下，因为劳工之间存在公开的协议或者达成某种契约，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如果劳工都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那么就业量就可以扩大。这种失业尽管表面上看上去是不情愿的，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属于自愿的范畴，这种失业应该被列入“自愿性失业”的范畴。

按照他们的说法，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决定着实质工资。因此，劳动者中间不存在限制性的联盟，那么在劳动者情愿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使他们的实质工资等于在此工资标准下雇主所雇人数的边际负效用。

然而，现实状况中，用工人不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解释大规模失业，非常牵强。不是大批工人突然提高工资要求然后辞职，而是突然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潮。换

句话说，不是大批工人集体炒老板，而是老板集体炒工人。大规模的失业是老板压缩产能，不是工人集体头脑发热在工会的煽动下主动下岗。短时间内大批工人失业，是不能用不愿意接受现有工资解释的。不是工人不愿意接受现有工资，而是老板突然不用现有工资继续雇用工人了。为什么老板不能接受原有的工资水平继续雇用工人？如果失业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高于老板认为工人劳动的边际效用，那么为什么老板们觉得工人劳动的边际效用下降？为什么所有的老板几乎在一夜之间，同时同步地做出工资过高的判断？为什么这种工资下降会有周期性？

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

更糟糕的是，对工人来讲，苦难刚刚开始。工人一旦失业就很难找到原有工资待遇水平的类似工作。因为全社会的资本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觉得他们的劳动不值钱了。到处都是堆积的商品，工人却囊中羞涩。老板做什么也不赚钱，索性停产，老板不生产了，工人的劳动也就不值钱了。或者说工人不能创造价值了，所以对老板就没有用了。

这时有人就指责工人要价太高，一个月1000美元找不到工作，一个月500美元难道还找不到吗？

稳拿经济学假设工人工资水平下降，老板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问题是，老板的需求与产品的销售有关，当销售情况不改善的时候，工人工资再便宜，老板也没有兴趣多雇人。资本不养吃闲饭的人。这是现实社会用工的基本原则，而决不是只要工资便宜就多雇一个人，然后N+1个人干原先N个人的工作。

在到处压缩产能的时代，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某甲少要了工资，某乙就会没有位子，少了某甲的失业，多了某乙的失业。对个人来讲，失业问题解决了。对全社会来讲，失业问题会不会并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呢？

面对某甲的竞争，某乙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会不会主动接受500美元的工资呢？老板考虑到某乙是老员工，于是保留某乙，但是工资减半。这时社会上就会出现虽然工资水平下降了，某甲也愿意接受，但是他还是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某甲的存在，成了老板压缩某乙工资水平和督促某乙努力工作的利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爱干不干，不干辞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就如同有纳粹集中营的存在，让多数德国人老老实实一样。对某甲来说，这就是所谓的非自愿失业，即愿意接受目前的工资率，却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对某乙来说，必须不断接受更低的工资，保住自己的饭碗，免得被某甲这样的人夺走。

这种工资下降的趋势，会最终下降到工人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为止。这时如果老板还想继续压缩工资，工人就会选择辞职，去找能养家糊口的生计。这就如同农民逃荒。留在老家种地，多少还会有一些收成，但是却不够维持一年的口粮。如果榆钱、野菜、树皮、观音土能弥补不足的部分，农民就会选择留在老家；如果

不能维持，即使还有微薄的产量，农民也会选择背井离乡。低于这个标准，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留在老家，挖地三尺也不够维持生活到来年收获，留下只有饿死，既然那样就不如出去谋条活路。

如果资本家给工人的边际效用，低于工人谋生所需要的费用，这样的职位根本就不能算是有效的职位。如同农民对土地的产量有一个最低的要求一样，工人要求的工资有一个最低标准，即能满足其正常的劳动力生产循环。如果降低工资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工人就会选择相对较低的工资。如果降低以后，无法谋生，工人就会搞兼职。如果兼职以后还不能谋生，那就难免放弃这个所谓的就业机会，而去寻找其他能糊口的机会。

在稳拿的眼里，这也是“自愿失业”。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水平，还要工人接受，否则就是工人挑剔，这样的说法很无耻。工人是生产者，有那么多的产品卖不出去（尽管萨伊定律不承认这一点，却无法违背大众的常识），自己的工资却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即劳动力的再循环，这正常吗？

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中，上述工人的工资不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的情况不正常。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工资论，都与工人劳动力再循环挂钩。斯密认为，“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在斯密看来，对于需要靠劳动过活的工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传宗接代了。李嘉图认为，工资是工人出卖劳动的报酬。劳动像其他商品一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劳动者大体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换句话说，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相反，劳动的自然价格就下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随劳动的供求不断变动，但一般总是倾向于自然价格。

在以后的理论中，工人工资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就很正常了。

19 世纪 20～70 年代工资基金说在英国十分流行。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工资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都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詹姆斯·穆勒（最早提出萨伊定律的人）说，工资决定于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资本同人口的比例不变，工资亦不变；如果资本对人口的比例加大，工资即上涨；如果人们对资本的比例加大，工资即下落。工资基金表现为一个固定量，

一个常数，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工人人数的多寡。

按照工资基金说，不论工人创造的社会总大饼有多少，分给工人的量不变。现实社会中，不论是全社会还是具体企业，工资总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在繁荣期，商品销路好就要多雇人，经济在衰退期，商品没人要就要裁员，压缩工资。工资基金说违背了这些基本常识。

工资基金说的核心是想说明，工人工资低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无关。工人人数多，所以工人工资低。工人吃不饱，是工人人口太多，只有控制工人人口才能改善工人生活。本质上，还是马尔萨斯那一套。

两种理论的变化与当时的经济主导权的更迭有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时代，工人工资主要用于支付食品消费。工人工资高，其实是地主收益高，资本家为此必须承担更多的成本。维护地主利益的《谷物法》鼓励粮食出口，限制粮食进口，导致英国国内食品价格相对较高，英国工人工资也必须较高，所以资本家怨声载道。等到地主阶级交出主导权以后，资本家成为工资提供者，而农业资本家成为农产品主要供应者以后，工人的工资就与资本家的评价有关了，至于够不够维持工人劳动力再循环另当别论。

稳拿经济学把失业的责任推卸到工人不肯降低工资，把工人工资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推给人口规律，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几乎在一瞬间全社会的边际效用下降到工人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幅度？说到底，还是雇用工人不挣钱。不挣钱的原因，是东西卖不出去，或者即使能卖出去，利润低到无法维持。但是，如果这样解释的话，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便难免暴露出来。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工会是工人工资不能顺利下降以达到所谓就业平衡的最大阻力。稳拿经济学把工人失业的责任直接推给工会了。谁让你们团结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了，现在失业了吧。问题是，历史上工会运动非法的时候，工会势力弱小的时候，那时工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工人生活最困窘的时期，也并不比有工会以后的生活水平高。这怎么解释呢？再者，很多国家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很弱小根本不发挥作用甚至是黄色工会。这些国家的失业怎么解释呢？

资本家和他们雇用的经济学家顾左右言他了。

在资本家看来，资本有剥削的自由，劳动力没有反抗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资本家一直要求镇压工会：雇用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两厢情愿、互利互惠的事情，工会是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害群之马。资本家教育工人说，要记住，我们镇压工会是为你们好。

对失业的第二种解释是摩擦性失业，即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不合理。本来需要种红薯的，但是出现了很多种土豆的。种红薯的人手不足，种土豆的找不到工作。或者本来是厨子不足，却培养了很多木匠。结果一边是大批人失业，一边是大批工

作没人干。

实际上，这样的大规模失业很难持久。财富的金字塔的平级之间可以自由调节。只要不存在垄断，结构可以自动调节。种土豆改行种地瓜，木匠改行当厨子。每一个人大学里面学习的专业就一定与他工作的专业相对应吗？十有八九不是。毕业以后重头来，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常见吗？如果有足够的需求，木匠完全可以改行当厨子，一上来技术生疏不能颠勺，可以先切墩。原先切墩的去颠勺，原先颠勺的升任主厨。大批人员被吸收，菜的口味下降并不多。摩擦性的失业，难免存在，却很难在长时间保持高位徘徊。

在工业化社会尤其如此。流水线作业，全社会大分工，每个劳动者要求的专业技术水平都被下降到最低。机器取代了工资高昂的高级技工，大多数岗位要求的都是非熟练工，只有极少数的岗位要求高技术的技工。用极个别技工岗位供不应求的例子证明工业社会的失业问题是劳动者自己选错了行当，而不是社会总需求不足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个社会要求主要劳动者是技工而不是非熟练工，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小作坊和手艺人是工业劳动者的主流。引申一步讲，如果这个社会已经是工业化社会的话，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工业化大生产停顿了。事实上，停顿的原因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此外，如果长期存在摩擦性失业，就应该出现空缺职位与求职人数大致相等的情况。某些行业工资水平上升，某些行业工资水平下降。但是，这显然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因为在危机中，我们常看到的是全社会工资水平的全面下降，或者绝大多数职位工资水平下降，同时个别职位工资水平上升，而不是涨跌互现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同时选错了就业方向呢？稳拿经济学家提出因为政府干预，导致就业信息失灵，市场不能发挥作用。刚才推给工会，现在又把责任推给政府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经济波动，很难持久。所以，一切真正的危机都源于工人的贫困。

社会金字塔的平级之间是可以自动调节的，但是上下级之间却不能自由调节。当社会需要的产品与资本家提供的产品不对称的时候，资本家能自行改变产品结构。当社会需要的劳动力与工人能提供的劳动力不对称的时候，工人能自动改行。但是当塔的上级不愿意投资和消费的时候，塔的下级却没有能力去代替上级投资或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困难。

市场在金字塔的平级之间是有效的，在上下级之间是无效的。这是稳拿经济学要回避的。因为如果要质疑这个金字塔的上下结构，那么必然质疑稳拿地位，以及他们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公器私用的凯恩斯主义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产品做得出就卖得掉，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注定无法消费，如此必然导致资本家压缩生产，工人失业。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多余的产品需要政府帮助消费掉——甚至是浪费掉。无法消费的产品的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而增大，换句话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经济体，失业问题越严重。

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前，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政府的任何干预只会破坏均衡，制造麻烦。拿美国总统举例，在胡佛因为不作为被撵下了台，罗斯福的新政已经搞了三年多的时候，在经济理论上，还是胡佛是对的，罗斯福是错的。任何试图干预经济的做法，都会受到经济理论的指责，都难免承担以正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由稳拿控制的舆论的压力。

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年代，凯恩斯的理论都不会如此脱颖而出。事实上，在凯恩斯以前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提出贫富差距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达到凯恩斯的影响。这就如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放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会湮没在历史大潮中，唯有在戊戌变法前夕出现，才会历史留名。

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几乎把资本主义逼上了绝路。这次危机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在于广度和深度空前，而且在于其持续时间之久。与以往突如其来、自然痊愈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在发生了三年之后，不但没有痊愈，而且恶化了。1932年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的一年。1930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大约有300多万失业人口。1932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1500万~1700万，大约是当时全美国人口的15%左右，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不包括1100

万户农村人在内，全美有3400万[①]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去读《光荣与梦想》一书，看看当时多数美国人惨到什么地步。

不仅是美国，世界范围充满了危机和动荡。日本为了转移矛盾，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魏玛德国遭遇经济危机后，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负责组阁。从此，纳粹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军事实力迅速扩张，失业现象消失，社会蒸蒸日上，开始了12年疯狂扩张的历程。可以说，1929年的大危机注定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和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苏联从1928年开始，逐步实行五年计划。到1933年，苏联基本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卫国战争爆发时，德国吃惊地发现，苏联生产的T34坦克性能全面超过德国3号和4号坦克，而且产量惊人。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苏联人的命运可能和苏族人类似。

凡事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几乎没有失业同时经济迅猛发展的苏联对照，每一个西方政治家都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压力很大。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只要什么也不做，经济自己就会好转。胡佛坚信这一点，结果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不断攀升。最后被罗斯福撵下了台。罗斯福上台以后，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做什么，却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罗斯福搞了三年新政，经济取得了好转。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反对罗斯福了。罗斯福后来曾经说：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虽然罗斯福不欣赏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却为全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经常无法自我完善，“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需要“看得见的手”去辅助。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雇用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

① ［美］威廉·曼彻斯特，广东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第27页。

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以上是学术的说法。换成通俗的话，就是社会消费能力决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资本家供给多少，资本家供给多少，决定他雇用多少工人。有人买得起，产品有销路，资本家才生产。资本家生产，才会雇人。如果没人买东西，资本家生产赔钱。这时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人。社会总需求不足，所以就会有工人失业。不是工人要的工资太高，而是社会不需要这些劳动力。工人失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社会总需求决定于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人越有钱，个人消费数量绝对数越多，与总收入相比的相对数越少，所以指望有钱人消费是没戏了。投资品的需求决定于生意赚钱不赚钱和利率高低。投资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社会总需求不足，做出来也没人要，所以投多了也不赚钱。当投资的利润还不如利率的时候，资本家就都不投资了，持币观望，转而存银行吃利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高，那么投资就非常少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到处都钱紧。对企业来说，能借到钱就可能渡过难关，借不到就完蛋，所以实际利率往往非常高。这时大家都退出实业，去放高利贷。投资不赚钱，放高利贷很赚钱，大家就都不投资实业，对

投资品也就没有需求了。消费不足，投资也不足，产品生产出来没人要。结果就导致了大批失业，形成生产过剩型危机。

说来说去，其实还是消费需求不足。因为投资需求归根到底完全仰仗消费品的销售情况。凯恩斯后面啰里啰唆说投资的问题，根源在于萨伊定律认为资本家有钱不是消费就投资。尽管萨伊定律是幼稚的胡说，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为了驳倒萨伊定律，必须把事情说明白。

有人说《通论》难读，其实好读就邪门了。凯恩斯的理论的基础是稳拿经济学，稳拿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有效，现在要证明市场有时无效。这就如同本来是承认1+1等于2的数学，要证明有时候1+1未必等于2一样。本来很简单的道理，一旦用维护稳拿地位的稳拿经济学的理论阐述，就要绕来绕去，让人头大一圈。

凯恩斯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造成的消费倾向下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个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的确有社会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但是不均得像今天这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但是，他不希望建立所谓牺牲自由的集权国家。他希望资本主义做出一些牺牲，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牺牲，就是通货膨胀的代价："当今集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不过如果我们能对事业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或许可能医治这一痼疾，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他预期到了通胀的代价。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就很直接。他自己比喻说，让财政部把旧钞票装到玻璃瓶里，和垃圾一起埋到废弃的矿井中。然后，由资本家雇用工人挖出来。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衣物等商品，从而刺激了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这种所谓的一轮刺激另一轮，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

然而，现实世界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现实世界中的方案要有理论性，还要有可行性，具体操作中还要保证方案按照预期的目标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差，最微小的细节可能成为最致命的环节。

官僚集团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资本诞生的那一天就存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为这种争斗提供理论依据。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家与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的争论。最终的争论以"市场能自动调节，政府不要插手，大社会小政府是最理想的

模式”为结论而收场。换句话说，在理论上资本赢了，官僚输了。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证明了市场的局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凯恩斯无疑给官僚集团压制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挽救了资本主义，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从罗斯福的时代开始，美国总统权力不断扩张。官僚集团逐步压倒了议会和最高法院。这有军事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凯恩斯的理论在官僚集团扩张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操作中，政府财政的投入方向往往并不与需求和支付能力挂钩，而是与利益集团的政治能量挂钩。比如，美国政治中很出名的“滚原木”和“分猪肉”原则，在凯恩斯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盘子更大了，出现的结果不是穷人获得更多的照顾，而是利益集团有更多的猪肉可以分。不是削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强化既得利益集团。在号称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中，尽管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是大量人口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都差强人意。许多人吃得很糟，穿得很糟，住得很糟。

财政是公器，公器就可能被私用。公器私用越严重的经济体，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资本家有可能根本不必雇用工人开采货币矿，财政部的官僚也不必安排人埋钱。资本家只要象征性的花点小钱，财政部的官僚就直接把财政拨款划拨到他们的账户了。这是凯恩斯在他的货币矿的设想中没有想到的情况。凯恩斯主义是用通胀换就业，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公器私用越严重的财政体系，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乘数效应越差。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消灭同样的失业人口需要投入的货币越多，换句话说日后的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越严重。解决就业事倍功半，刺激通胀却立竿见影。按下葫芦瓢起来，葫芦未必下去，瓢先起来了。

凯恩斯主义意识到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根源在贫富差距，却没有意识到在公器私用的作用下，财政刺激和随后通货膨胀直接加剧贫富差距。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本来试图消灭的危机，反而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在公器私用严重的经济体中，凯恩斯主义甚至可能成为经济的毒药。最终，凯恩斯的药方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反面。

凯恩斯主义“背书”了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公器私用，资本的势力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另一方面，公器私用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留下了口实。迟早会有人挑战凯恩斯，挑战他的人注定历史留名。

挑战凯恩斯的人，就是号称“20世纪第二大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他只能称为第二大，第一大经济学家是凯恩斯）。

圣骑士：弗里德曼打了个补丁

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系，有一显著特征：即在产量与就业量方面，虽然有剧烈变动，但该经济体系并不非常不稳定，反之，似乎可以在次正常状态下，停留一段相当时间，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里德曼，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圣骑士。在他之前有哈耶克，与他相比，哈耶克生不逢时。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人为私利的社会中，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退化——官僚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如果不加以约束，则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危害，很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资本主导经济的危害。

西方民主政治一直与幕后交易分不开，为政客服务的人，往往能获得必要的回报。历史上，在美国替总统候选人募捐的人，如果押对了宝，往往能获得大使等要职。这是个人的好处，具体到利益集团，则往往选择一个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的候选人。利益集团和候选人的关系，往往长久而稳固。许多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候选人服务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支持候选人，彼此成为一种互利互惠的主仆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是你给我赞助，我当选以后投桃报李，还是我能掌握你的发展情况，所以你要给我赞助。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很重要。虽然皇帝与太监都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是皇帝一旦被太监篡权，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尽管凯恩斯也对集权主义高度警惕，但是在 30 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管不了这么多。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使官僚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决定权不再在于生产效率，而在于与官僚的关系。获得伊拉克重建的订单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投标公司的综合实力，而在于其公关能力。美国和英国公司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官僚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换句话说，官僚也关心自己手中的资本。如此一来，资本积累与市场无关，而决定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博弈，即所谓通往奴役之路。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与民争利和假公济私，制造新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积累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市场上的性价比的竞争变为与官僚关系

的亲疏比的竞争。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成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反动。

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给官僚划一条界限，避免凯恩斯主义无限退化下去。

第一个给官僚夺权敲警钟的是哈耶克。不过，生不逢时的哈耶克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更没有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由于二次大战使英国社会出现了既深且广的变化，遂促使社会上出现要求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急迫需求。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更明确指出战后政府应该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工党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如获至宝，把这本书用于选举宣传：这本书使他更加忧心工党上台以后的后果。尽管保守党大量印刷这本书，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历史。战争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落选了。

当时的英国人对苏联普遍印象不错。铁幕、柏林墙、匈牙利事件，《新阶级》在纽约发表，苏联印象破灭，都是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西方有力的盟友，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后20多年，苏联就由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与半死不活的欧洲相比，苏联模式确实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距离产生美，身在欧洲的人们对苏联国内悬殊的等级制、翻来覆去的大肃反和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几乎一无所知。大洋的另一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给予了欧洲劳动者的希望。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有榜样的作用。这个时候，说政府干预会如何如何，自然没有听众。

弗里德曼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时，铁幕已经落下，种种关于苏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播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否定了斯大林，也震惊了世界——苏联国内原来是这样子啊。彼此为领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立，双方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剑拔弩张，全世界担惊受怕。美国人严重受惊——美国人从没有感觉过外来的威胁离自己如此之近。在此之前，即使两次大战，也是海外的事情。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随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政府在民间的信用跌到二战以后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扩张到了战后的最高。尼克松已经轰炸了柬埔寨，却根本不和国会打招呼。政府几乎失控，三权分立原则面临失衡，国会和最高法院都被政府扔到了一边。尼克松的“管子工”[①] 是属于总统私人的秘密调查部门，准备使用非常手段收

① 尼克松时代，白宫下令成立的“业余”反间谍班子，因其任务是调查泄密原因和堵塞漏洞而得名。后因业务水平拙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解散。后来，两位前“管子工”成员，终于惹出了“水门事件”。

拾泄密者。国家大政方针的是非对错，完全在美国总统的私人判断。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更让资本郁闷的是，做出这些事情的居然是要强烈反共，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右派尼克松。“想不到啊，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革命了……”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无疑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弗里德曼的理论流行的社会基础有两个：第一是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第二个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弱化。美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之间，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结果，资本家受到削弱，工人得到扶助，美国政府借维护工人利益扩张了自己的权势。社会主要矛盾由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转变为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改善，工会实力增强，工会领导人逐步向官僚化发展，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当然，卢瑟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卢瑟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政府能有必要的救济）和物价别太贵这两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都做得差强人意。当时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常年保持20以上。

哈耶克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自然生不逢时。作为研究社会学科的人，要领先于时代，这样才能体现他先知先觉。但是也不能太领先，否则在著作发表的时代大家并不理解。所以，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悲剧”了，而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喜剧”了。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名分的，要知道谁是皇帝，谁是太监。这本书开篇讲的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要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或者“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胞能够通过政府做什么。”——开篇明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是皇帝，是太监。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做的第一要务是国防，第二要务是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调节财富分配则属于“是一个人认为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有害的”范畴。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要求的话，就会发现三件事说起来冠冕堂皇：第一是不要外来势力干涉稳拿；第二是要求法律是保证契约的执行，不要插手稳拿利用契约合法地抢劫卢瑟；第三是不要试图触碰，甚至返还抢劫的赃物。具体地说，就是保护本国稳拿，不许外来的势力推翻本国稳拿，保护本国稳拿剥削卢瑟，不许本国卢瑟赖账。除此以外，政府做的其他的事情，都可能是多余的，尤其是试图重新分配财富。美国政府确实干涉资本的行为，比如强行拆分垄断企业。历史经验表明，这样行为是必须的，而且美国政府的操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低限度的。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也无法忍受。资本要求的就是剥削的自由，任何制约它的外来限制，都会让它觉得不自在。

表面上看，维护契约的实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必然对强者有利，对弱者不利。对弱者来说，与强者费厄泼赖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普通公民都有普选权的社会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能直接说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稳拿的剥削地位，于是就说要维护契约的实施。虽然换了个说法，但是本质上还是资本至上那一套。由国家暴力为资本搭建一个擂台，在这个擂台上稳拿和卢瑟公平竞赛，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稳拿不必心慈手软，卢瑟也不许赖账，这就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社会。至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宣扬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就很清楚了。

接着弗里德曼介绍了若干天才，这些天才的成功都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用停滞代替进步。但是，弗里德曼却闭口不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要去工厂做童工。这些孩子即使有超人的天赋也可能在劳累中过早的夭折，或者一生无缘接触现代科技，仅仅作为“人肉电池”贡献最简单的体力和脑力。智力是不稳定遗传的，财产是稳定遗传的，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显然不能与智力完美匹配。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很常见的事情，却被无视了。

弗里德曼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公开的观点，骨子里还是要宣扬资本至上。在他看来，资本是皇帝，政府是太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皇帝权柄下移、太监犯上作乱的风险。

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读者难免要问：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尽最大幅度压迫工人。如果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就是工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呢？如果政府不干涉经济，那么会不会成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压迫工人的局面呢？当然，这种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表现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拿要用边际效用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彼此互利互惠的行为，尤其是雇用，所以不存在压迫。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卢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被稳拿代表了。

卢瑟被自由了。卢瑟的利益也一样被代表了。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一个命题：交易使双方获利，只要双方自愿并不带欺骗性。那么抢劫算不算自愿交易呢？某甲用枪顶着某乙的脑袋，某乙自愿交出自己的钱包。于是，某甲获得钱包，某乙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当然，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自愿的，某乙不接受某甲的条件就会丧命。那么，如果某乙不接受某甲提出的条件，就可能饿死，某乙接受某甲的条件，就能苟且活下去。这算不算自愿呢？自愿与双方获利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实

际上，按照日常的经验，自愿和双方获利，只有在双方经济地位接近的时候才能存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贫富分化，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就不会平等，不但会不平等，而且会越来越悬殊。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权比别人大得多。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钱人显然比没钱的人更自由，他们显然比穷人有更大的权力。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卢瑟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必然有不同的结果：从一个角度看，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卢瑟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稳拿渔翁得利。所谓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控制这些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相比控制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稳拿，卢瑟怎么可能不反对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呢?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 20 个扣针提高到 4800 个，提高了 240 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出来的 4780 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拿给工人的数量越少。

如果鲁滨逊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合算，分配者太贪婪，给自己的份额太少，可以自己单干，自己生产各种生活用品自己消费。工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是，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断绝了他们当小农的路。

工人一无所有，男耕女织绝无可能。不出卖劳动力，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经济行为的起点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终点是用出卖劳动力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稳拿则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工人。对工人来讲，接受剥

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进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弗里德曼宣扬的自愿交易、皆大欢喜的真相。

能够制约资本这样肆无忌惮的剥削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极力攻击的目标，也是弗里德曼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不能因为官僚主义在工会和政府之中蔓延，而把两者说的一无是处。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家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 = 收入保障数 - ［个人实际收入 × 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 = 个人实际收入 + 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负所得税方案，就是个画饼。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他这样说，非常不厚道。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高关税保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避免被英国资本吞噬，避免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充当经济危机替罪羊。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美国政府平息了反叛，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军事扩张，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 1929 ~ 1939 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 1929 ~ 1939 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 30 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得多。我们有

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善事的天使，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事实上，资本是可以为了300%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如果凯恩斯主义把自己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则可能更糟。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100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他的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打扮，必须把资本的利益充分伪装，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不然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需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分，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小资有话说：中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合。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

——《资本论》（第三卷）

除了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没有哪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视而不见。

即使同样处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强烈反对大资产阶级不顾全社会消费能力，盲目发展生产。在资本家内部，每次经济危机倒霉的都是小资产阶级（以下简称“小资”）。小资与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万里长城。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进、小资本退”的过程，也是一次小资财产归零的过程。大批小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清零，成为大资本的牺牲品。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资本来说，就是抢别人的市场，卖自己的产品，让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我不用跑得比熊快，我跑得比你快就可以。我跑得比你快，你就成为熊的点心。所以，张三惹祸，李四买单，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如果张三惹祸越大，越不用自己买单，那么对张三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不是自我收敛，而是把祸惹得更大，反正洪水滔天，淹没的是别人。这是同行之间的竞争。

上下家之间则更残酷。某甲和某乙竞争原料，控制原料的某丙就可以提高售价。某甲和某乙争夺市场，控制市场的某丁就可以压低进货价格。除非有暴力的支持，否则小资本只能处在某甲或某乙的位置。小资本竞争，大资本渔翁得利。某甲和某乙的利润，被某丙和某丁瓜分。某甲和某乙的利润稍微上涨一点，就被某丙或某丁一股脑地吞了去。至于损失则完全推卸给某甲或某乙。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其实不但死后不必担心，就是活着的时候都不必担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资格引发洪水的人，在洪水之中最安全。每次经济危机的洪水都会消灭一大批小资本家。真正制造经济危机的人，则根本不必担心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尽管洪水是他们造成的，但是他们可以稳坐钓鱼台，看着小资本家被洪水吞没。将来洪水退去，他们还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遗体上，搜索免费的首饰和金币。所以，谁捅的窟窿越大，谁越有钱买船票。不但能买到船票，还能从死人身上捡便宜货。

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从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破产，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同样是资本家，冰火两重天。危机的时候，小资本家是大资本家的缓冲器，也是他们的猎物。一边是房倒屋塌，上吊自杀；一边是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乐不耽误，回头收拾残局，并购资本，占领市场。明明是大资本惹祸，承担责任的却是小资本。大资本吃肉，小资本挨打。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很简单，生活安逸富足即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安宁无忧。小资产阶级既不希望暴力革命，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也反感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即所谓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希望的是公平交易的社会，所谓的“公平”就是让他们的资本能获得适当的利润。但是，由于财产具有自我汇集的效应，古往今来小农经济就没有长期稳定存在过。小农如果不能进化为大地主，那么迟早会被地主吞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大资产阶级对抗地主阶级和官僚，或者镇压工人的时候，小资产阶往往跟在后面起哄。他们希望在大资产阶带领下，推翻地主和官僚的压迫，牢牢控制破坏社会稳定的工人，建立一个以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的“乐园”，自己能快快乐乐地发财致富。他们乐于相信大资产阶级编造的各种草根，规规矩矩最终奋斗到君王的“传奇”，看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觉得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和好运，在这样的“乐园”中有朝一日能取而代之。不过，资本主义的竞争始终贯穿马太效应，很快就打破了小资的白日梦。大资本从来不会给小资本保留公平的利润。在社会金字塔之中，大资本会无情地挤压小资本的利润空间，同时转移风险。现实生活中，一旦某个小资本家因为各种机缘成为大资本家，他也会抛开公平交易的概念，推崇“物竞天择”，而绝不会对自己当年的同辈心慈手软。

自由竞争的交易中小资处于绝对的劣势，残酷的事实让他们警醒，他们自然不满意这样的制度。对经济危机，小资本的态度很简单，经济危机是因为你们大资本生产得太多了！消灭经济危机就要抑制和消灭大资本。

有人说，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消费不足理论，颇受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影响。绝大多数伟人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天才凭空创造，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西斯·蒙第出身牧师家庭，在里昂的银行当过职员。法国爆发革命以后去了瑞士。后来瑞士革命以后，因为他家与一些贵族来往甚密，他和他老子一起进了监狱。后来他移民英国和意大利，经营自己的农场，1800 年返回瑞士。与出身豪门、后来自我创业成为金融巨头的李嘉图不同，西斯·蒙第一直没有成为暴发户，始终是个小资。

里昂在历史上是法国的金融中心和丝织业中心，是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主要客户都是贵族，负责特供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里昂的产品不仅是

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包括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帏幔、窗帘、壁布、家具镶料等。枫丹白露堡、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罗浮宫的装潢布料都来自里昂。可以说，里昂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王室和贵族的御用资产阶级。里昂仰仗贵族的消费，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感冒，甚至有些反感——大革命影响里昂产品的销路。1793 年，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富歇在里昂血腥镇压了 2000 多人。

在里昂生活期间，西斯·蒙第对里昂资产阶级处处仰仗王室（和为王室服务的官僚）以及贵族的鼻息深有感触。里昂丝绸产品销路的好坏、当地资本家的兴旺与破产，完全靠封建统治阶级的恩赐。后来的血洗里昂，西斯·蒙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颇为震动。所以，在西斯·蒙第的思想中，一方面希望资产阶级摆脱封建贵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惧怕革命。所以，西斯·蒙第在早期的著作《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应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非常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即不要束缚也不要革命，只要把一切交给资本，资本会把一切做好。

法国大革命砍了国王路易十六、王后和一大批贵族的脑袋，封建制度被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解放。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内部利益迅速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成了对立的双方。19 世纪初，经济危机开始袭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大资产阶级不断扩产，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

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西斯·蒙第惊讶地发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大资产阶级代表了：一切交给资本，其实是一切交给大资本，小资本根本没有决定权。于是，他的思想 180 度大转弯。1819 年，他发表了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转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不能让大资本说了算。

大资产阶级只考虑生产，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萨伊说，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掉，卖不掉是资本家经营不善，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则从消费分析经济：没有消费者，生产有什么用？消费决定生产。所以消费要优先于供给，而不是供给带来消费。人们的消费直接受分配到的收入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消费特点。这种特有的消费特点，导致生产力超过消费能力。按照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生产超过消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小生产者破产，丧失了收入，从而降低了消费。生产无限的扩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相对生产能力日益缩小，产品没有销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按照萨伊的说法，产品卖不掉是资本家自己经营不善，或者说，大资产阶级日益发财是理所当然，小资产阶级日益破产是纯属活该。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经

济危机是因为大资产阶级生产的生产方式导致多数人贫困。相对消费能力，产品太多了，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大资产阶级抢占了小资产阶级的市场，大资本的产品卖得掉，小资本的产品卖不掉，工厂倒闭。大资本否认危机，把责任推给小资本。由于大资本的存在，危机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不断爆发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最早提出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自相矛盾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呢？

大资产阶级的产品不愁销路，在萨伊和李嘉图的理论中，发展生产就是最高的目标。小资产阶级的产品经常卖不出去，在西斯·蒙第的理论中，满足社会个人消费的需求是最高目标。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和工人的经济地位最接近：本来就处于社会金字塔中相去不远的位置，而且随着大资本的压榨，两者经济地位不断靠拢。所以，西斯·蒙第的理论对大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也就毫不留情。西斯·蒙第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小企业的没落、农村人口不得不外流、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工人贫困化、机器驱逐工人、大规模的失业以及社会的阶级对立、生活不安和无政府状态。这些都是大资本惹的祸。大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矛盾一大堆，而且不断激化，大多数人都不幸福，要那么高的产能有什么用呢？这些其实也是卢瑟想说的话。

既然经济危机是大资本惹的祸，治疗经济危机就要制约大资本。但是，自由交易的市场之中，小资本肯定是斗不过大资本的。为了制约大资本，必须有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西斯·蒙第看来，政府要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国家要调节经济生活，立法者必须是穷人获得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每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运动，政府的职责则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

西斯·蒙第希望把城乡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分散成为数众多的小农场和小作坊。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求法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遗产的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西斯·蒙第认为，这样一来，私人利益就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弥补。

西斯·蒙第的方案可行性值得商榷。首先，在人人追求私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给予政府干预经济无上的权力，那么政府的退化是无法避免的。什么叫“完全合理的裁判”？“合理”两个字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定义。伸缩的弹性完全掌握在立法和司法者的手中，这就使他们拥有了经济主导权。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的人，

是否一定会照顾底层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个未知数。小资产阶级过分依赖官僚，结果很可能出现哈耶克所警告的通往奴役之路。德国纳粹党是在垄断资产阶级默许下，由小资产阶级推上台的。上台后的纳粹党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戈林那样的高层利益外，较多地照顾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顾及却很少。实际上，大资本和官僚都可能压制小资本，不论哪一方获得优势，都不是小资本的福气。

其次，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真的按照西斯·蒙第的想法，采取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削弱了本国的大资本。那么，本国的产品与其他国家的产品在竞争过程中，就难免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商品进出口完全自由的话，这种削弱本国大资本的政策的最大受益方，很可能是外国大资本。

再次，西斯·蒙第希望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小生产所有制的时代，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工业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机械和复杂的工艺，显然不可能拆散为若干环节，在一家一户的小作坊中完成。纺织业也许可以一家几台纺纱机或织布机，但是冶金化工这样的重工业很显然不可能一家几台高炉。何况，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完全不能和现代化纺织机械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核心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用退回到手工作坊的时代抑制生产力的方式克服经济危机，是削足适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按照小资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有问题，而是大资本的经营方式有问题。所以，只要消灭、制约大资本，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希望资本主义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但是，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先是贫富分化，然后大资本消灭小资本就是必然的规律。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只要一代人，就能在社会上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能力的竞争最多在一代人之间发挥作用，一代人之后资产确立统治地位，竞争就死掉了。如果让政府制约大资本，又难免陷入官僚独大的情况。这种情况，如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社会，很可能更糟糕。如果强行退回到手工工场阶段，又意味着生产力的大规模倒退。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意味着本国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工业化的时代让小资破产，所以小资提出要退回到工业化之前手工生产的时代。当时的小资希望由某一权威创造这样的安宁和谐的社会，他们的想法浪漫而美好，却不易实现。

本章小结

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

第一派是神父、官僚和地主的解释。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丧失了经济主导权。他们一方面把劳动者当简单的提供电力的电池看待，一方面看不起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们的解释简单直接：工人失业是他们生孩子太多，就应该受穷；产品卖不出去需要有人来帮助资本家消费。解决方案同样简单直接：扔掉多余的电池，把失业的工人关进集中营饿死，实行强制绝育；神父、官僚和地主承担饭桶的角色，把多余资本家的产品拿过来，吃掉资本家多余的利润。——我们消费掉这些产品是为你们（资本家）好，你们应该眼含热泪，心存感激。

第二派是大资本家的解释。经过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表面上是民主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和被他们领导的社会有问题呢？稳拿经济学的专家推崇萨伊定律。只要生产得出来，就能卖得出去。所以，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工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没有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问题。产品卖不出去是个别资本家经营有问题，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专家的作用就是维稳、辟谣，或者说是澄清事实，教育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稳拿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火车已经停了，但是不妨把窗帘拉上，继续装作火车还在走。这么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否认危机的也只有这一派。不过，不论他们是否承认，事情摆在那里，周期性的商品滞销，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不承认不过是掩耳盗铃。

其实，对大资本家来讲，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未必是坏事。经济危机可以促进资本的汇聚，这些资本会自动汇聚到强者——也就是大资本家手中。保持一定数量的工人失业也是好事。“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你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愿意干。”这是老板常说的话。只要保持一部分人始终找不到工作，职员就不敢多说少道。

这一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凯恩斯，提出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危机由此产生。凯恩斯的出现是因为有革命的压力。只要是资本，就要挣钱。挣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别人饿死活该，我发财就行。不把你逼到饿死，你怎么能倾家荡产买面包？不让工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怎么能自愿去血汗工厂？所以，如果一切都交给资本，按照资本的意志行事，非弄出个对大资本有利的帕累托最优，然后社会底层不触动顶层大资本的利益就活不下去。这时，如果没有人主动约束，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本家不必考虑社会矛盾，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社会矛盾。资本家往往忘记了暴力是元要素，财产必须在暴力的支持下发挥作用这个原则。资本家可以不考虑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个社会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人，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是卢瑟，饿死活该。你敢造反，小心资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是，资产阶级专政对少量、零星的无产阶级反抗是有效的，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全面抗争是否有效则值得怀疑。毕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但是被卢瑟推翻的数不胜数。沙俄的例子证明“后膛枪时代无革命”只是一句空话，鼓舞了卢瑟，也让政治家戒惧。政治家必须考虑，在大量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大批工人失业、嗷嗷待哺的时候，给他们讲任何经济学的宏观大论都没有用。经济学家可以愚弄他们的头脑，不能愚弄他们的肚子。他们要吃饭，没有饭就要出乱子。“要么是面包，要么是子弹。”减少饥饿的本国失业者，面包比子弹好。再说，暴力能否让所有工人听话，政治家没有大资本家那样的信心爆棚。

凯恩斯是这一派的叛乱分子，挽救了资本主义，却给了官僚权力。所以，凯恩斯是这一派的大魔头。虽然资本不喜欢他，但是官僚支持凯恩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人都为私利运动。官僚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利。在官僚势力强大的西方国家，由于官僚和利益集团公器私用，凯恩斯主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把问题复杂化。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往往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毒药。这又给反对凯恩斯的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然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站出来反官僚。其中，弗里德曼名气最大，成了这一派的领袖。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经济危机是政府不当干预经济的结果，不是大资本的责任。只要一切交给资本，一切万事大吉。但是很显然，历史上没有官僚插手的时代，经济危机照样爆发不误。没有官僚制衡，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虽然两派争来争去，但是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

这一派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全民的利益，无论是官僚还是大资本家，都说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只要把经济主导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就能完事大吉。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多数卢瑟的利益吻合，而是因为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卢瑟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源，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策不伪装起来就无法推行。

第三派是小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小资本家最倒霉，平时受官僚和大资本家的气，每次危机破产的主要都是小资本家。所以，小资本家的观点和无产阶级最接近。小资本家最开始希望官僚少插手，一切交给市场。后来受大资本家压迫，指出大资本家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希望政府介入抑制大资本家，保护小资本家。小资本家是弱者，总是受气，总希望有强者保护他们，跟在强者后面吃香的、喝辣的，最好还能有朝一日混进强者的队伍。但是不论哪一派掌权，都不把他们当回事。对他

们来说，不要说混进上一层，能勉强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成为卢瑟就不错了。所以，他们的观点必然不断地变来变去。

小资产阶级提出的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显然这不能被接受。即使某一个国家退回到小农，也会被邻居强行转化为殖民地。后面会谈到，资本主义是有极强扩张性的生产模式。不成为主人，便是奴隶。

以上三派的解释，对与错放一边，共性是：都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解释（或者掩饰否认）危机。

除了僧侣、地主、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卢瑟也要提出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卢瑟说，这是真理；小资说，这么说有道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这是危言耸听，危机是由于生产信息与消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小生产者没有及时获得正确的信息，所以生产了结构不合理的产品。劳动者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选错了职业培训方向，不了解工资行情，所以毕业就失业。只要完善信息交流就不会有危机。谁也不会生产没有消费者的产品，只要对资本有用就会找到工作。产品滞销是厂家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工人失业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了，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全社会的生产者会周期性的信息失灵？工人会周期性工资要求太高？

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危机，什么引起的危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危机的原因是产品（劳动力结构）比例不合理还是总量过剩？如果是比例不合理，那么就存在合理的可能。只要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不足的部分就可以，调整产品结构就能避免经济危机。

如果是产量相对购买力过剩，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存在内在的问题。如果承认劳动者贫困会导致经济危机，那么无疑就会质疑分配制度，换句话说，以资本为主导的分配行为会导致经济危机。显然，最终难免质疑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能否顺利运转。这是大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的。无论如何，不能质疑看不见的手，不能质疑资本主导的分配方式。所以，在稳拿经济学看来，马克思是大魔头，凯恩斯是坠入黑暗的暗黑骑士，而弗里德曼则是维护正义的首席光明骑士。

部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承认比例不合理可能导致危机的同时，否认总量过剩必然导致危机，本质上还是不承认危机的必然性。很显然仅仅因为产品比例不合理的危机，不能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全面的过剩总会表现为某一种商品的过剩。所以，用商品结构不合理，似乎可以掩饰产品全面过剩。但是，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定期发生，却是无法用“结构定期”不合理解释的。用结构不合理掩饰全社会消费不足，而结构永远不可能合理，表象上是经济总是定期发生全面生产过剩现象。结

构完全合理，只是理想中的状态。

如果某一种产品过多，对应其他产品不足，则说明产品结构不合理，不存在全面过剩。如果只有某些产品过剩，没有其他产品不足，或者多数产品过多，少数产品不足，则说明产品存在全面过剩。事实上，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的话，常见的是后一种现象，即全面过剩。

如果承认市场是完美的，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不完美的事情。所以，自由市场绝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失业的原因是工人提出的工资要求太高（后面会证明非自愿失业的必然，在此暂不论述）。工人找不到一个月1000块钱的工作，还找不到一个月100块钱的工作吗？谁说100块钱不够吃饭？工人买不起面包，面包房自然会降价，怎么会没有饭吃？多么完美的逻辑。如果不是空话，至少是纸上谈兵。

只要默认市场是完美的，后面的任何论述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如同已知市场是完美的，求证市场是完美的一样。一切的论述都是在市场完美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怎么可能证明市场的缺陷？这是凯恩斯在他的《通论》的论述中最尴尬的地方。

市场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那就需要让市场不断向完美的方向运动，这是另一种解决方式。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只要市场足够完美，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说法如同巫婆神汉法力不灵的时候，并不是老实坦白自己在忽悠人，而是谴责其他的人不够虔诚。

大资产阶级推崇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因为这个假说给大资本家控制世界经济打了保票。他们的经济学家推导模型，采用的是鲁滨逊的荒岛。问题是，自给自足、偶尔去集市交换产品的小农生产，与今天的“所有人为别人生产，少数人主导分配，所有商品要出售，所有人购买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一回事吗？

为了维护资本的理论，自然不会推导出对资本不利的结论。实际上，在物品交换主观价值增加，替代生产过程中劳动价值增加的那一刻，市场交换就注定不会受到怀疑。或者说，资本主导的交易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获得了稳拿经济学家的背书。

承认劳动价值论必然推导出全面过剩的结果，资本家的剥削和不可避免的全面过剩的危机是马克思的理论的必然结果。承认边际效用论，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待遇，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资本家为了减少成本，压缩了工人的数量。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评级发生了较大的分歧，彼此无法达成一致，于是生产者保留商品，消费者保留货币。失业、滞销、萧条，这些现象都不是稳拿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与双方的主观评价无关。市场上双方成交必然是有利，双方不成交也是有利。尽管，抢劫也可以算是一种成交。

对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来讲，只有一个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交易。只要自由交易，资本就能不断扩张，即使在危急时刻。事实上，每次危机都是资本迅速扩张的时候。大量的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噬掉，如果以劳动时间估量，社会资本总量也许下降，但是大资本所占的绝对份额必然会上升。他们一再强调政府能承担守夜人的角色，不要插手多余的事情。尽管历史上的“守夜人政府”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屡遭经济危机的打击，他们仍然视而不见，那是他们最怀念的时期，是资本为所欲为的时期，帕累托最优的时期，是把工人逼上绝路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自己走上绝路的时期。

认识经济危机并不复杂，解决经济危机（至少从理论上）也不复杂，复杂的是后面纠葛的利益。经济危机袭扰人类将近200年了，解决的办法，无论是书面还是实践的都不少，各村有各村的高招。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后面几种。

希特勒的解决方式是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

凯恩斯的解决方式，是政府印钱，由政府创造需求。多余的产能浪费掉，资本家不是没钱不生产，不雇用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政府有印钞机还愁没钱支付？后果是通货膨胀或者资产泡沫。

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

这么多方法，多数效果都不好。这是因为稳拿处于塔尖的地位，直接调节总量而不触动分配模式的解决方案，不过是给稳拿更多的发财的机会，导致更严重的分配不公。如果触动分配模式，又难免遇到稳拿的强大阻力，很可能半途而废。再说，即使选对了方向，具体操作过程之中，还难免因为个人私利而变味。

不触动顶层的利益，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减息和扩大财政开支。减息很可能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胀，扩大财政开支也难免刺激泡沫和通胀。通货膨胀买单的往往是底层。这是因为稳拿有更好的博弈条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和紧缺物资，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稳拿把贷款用于资产投机和囤积商品。而卢瑟不但没有机会去搞囤积，还被迫接受更高的物价，常年积蓄的养老金也会大幅度缩水。如果搞不好，还不如不搞。

“世界也没有救世主。”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如果有某甲对其他人说：“我是为你好。”那么，这个某甲有可能是为对方好；更可能是为某甲自己好；甚至可能仅仅为了某甲的利益，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至于“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大可不必当真。如果某甲不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其他人的利益，那么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同理，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如果某人说他的方案能增加全社会的福利，那么卢瑟一定要多个心眼：这个方案有可能增长全

社会的福利，更可能仅仅增长此人的福利。卢瑟的福利，在这个方案中，很可能被别人代表了。

经济理论也是一样。引导全社会思想的经济理论，必然包含本阶级的利益。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为了能说服尽量多的人（至少要让他们产生迷惑），就要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到社会的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卢瑟，稳拿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卢瑟的利益就是很正常的了。

各种解决方案，首先是维护本阶级利益，至于能不能解决（至少缓解）经济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情。

如果要认识经济危机就必须从市场的运转考虑。从每一个具体的资本的行为，归纳出社会总资本的行为。而市场是否完美，只有在分析了总资本的行为以后才能下结论，而不能在一开始就作为初始条件强加给分析过程。

市场的行为，显然不是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平衡那么简单，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必须从分析资本和市场开始。

第2章

资产的属性

资本“魔鬼”的罪与罚

暴力的兄弟：资产与暴力的关系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于是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

——《论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阶级社会从来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普世规律。这是我早就说过的。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

占有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依靠暴力，一种依靠产权。

尽管暴力退出前台，隐藏起来，但是阶级社会的税收，仍然具有暴力的属性。比如中世纪欧洲征收的什一税，名义上是教徒自愿的，用于供养僧侣，完成各种宗教活动。既然是信教，就应该尽教徒的义务，天经地义。不过，当时在欧洲，异教徒虽然不会被要求征税，却要被送到宗教裁判所。所以，是缴什一税，还是火刑柱，自己选择。

有暴力作后盾的税收，很容易失去上限，最终失控。所以，现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税收都经过议会的终审，而不能由行政部门自行决定。林肯当年为了支持南北战争，开征直接税，美国有人提出来这样做违宪，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属于政治研究的范畴，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提及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与靠产获得剩余价值进行对比。如果说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是抢劫，那么依靠财产获得就是盗窃。

这里的产，与财产属于两个范畴。这里提到的产，不是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汽车、住房，而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产品属于个人无非两个用途：消费；再生产。属于个人的产品，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些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不算产。比如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住房以及部分存款。通俗而不太严格地讲，产是可以越来越多，可以“用钱生钱”的财产。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只能贬值，没有这样的功能。包括各种投资者，他们手中拥有的各种证券也未必能成为产。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都是给

庄家送钱的人。

在奴隶社会，主要的产，就是奴隶个人。到封建社会，主要的产是土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可以在市场购买，都可能成为产。

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过程中究竟什么成为产。成为产，必须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好控制的。缺少这两个特点则无法稳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就不能成为产。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加土地，产生出农产品。奴隶社会时期，人口数量有限，大量土地处于荒芜状态。这时控制土地不现实，必须控制奴隶人身自由，才能保证获得剩余价值。到封建社会，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开垦出来，没有开垦的残余地块很少。这时，给予农民一定自由，由控制人身自由，改为控制土地，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产量，也可以减少监工成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把孩子他妈妈攥在手里，孩子还能跑了不成？

美国建国初期，农业为主，西部地广人稀的时代，虽然美国人追求民主，但是民主的光芒却普照不到黑奴和白人契约奴身上。如果那时美国农场主给黑人自由，那么黑人十有八九不会在农场当佃农，而是会去西部开荒。——有大量荒地的时期，谁也不会主动去当佃户的，除非此人智商有问题。

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原地区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不同的社会对比。北部地广人稀，稳拿如果给卢瑟自由，那么多数牧民都会选择自主生活，而不会继续向统治阶级提供剩余价值。反之，如果他们进入中原地区，那么奴隶制控制人身自由的低下的生产模式必然改变为控制土地的生产模式。奴隶主必须进化为地主。如果奴隶主坚持落后的生产模式，那么必然被地主所淘汰。所以，利用产榨取剩余价值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具体方式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各有差别。

资产阶级推翻大地主阶级以后，各种生产资料都可以在市场获得。这个时候，任何生产资料都可以成为产，或者说资本。与十指不沾泥、除了吃喝玩乐和权谋，对其他知之甚少的奴隶主或地主不同，早期的资产阶级是生产的组织者，甚至是参与者。与奴隶主和大地主相比，资本家的地位是最不稳固的。

获得产进而不劳而获，是一个靠暴力得天下，靠仁义道德坐天下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强盗进化为稳拿的过程。当然暴力仍然是存在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隐藏在幕后。

产的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勤劳、善良、节俭无关。稳拿的前身，大多数都是强盗：奴隶社会多数奴隶来自战争，是战俘或者他们的后代。在封建社会，大地主阶级主要依靠战争或权力获得田产。刘备入川，忙着分给各位将领良田美宅，如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争地。满洲人入关，八大旗跑马圈地。

从发财的角度看，“抢钱、抢粮、抢娘们”，不如“抢钱、抢粮、抢地盘”。因

为地盘是产，有了地盘什么都有了。不过，在天下大乱的时期，社会动荡，产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抢娘们更实用。

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样是血淋淋的。统治阶级会不断提高榨取剩余价值的量，农民丰收，地主就会提高地租。靠个人节俭，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何况，即使积累了一定财产，这些财产也不足以支配其他人的劳动，这些财产不能进化为产。勤劳、善良、节俭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珍稀美德，所以靠勤劳善良节俭积累远远超过多数人财产水平是不可能的。贩运奴隶，掠夺殖民地，对殖民地搞种族灭绝，贩运鸦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只要有300%的利润，什么事情都能做，包括冒上断头台的风险。所以，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强盗劫掠以后，获得了足够的产，有了不劳而获的依据，就要考虑洗手不干。于是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此强盗变成了绅士。所以，今天看到发达国家文质彬彬的时候，不要忘记顺便看看他们的祖先当年的“文治武功”。如此便能更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发家史，而不必相信龙子太郎之类的鬼话。如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保护私有产权加自由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熙熙攘攘为利趋往：资产运动的目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红楼梦》

红楼梦的《好了歌》，挑明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追求。前两段追求的一个是政治权力，一个是财产，两者都可以认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后两段追求的是传宗接代。人在阶级社会中第一个目标是尽量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个是传宗接代。换句话说，拼命聚敛，然后把这些聚敛来的财产传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的目标是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产也只有一个目标，即自我增值。我们所能确定的也只有产的自我增值的本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增值具体化为赚钱。

赚钱手段有很多：可以是提高生产率搞物美价廉，可以是假冒伪劣降低成本，可以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可以是买空卖空囤积居奇，还可以是兼并弱小同

行，垄断市场压缩供应，获取垄断利润。

对产来说，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来钱最容易，或者说风险更小，效率更高。产是否发展生产，并不确定，是否会改善多数人的生活则更不确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产权明晰加自由市场经济一定会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亚当·斯密讲得很清楚，产追求的就是私利，而决不是什么善行。换一个角度看，只要能挣到更多的钱，酿酒商人既可以酿出更好的酒，也可以往酒里掺水。同样的情况下，屠夫可以提供更新鲜的肉，也可以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出售注水肉。

马克思的时代，商人使用劣质面粉制作为工人吃的面包，甚至向面包里掺白垩。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厂的生产环境，让人作呕：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也没有绝迹。最近的例子包括雀巢奶粉中含有二噁英事件，日本的雪印牛奶事件，还有风行世界的疯牛病……利润的水平决定企业的选择，顾客的身体健康或者社会公益则只是参考。

“挣大钱的方式最简单，就是做那些法律即将禁止还没有禁止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大实话，资本家进入市场的目的就是挣大钱，市场由资本家主导，那么资本主导的市场行为一定是有益于所有人吗？坚持认为市场行为一定有益于所有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产所关心的只是获得更多的钱，自我增值，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给资本最大的自由，充分竞争，就能使全社会所有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个结论值得极大的怀疑。

上世纪80年代，长期计划经济和战争，导致苏联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匮乏。苏联人民生活窘困，人心思变。当时有一种说法，提出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然后允许充分竞争就能发展生产力，缓解苏联当时的困境。于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面推动休克疗法彻底放开市场，一面推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

几乎在一夜之间，原先的国有资本变成了私有资本，俄罗斯出现了若干富可敌国的寡头。这些寡头财大气粗，他们挥霍程度让欧美人惊讶。但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却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俄罗斯的经济则几乎停滞不前。

对这些寡头来说，发展生产不如勾结官僚（比如丘拜斯）瓜分苏联庞大的遗

产来钱容易。全苏联人民69年的劳动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产。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中的大多数。这些财产称为寡头瓜分的对象。与发展生产相比，瓜分国有财产，来钱既快又容易，而且稳当。只要和官僚达成默契，一切都易如反掌。2003年11月，普京就霍多尔科夫斯基案答记者问："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有这样容易的事情，谁还会辛辛苦苦地冒风险搞生产？真正想发展生产的资本家也会被寡头的行为所抑制。

回顾俄罗斯的历史，对苏联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完全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或者说产权明晰化）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私人产权迅速膨胀，出现一批人造寡头，其余的多数人则沦为这些寡头的奴隶。

资本在市场中未必是善行的化身，更多的时候是恶行。如果不能有效约束，仅仅强调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那么绝大多数人都难免成为产的受害者。

某甲与某乙竞争，某丙必然渔翁得利。市场经济之中，竞争的不仅仅是最终消费品，更关键的是劳动力。劳动者成为消费者享受竞争的利益的前提，是他们首先要在劳动力竞争中胜出，先要把劳动力卖出去，才有能力去消费。劳动者的同行越多，他们的劳动力卖得越贱。绝大多数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之间竞争激烈，注定是吃亏的一方。相比之下，那些控制垄断商品的人，则完全可以压缩供应，获得惊人的收益。在控制垄断商品的某丙看来，那些对自己自信能力——认为自己比别人跑得快就可以发财的某甲或某乙，是非常有用的。正是由于某甲和某乙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才使得某丙可以压低工资，提高价码。可笑的是，某甲和某乙一边互相拆台，一边心怀幻想，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某丙。这种与数量有关的博弈关系，我们后面会反复提到。

产的自我增值的行为，是绝对自私的。产对自己的势力范围掌握的很清楚，为了自我增值，对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为。甚至即使这些利益与自己有关，不是直接利益而是间接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

俄罗斯的例子中，每个寡头的行为都是拆毁大厦窃取钢筋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无疑伤害俄罗斯全民族的总体利益，却满足了寡头个人私有资产增值的要求。

中国的例子可以参考国民党统治后期，生产凋敝，物价飞涨。对国民党整体来说，是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但是对个人来说，则是发财的机会。国民党高官大员一面感叹共军凶猛，学生造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面囤积居奇大捞特捞。对国民党官员来讲，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第一是国民党的一员，第二是私有财产的人格化的化身。很显然，第一种身份相关的是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具有直接利益。于是，间接利益让位于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压倒了第一种身份。

这种行为，在广大的代理人中有普遍表现。认为廉价或者免费给经理人一部分

产权，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维护其他人的直接利益，未免太幼稚了。须知，他们获得直接利益的方式，远不止使用自己的产权分红，还包括牺牲其他人的直接利益。

产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谈及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个人对产的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产的意志，产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当一个面包房主良心发现悔恨自己向面包里掺白垩，或者当一个寡头决定不再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他们被同行排挤掉的时候就来了。对一个面包房主来说，他要做的是在同行基本的水平上掺白垩，不能太多，免得立即吃死人；不能太少，免得自己的面包利润低于同行。对于一个寡头来说，如果放弃这种疯狂的瓜分，那么他所掌握的产，很快就会成为同行猎取的目标。换一个角度看，当面包师或者寡头良心发现的时候，产就要寻找新的主人了，或者说是产的代理人。资本家不过是产的人格化的化身。

所以，本书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他们的意识，是产的意识，无须过多考虑。

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产为追求其直接利益逐利而行，甚至牺牲其间接利益，至于这种行为是否会对整个社会有益，还是仅仅对个人有益，则是无法确定的。——连自己的间接利益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利益吗？

坚持认为这种利一定会造福所有人的人，十有八九与这种利有密切的关系，是这种利益的受益人。

帕累托最优：资产运动的极限状态

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某甲种玉米，某乙种花生。某甲用自己吃不了的玉米，在市场上换某乙吃不

了的花生。于是两个人都能吃到玉米和花生，都觉得特幸福。这就是稳拿经济学描绘的市场。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只字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并没成为商品，小农到这样的市场互通有无。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也就成为劳动力最主要的集散地，怎么能不提劳动力这种商品呢？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得最大价值。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不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拥有这些产的稳拿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数量众多的卢瑟，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所以，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

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劳动力获得工资，产获得剩余价值——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候。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劳动者还有当小老板或者当雇用工人的选择。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值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来说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经过200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了。

稳拿经济学提出只要交易就能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卢瑟经济学认为改善福利的过程复杂得多。价值来自生产劳动，市场并不创造价值。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炒房子

炒地皮获得极大的收益，但是社会总体生活不会改善，因为总消费品的量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并没增加。如果我们把社会总产品看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全社会多数人能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

与个人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所以，可能存在大饼整体萎缩，大家吃得越来越少，某些个体却吃得越来越多的情况。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参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这种很常见的行为。从个人来讲，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可以创造最大价值。从全城来讲，这样的行为很显然让多数人吃得更好。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并不是市场可以确定效应，市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效应是马太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钱具有自我聚集的能力，穷人则愈来愈穷，糊口都难。

只要交易就存在马太效应，就能改善稳拿的福利。是否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则不得而知。是否改善卢瑟的，更不得而知。使一方致富未必会使整体致富。实际上一方在交易中占便宜之后，必然会收购产权，通过控制产，不断抑制另一方。

如果承认市场是交易，那么就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交易未必平等，就要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影响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第一是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是对成交的渴望程度。一无所有的卢瑟，竞争者数量众多，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就没有晚饭，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不可能有很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稳拿的解释是双方信息决定市场价格。双方都认为一支钢笔应该价值10元钱，钢笔就以10元钱成交。问题是，如果两者对同一样商品的评价不同会怎样呢？比如，地主认为农民的劳动就值这点钱，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农民为了糊口只能接受这点钱。虽然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不止这点钱，可是糊口要紧。反过来，如果地主觉得交易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放弃交易，让农民无地可种。饿死或者接受地主提出的租子，只有这两种选择。农民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想过难关，就要向地主借粮，或者廉价出售自己有限的土地。这个时候，则是眼下的粮食值钱，未来的粮食、土地不值钱了。农民可以觉得自己的土地比地主粮食更值钱，可以不向地主借粮，不过农民肯定比地主先饿死。

主观的估价必然屈从于客观的实力对比。农民不比地主傻，也知道丰年谷贱，灾年地贱，又能怎样？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想饿死，就要接受地主提供的价格，或者说极其苛刻的条件。平时提高租子囤积粮食，灾荒时用粮食廉价收购土地，这是中小地主常用的手段。他们拥有的产，给他们躲闪腾挪的空间，而农民则只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价格。相比地主，农民在丰年收获的粮食越多，在灾年他们的地位越不利。丰收会提高地主的地租水平，也会使地主有更多的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农

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丰收时地主租子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改善有限；歉收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售自有田产，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用信息不对称掩盖交易的不平等，是稳拿经济学骗人的把戏。

最终的趋势，一面是小地主变中地主，中地主变大地主；另一面则是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逐渐变贫农，贫农变佃农、雇农。这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

这也是《资本论》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资产越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最终成为资本的奴隶：死劳动（工人以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牢牢抓住活劳动（工人）。

掌权的阶级必然会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模式解释为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就是产在总分配中获得最大价值。这是因为市场中稀缺的永远是产，而不是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帕累托最优也就意味着，产获得最大收益，稳拿拿得最稳，卢瑟输得一干二净。这时往往酝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对立。一块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割。不伤害某一方，不能改善其他人的境遇，就算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点是图穷匕见的点，农民如果想活命就要铤而走险。在达到这个点之前的每一步，如果按照卢瑟经济学，农民的利益都是被损害的；如果按照稳拿的经济学，都可以看成是改善的。因为稳拿经济学的价值是建立在主观评价基础上，只要把农民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利益的评价高于另一种利益的评价就可以。比如，丰年地主提高地租获得丰收的大部分。这可以解释为农民更渴望获得土地承租权，主动放弃增收的大部分。或者说，在农民觉得承租权比占有丰收的粮食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获得丰收的粮食的大部分，地主就可以选择收回土地。对农民来说，放弃丰收大部分成果，总比没有地可种好。灾年地主廉价收购农民土地，这个可以解释为在农民看来，眼前的粮食比自己土地的所有权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按照正常年景的价格出售土地，地主就可以不用粮食换土地。对农民来说，有粮食度过青黄不接，总比饿死强。每次交易，只要是自愿的，就是改善生活。交易总是改善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农民逼上绝路。

以后，谁再说只要发挥明确产权和自由市场，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全社会之福。大可告诉他，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之前，都是帕累托最优。这样的情况在正常的时期也许能维持，但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比如明朝末年的满洲入侵和小冰河时期气候异常，农民的份额就不足糊口了。这时就面临三个选择：地主阶级自动牺牲一部分大饼让给农民；农民自己饿死；农民铤而走险。如果地主阶级不能选择第一种的话，往往就要面临第三种结局：不伤害地主阶级，农民活不下去——不会有人选择主动饿死。

从前文产的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产为了自我增值不择手段。所以自由市场下，看不见的手可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能确定的却只有马太效应。而帕累托最优的状

态，也是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的状态。

多收了三五斗：资产优势在博弈中的趋利避害功能

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么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对于除了劳动力（有时还有为了活下去而欠下的债务）一无所有的卢瑟来说，一切经济行为的起点首先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如果不接受稳拿的苛刻的条件拒绝成交，就意味着自动弃权参与经济循环。后面的一切，甚至包括购买最低限额的口粮都无从谈起。“我是讲道理的人。”这是教父的口头禅。不过，教父给人讲道理的时候，喜欢用枪顶住对方的脑袋。所以，对方一般都会听从他的建议。卢瑟的处境类似，不听资产者的话，不接受“公道的”条件就要准备饿死。阶级社会之中，不存在普遍的公道，所以这种“公道的”条件，究竟公道不公道，自然就只有天知道了。

阅读本段之前，请重新阅读叶圣陶老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小说很简单：第一年，农民水灾歉收，结果赔钱。第二年，农民丰收，结果还是赔钱。

小说之中，农民是卢瑟，米行是稳拿。无论丰收、歉收，农民都赔钱，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看成一块大饼，每个人分配的份额并不与他的贡献有关，而与他掌握的要素的紧缺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稀缺的是产。所以，产越多，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分到的份额越多，产积累越快，便有更大的机会在下一张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想发财就要掌握围城中的面包。一块普通的面包，如果放到围城中，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物品。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成交，就要满足面包房主要价格。这就

是自由市场内发财的核心思路。

回到小说之中，所有的产品就是农民的大米。糙米收购价 5 块，零售可以卖到 15 块。农民和米行的分配，是农民 1/3，米行 2/3。按照本书的说法，米行创造了围城中的面包，农民只好老老实实就范。

首先看围城，当地只有一家米行，即万盛米行。这本身就是天然的围城。附近还有一家米行，在范墓。但是去范墓要经过两个局子，农民没有现钱缴付过局子的厘金。相比没有组织的农民，米行之间则同行公议，形成攻守同盟，“这几天都是糙米 5 块谷 3 块”。米行之间避免竞争，巩固围城。这两点一确立，米行已经具有稳固的优势。

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当农民嫌米行的收购价太低时，米行的先生直接教训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渴望成交的，不是围城中的面包房主，而是嗷嗷待哺的大众。所以，尽管米行的价格低到让农民赔本，但是农民也要接受这个价格：“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所以，这种交易对农民是稳输，对米行是稳赢：“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沓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市场交易看起来很公平，只要想方设法让自己提供其他人提供不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市场中，短缺的要素永远是产，稳拿用于压榨卢瑟的财物。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是米行手里的现钞。米行有现钞，可以在农民需要现钞的时候，廉价收购大米，反手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出售大米，谋取惊人的暴利。利用富裕的财物，打一个时间差。所以，农民说：“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5 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股脑儿吞了去！”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一，就是大家都能随便改行。市场理论中存在一个假设，某种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投资某种资源。提高这种资源的供应，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同类人群之间存在。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制约最大的就是产。种土豆的可以改行种山药。但是，农民和地主能随便互换职业吗？工人和资本家呢？如果人类社会是金字塔的话，只有同级之间才能有这样的事情。比如种土豆的农民改行种山药，生产汽车的企业投资生产拖拉机。粮农可以改行当菜农，却不可能改行当地主或者面包店老板。因为

他拿不出本钱。所以，自由改变供应，提供紧缺物资，只能是书面的说法。现实中，只能在社会同类的等级中自由转换。农民可能比地主还善于经营，工人可能比资本家还有头脑，但是却没有对应的产，必定一无所成。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二，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成交或不成交——既然于自己不利就不成交，那么成交必然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事实上，这种选择权只在稳拿一方。对一无所有的卢瑟来说，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自己就没有晚饭。不成交就是饿死。在米行和农民的例子之中，米行可以不成交，但是农民不能不成交。因为农民为了谋生已经负债累累。对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来说，他们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工具，已经彻底丧失了独立劳动的可能，最不利的成交也胜过饿死。所以，他们往往不得不接受稳拿开出的最不利的条件。

绝大多数人无法从提供劳动力转移到提供产，也不能拒绝最恶劣的条件。因此他们分到的大饼，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勉强糊口。即使偶有剩余，也和其他劳动者的水平相差不多，根本没有能力成为侵吞其他人的劳动的依据。

产的来源：第一个是原始积累；第二个是积聚；第三个是集中。后两个都需要有第一桶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三种方式是产之间的彼此侵吞，后面会谈，说说前两种。原始积累如同获得种子，资本积聚就是用这个种子不断吸收卢瑟的劳动，做大产。也就是说，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需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原始积累。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中大奖，捡钱包，发明永动机。如果不能中大奖，捡钱包，或者有爱迪生那样的能力，就需要暴力或者提供围城中的面包。比如《教父》中的考里昂老头子卖橄榄油。当然，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暴力，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大型垄断企业，靠财政直接支持。或者，政府暴力和私人暴力，两者兼而有之，比如上海滩的杜月笙老板做毒品生意，本人手下有一群兄弟，还是官方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围城中的面包对大多数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几乎是同质，拥有的资源也有限，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数以亿计。能提供的东西，决定分配，所以在分配中卢瑟没有任何优势确保自己成为围城中的面包的提供者。

第二步：是在交易中剥削卢瑟。只要不断费厄泼赖，正常交易，产就可以逐步把卢瑟榨干净。农民多收三五斗，米行把油水一股脑吞了去。农民收得越多，卖粮的价钱越便宜。米店收米的价格越便宜，越有资格在来年6月卖15块。

相比之下，农民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4分钱5分钱的债缴租，或者沉湎于赌场，希望能有意外的好运，或者去逃荒。不论哪种选择，农民在下一次交易中的地位，相比这次，更加下降了。

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这么穷？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卢瑟都辛辛苦苦工作。地主的儿子与佃户的儿子之间相差的绝不是工作的辛苦程度，而是他们所掌握

的资源。小佃户只有自己的劳动，只有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别人种玉米的时候，他偷着种大烟。如果大家都种大烟，那么他又没有优势了。除此以外只能依靠中彩票那样的运气。相比之下，地主的儿子只要不太愚笨，就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受穷。其实，富裕的也未必努力，年轻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并不紧缺。物以稀为贵，所有健康的适龄人口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自然贵不了。

现实中，分配中绝大多数的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产的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和米行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再如，甲地丰收，乙地歉收，两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但是农民却没有能力长途贩运，只有拥有相应产，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才可能获利。所以，农产品涨价，获利的未必是农民。

卢瑟经济地位的下降，绝不是某一行业的下降，而是全面的下降。劳动力对产的交易的劣势，必然随着卢瑟不断改行而扩散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去。《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商量改行，比如出去逃荒，比如去上海做工。结论都是还不如种田。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拥有足够的产，就拥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只要能创造围城中的面包，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大饼的任何比例，只要把城修得足够严紧，面包足够紧缺，然后给城里人留一口饿不死的面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面包房主夸口他能创造多少价值，大可一笑置之。

靠产分配的稳拿是稀缺的，靠力分配的卢瑟是过剩的。实际上，只要进入市场经济，就难以保证按劳分配。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随着马太效应发挥作用，劳动力是越来越充裕的，而产是越来越稀缺的。如果承认按要素分配，那么提供劳动力的卢瑟就注定只能分到很小的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够他糊口，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卢瑟并不愚蠢，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稳拿这样的剥夺。

少数卢瑟希望联合起来，增强卢瑟的博弈能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建立工会或农会。对于稳拿来讲，这是决不能允许的。禁止组建工会、农会，拉拢腐蚀或者逮捕工会和农会骨干，建立黄色工会，也就是各种常用的手段了。正是卢瑟之间的激烈竞争，才有利于稳拿的统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稳拿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事实上，尽管美国一直宣传政治自由，但是建立工会的自由直到罗斯福时代才正式确立。

劳动力为了一点可怜的口粮彼此之间鹬蚌相争，你死我活。产不断压低工资，转嫁损失，坐享渔翁之利。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劳动力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劳动力不过是压低了同行的工资标准。甲劳动力能干

两个人的活，产绝不会给他双倍的工资，而是会以他的产量为标准制订绩效工资，提高其他人的劳动强度。稳拿控制了产，卢瑟永世不得翻身。对劳动力来说，勤奋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通天塔：财富集中与社会分化

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资本论》（第一卷）

如果我们承认交易双方的收益与风险关系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强势一方有能力趋利避害，弱势一方只能接受结果，就不难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层的结论。

霸王龙的食谱很宽，不仅仅包括各种其他种类的恐龙，也包括同类。产也不会放过同类。

交易中不断侵夺对方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产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产之间。产的形成：第一是原始积累；第二是榨取劳动力；第三是资本之间彼此的吞噬。对个别资本的增值来说，资本间的彼此吞噬比积累还有效。

同行之间，占领对方公司的市场，窃取对方的商业机密，挖对方公司的墙角，提前垄断紧缺的原材料，压低产品成本和价格，最终达到挤垮、吞并同行的目的，这是每个公司高管都在考虑和提防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是大地主吞并小地主。现在背景下的例子，比如银行之间，大银行拥有网点优势，就可以对小银行的跨行收费采取高标准，封杀小银行的客户。小银行则针锋相对，降低各种服务的手续费，甚至免费来挽留客户。为了生存，小银行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大饼。

规模小的产，受到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同行。

卢瑟竞争，稳拿得利；小稳竞争，大稳得利。小稳与大稳之间的关系，就是劳动力与产之间的关系的翻版：小稳为了一点可怜的利润你死我活，彼此之间鹬蚌相争。大稳坐享渔翁之利，不断压低上下游利润，转嫁损失。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小稳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小稳不过是压低了同行

间成品的报价，提高了同行间原料的进价，或者接受大稳更苛刻的供销或贷款条件。大稳控制核心资源，小稳永世不得翻身。对小稳来说，勤奋和精明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和精明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需要牢记的是，马太效应无所不在。

前一节我们分析了农民与地主的例子，米行先生训斥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这一节不妨把视野转变一下。如果要粜米的不是农民而是大地主会如何呢？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大地主不会去米行的，而是米行先生来大地主家。米行先生满脸堆笑，大地主闭目养神，地主管家开口："糙米 10 块，谷 8 块。"。米行先生大惊："这么贵！"管家训斥先生："你们万盛米行嫌价钱贵，不要买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不缺钱，有的是大米，不卖你们，有别人的好卖。你们看，范墓米行的人也来了，城里的米行也来人买米了。"

怎么能够不买呢？米行的铺面的店租是要缴的，钱庄的借款是要还的。为了打点应酬各种官长，借下的债是要还的，米行上下的员工的工资是要开的。不买米，米行没有米卖，这些钱从哪里来？米行先生只好央求管家，最后成交。大地主自始至终闭目养神，不动如山。

淡定要有淡定的资本。地主与米行之间的抢大饼游戏结果，取决于双方数量。米行多，还是地主多，决定最终哪派占上风。或者说，决定于双方拥有的产的量。拥有产的量越多的一方，便越占优势。

同样的大米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博弈效果。在分散的农民手中和垄断一个地区的大地主手中，博弈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解体之后，大量的国有资产的股权分散到民间，这些国有资产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拥有这些国有资产股权的老百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晚餐在哪里。相反，少数人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是直接帮助下，利用紧俏物资和外汇廉价收购了这些国有资产之后，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按照边际效用论，某种东西越多，边际效用越低。这只是书斋中的想法。现实中，单位资本的回报，往往与资本总量有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资本总量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如果，N 个企业的资本量于一个企业的资本总量相当，那么这个企业的利润量要远远超过 N 个企业的总和。这些小企业由于彼此竞争，以及大企业的压力，必须把一部分利润主动让出来。资本量越小，竞争对手越多，选择余地越少。由于自身资本量小，选择余地小，竞争对手多，在与上下家谈判的时候，必定很被动。这时如果想成交，必须做出退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美国历史上，铁路公司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定价：铁路公司把短途运费订

的很高，小农场主、小商业主和小企业家就很吃亏。相比之下，大农场主、大企业则有资格与铁路公司谈判，争取优惠的运费水平。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关键看谁大。谁的产多，谁是老大。相比之下，小稳收入比大稳少，开支比大稳多，最终的趋势，必然不断不利于小稳。

产的争斗无处不在。即使同一个公司内部，产与产之间也存在剥夺与吞并的关系。不相信的话，可以看看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如果认为大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照顾小股东，则未免太幼稚了。小股东的利益不过是分享大股东的残羹剩饭，而大股东为了多吃自己的大饼是会毫不犹豫侵占小股东的大饼的——只要不引起股票被抛售即可。其实，即使被抛售也无所谓。因为上市的时候，圈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围城之中的高价面包，对应的是全社会的大饼。为了买面包，少吃大饼的不仅仅是卢瑟。其他不太稳的拿，也要牺牲一部分大饼份额。虽然他们也能吃到一部分由产获得的大饼，但是相比面包房主则少得多。小资本能分到的部分，也仅仅够其资本再循环而已。只要面包足够贵，并且继续贵下去，他们与面包房主的差距不断拉大，迟早会丧失稳拿的地位，甚至成为卢瑟。他们的产则会去找自己的同类，成为面包房主的产。

当全社会利润总量下降的时候，首先吃亏的就是小资本。大资本为了减少损失就侵占上下游小资本的利润，许多小资本受到两头的挤压，利润率迅速下降。当利润率无法维持，甚至降到零的时候，小资本就完了。

比如，许多小企业为了保持销路不得不向下游赊销，同时对上游赊购。这样虽然经手的量很大，但是利润很薄。为了保持基本的利润量，往往要申请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这样一来，维持运转对资金流动稳定性要求非常高。一旦下游赖账或者改换供货商，或者提出降价，或者上游原料企业提出更苛刻的赊购条件，或者原料涨价，或者银行不再给予流动资金支持，或者贷款利息上调，这些条件随便出现哪一条，小企业就凶多吉少。出现这些条件，往往与小企业自身的经营关系并不大。出现两条或以上，基本就要准备关门。

在交易中，产越多越有利，拥有产越多的人，越有机会坐庄。而这个庄，必然是对他有利的，否则他就放弃交易。产的数量对应能调动的资源的量，如同战争中士兵的数量。最终的结果，决定权在产的数量。如同战争中兵力越多越有利一样，以少胜多的战例往往流传千古，可是流传千古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多胜少才是常态。卢瑟与稳拿之间的差距，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只能扩大，不可能缩小。小、大稳拿之间的差距亦然。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

维持这种差距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加明晰产权。兔子与狼共舞，不会成为狼，而是会成为狼的晚餐。对狼来说，邀请兔子一起费厄泼赖，就是最好的

维护自己地位的方式。既保证自己稳拿，又显得光明正大。普通人与泰森同台竞技拳击，既是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

如同卢瑟改行企图改善生活一样，小稳同样会改行。希望通过改行，退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行业，发现未开垦的处女地。让他们失望的是，这种改行的结果，不会让他们中的多数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是让改行能力类似的小稳获得利润率趋同。真正限制他们的，不是眼光或者管理能力，而是资金量。这就如同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哺乳类就没有出头之日。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都能买到，钱最稀缺，钱的数量决定彼此斗争的胜负。所以，上世纪初美国权势最大的不是总统而是银行家，最有势力的地方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什么都能买到，只有个别几样买不到，买不到的最稀缺。比如特种经营权，只许某人或某个特定团体经营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缺少替代产品。如果能获得卫生纸的特许经营权，外加法律禁止人们用其他任何报纸、旧书本、挂历、砂纸（逼急了，砂纸也是刚需。如同大米白面是刚需，窝头咸菜也是，观音土也能成为刚需一样）等等非手纸类替代物如厕，并且能够有效监督执行，那么布鲁克林的小混混马上就能成为美国首富，他的公司有能力超过微软。

截止到马克思的晚年，主要现象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压迫。截止到恩格斯晚年，增加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最终诞生垄断资本，在这个行业之中，垄断资本最强。到列宁时代，行政权力开始和资本结合，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有国家暴力做后盾，产的优势便不再存在。所以，国家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克虏伯的大炮，国家包销；两房出了问题，国家给贷款；看中伊拉克廉价的石油资源，找个理由干掉萨达姆。到今天，美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经济活动，美军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建立了超级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是一个金字塔，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平均利润率。同样是资本，塔尖吃得最多，塔底吃点残羹剩饭。最小的资本，比如个人在银行的存款，利润率是零——正常情况下，个人存款扣除通货膨胀以后，没有任何收益。随着层级的上升，产的规模不断提高，财富不断集中，人数不断下降，利润率不断提高。高一级需要的财富总量，或者说产的总量，就是天然的门槛，这些门槛把下一级人拦截在外面，所以能维持比下一级更高的利润率。相反，如果某个新兴产业有足够高的利润率和利润总量的话，上一级的产，不会在意向下伸手，进而侵夺下一级的利润。所以，上一级可以稳定的维护更高的利润，而下一级却做不到。上一级产的增值，相对下一级，即多且快，这又是马太效应。

最有效的对抗被吞噬的手段就是自我增值，想方设法向上爬。资本增值的冲动不仅仅来自贪婪，也来自岌岌可危的地位。大稳如果不想成为小稳，小稳如果不想成为卢瑟，就要不断地自我增值。身边的例子在那里，这是警告，也是动力。

这个金字塔的收益集中在上层，损失却要下层承担。这就如同吃饭，大稳先吃，大稳吃饱喝足，打着饱嗝扶着墙出来的时候，才轮到小稳进场。小稳看看大稳吃剩的饭菜，随便划拉一口。个别身份比较高的卢瑟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还能吃一点稳拿没吃的鸡头或者没啃净的肉骨头。留给多数卢瑟的则只有泔水，尽管他们是做饭的人。如果某一天因为什么原因饭做少了，大多数卢瑟泔水也吃不到，只能饿肚子。

基尼指数的不断上升，是产在自由市场中不断运动的必然的结果。或者说，这个金字塔最终的趋势是越来越高，越来越细，越来越尖锐。

随着塔尖越来越高，越来越纤细，整个通天塔的结构也必然越来越脆弱。随着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不断变成彻底的卢瑟，塔的结构日益脆弱：财富向塔尖移动，人员向塔底移动。随着双方财富对比日益悬殊，人力对比也必然日益悬殊。随着武器和战争技术的进化，统治者不需要很多的人力就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被统治者。但是，任何武器的生产者和操作者都是人。如果不能确保这些暴力被稳拿所垄断的话，必然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裂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社会人口强行分等级，贱民天生就是贱民，农夫天生就是农夫，武士天生就是武士……各个等级彼此种族隔离，严禁通婚。贱民学习武术，农夫学习读书识字，一旦被发现就要被处死。统治阶级牢牢控制暴力，被统治阶级长期处于羸弱和愚昧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是稳定而停滞的社会，只能提供劳动能力低下从事简单劳动的奴隶，不能提供有创造能力的劳动者，更不适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财、物大流通的要求。一旦遇到外来侵略者的挑战，必然土崩瓦解。

于是，塔尖高耸入云，可望不可及，越发摇摇欲坠。

小猪跟着大猪跑：大资本对中小资本行为的影响

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

——《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The Matrix Reloaded）

金字塔不仅仅向上吸收财富，向下转移损失和人员。如果仅仅停留在此，未免太小看这个金字塔了。金字塔上层的行为，对下层的行为有很深的影响。既然金字塔的上层有能力决定交易的成交与否，以及双方互相交换的内容，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交易方向。引申一步，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让下层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多数情况下，下层经过权衡往往屈从。这种统治方式，类似资本统治劳动力，相比赤裸裸的暴力，柔和而隐性。或者说，小猪跟着大猪跑。大产是大猪的

话，小产就是小猪。

在博弈论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很长，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 10 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踩按钮就会首先付出 2 个单位的成本，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按照博弈的解释，在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面前，小猪“搭便车”获得收益最高。表面上，大猪辛辛苦苦开创事业，小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并轻松收益。现实的情况却不这么含情脉脉，与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博弈，不是小猪吃多少的问题，而是小猪能不能存活的问题。

“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的数据是精心安排的，而且本轮博弈的结果，不影响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如果换一换数据，外加本轮博弈的结果直接决定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踩按钮需要 2 个单位的饲料成本，小猪勉强能够承担。如果这个成本需要 5 个单位饲料呢？小猪根本踩不动这个按钮呢？如果小猪不肯等待大猪踩按钮，而是自己踩按钮，投入了 2 个单位的成本以后，才发现后面还需要 3 个单位的成本，而小猪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拿出哪怕 1 个单位的成本了。这样的情况下，小猪主动踩按钮的结局就是找死。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踩一下按钮会有 10 个单位的饲料，如果出现的是 100 个单位的饲料呢？只要花 5 个单位的成本就可能获得 100 个单位的收益。小猪也知道踩下按钮有丰厚的利润，但是小猪踩不动按钮。踩按钮成为大猪的特权。

这样的情况下，小猪要么挨饿，要么等大猪踩按钮之后，分一杯羹。结合现实，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一行业的投资门槛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小资本被排斥出去。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某一商品生产销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竞争对手的减少，这些行业的利润越来越丰厚。小资本知道这些行业利润丰厚，却无力涉足。他们的选择只能是为大资本提供上下家相关服务。他们的企业能否有货源或者订单，完全仰仗上下家的大资本。

另一方面，如果小猪踩下按钮，出现了饲料，大猪会毫不犹豫地拱开小猪，小猪获得的饲料够不够投入的成本都是问题。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大猪先到槽边，大猪小猪吃到食物的比例是 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如果大猪小猪吃到食物的比例分别是99:1，97:3，96:4呢？大猪比小猪力气大，能把小猪拱到一边去。小猪个子太小，根本没能力挤到食槽边上，只能吃大猪吃食时溅出来的饲料。

这样的情况下，小猪能否吃到饲料，完全看大猪的意思，如果大猪吃相不好，小猪就会挨饿。随着两者之间体型差距的扩大，小猪能不能活下来，越来越仰赖

大猪。

只要具有体型的优势，大猪可以在小猪踩不动按钮的时候，踩下按钮获得超额收益，也可以在小猪踩下按钮之后，拱开小猪获得绝大部分的收益。只要具有压倒性的体型优势，无论踩不踩按钮，大猪都是稳赢不输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小猪之间的体型将越来越悬殊，小猪生存将越来越难。小猪如果想分一杯羹，最后就不得不依附大猪，必须对大猪百依百顺，唯大猪马首是瞻。

同样开拓一个市场，或者开发一个产品，小产需要的投入的成本和大产一样。但是，小产获得收益的能力却弱于大产。大产能够承担开拓的费用，小产却力不从心；一旦开拓成功，赢者通吃，收益更加集中；下一轮新的开拓中，两者的差距更加明显。小产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臣服于大产，或者在大产力所不及的夹缝中求生存。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果投资门槛越来越高，如果投资的收益越来越丰厚，越来越集中，那么大产就能把小产排挤出市场，小产要么死掉，要么成为大产的依附。前两个条件存在，后面的结果就无法避免。

在资本量悬殊到一定程度后，小产无力自己开创新的空间，必须小猪跟着大猪跑，于是也就被迫接受大产的各种苛刻条件。这就类似农民无法开荒，只能交纳地租，工人无力自己开办企业，只能进血汗工厂一样。

进一步考虑的话，我们会发现“智猪博弈”之中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就是谁控制按钮（或者说按钮的饲料交给谁）以及谁控制报酬（获得的饲料来自谁）？在空对空的理论之中，饲料的去向和来源都是一台人为设定的机器。现实世界之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机器。交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资本家不会和机器做交易。大猪或者小猪作为交易的一方，必然对应交易的另一方，接受饲料的必然是另一头猪，给予大猪或者小猪饲料的肯定也是一头猪。

如果小猪依附于大猪，那么大猪必然会利用小猪的依附获得好处，小猪和大猪之间的关系自然存在利润的转移。这时大猪和小猪作为交易对立的双方，情况同样有利于大猪。因为大猪可以选择交易方向，更有效地趋利避害。如果大猪控制按钮，知道踩动按钮可以获得 10 个单位的饲料，那么小猪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就是 10 个单位，大猪就会要求小猪每次支付 9 个甚至 10 个单位的饲料。另一方面，如果小猪控制按钮，大猪就会在诸多小猪之中寻找要价最低的小猪。所以，当小猪想主动踩按钮的时候，大猪可以有效阻碍。当大猪想主动踩按钮的时候，小猪是拦不住的。对小猪来说，当大猪控制按钮的时候，不要贸然投入 9 个甚至 10 个单位的饲料去冒险，反过来，当小猪控制按钮的时候，不要妄想对大猪要过多的饲料。报酬的环节与控制按钮的环节类似。

结合现实的话，两者一个是销售利润，一个是生产投资。两者与销售价格和原料价格密切相关。当大产打算休眠的时候，小产最好也老老实实地休眠。不然，原

料价格会迅速上升，销售价格则会下降。当大产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现实中这样的机会不多），小产最好也扩张产能，为大产提供原材料，或者销售渠道，不要错过机会。

不依赖大猪的小猪，则将受到大猪和其他众多小猪的双重打击，如果不是死掉也是苟延残喘，难以发展。小猪之间的搏杀将越来越激烈。有大猪支持的小猪，比一般的小猪有更强的希望在小猪群中胜出。小猪在搏杀中的死活，很大程度上仰赖大猪的意愿，这是小猪臣服于大猪的第二个理由。

此时，无论是同行还是上下游，小猪最好的选择都是顺从大猪的选择。于是，大猪不仅仅是游戏的参与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游戏内容和规则的影响者。大猪对小猪的影响力的强度，随着双方实力的差距而增强。双方实力相差越悬殊，大猪对游戏内容和规则的影响力越强。另一方面，大猪对制定游戏内容和规则的能力越强，越有能力拉大与小猪之间的实力差距。最终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小猪彻底成为大猪的奴隶，如同工人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在资本高度集中的社会中，中小资本家虽然暂时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其控制的生产资料的作用日益弱化，逐步丧失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控制权。

当猪的体型相差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博弈的关系，只有一种选择：没有什么搏与不搏。产的规模相差到一定程度，结果也将如此。当产的规模相对于竞争的成本和收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就不再存在。这时，产发展到极限，不是竞争而是垄断，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只有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以及臣服和统治。

这时，由于存在稳定的利润向上转移、风险向下转移的关系，中小资本战胜大资本，进而夺取其统治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谓靠自己勤俭节约开一家小店铺（小作坊），然后依靠聪明才智，越做越大，最终成为行业巨头的故事，可以作为励志故事忽悠心存幻想的中小资产阶级，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多数利润要上交给大资本，多数风险要照单全收，所剩无几的利润还要经过为数众多的同行激烈瓜分，这是中小资本经营的真实情况。这样的情况下，颠覆大资本的统治极其困难。现实之中，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而是这样的故事往往故意隐瞒了什么。一般来说，某些人的发家史往往有很多版本，而且差异惊人。高高在上的时候的版本，往往是勤俭、聪明、敢于冒险。身陷囹圄时的版本，往往与各种罪恶有关。究竟哪种版本更可信，自然见仁见智。

随着社会金字塔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大资本控制生产环节，中小资本逐步失去市场主动权，理论上，中小资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上由于资本门槛的限制、抢占市场份额能力不足和大资本跨行业的利润侵占、风险转移等诸多原因，他们最终被迫彻底投降。自由选择不自由，这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的真相。

有意思的是，一旦小猪彻底投降，大猪往往也是选择等待。不论大产是否发展

新产品、新技术，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大产的。既然能如此，何必花5个单位的成本去搞开发呢？城市里只有一间面包房的时候，面包还有必要提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吗？大产关心的不是怎么研制新产品，而是怎么修高城墙，提高面包价格，或者向面包里掺白垩。大学食堂的包子，第一口没咬到馅，第二口咬过了。只要和负责后勤的领导搞好了关系，这样的包子就能统治学校的餐饮市场。既然竞争死掉了，便不再存在开拓。这时大产更关心的是如何享受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开拓进取。

于是，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一切死气沉沉。这时大产花天酒地，小产卑躬屈膝，卢瑟苟延残喘。所以，这时的社会虽然接近帕累托最优，却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这时，不要问小猪为什么这么做，而要问大猪在干什么。不要问小产为什么这样，而应该考虑大产在做什么。

美国人对此早就有认识。经过南北战争，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期。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大批的托拉斯。虽然有保护私有产权的美国宪法，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传统，但是美国政府这次却坚决不放过托拉斯。1890年，国会通过了反垄断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1902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调查并控告北方证券公司，理由是北太平洋和大北方的合并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垄断公司不服，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垄断寡头败诉。①

老罗斯福曾经表示：“在对付我们称之为托拉斯的大公司方面，我们绝对必须拿定主意，按渐变而不是革命的办法行事。……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法人公司；正相反，这些大集合体乃是近代工业制度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我们要想调节和监督这些公司，就须先在我们的思想中明白确定，我们不是攻击它们，而是力求消除他们的一切弊害，否则我们就做不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我们对这些公司并无敌意，只不过是决心要使它们经营得有利于公众。”

没有微软，大家不会有方便的视窗操作系统。有了微软，其他操作系统就很难发展。如果只有微软，大家只能买微软，微软毛病再多，也能卖到天价。所以，既不能关闭微软，也不能放任它独大。

自由市场，绝对产权，完全竞争就会一切万事大吉这样的傻话，美国人是不相信的，上当的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稳固政权，实行激进的私有化。三五年之间诞生出一群大猪（寡头）。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积极生产的热潮，相反经济下滑，人民

① 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53页。

生活困窘，另一端的寡头则花天酒地。有报道说，俄罗斯高档色情产业发达，各色尤物质量高价钱也高；俄罗斯人消费奢侈品的能力让西方人惊讶……但是俄罗斯经济停滞，国力下降，却是有目共睹的。对寡头来说，瓜分国有资产即可富可敌国，何必去发展生产？对小产来说，打不过他就加入他，与其自不量力地对抗寡头，不如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和产品。

当年积极推动私有化的俄罗斯副总理丘拜斯，自己也成为了大猪。丘拜斯也许是上当，也许是故意如此，不论哪种原因，倒霉的是多数俄罗斯人。

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按按钮的成本，在于饲料的总量和分配，在于大猪对按钮的控制程度，最终则取决于猪的体型。猪的体型越悬殊，按按钮的成本越高，一次获得的饲料量越大，大猪控制按钮的能力越强，饲料分配越不公平。这样的结果又将影响下一次按按钮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不是小猪悠闲地等着大猪去支付成本，然后“搭便车”获得收益，而是一只巨猪率领若干听话的迷你猪，迷你猪的脚下若干听话的蚂蚁。迷你猪的命运取决于巨猪，蚂蚁的命运取决于迷你猪。

理想的社会中，控制按钮的权力高分散，即使蚂蚁也有能力按动按钮，每次获得的饲料足以弥补按按钮的成本外略有盈余。这样的社会，是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大猪的体型优势在这里发挥不出来。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大猪喜欢的社会。

本章小结

产是什么？产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人类社会总产品是块大饼，产是稳拿用来切大饼的刀。

不同的社会这把刀的化身不一样。在奴隶社会，产是奴隶的人身。在封建社会，产是封建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产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是资本，生产资料在一定的历史生产条件下，才能成为资本。这就如同金银和货币是两个概念，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才能等同一样。稳拿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能增值的财物”。这话没错，但是却隐藏了增值的条件，即私有产权所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换。

与奴隶人身或者封建土地不同，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来自工人劳动的积累。资本的形成需要两步走：第一步是原始积累，绝大多数来自坑蒙拐骗，也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第二步是不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工人的劳动成为商品，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中扣除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剩下的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工人劳动越多，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

多，积累越多，资本的量越大。资本对工人的优势便越强。工人自己被自己创造的价值牢牢地束缚住。表面上的公平交易，却是资本不断壮大，工人输得一干二净的过程。

可能存在异议的部分是土地。土地成为生产资料，不需要劳动。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所有者并不产生价值。他们宁可使土地荒芜，也不允许产业资本使用。产业资本为了获得使用权，必须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土地所有者。这部分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也是产业资本家的损失。土地价格的攀升，不是土地自己产生价值，而是土地上产业资本不断壮大，地主要求其支付的贡税越来越多。如果土地上的产业萧条，土地价格必然暴跌。

依靠土地获得剩余价值，是对资本主义的阻力而不是动力。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太薄，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此外，土地垄断会造成土地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资本家的剩余资本必然会选择投机土地，而不是投资于原料或设备进行扩大再生产。引申一步，如果土地成为资本的主体，那么社会必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历史上，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地区很难诞生资本主义。

拥有产的稳拿，决定生产的过程：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决定奴隶是种小麦还是种烟叶；地主决定农民能不能在他的土地上耕种；资本家决定工厂生产、招工、扩张产能，还是减产、裁员、压缩产能；至于卢瑟，他们有按照资本确定的价格提供劳动的自由。如果他们拒绝提供，房东就有把他们赶到大街上的自由，面包房就有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品的自由，水电煤气电话公司就有断水、断电、断煤气、切断电话线的自由。

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关系亦然。小资本有挑战大资本的自由，有臣服于大资本的自由。大资本有挤垮小资本的自由，有兼并小资本的自由，也有统治小资本的自由。挑战还是臣服，选择权在小资本。挤垮、兼并、还是统治，决定权在大资本。挑战大资本很英勇，活下来很明智。许多人敬仰华莱士，传颂他英勇的事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会选择老死在床上，而不是血染沙场。所以，不要指望小资本家去头脑发热，做出不该他们做出的选择。他们要活下去，不会做无谓的牺牲。活下来的小资本，必须唯大资本马首是瞻。大资本选择趁机涨价，小资本就要选择囤积居奇。大资本选择投机金融市场，小资本就要选择跟风炒作。大资本选择投机土地，小资本就要选择炒房。

大资本决定全社会的生产过程，这既包括是否扩张，也包括生产的主要方向。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卢瑟可以选择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选择被哪个资本家雇用，却不能选择社会分配中改变被动的地位。小资本可以选择被大资本统治的方式，或者被哪个大资本统治，却不能选择统治大资本。

看不见的手就像皇帝的新衣服，看不见乃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很快就会消亡。资本主义的市场，是资本自由的市场，而不是所有人都自由的市场；是大资本自由的市场，不是小资本自由的市场。完美的市场和完美的社会一样，永远不会稳定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个独立的鲁滨逊建立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大家起点相同，也很快就会出现分化，最终达到垄断，走向自己的反面。何况，绝大多数的市场的起点是原始积累。大家进入市场的时候身份差异便已悬殊。

真正决定全社会生产过程的人，只是社会的少数人。这些人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塔顶，掌握巨额的财富，控制社会生产的进程。社会基尼指数越高，这些人的人数越少。由于马太效应，这些人的数量趋于不断减少。

“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资本剥削工人的自由。”希特勒用这话反驳西方对他的批评，兜售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要全德国人民交出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元首（也就是他自己）的身上。如果抛开他疯狂的目的，这句话是很贴切的。

任何单一金字塔式的结构都是危险的。一旦确立了塔式结构，便不再有竞争。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塔顶的失效意味着全塔结构的失效。塔顶的选择，注定在很小的圈子内。这又大大加大了塔顶失效的概率。产的金字塔也是如此。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百余年，农耕社会达到鼎盛，然后随着土地的集中，稳固的塔便确立了。这座金字塔高耸入云，是一座通天塔。极少数人在塔顶飘飘欲仙，绝大多数人在塔基遥望天堂。后面的事情，就是地主阶级比赛穷凶极恶，人生如同白驹过隙，要充分享受醇酒妇人和锦衣玉食。还有就是不断测试农民的底线。再后面的事情，就是因为天灾人祸，或者外族入侵，一不留神搞大了。旧塔倒塌，新塔开工。整个过程，是小概率偶然事件的大概率必然。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个过程大大加快。自由竞争的市场，至多存在二三十年的时间，然后随着贫富的分化，大资本的成型，自由竞争就死掉了。以后的自由市场，是自由交易的市场，是自由剥削的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

贫富分化的提速有几方面的原因：生产循环的周期加快了，过去一年一收获，现在往往几个月一个生产循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过去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形成的贫富差距。造船矿山开发那样的行业虽然周期长，但是对应要求的利润率却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甚至更高。现代金融业使资本不但能利用自身，而且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交通的发展，使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扩展，一个厂家产品的辐射范围远远超过以往。于是，大资本可以利用金融和现代交通的力量，迅速扩张，短时间内制服小资本。

资本主义社会的塔，同样也是不稳固的。建设塔的过程，是社会欣欣向荣的过程。资本家雇用工人，为自己憧憬美好的未来。工人获得工作，挣取工资，失业似乎是遥远的事情。但是，这种周期性的美好，注定要以经济危机结束。

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如同建设通天塔，每次塔倒塌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过程，都将加速塔的建设。这座通天塔最终可以建成，但是建成之日就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死掉之时。资本主义从此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陷入长期的萧条。最终，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整个通天塔难免折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不相容的时候，外壳必然炸裂。

第3章

切大饼

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

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列宁全集》（第29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讲的是分工，工人通过分工生产效率提高。通过分工，做扣针的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若干倍。今天的稳拿经济学喜欢从鲁滨逊飘流到小岛上讲起，不再提社会分工，而是从鲁滨逊的资源和时间有限，提出了怎么样最好的利用资源。

这个不起眼的变化，其实蕴含深深的含义。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社会上各种资源的主要占有者是贵族、大地主、高利贷者和僧侣。贵族、大地主和僧侣控制土地，高利贷者控制货币。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所谓物的稀缺，最终往往落脚于物的所有者的稀缺，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获得最高的价格。稀缺产品获得最大利用，潜台词，就是物的所有者可以利用控制物的供给，哄抬其控制的资源的价格，获得最大收益。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调物的稀缺，强调最大利用，无疑是给贵族、大地主、僧侣和高利贷者压迫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土地是稀缺的，你在我这里建厂，我就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了，我每英尺土地每年收你100英镑的地租，一点不贵。你觉得贵，可以不干。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我的地盘，是我祖爷爷从国王那里分封下来的。土地是我的，我觉得土地很宝贵，你建厂100英镑的地租已经很便宜了。我邻居在20公里以外，他的领地运输不便，要价比我还高，你自己掂量着办。

他们的土地获得充分利用，就意味资本家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他们无偿占有。所以，斯密说这些人是不劳而获的游惰阶级。

今天，大地主、贵族、僧侣和高利贷者已经让位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的土地或者收归国有，或者逐步卖给了资本家。高利贷者如果不能转变为银行家，多数逐步破产——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无法抗衡的。社会上主要资产所有者是资本家，所以这个时候强调物的稀缺，为资本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寻找理论依据。

用鲁滨逊的小农生产分析今天社会充分分工下的大生产，除了掩饰私人所有权获得最大收益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卢瑟经济学分析经济要回到亚当·斯密的起点，从社会化大生产讲起。

什么叫社会化大生产呢？社会化大生产又称生产的社会化，是指同小生产相对立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它表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在企业中进行有组织的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生产之间协作更加密切；通过产品的市场化和市场自动调节，使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简单地说，社会化大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不断分工合作，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分子，全社会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社会总产品由数不清的劳动者生产出来，在数不清的劳动者之间分配，社会的总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换，最后社会成员消费所有的产品。

首先看社会化生产的生产过程，即所有的劳动者生产所有的东西。鲁滨逊的生产是一个人全包，从播种，到磨粉，到生产面包一肩挑，不存在分工。社会化生产则完全不同。每一件产品，我们都不能说清楚究竟有哪些人在其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穿的衣服（假设是纯棉的）包含：农民的劳动，他们种棉花；纺织工人的劳动，他们纺纱织布；制衣工人的劳动，他们把布匹裁减、缝纫成衣物。但是，仅仅是这些人的劳动吗？在手工工场的时代，也许这些劳动就足够了。但是，在今天，这些劳动远远不够让我们获得一件成衣。农民的农具，显然不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化肥、农药显然也不是。纺织工人使用的纺纱机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制衣工人的机器也是买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加入生产是否就足够了呢？还是不够。制造机器的矿石、焦炭，运转机器的电力、柴油，运输原料的汽车、火车、轮船，生产厂房的建材等等。在今天的社会中，每一件产品都可以无限穷究下去。我们今天消费的每一件产品，比如一个信封，一块手帕，一张餐巾纸，都包含了无数人的劳动。

反过来，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每一个生产者脱离其他人都无法有效的生产。农民没有化肥农药也许还能勉强维持，但是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们的多数产品只能腐烂在地里。纺织工人没有纺织机械则无法纺织。制衣工人同样如此。在小农生产中，每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但是在社会化生产中，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每一个人的劳动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微小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却以惊人的数量增加。社会化大生产直接推动社会总产品的大幅度增加，劳动者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丧失了独立性。换句话说，大部分工人劳动技能一旦离开了现有岗位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社会化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化的分配，即所有人分配所有的产品。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如果成衣是最终产品的话。那么农民、纺织工人、制衣工人、机械制

造工人、采矿工人、采油工人、运输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所有参与社会生产的人都有资格获取一部分产品，即一部分成衣。但是，究竟谁获得什么？获得多少？则未必与他们的劳动质与量成正相关关系。分配直接由所有制决定，与对生产过程作出的贡献关系不大："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需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这个例子之中，私有土地所有者，只要依据私有产权，就可以要求不劳而获。或者说，在社会总产品中要求一部分。如果生产者不答应，就无法顺利完成生产。有一些总比没有好，生产者最终必然妥协。土地所有者获得产品的多少，则与他垄断土地的程度有关。在土地产权越集中的地区，他获得的产品越多。

社会化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社会化的交换，所有产品都要到市场去出售。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产品自产自销，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农民是专业户，是为市场而生产。既然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不断增加，必然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数量远远超高于他在某一方面的需求，有些产品甚至对他来说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比如硫酸、硝酸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但是对生产它们的工人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产品，都要在市场交换。

社会化大生产交换的过程，本来极其复杂，绝不是鲁滨逊用吃不了的小麦去换别人吃不了的鱼那么简单。每一个产品都要寻找买家，每一个买家都要寻找卖家，极难两两配对。生产硫酸的人，需要电力和矿石；需要硫酸的人，不生产电力和矿石；发电厂和采矿场需要煤炭和机械，不需要硫酸。后来，这些复杂的交换过程，由于货币的出现而大大简化了。原先数不清的易货贸易，由简单的出售替代。人们用自己的产品交换这种商品，然后用这种商品去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货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前提，货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货币简化了交换过程，代价就是同一个生产单元的卖与买，从此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货币的出现，是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社会化生产的第四个特点是社会化的消费。所有的产品，在扣除掉原有生产资料的损耗和追加投资以后，成为所有人的消费品。所有人在前一个环节中获得的产品，至此都找到了需要他们的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这些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一个环节的变化，必然影响另一个环节。生产过程中，产权的变化，必然影响分配。分配的变化，则必然影响交换的过程。分配极度集中，那么在交换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产品找不到对应的买主。反之亦然。鲁滨逊的生产，或者说小农的生产，显然没有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分配、社会化交换、社会化消费这四个环节。鲁滨逊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他自己的产品直接决定于他的消费，与市场销路没有任何关系。鲁滨逊生产的玉米，不存在任何分配问题，自己生产的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如果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满足地租以后，其余全部自己消费。鲁滨逊生产玉米，吃了就是吃了，吃不了的部分不会影响明年的生产。只要不把种子吃掉，今年的生产与明年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彼此独立。鲁滨逊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的，很少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农村，多数是小农经济。夫妻双方都是生产者。粮食、蔬菜、棉花是男人种的；鸡、鸭、猪是女人养的；房子是男人盖的，布是女人自己纺纱和织的。肥料是自家厕所积的，饲料是自己粮食的秸秆和刷锅水。除了盐、铁和少量点灯的煤油以外，基本不需要任何外来产品。只要风调雨顺，张家懒惰，不妨碍李家勤劳富裕。

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生产过程都会对其他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空间的影响、生产工序上下环节之间的影响，以及时间的影响。

社会化生产在空间上是一个整体。如果某一个地区有一家制衣厂，产量足够满足这个地区的消费总量，那么这个地区就无法存在其他的制衣厂。这种地区的范围与生产规模和运输能力有关。当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极强，产品又很便于运输的时候，这样的企业的影响地区将极其广阔，甚至垄断全球。

社会化生产在行业上是一个整体。某一个环节生产过程的改善，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调整。新纺织技术的出现，必然推动纺织机械的改进。反过来纺织机械的改进，也必然改变纺织技术。农民的棉花欠收，必然影响后面一系列的制衣环节。如果成衣销售滞销，那么农民的棉花、纺织厂的棉纱、纱布、化肥、种子，甚至生产各种机械的钢铁、煤炭和原油都会滞销。

社会化生产的特点就是全社会是一个整体，只要进入这个整体，就触一发动全身。只要在这个整体之中，就存在利润向上转移，矛盾向下转移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对上级的冲击，必然会冲击到下级。

生产与消费并不是脱节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过程。供需分析中，生产与消费呈两条完全独立的曲线以 X 型相交。如果是单独的产品的话，这样描述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也许是对的，但是用来描述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就有问题了。工人的工资在开始生产的时刻就决定了，总工资不变的话，总需求不会有过大的变

化。所以，社会产品的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的一刻就决定了。工人的消费不足，资本家就要压缩生产。大量产品积压的时候，只有萨伊那样的傻瓜才盲目扩张。这就是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总需求反过来会影响未来的总供给。这就是社会化生产在时间上保持密切的持续性。此时，一种产品降价销售，可能会吸引消费者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增加对该商品的需求，但并不能创造原先没有的消费能力。甲产品的增加，往往是建立在对乙产品需求减少的基础上的。

一个人如果要完成自己的消费过程，首先要把自己的商品（包括劳动力）卖出去，然后要把自己需要的商品买进来。一个人要完成发财的过程，只要把自己拥有的商品卖出去就可以了。对资本家来说，他们参与市场的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他们买进是为了日后更高价卖出，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买与卖必然是同时同步发生的，有买家才能有卖家，没有买家，卖家就卖不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一群人只想卖，不想买，他们卖出的东西超出他们买入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必然找不到对应的买家。一些只想买不想卖的人，比如挥霍无度的封建土地贵族的存在能够暂时满足资本家发财的欲望。但是，这些买多卖少的贵族很快就会破产，他们破产以后资本家又会发现自己找不到对应的买家。

小农经济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多面手，既能种粮，又能做面包。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全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每个生产者都是某一方面的劳动者，既不能独立种粮，也不能独立做面包。打个比方的话，小农经济全部是单细胞生物，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动物。所以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化生产的触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是经济危机过程中，几乎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会遭到冲击的根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 1932 年，私酒和避孕用品在美国的销路非常好。

小农生产彼此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彼此之间不存在紧密地联系，与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完全大相径庭。用这样的例子推广到今天，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作坊，如果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就难免让人怀疑研究者的智力有问题。

正是因为两种生产方式完全不同，所以劳动者的贫困表现截然不同。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少数人占有多数产品，多数人贫困的表现是地主家中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绸缎，农民则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丰年的时候，半年的时间农民需要靠瓜菜度日，遇到灾年农民往往就要流离失所。在小农经济的时代，表现是产品的严重不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劳动者贫困的表现就是产品滞销，同时多数人失业。

做大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吃大饼，如果不能吃到大饼，没有人会去参与社会大生产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如何分配。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农民自产自销，地主依靠土地产权不劳而获。农民的总产品，扣除了给地主的部分，就是自己的。

社会化大生产，这个问题就很复杂。首先，生产过程复杂到我们不能确认每个产品中究竟有谁的劳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有效地分析每一件产品中，究竟谁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子，每件产品穷究下去，都是全社会的总产品中的一分子。其次，我们不能确定每个人作出的贡献。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人的存在对社会财富增加都有意义。简单地说，什么人是吃闲饭的，什么人是作贡献的。表面看来，有些人的劳动是可有可无的，有些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农民显然不行，没有钢管舞女郎则不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同一行业内部，也不好确定。没有正骨大夫，人们发生骨折以后，只能落下残疾。没有研究春药的大夫，则似乎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有些是可多可少。没有军队显然要受外敌欺侮，但是如果军事人员太多，同样不是好事。巨大的军费开支，会压垮经济。实际上，多数人的行业都处于模棱两可之间。所以，谁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既然我们既不能确定每件产品中哪些人是作贡献的，也不能确定社会生产中每个人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应该如何按劳分配。

但是，大饼不能不切。这个切大饼的场所，就是市场。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让社会总产品这块总大饼，在市场上按照供需关系去分配。决定分配份额的，则是彼此博弈的能力。很显然，掌握越稀缺要素的人，博弈能力强过不掌握稀缺资源的人。他掌握的资源越稀缺，他便越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大饼份额。

在社会化大生产加自由市场条件下，我们能确定的是，社会总大饼在所有人之间分配，彼此的分配份额与彼此为做大饼作出的贡献没有任何联系，而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有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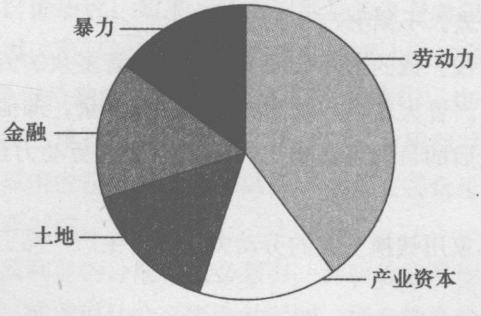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总产品在市场中，按照各个要素分配。劳动力获得工资，其余四方瓜分剩余价值

拉锯战：争夺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博弈

现在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预料来源做出大致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列宁全集》（第27卷）

驱动人们在社会中运动的究竟是什么？按照卢瑟经济学，人们运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争取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

卢瑟在这方面很诚实，上班，养家糊口。工作的目的就是赚钱，而不是什么精神上的愉悦。追求精神愉悦可以去旅游，去电影院，去吃饭，不用朝九晚五（甚至朝五晚九）地按时去公司工作，看老板脸色。周六是洒脱 day，周日是伤 day，周一是忙死 day。听说过恨周一，没听说爱周一。

按照稳拿的经济学，则是追求最大的效用。随着某样东西数量的递增，效用递减。按照稳拿的经济学，越稀少的东西效用越高，越充裕的东西效用越小。“水有很大用处，价值却很小，因为水的数量远远大于对它的需求。钻石的用处很小，价值却很大，因为对钻石的需求远远大于钻石的数量。”① 所以，按照稳拿经济学，则是资本家是钱太多了，边际效用下降，不妨交换一些劳动力，交易之中彼此创造价值。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产品多了，边际效用下降，又要卖出去换成钱。钱多了，又要购买劳动力。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不累啊？

资本家有多余的钱，钱的边际效用下降；工人有多余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下降。交换一下，皆大欢喜。既然资本家的钱多余，那他还努力赚钱干什么？

不过，资本家最后的目标还是要把产品卖出去。劳动力最终被转化到商品中，然后换成钱。

整个过程是资本家用钱换工人的劳动力，然后生产产品，用产品换钱，再用钱

① 约翰·罗，朱淵译：《论货币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换劳动力。不用考虑什么边际效用，只要他卖出的产品的钱少于他最开始的投资，他就会停下来。资本家的行为，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消食儿，而是想方设法用钱生钱。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孔圣人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按孔老夫子的说法，爱财只要符合“道”的就可以。问题是什么是“道”，这就不好下定义了。当然，中国历史上对“道”下定义的当然是稳拿了。

相比老外，还是中国人实在，人人爱财，追求的就是物质财富，没有必要扯什么主观感受。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聪明，不好糊弄。中国的统治者更聪明，玩了个小花招。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都追求物质利益，都要粉饰自己的行为。老外是彻底否认自己追求物质利益，把自己的行为上升到精神层面。中国的统治者承认自己追求物质利益，不过自己追求的过程，是符合“道”的。既然是符合“道”的，卢瑟就没资格多说少道。不过，这个“道”究竟是什么是统治者自己定义的，统治者给自己留了个“后门”。

最终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稳拿怎么拿，卢瑟都要闭嘴。

推动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主观评价，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一切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大饼。用太史公的话说，“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卢瑟研究经济学的标准也就是彼此间物质利益的消长。

如果不采用物质尺度，而仅仅采取主观评价，那么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如何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彼此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物质利益的博弈，会被隐藏在彼此皆大欢喜的和谐的景象中。如果采用主观评价衡量经济行为，那么抢劫也可以看成一个互利互惠的过程。相反用物质标准衡量抢劫过程，则可以清晰地看到受害人与劫匪之间财物转移过程。

任何成交行为都是合理的，或者说任何市场行为只要存在都是合理的，都是互惠互利的。那么我们除了获得精神上的安宁与祥和，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或者我们只要知道一切都是合理的结果就可以了。市场是复杂的互动过程，彼此为了争夺最大的物质利益在讨价还价，如果不从物质利益的争夺着眼，那么必然看不到任何市场行为形成的原因，而只能看到结局中彼此心理上的“皆大欢喜”。当然，这种双方的“欢喜”，既包括劫匪成功占有他人财富的喜悦，也包括受害人对自己能够通过破财免灾而幸免于难的暗自庆幸。如果不能从物质利益出发去研究经济，那么我们便无法看清楚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芸芸众生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彼此之间复杂的博弈过程。

既然研究衡量物质利益的分配，就必须有一种明确的尺度。卢瑟经济学里面的衡量标准是劳动价值，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全社会的总产品放在哪里，这

就是全社会的总大饼。问题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量，看不见，摸不到。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中，这个尺度很好把握，看看最终粮食分配份额，多少属于地主的租子，多少属于农民的口粮即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之中，产品种类数不胜数，所有商品都要卖出，不能像租子与口粮的关系这样一目了然。

在分析的过程之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本书会采用货币来衡量。一方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货币能稳定地发挥价值的影子的作用——除非发生严重通胀。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尺度来衡量工人的劳动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事实上，如果有一种商品能稳定地保持价值，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成为货币。这也是货币成为货币的重要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货币必须是最好的商品，是人们追逐的目标。这是因为成为货币的商品具有价值相对稳定、便于衡量数量和质量、易于保存和携带等等。因为这种商品具有以上的优点，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商品，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商品这一点，又强化了这种商品的货币地位。

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人获得多少货币，却难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必要劳动时间。不过，在绝大多数产品都会成为商品，在市场交易的社会中，如果物价稳定的话，获得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可以获得的商品总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获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在本书的分析中，更侧重博弈力量对比对分配情况的影响而不是待分配的总量，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货币收入的对比情况替代获得社会总产品份额的增减情况。如果某一段时间，某甲和某乙的货币收入为1:2，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某甲和某乙获得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的比例为1:2（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之中，资本家获得实物产品的比例往往更高一些，不过这些实物收入能不能变成可以消费的收入，还要看销售情况）。

既然人人追求货币，本书也用货币衡量博弈各方物质利益的得失，那么为什么强调商品的内在价值，而不直接用货币量作为尺度来衡量彼此之间物质利益的分割呢？

首先，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追求货币，但是不是永远如此。当货币数量迅速增加，币值迅速下降的时候，人们就追求商品，囤积商品。不再追求货币。所以，货币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当币值稳定的时候，货币是目标，当币值不稳的时候，货币就不是目标了。稳定都是相对的。币值不稳，必然对应另一种相对较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需要确定的尺度。货币是价值的影子，当这个影子不能反映真身的时候，人们就抛弃货币。我们要考虑的显然不是影子而是真身。在分析危机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胀的过程中，不会完全使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当货币超量发行的时候，必须结合物价考虑经济行为。

这个话题引申一步，就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不可以通过印钱或者投机来致富。

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讲，最终的致富途径只能是发展生产力。这里使用了“封闭的经济体”，而没有使用“国家”。这是因为对美国那样的极个别国家来讲，该国央行是某一地区甚至全球的央行，确实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或者使用金融手段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的劳动。

其次，货币并不是在所有的交易中都存在的。应该承认，最早的交易是没有货币的。用谷物、肉类、马匹等来交易，并不代表人们之间没有经济行为。即使在工业化时代，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易货贸易。

再次，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强国富民。在金融、土地投机等追求货币为主要目的的场合中，有惊人的货币流动和资本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很显然在这样的场合，甲之损失成为乙之收益，乙之收益来自甲之损失，对总体来讲，这样的过程只是一次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并不能增加任何产品，不能增强综合国力，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而且很难稳定存在。

引申一步，既然用货币来衡量价值，追求尽量多的价值具体表现为追求尽量多的货币。那么为什么不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内在价值呢？

这是因为等量货币购买的商品具有相等价值的情况只能出现在自由竞争时期。一旦出现垄断，价值与价格之间就会出现偏离。价格高的商品未必价值高，反之亦然。何况，有些商品本身没有价值，比如土地、证券、特许经营权等等。稳拿经济学提出稀缺性决定物品的价值——我需要就有价值，越稀有就越有价值。市场价格反映价值。卢瑟认为稀缺性只是分配的依据，没有稳定的内在价值标准。同样一块土地，被切割成若干小块属于不同的主人，获得地租的总量必然小于属于同一个主人获得的地租总量，对应的土地价格必然不同。同样的燃油由若干经销商经营，与仅仅由一两个寡头经营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生产燃油的过程是不变的，变化的是燃油所有者的稀缺性，或者说垄断性。同样一件商品买卖双方不同，价格完全不同。比如我们提到的《多收了三五斗》中大米的例子。大米还是大米，内在价值不变，变化的是大米所有者切割社会总大饼的能力。

这就涉及到稀缺性的本质，即是物的所有者稀缺，还是物稀缺。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基础是物稀缺，而不是所有者稀缺。表面上的逻辑说得很好，让稀缺的东西获得更好的利用。物的所有者稀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自然可以制造物的稀缺，是很显然的有力的议价权的条件。但是如果承认所有者稀缺与物稀缺有相同议价权，那就涉及到私有产权的集中更有权力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如此的推论就是有钱人与没钱人之间的交易不是平等的，有钱人更有利。交易条件是越有钱越有利，越没钱越吃亏。卢瑟的卢很大程度上是稳拿的稳造成的，而卢和稳的趋势还会扩大。或者说是马太效应。物的所有者稀缺的基础在于私有产权，所以说，所有者的稀缺让所有者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物获得了更好的利用。换句话说，私有产权为钱多

的人创造了更好的交易条件，同时也意味着钱少的人更不利的交易条件。如果要获得相对公平的交易条件就要削弱私有产权的作用。所谓物获得更好的利用，就能使全社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实际上是私有产权获得更大效用，私有产权所有者获得更大的收益。卢瑟的利益，被稳拿代表了。这样的结论，更接近我们的观察，但是很显然是稳拿要回避的。

市场交易中，每个人都要经过两次博弈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对劳动力来说，第一次是卖出劳动力，第二次是购买消费品；对资本来说，第一次是买入原材料和劳动力，第二次是售出成品。交易各方在交易中都会尽力压低对方的价格，抬高自己控制的商品价格。两次博弈决定获得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价格只是市场博弈的结果。既然研究物质利益的分割，就不能用既成事实的结果来研究。否则，用切大饼的结果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必然一切都是合理的。

某一具体商品的价格与该商品内在价值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商品价格的变化可以反映博弈能力的强弱，也就是商品所有者获得社会总大饼份额能力的强弱。垄断资源价格高涨，垄断资源所有者获得社会总大饼的份额能力就强。劳动力价格低迷，劳动者获得社会总产品的能力就弱。

卢瑟经济学的分析过程，侧重于从资本增值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现象，在资本内部则侧重于从垄断资本和大资本增值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层对低层的选择行为有隐性的、强有力的操纵和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强势一方是主动的，相对独立的，处于弱势的一方是被动的，从属于强势一方的行为，对强势一方的行为有反作用。分析经济问题，需要从强势一方的主动运动，和弱视一方的反作用入手。这就如同马克思的著作名为《资本论》，而不是《劳资论》。

用物质利益的争夺分析整个经济过程似乎并不全面。不能否认，少数人并不看重物质利益。比如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人，或出家修行的和尚。但是，这些人的行为显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将随着他们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逐步被边缘化。他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越淡漠，他们越被经济循环边缘化，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经济循环的影响越无足轻重。所以，对不看重物质利益的人，我们可以忽略他们个人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忽略决定于他们的客观选择，而不是他们的具体职业。当然，个别打着修行旗号，广筹善款的寺院不仅没有边缘化，而且不断深深地陷入经济循环之中。这样的寺院，显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寺院也可以归为企业。

拥有巨大物质财富的人，在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给社会的时候，必然对经济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和微不足道的。从他们捐献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丧失了对那部分财富的影响——否则就不是捐献。这些财富将通过经济循环，重新

回到金字塔的塔顶。这个过程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那么个人谋求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行为中最基本的原则。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任何原则。所以，任何双方自愿的交易，都可以从精神的角度解释为获得了利用价值更大的商品，是彼此互相愉悦的过程。但是，从物质的角度看，就存在彼此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性的关系。在双方争夺物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一方难免屈从于另一方。个人谋求经济利益的能力与他掌握的生产资源的量成正比，与社会上拥有类似资源的量的人数呈反比。双方交易行为，如果能够成交的话，毫无疑问，处于经济地位中相对优势的一方，必然在物质利益方面获得了好处。否则，这一方不会采取行动。这就是处于优势地位一方谋求更好利益的根本方法。

这种拉锯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正如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由卖主和买主之间私下博弈的结果。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都是所有买主和所有卖主之间竞价的结果。这种竞价既包括买卖者之间，也包括买主同行之间和卖主同行之间。

事实上，工资水平的形成，利率的形成，地租的形成，以及某一资本量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都是彼此拉锯的结果，也是广泛交易的结果。一次拉锯的结果，取决于其他拉锯的结果。反过来，一次拉锯的结果也会影响其他拉锯的结果。张地主家土地的出租价格必然影响李地主家土地的出租价格。最终，张、李两位地主的地租必然达到一个接近的水平——如果土质、肥力相等，水利、运输条件相当的话。正是千百次的拉锯，形成了社会总拉锯的结果。如此一来，同样进行类似拉锯的人群，便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利益。这些人群中，小者为阶层，大者为阶级。

实际上，每个阶级都在同对立的阶级进行价值的拉锯。经济地位类似的人群组成阶级。同一个阶级的人，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相同，发挥的作用相同，获得产品分配的方式相同。比如属于地主阶级的人，他们都是私有土地的占有者，都依靠私有土地产权作为分配依据，都以地租作为收入来源。地租的上升，不仅仅影响一个地主的生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生活。同理，地租下降，也会影响整个地主阶级的生活。更深入地讲，会影响他们整体的经济行为模式。毫无疑问，解放区无偿没收大地主多余土地的土改必然遭到大地主阶级最强烈的抵抗，也必然获得无地、少地的佃农和贫农的极大支持。

各个阶级内部又有不同的阶层，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拉锯行为对小地主有影响，大地主为了吞并小地主土地的拉锯行为对小地主也有影响。在第一个拉锯行为中，大小地主之间是盟友的关系，第二个拉锯行为之间则是敌对的双方。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金字塔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尖锐。

由于拉锯方式类似，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阶级认同。共同的利益产生共同的

语言，共同的语言来自共同的利益。地主内部必然都认同地租，认同土地的宝贵。同理，佃农内部必然都认同不劳不食，都认为地主靠霸占土地剥削农民是可耻的行为。卢瑟说稳拿为富不仁，黄世仁还说“穷生奸诈，富长仁义”呢。小自耕农的思想，则必然介于两者之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

阶级之间由于利益拉锯关系，很难彼此沟通。这就如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之间，当涉及工人失业、贫困的时候，两者就有共同语言。当马尔萨斯提出要僧侣、地主和官僚消费资本家的多余产品的时候，两者就要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的阶级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涉及彼此共同关心的利益的归属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共同语言呢？地主对地租的认同与农民对地租的敌视必然无法统一。两种不同的思想彼此交锋对立，并不能分出胜负。稳拿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分配权雇用为自己说话的经济学家，但是并不能完全禁止卢瑟的歪理邪说在私下传播。所以，最终决定胜负的，是暴力这个元要素——有了宗教裁判所，于是所有的欧洲人就都尊重罗马教廷的权威了。这时卢瑟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隐藏起来，然后对稳拿深深地鞠躬。

需要注意的是，超越本阶级利益考虑问题的人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行为违背了本阶级的利益，注定被本阶级边缘化。所以，僵化地认为出身决定人的思想是不对的，但是所属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思想又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在卢瑟看来，市场并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彼此捧场和皆大欢喜的场所，而是为了争夺物质利益，彼此拉锯的地方。要分析拉锯的过程，就需要从最基本的拉锯讲起，拉锯的双方是工人和资本家。

劳资博弈：剩余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物以稀为贵。

——中国谚语

既然物以稀为贵，劳动力又是人人都有的，自然不值钱。或者说，分不到多少大饼的份额。

所有的产品，扣除固定资产折旧以后，就是全社会的总大饼。这张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其中，劳方获得的部分称为工资，资方获得的部分称为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标准。这是因为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各个阶级的博弈能力。博弈能力的强弱则与该阶级的人数、

合作失败的后果和选择其他替代合作的能力直接相关。

过去有句话，同行是冤家。总大饼分配的阶级拉锯战中，博弈力量的强弱直接取决于本行业同行的多少。阶级博弈之中，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恰恰相反。

首先我们不妨看看博弈论中经典的案例：囚徒困境。在这个案例中，团体并非最佳选择。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相关术语称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如果我们假设人人都是自私的，而且无法与对方达成最大的默契。那么最优的选择就是，无论对方是否招供，自己都要招供：出卖对方，自己可能被当即释放，也可能坐牢8年。不出卖对方，自己至少坐牢1年，甚至10年。在囚徒困境之中，如果一方采取合作，那么他注定就是死得很惨，他的选择无非是给对方减刑的机会。

如果双方是父子、兄弟或者其他血亲，那么父兄可能为了子弟保持沉默，对方也能如此。但是在广泛的市场中，同行之间显然没有这样值得信赖的、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同行要高价，显然给自己创造了更好的成交机会。同样的商品（也包括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对方要价100元，自己要价95元，自己就能成交，对方就要寻找其他机会。为了胜过同行的竞争，自己就要做出一些牺牲。买同样的商品，出价更高；卖同样的商品，要价更低。对卖家来说，拍卖是最好的出卖形式。一群买家追求一个卖家，以最高的卖价出售。如果拍卖过程中，暗地有意安排一两个“托”儿，或者有意造成人为的供不应求，便能以更好的价格成交，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事情。这也是期货市场中，使现货市场中占有优势的一方，获得更大的博弈优势的原因。

市场中，同行越稀少的参与者，越有资格获得更大的份额。反过来，同行越多的参与者，越只能获得最小的份额。同行数量越多的参与者，越要把自己的要价压低到接近成本（劳动者的成本就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费），把自己的出价提高到自己支付能力的上限（教育、医疗、住房资源是有限的），才能优先成交。同行数量越少的参与者，越有资格要求对应的支付的上限和成本的下限。

同行是冤家这句话，似乎与我们前面说过的同一个阶级有同样的认同的说法存在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比如，对地主阶级来说，当面对农民起义的时候，彼此就是兄弟。反过来，这种兄弟情谊并不妨碍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吞并小地主，大地主之间彼此政变，动辄族诛。当追求阶级利益的时候，大家是兄弟，当追求阶级内部的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的时候，同行就是冤家了。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成为垄

断寡头，或者说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每一个地主也都希望成为良田万顷的大地主。他们成为寡头或大地主的过程，显然要对兄弟下刀。

博弈力量的强弱，还取决于合作破裂的后果。如果甲方迫切希望成交，乙方却不在乎成交失败的后果，则甲方注定输得一干二净。青黄不接的农民，可以为了一二百斤粮食，押上一两亩土地。正常年景，20倍的粮食也换不来的土地，被出奇廉价的抵押出去。农民不能等到今年的粮食收获，而地主则不在乎去年的粮食发霉。

博弈力量的强弱，也取决于其他选择的多少。农民渴望成交，甚至不惜以超低廉的价格抵押仅有的薄田，最终走上绝路，也是没有其他选择的结果。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选择的能力，与他的腰包的鼓胀程度密切相关。对一无所有，为了活下去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其他选择的人来说，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是不自由的。自由市场中，自由的是稳拿而绝不是卢瑟。给卢瑟一部分自由，卢瑟仍然要把大部分产品上缴给稳拿。一面刺激卢瑟的积极性，一面减少管理成本。这就是许多奴隶主主动解放奴隶为农民的原因。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黑人获得解放，得到法律保护的人身自由。这些黑人虽然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足够的经济独立地位，仍然是奴隶。不过是由丧失人身自由的显性奴隶，变为获得人身自由的隐性奴隶而已。类似的还有各种债务的隐性的“债奴”，比如荒年欠下地主高利贷的农民，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只要牢牢地控制住生产资料，让卢瑟走投无路，就能逼迫卢瑟乖乖地就范。

经济地位越弱的人，越不能承担合作破裂的后果。对他们来说，没有多余的财物，现金流始终是紧绷的。如果现金流断裂，他们就要承受最严重的后果。资本家不成交可以吃利息，工人不成交就要饿肚子。工人不与甲资本家成交，就要与乙资本家成交，最终必然与整个资产阶级中的某一个资本家成交。所以，资本家说不干了的时候，显然比工人更有底气。

保持一部分人无法成交，对其他人是警告，更是督促。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弱者。博弈双方成交的底线不同，博弈双方的选择手段不同，博弈双方数量对比不同（同行竞争对手）。由于有一定数量的竞争对手，强者可以选择一定数量的不成交，直接压迫成交者。

如果我们综合看以上三点的话，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大资本的绝对优势，也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参与到市场行为中人的劣势。那些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除了一身力气身无长物，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人，数量最多，最害怕失业，也没有其他就业的门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不成交，竞争压力巨大，所以是注定的卢瑟。在消费过程中，面对垄断土地、能源的对方，他们再次注定是弱者。他们在大饼中的份额经过两次削弱。绝大多数的参与制作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的人，却注定处于劣势

的地位，很有讽刺意味。

以上三点，在《多收了三五斗》之中都很清晰。农民一方数量众多，米行则只有一家；农民不成交无法缴租偿还债务，米行则可以耐心等待；农民除了种地，只有去工厂做工或者逃荒两条路，事实证明这两条路还不如种地，米行则可以关了米行开当铺、钱庄或者当地主等等。所以，虽然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多收的也不是农民的。

这种资方和劳方之间的拉锯，双方都有底线。资方是利息，不赚钱就停产。劳方是最低生活标准，不行就下岗去领救济。一边领救济一边打点零工，收入也未必比工资低的话，就下来吧。如果没有失业救济，拉锯的底线将对资方更加有利，这也是资方强烈反对失业救济的原因之一。此外，有些工人不是彻底的无产者，而是半农民半工人。农村遭灾了，就进城混饭吃。农村收成好了，城里找不到落脚地方，就回老家发展。这时，如果出现类似圈地运动的进程，就可以彻底毁灭他们自谋生路的可能。这样的进程显然有利于资本家。

双方的拉锯，往往以某一方提出“不干了”为要挟。对工人来说，工资低，我就跳槽，再牛点的，还可以联合起来不上班。对资方来说，你要涨工资，我就裁员。对另一方来讲，只要别触及自己的底线，合作往往比谈判破裂带来更多的好处。彼此的拉锯最后在辞职和裁员之间达到平衡。如果工人辞职以后的结局不是跳槽，而是失业，工人自然不敢随便动用辞职这个最终武器。

随着资本量的增加，工人单干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在手工工场的时代，机器设备价格相对低廉，工人也许还能涉足工业。在今天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没有巨大的资本，无法想象涉足制造业。此外，由于不断复杂的分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都被简化到最低的限度，如同庞大机器中的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一个生物体内的细胞。这样的劳动者，离开机械化的工业生产，没有任何独立的劳动能力。这就如同零件离开机器没有任何用处，细胞离开生物只能死亡一样。实际上，大多数人，即使单干，最多涉足第三产业，开个小饭店、旅店、理发店、小卖部等等。由于门槛低，这些行业注定竞争激烈。

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家可以把工人的收入压低到零。工人的收入的最低限度，是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比较合理的标准，是能保证他们能赡养老人，养育子女，偿还自己在获得劳动技能过程中所欠下的债务。最低标准，是能满足他们吃饱喝足。这时的工人根本就不想未来。他们是血肉的机器，他们能劳动一天，就有一天的口粮。一旦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劳动的机会，他们就要被社会抛弃。所以，想也没有用。想多了，只能是自己得抑郁症。

不过，这个最低标准，也不是固定的。有些人喜欢谈论刚需，刚需其实是很虚伪的说法。以食品为例，为了维持生命，可以吃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也可以吃窝

头咸菜、高粱米烂菜叶，还可以瓜菜代。最悲惨的时候，榆钱、树皮、树叶和观音土也可以充饥。多说一句，谈论刚需的人，并不是谈论如何提高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如何让多数人的晚餐从瓜菜代进化到窝头管够，从窝头咸菜进化到大米白面、鸡鸭鱼肉，而是强调窝头咸菜的重要性，要卖到大米白面、鸡鸭鱼肉的价格。对这些人的言论，卢瑟要多个心眼。

同样，资本家支付工资也是有限的。特殊的技术工人可以要求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占有全部价值。资本家的底线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如果资本家的投资获得的销售收入在扣除设备折旧和工资之后，不能维持类似资本量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家就会考虑逐步压缩现有生产规模，逐步改行，或者干脆把企业转手出去，自己套现原有资本，然后吃利息。

实际上劳动能力类似的劳动者之间的平均工资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种水平的形成，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是辞职跳槽与减薪裁员之间不断动态平衡的结果。

个别企业违反社会同类劳动素质的平均工资率的高待遇，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无法维持的。大量的求职者会蜂拥而至，追求利润的资本家没有必要支付不必要的代价。当然，如果管理者雇用工人不是追求利润则另当别论，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比如职业经理人把自己的亲友安排在肥缺上。全体股东的利益受到牺牲，职业经理人家族的利益获得增长。显然，这样的位置并不对外人开放，也就必然不存在其他竞争者蜂拥而至的情况。即使其他求职者蜂拥而至，也会被各种理由拒之门外。

另一方面，如果某些工人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名义工资，则往往付出特殊的代价。最终，他们的实际工资往往是和同行趋平。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工人为了谋求一份待遇比较好的工作，需要托人给“拿摩温”（英语 Number One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用来称“工头”）送礼，请“拿摩温”吃饭，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上缴给“拿摩温”。或者男工投靠一些帮会头子，认他们做师父，女工则要满足好色的上司的各种要求。类似的经济和肉体的付出，其实应该也算作工资的扣除。

从全社会来看，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资本的收益，必将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到的资本收益上升，是大中小资本平均考量的结果——虽然，中、小资本的收益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大资本的收益注定不断上升。综合考量的话，社会总工资相对社会总利润（或者总剩余价值）注定不断下降。这是因为在放任自流的劳资博弈之中，劳方的博弈能力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注定不断下降，博弈的趋势是愈发不利于劳动者的。

这首先应该归因于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或者小资本为了生存主动合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资本家要加入卢瑟的群体中，相反卢瑟加入小资本

家，最终晋升到大资本家的机会则微乎其微。尽管许多人可以说出若干白手起家的创造奇迹的人，比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包公留名千古不是因为包公在封建社会官场中常见，而恰恰是因为多数官僚不是包公。人们敬仰包公，是因为自己的冤屈无处申冤，渴望遇到包公。同理，人们传颂白手起家创造奇迹的故事，因为这样的奇迹不是普遍现象，人们希望类似的好运发生在自己身上。出身士卒的猛将是很多的，但是更多的士卒最终注定成为无名枯骨。所以，这样的奇迹作为励志作品的题材是可取的，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例证则是不可取的。

由于马太效应，大资本消灭掉了小资本，劳资双方的数量对比的变化，显然愈发向不利于劳方的方向运动。斯密描述的十几个人手工工场，经不起工人跳槽的打击。一两个工人的跳槽就可以导致整个流水作业停顿下来。相反，对几百人的大工厂来说，几十人同时跳槽也未必会伤筋动骨。至于几万人的大企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否则几百甚至上千工人的跳槽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此，每一个劳动者都被弱化为一个劳动零件，单个劳动者与资方博弈的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弗里德曼提出，最有效的保护工人利益的方法是其他雇主的雇用。这样说是有些道理的。但是，随着资本的汇聚，同一个行业，小企业会不断倒闭、联合或者被大企业吞并。对工人来说，选择的余地会越来越小。市场容积决定随着资本量增加，单位地区能容纳的公司越来越少，想跳槽越来越不容易。弗里德曼隐瞒了这一点。其他雇主的雇用能有效保护工人，但是谁能保证其他雇主永远存在？如果我们承认市场存在丛林法则的话，我们就知道市场显然没有这个机能。既然资本可以通过吞并或联合，不断增强资方的博弈能力，那么劳方就有权力通过组织行为改善日趋不利的博弈能力。

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的统治地位受到技术的冲击，于是创业门槛迅速下降，此时是小资本和劳动者的黄金时期。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对资本“汇聚规律”的一种补偿。但是，工业革命使技术工人地位不断下降，部分技术工人不断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工业革命的作用之一，就是使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幅度下降。各种需要复杂人工的手艺，逐渐被机器所替代。18 世纪前，织工曾经是工人中的贵族。个别织工的收入曾经不亚于小作坊主。工场主愿意出这样高的工资的原因很简单，离开他们工场就无法正常运转。然而，随着新型织机的出现，织工的技术不再是工场生产必不可少的部分，于是他们的工资待遇便一落千丈。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家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选择最便宜的劳动力。随着资本的积累，全球设厂，这种小资本做不到的事情，对大资本来说易如反掌。对劳动力来说，这时的竞争不再局限在交通运输技术极限的较小范围，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因为相同劳动素质的劳动者的工资会逐渐趋同，提高劳动者整体的工资水平不是单个劳动者所能改变的事情。单个劳动者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不做目不识丁的劳动者，而是花费巨资去大学深造。然而，对全体劳动者来说，如果所有的劳动者都去大学深造，最终的结果将是大学深造对提高工资收入水平的作用日益下降。

虽然产量一直上升，多收了三五斗，但是多收的粮食，也不是农民的。事实上，最终的趋势，就是把农民的生活水平从大米白面压缩到窝头咸菜，最终压缩到观音土。个别劳动者可能因为懒惰或愚笨而收入低下，但是如果把全社会劳动的贫穷都归因于个人原因，就显然忽视了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

改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需要改善劳动者的博弈能力。改善劳方博弈能力，首先需要减少经济地位劣势一方的数量。单个工人都清楚资本家利用工人竞争压低工人工资的手法，但是却由于囚徒困境而无可奈何。在劳资博弈之中，如果工人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则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不一样了。要么全雇用，要么一个也不雇用。工会就是使工人用共同认识，产生共同情绪，采取统一行动的组织。

资本家利用工人之间竞争压低工人工资的手法，由于工会的出现而大打折扣。工会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也沾光。不仅如此，类似行业工人的待遇也会提高。筑路工人工资提高，建筑工人的工资也会提高，这种“搭车效应”普遍存在。弗里德曼提出只有1/4的美国工人是工会会员，所以工会不是促进美国工人待遇改善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考虑到劳资博弈过程，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博弈，一群人中一部分的博弈能力的提高，对整个群体都有促进作用的话，就会知道弗里德曼的说法值得商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耐神奈儿就一定要实现，但是这种联合却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资方的打压，工会自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资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宣布工会非法，逮捕工会领袖，开除参加工会的工人，血腥镇压工人。这种行为在旧中国司空见惯，林祥谦、顾正红都留名于中国近代史。其次是工会领袖的堕落和官僚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许多领袖已经堕落成职业官僚。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会领导人私吞工会基金，滥用工会权力为自己谋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会内部必然离心离德。此外，一旦工会领导人出现官僚化，他们与稳拿之间就很可能出现利益的交集。比如：一次大战前夕，许多国家的工会领导人或者工党领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对此，列宁曾强烈批判。再次，当工会势力取得成果，工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时候，往往也是工会势力逐渐弱化的时候。工人联合起来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就是资本家的压迫，当资本家的势力削弱的时候，也就是联合起来的动力削弱的时候。

工会不仅仅扩大本行业工人在劳资博弈中的能力，有时也能扩大本行业在全社会的博弈能力。在全社会的大饼中，窃取超过本行业创造价值的份额。比如某些国家和地区航空公司的工会，定期组织驾驶员罢工，尽管理由牵强，却照罢不误。这种行业往往是垄断性行业，参加罢工的劳动者往往也需要复杂的职业技能，所以，一方面公司可以把负担转移给社会其他部门，一方面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如此一来，这些公司的工会往往获得胜利，于是便不断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样的罢工不但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同情，反而会引起反感。不过，这样的例子很显然不能推而广之。弗里德曼说工会获得的好处往往首先来自其他工人的损失，在垄断行业的工会中可以这么说，在一般行业中这么说，就不恰当了。

工会领导人的堕落和官僚化，个别垄断行业工会的贪得无厌，给了弗里德曼这样的专家充足的弹药攻击工会的存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工会的存在，劳方在与资方争夺大饼中的博弈能力必然大幅度下降。这一点，从弗里德曼不遗余力地贬低工会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了。

改善劳方博弈能力，理论上还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式为工资的最低限划上一道杠。用行政的方式规定，企业雇用工人，必须为工人提供窝头咸菜，不能利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无限压低工人工资。

不过，这道杠理论上能保证工人的利益，实际上的效果往往不怎么样。在有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往往是一纸空文。假设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500元，外加几险几金。如果甲工人坚持最低工资标准，而乙工人只要1500元的工资，不要几险几金，或者要求更低的工资，那么乙工人自然更有机会获得这份工作。吃高粱米，总比没饭饿肚子好。资方也摸清工人的底线，要求工人签署“虚钱实契”的合同。即使有人告发，必要的合同一应俱全。何况，工人为了稳住饭碗，也会配合资本家作假——除非下定决心不干了，准备跳槽，而且已经找到了下家公司。

此外，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在扣除工人工资以外，还能维持最低的利润率，至少要稍微高于利率。否则，资本家就会选择关闭工厂，解雇工人，放弃实业，当货币资本家。如此一来，则最低工资标准根本不可行。在个别垄断企业利润率很高，社会多数企业平均利润率很低的情况下，不增加垄断企业税收补贴工人而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结果，往往不是存在大量非法雇用行为，就是大量小企业无法承担工资标准被迫关门倒闭。简单地说，在社会总大饼的份额中，由于大资本的压迫，中小资本家获得的份额很少。如果这时获得多数大饼的大资本家不肯出血，却要让中小资本家支付成本，提供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工资给工人，使中小资本不能获得最低的利润率。那么，中小资本家理性的选择就是关门大吉，不干了。

在现实的劳资博弈中，如果不改变工人的博弈地位，不改变中小企业维持微利的状况，不触动大资本的既得利益，最低工资标准往往是一纸空文。在前文中提到的救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人的博弈能力。但是救济的来源却值得注意，如果是来弥补就业工人的工资，那么这样的救济对提高工人整体收入水平的作用，显然不如来自大资本家的利润。

在自由市场的劳资博弈之中，劳方是注定的弱者。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劳动者获得消费品必须经过两道关：第一次是卖出自己的劳动力，第二次是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和劳务，这就意味着卢瑟必然接受两次对自己不利博弈，他们要受到两次剥削。饥饿比皮鞭更有效。只要不断推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能刺激奴隶们努力工作。相对奴隶主，资本家不使用暴力胁迫却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培养奴隶学会一门手艺，需要自己花钱为奴隶请师父。在资本主义时代，老奴隶为了让小奴隶生活得好一点，至少比自己生活得不差，会倾尽全力供小奴隶上学。类似的还有住所，奴隶主不必为此支出一分钱，奴隶会主动负债累累以求一个立锥之地。实际上，看看美国大学的学费和次贷危机，就会知道中低收入的美国在教育和住房承受的压力。在世界各国，教育和房产都是卢瑟最重要的开支。

劳方是弱者，资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下一节，我们会分析剩余价值在资方内部的分配过程，包括不同资本量的不同平均利润率以及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土地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你争我夺的过程。

财富之母：剩余价值中的地租部分

他（土地所有者）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是垄断价格在许多情况下的优势，特别是对贫民进行最无耻的剥削方面的优势（因为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以及这种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

——《资本论》（第三卷）

产业资本家获得利润以后，并不能独吞，必须和其他稳拿共享。这个共享的过程，又是一次彼此拉锯的过程。下面就要讨论产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关系。

与产业资本相比，大土地所有者是彻底的不劳而获者。暴力拥有者夺得土地，土地所有者购买了土地，于是土地所有权获得收益，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抛

开许多暴力拥有者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不看，从暴力所有者手中购买土地，就可以心安理得享受地租也是荒谬的："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从而，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像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事业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像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像不是由于奴隶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改变外壳的程度，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即一种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①

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需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② 可以说，地租就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循环的产品分配中的映射。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地主与土地使用者的博弈能力，并没有一定之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有一个三位一体公式，提出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他认为：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如果把平均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页。

② 亚当·斯密，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4页。

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则企业主收入表现为资本家的工资，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的产物，这样，三位一体公式可以更确切地归结为资本创造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

这个公式表面上看，为每个阶级的收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家各自投入各自掌握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然后各取所需。表面上看，各有付出，各取所需，好一派安乐祥和的景象。实际上，则掩盖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博弈关系。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博弈，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工人和资本家彼此之间存在拉锯关系，工资与剩余价值此消彼长，工人由于人多势微，往往是弱者。

实际上，同样的博弈关系也要推广到资本家与地主之间。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分配也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利息与地租之间的关系。土地垄断程度越高的地区，地租越贵。土地垄断程度高，地主一方的人数就少，相比之下资本家的人数就多。同行人数的多少，与博弈能力成反比，这条规律不仅在劳资博弈中发挥作用，在这里也发挥作用。因为存在激烈的博弈，决定博弈结果的是双方的垄断程度，所以地租与资本家利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

关于地租的具体表现，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是产品的价格加上一部分地租，到马克思的时代，就是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中扣除一部分剩余价值了。从单位产品的价格来看，由于地租的原因，也许上升，也许不变。而上升的部分，往往并不与地租相等。但是从社会总产品来看，随着地租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社会总产品要由地主阶级占有，如此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必然要与地主共享。

地租并不是产品价值的附加值，而是产业资本家剩余利润的扣除。市场上的产品只存在一个标准，即同等质量同等价格。同样质量的棉花，并不会因为是大地主的土地上生产的，就比小农家生产的卖得更贵。租种大地主家的土地的农业资本家，并不能因为自己要缴纳的地租比别人高而提高棉花的价格。农业资本家要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棉花，扣除种子、化肥、农业的开支，支付雇工的工资，获得剩余价值，扣除地租以后，才是他的利润。地租越高，他的利润就越低。

地租并不仅仅存在于农业和工业，商业同样有地租的存在。工厂的厂房要缴租金，如果自己买地皮自己盖，那可以理解为一次性缴纳地租。除了支付采矿成本如各种矿石、原材料以外，也要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利润。商业地产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如店铺的租金、摊位的租金等，都是地租。

地租无所不在，只要以土地所有权为依据的收入都可以理解为地租。

地租的高低决定于土地所有者与产业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博弈。如果地租过高，产业资本家就可能产业转移。如果地租较低，就可能吸引产业资本家投资。当然，先把产业资本家吸引进来，再把地租涨上去，也是一种手段。毕竟几千万、几个亿的固定资本投下去，再转移也不容易。同理，房租过高，劳动者也可以逃离发

达城市，去边缘地区谋求机会。当然，如果产业资本家是微软或者苹果那样的环球巨头，而土地相对分散，则可能出现地租优惠，甚至减免地租的现象。整个博弈过程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无疑是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实力对比，最关键的是土地的垄断程度，或者说地主数量的多少。

地租的上涨，有时会直接推动物价的上涨。如果有地主在集市收租，而附近又没有其他的集市，或者说没有其他地主与这个地主竞争的话，那么集市上的商品价格必然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市场上的商贩如果彼此激烈竞争，那么地租的大部分将由商贩承担，物价上涨有限，如果商贩彼此之间形成稳定的同盟，那么地租上涨的部分，绝大部分都要转嫁给消费者。换句话说，如果地租上涨，那么商贩和消费者将进行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就是彼此分摊新增地租的份额。

地租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润。一方面资本家要缴纳地租，另一方面有时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待遇，因为工人的房租和食品价格上涨了。

历史上英国工人在资本家的影响下曾强烈反对《谷物法》。1815 年英国通过新的《谷物法》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规定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当时，英国的地主阶级负债累累，为了偿还欠债，并且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他们一直对佃农维持高地租。在英法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采取封锁政策，输入发生困难，迫使英国用粮多少局限于本国所生产的。战争所造成的输入困难起了保护关税的作用。谷物价格上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租也就增加到以前的两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进口的粮食涌入英国，导致粮价下跌。这时，要么保持高粮价，要么降低地租。英国的地主，在内阁、上下两院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于是强行通过《谷物法》，限制国外的粮食进口。

很显然，《谷物法》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直接损害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工人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费用去购买食品，资本家也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地主阶级要求更大的大饼份额，这部分份额将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博弈决定。多数情况下，多数负担显然要由工人承担。不过，当时的英国资本家面临一个困难，就是美国对英国的移民敞开大门。换句话说，如果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太多，英国工人就会选择移民美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一部分增加的地租。

在当时的条件下，食品价格上升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工人的生活质量却下降了，资本家的成本上升了，资本家的利润下降了。唯一获利的就是地主阶级。这些地主阶级依靠在内阁和上、下两院的政治特权维持高地租，整日无所事事，穷奢极侈，花天酒地。工人和资本家怎么能不火冒三丈？

城市的房租的上涨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不断提高

地租的水平，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工人却没有获得任何实惠。

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难理解身为资本家的李嘉图为什么反感地主阶级了。大饼总量不变，地主吃多了，资本家就要吃得少。在资本家看来，产业资本家艰苦创业，绞尽脑汁，承担风险，却为别人忙活。地主膀不动身不摇在一边坐享其成，而且地租水涨船高。产业资本家干得越多，地租就越贵。

在资本家看来，地主把获得剩余价值用于吃喝玩乐，如果这些利润不给地主阶级，而是由资本家获得，用于资本积累，那该多好啊。如此就难怪亚当·斯密愤愤地说地主、贵族是什么游惰阶级了："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是用全部年产物来维持勤劳阶级。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归游惰阶级消费。一国年产物的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每年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

与产业资本相比，土地所有权具有先天的优势。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可以摆脱土地的生产方式，土地资源也仅仅局限在地球范围内——虽然人类能登陆月球，但是在月球上长期生产生活的技术目前还不具备。所以，土地很容易被垄断。如果考虑到在封建年代土地是最容易通过暴力垄断的生产资料，而且不许私人交易，那么这种垄断就更容易形成并维持了。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把孩子他娘抓在手里，就有资格获得最大的产品份额。土地资本处于高度垄断的地区，即使产业资本多收了三五斗，也是地主的。只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率土之滨"，就必然"莫非王臣"。

地租的上涨，最终难免扼杀产业资本。地租高到一定程度，资本家无利可图，就纷纷改行。

如果这时土地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下，那么地租的水平显然会高于土地分散的状态。这时，小块土地不能满足大多数的需求，于是地租不会因为土地狭小而下降，相反会向大块土地的地租看齐。大地主是土地的坐庄者，大块土地的地租决定市场的地租水平。

改行的小资本的选择不是去挑战大地主，而是想方设法成为小地主，搭大地主的便车，获得高昂的地租。这符合小猪跟着大猪跑的原则。如此也就很容易理解许多中小实业资本家不断退出实业，争相购买土地，努力成为小地主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产业高度垄断的时候，大资本家也会这么干。大产业资本家垄断了本行业，继续扩大生产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他们并不把利润投入产业，进行产品升级或者扩大再生产，而是投入地产，争当大地主，从其他行业榨取利润。对中、小资本来说，既然大猪坐庄土地，小猪自然也放弃实业坐庄土地。

如果我们以工、农业产量作为衡量国家富强的依据的话，很显然推高地租并不能推动国家富强。地租只是土地所有者依靠土地所有权对土地使用者所要求的贡

赋。地租高的地方的产量并不比地租低的地方的产量更高，只能说地租高的地方的土地所有权比地租低的地方更集中、更垄断、更有权要求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剩余价值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土地价格高昂，地租居高不下并不是国家富强的标志，而是工、农、商业负担沉重的标志。

地租高的地区，土地所有者获得大量的剩余价值，然后并不用于生产，而是用于挥霍或者土地兼并。在这些地区，产业资本的利润相比土地资本的利润必然低，对占有了剩余价值的地主来说，投资产业资本显然是不划算的事情。

如此便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是地租畸形高涨，一方面是地面上的产业凋敝：小资本家改行当小地主，地主也不投资产业等。地租与地面上产业的承受能力之间发生越来越大的偏差。地租过高，生产不足的社会，不会主动降低地租，相反地租会不断上升。很显然，地租不会无限上升，最后必然崩溃。地主阶级既不愿意放弃奢侈的生活，又不愿意发展生产，那么产品从哪里来呢？大饼不断萎缩的时候，还要求更大份额的大饼，这样的结果能够实现的话，必然是挤压其他阶级的利益。

历史上看，满清末期，由于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实力太强，导致中国产业资本迟迟无法得到足够的剩余价值，完成大幅度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大量剩余价值并不是投资于产业，而是不断囤积土地，或者开当铺。盛宣怀的招商局最大的产业不是轮船，而是各地的房产和当铺。当时的情况不是地主用剩余价值投资工厂，而是企业家用剩余价值投资土地。不是去争当企业家，而是去争当地主。于是，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而产业发展则几乎停滞不前。也许有人会用洋务运动的成果反驳停滞不前的说法。但是，如果和同期的日本比较，说中国的产业资本停滞不前则是不为过的。满清在1864年攻克南京（天京），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两者开始接触现代化的时间基本同步。到20世纪初，两国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其中还有重要的政治原因。

亚当·斯密使用游惰阶级这个词，说明地主只消费不生产，游惰阶级的奢侈消费会影响总产量，这是客观事实。地租来自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有些地租直接从资本家的利润中扣除，比如厂房的租金、耕地的租金，有些则从工人的名义工资中扣除，比如房租。不论如何扣除，剩余价值的生产者都是工人，都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外，提出分割大饼的要求。如果参与组织生产的资本家可以算为勤劳阶级的一部分的话，地主阶级则无疑是游惰阶级。相比产业资本获得剩余价值后发展生产，地主获得剩余价值以后主要用于个人挥霍或炒地皮，很显然，这不利于一个国家发展生产力。

但是，游惰阶级不关心总产量，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即使他们的花天酒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大饼做大也在所不惜。所以，亚当·斯密的理论能说服别人，但是不能说服游惰阶级。不过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本国的游惰阶级虽然

能抑制本国的产业资本的发展，却不能抵御外国资本的侵略。抱残守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迟早被产业资本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踹开大门。在坚船利炮面前，曾经辉煌的生产力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败涂地。先是是军事失利，后是经济沦陷。由于工业能力低下，这些国家在外来强盗面前没有基本的自卫能力。这样的国家很容易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这时，无论土地所有权曾经多么垄断，无论地租曾经多么高昂，无论土地曾经吸引多少资本，在外来的工业化的暴力面前，这些土地所有权现在一文不值。外国侵略者完全可以杀光原住民，无偿占有土地，如同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或者如同纳粹那样有计划地对弱小民族搞种族灭绝。如果他们刀下留人，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屠杀，或者发慈悲，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让原住民当奴隶，为他们提供廉价劳动力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封建统治者喜欢信奉“宁予洋人、不予家奴”，实际上一旦洋人能脱离傀儡自主建立稳固的统治，那么原先的本国统治阶级将是首先被灭绝的对象。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权利最终将被向前发展的生产力无情地碾碎，不是被本国的，就是被外来的。不过，这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为了民族解放，往往有反封建和反帝的双重使命。

历史上看，土地资本往往是产业资本最强有力的敌手，几乎吃光了总大饼。战胜这个敌手，需要政府的介入：由于土地的易垄断性和封建大地主的存在，产业资本即使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多收了三五斗也很难保住成果。这样的情况下，指望产业资本自身战胜土地资本是很难的。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发展产业资本的前提，往往是由政府出面进行土地改革，或者提供大量国有土地，或者拆分大地主土地，或者把大地主土地强行收归国有，或者对大地主实行赎买制度。总之，要达到抑制大地主、削弱土地垄断的目的，使地租下降到一个相对低廉的范围，为产业资本保留一定的剩余价值，使产业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方面的例子，如美国历史上的《宅第法》，就是保证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以合理的价格在西部获得一块适当面积的土地。

由于今天各个国家抑制土地高度垄断，土地所有权对产业资本的威胁已经下降到次要的地步。但是，这并不是说，产业资本从此获得解放，可以独大。今天真正的主宰往往不是产业资本，而是当年一个不起眼的小助手。

金融为王：金融在社会总大饼分割中的份额

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

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为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资本论》（第一卷）

这就是金融机构的发迹史。

每一个企业都有生产周期，也都有设备更新换代的周期，固定资产折旧的资金在原有资产被淘汰以前，暂时处于闲置的状态。这时如果能把甲企业的货币资本借给乙企业。乙企业获得的利润分给甲企业一部分，那么对甲乙两个企业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困难的是，甲企业很难了解乙企业的经营情况，很难知道乙企业获得了资金会不会用于挥霍浪费或者干脆卷包走人。一种可能是甲乙两家是非常熟悉的企业，比如甲、乙沾亲带故，或者彼此是街坊邻居。还有一种可能是甲方虽然与乙方不熟悉，但是具有很强的暴力属性或者能够雇用到很强的暴力属性，乙方不敢赖账。最早的高利贷资本就是这个路子，比如清朝的印子钱。由于在交易中，甲方好整以暇，乙方火烧眉毛，利率往往非常高。所谓“印子钱，一还三；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

第一种方式中，甲方资金能够利用的空间有限，毕竟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总缺钱的，甲方的资金经常不得不闲置。第二种方式中，甲方拥有暴力或者雇用暴力，都需要很高的成本。虽然利率很高，自己未必能获得很多的收益，尤其是资金量比较小的时候。对乙方来说，第一种方式可能遇到自己的朋友都缺钱而爱莫能助的情况，第二种方式则不得不承受极高的利息，这种利息甚至可能远远超过自己正常生产经营的利润。如果不是为了解燃眉之急，多数人不会主动选择这种方式。

要把这笔钱利用起来，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发挥作用。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全社会，一方面是全社会有闲钱的人，一方面是全社会缺钱的人，如此便容易为货币资本寻找对应的需求者。金融机构大规模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法制的健全。金融机构把暴力属性外包给国家，储户也不用担心金融机构侵吞自己的存款。一方面敢存，一方面敢贷，一方面不敢不还。

金融机构帮人筹措资金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左手借入，右手借出，金融机构并不把自身的信用牵扯其中，只是当掮客负责撮合双方，收取手续费。这种融资方式并不创造货币。某甲通过某乙安排借给某丙资金，某甲自己放弃一段时间资金使用权。某乙的生意如果比较成规模的话就是投资银行，为企业安排上市、发债等等。

第二种是金融机构当司库兼账房先生，吃存贷款的利差，把自己的信誉牵扯其中。某甲和某乙都在某丙的钱庄开户。某甲把钱存入某丙的钱庄，购买某乙的商

品。某丙从某甲的账户中减少相应的数额，在某乙的账户上写入相应的数额。某甲和某乙来回交易而不提现，只是某丙账面上数额的变化。于是，某丙就有了可乘之机。某丁从钱庄借钱。某丙并不是让某丁把钱提走，而是给某丁开户，写上相应的金额。某丁如果购买某乙的商品，就在某丁的账户中减去相应的金额，然后给某乙的账户上加上相应的数字。这时，某甲也不放弃资金的使用权，随时可以用自己的资金购买某乙的商品。某甲和某丁都可以买某乙的商品，所以这种模式有创造货币的功能。某丙玩十个坛子两个盖子的游戏。不断把资金从某甲、某乙和某丁的账户上倒来倒去。某甲最早存入的资金则在金库之中睡大觉。某丙的生意如果成规模的话就是商业银行，接受存款，发放贷款等等。

不论哪种方式，金融机构都具有为资金短缺企业融资功能，金融企业的利润都来自资金短缺企业的利润。

由于金融机构的存在，不会一面出现借不到钱，一面有钱贷不出去，利率也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早期的金融机构为资本积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资本的利用率大大提高，资本闲置降低到最低。由于可以以合理的利率筹措资金，许多某些原先不存在的生产过程，现在可以发生。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无中生有”的生产过程可以被无限放大。仅凭不断的金融交易就可以无限增加价值。

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看，整个金融机构的作用，还是产业资本的助手，为产业资本提供资金支持，然后分红。如果产业资本不能顺利创造剩余价值，或者说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那么必然在金融机构内产生连锁反应。传统商业银行主宰的资本市场存在两个利润率，一个是零散小资本的利润率，这个利润率必然很低，最终趋同于存款利率。一个是普通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这是一般企业的利润率，这个利润率高于贷款利率。企业的利润要把一部分交给银行，银行把其中一部分交给储户，剩下的就是银行的利润。这是产业资本利润扣除地租以后的又一次分割。与地租一样，这次分割是简单清楚的。

由于金融机构的存在，企业的积累过程不再是单个企业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原先甲企业的闲置资金多少，并不影响乙企业的经营。现在则不然，乙企业的经营会影响到甲企业的资本积累，反过来甲企业的资金闲置情况，也会影响到乙企业的经营。社会的资金松紧情况，从此变为统一的整体。消费不足的危机，表现为企业回收货款困难，通过金融机构，可以迅速扩展到整个经济体。当然，这是后话。

存贷行为成社会化的过程，存、贷、金融机构三方之间形成彼此拉锯的关系。由于金融机构不论在存还是在贷的过程中，都是处在“一对多”（哪个企业没有流动资金？哪个企业不需要贷款?）的有利地位，金融机构在市场的博弈中，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优势随着交易的现代化和资本的社会化不断扩大。

早期的金融机构，使用的主要是自己的资金，社会资金仅仅是辅助，这样的行为与高利贷资本相去不远。这样的金融行为，使用的资金量有限，影响的范围也有限。今天的金融机构使用的是全社会的资金。所有的货币，除了极少数以外，都要在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中流通。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没有商业银行的账户是无法想象的。绝大多数的交易，不过是从甲账户转移到乙账户。如果我们把金融机构看为一个整体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货币都在金融机构的手中。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大批中小资本不得不主动退出竞争，以免在残酷的竞争中被动倒闭。这些资本不断脱离产业，成为货币资本。此外，由于纸币出现、不断的通货膨胀以及工人寿命的延长，工人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银行或者投入股市，以使自己在晚年丧失劳动能力以后，老有所养。这种用工资投资的行为可以是工人自发的，也可以是政府强制的，比如养老基金。这些货币资本通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入生产环节以求分一杯羹。

现在的金融机构使用的是一切可以动员的资金，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有限的资金。相比之下，企业的地位则不断弱化了。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企业越来越依赖金融机构的支持。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对单个企业来说，资本量越大越有利。能获得一支廉价的援军，无疑是莫大的优势。激烈的竞争之中，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规模越高，单位产品成本越低。可以调动的资金量越大，争夺原料和市场越迅速。没有贷款的企业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不断增加资本量，看准时机也要慢慢来。有贷款支持的企业一旦看准时机，就可以从银行（或者其他融资平台）获得货币资本。如果大家都不用贷款也就罢了，如果仅仅一部分企业不能获得贷款，那么能获得贷款的企业必然占尽先机，不能获得贷款的企业则要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甲企业的生产规模大于乙企业，总利润扣除银行利息以后也多于乙企业。换句话说，甲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远远高于乙企业。如果甲、乙两家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水平接近，甲企业获得贷款，乙企业不能获得贷款，那么甲企业的发展速度无疑要快于乙企业，无论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还是占领市场的速度。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同行之间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都处在类似的水平，那么两者竞争的结果则基本确定了。

企业的生存同样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谁能挺到最后。最后5分钟，就是胜负的关键。前期负债经营，现在产品销售不畅，银行逼债。彼此精疲力竭的战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获得贷款支持的企业可以活下来，没有的很容易死掉。不仅如此，活下来的企业还可以利用银行贷款的优势，廉价收购对手的资产。

金融机构对企业平时锦上添花，危机时雪中送炭。因为银行利率低于产业资本

的平均利润率，在繁荣期，利用银行信用意味着更快的扩张和积累；在萧条期，则意味着资金冗余量更大，可以承担的销价幅度更高；在复苏期，则意味着可以廉价收购失败同行的资产。有没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往往是同行竞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金融机构的支持很快就成为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

“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这个不起眼的助手，现在却决定企业的生死。当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限度，同行竞争强制产业资本家利用银行信用。

换句话说，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加强了。银行与企业的博弈之中，逐渐占据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在马克思的时代，产业资本对银行的依赖主要在支付信用上。随着金融的发展，银行资金进入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当银行为企业提供生产资本的时候，情况就改变了。当企业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依靠银行信用时，企业的债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除，其间企业为银行所约束。相比之下，银行掌握的货币有极高的流动性，而企业却依赖商品的销售。随着信用的发展，企业自有的资本量相对生产规模都被压缩到极限，或者说企业在有限的自有资本量下，把生产扩张到极限。如果任何突发事件需要现金，那么企业就需要求助于银行。这种情况下，贷款被拒绝就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断裂，企业就有破产的危险。由于企业掌握的资本的流动性永远小于银行掌握的货币的流动性，所以银行对企业具有先天的优势。企业必然越来越依赖银行，银行也必然逐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

随着信用的发展，企业间主要资金往来都变成银行账户上的划转。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为资本家办理往来账目及其他金融服务，确切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情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直到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取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银行也可以通过贷款的金融支持作为条件，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这些影响包括要求企业按照银行的要求采取一定的经营活动，或者在产销过程中优先考虑银行的其他优质客户等等。

企业对银行从依赖到臣服，银行对企业从助手到主宰。企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银行地位的上升，最终双方关系逆转，君臣地位互换。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股份制的出现，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许多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这些公司一旦出现迅速占领市场，吞并同行，封杀潜在的竞争对手。

股份制的出现给了金融资本更大的权力。股份制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单一所有者变成众多所有者，单个所有者的决策能力可以忽略不计，公司的核心权力控制在几个大股东手中。多数所有者唯一表示不满的方式就是抛售股票。由于创业资本门槛的提高，单个私人资本不能与社会资本抗衡。不借助金融机构，个

人资本已经没有什么投资的空间。小猪踩不动按钮，只好跟着大猪跑，老老实实地跟在大猪后面吃剩饭。绝大多数股东的博弈能力进一步弱化。他们通过股票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数量逐渐趋同于银行存款利息。股份制并没有削弱资本的力量，相反，极大地增强了少数资本的力量。大股份公司之中，掌握大量股份的数量众多的小股东，对自己的资本并没有对应的权力。他们的权力被极大地削弱，并被集中到少数大股东手中。

单位资本的利润率，随资本总量上升而上升。垄断企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一般产业资本。而这些企业多数股东获得的利润率远远小于正常资本。如此便产生一个现象，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小资本的利润率和一般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之外，超大资本还可能出现第三个利润率，就是垄断利润率。追求存款利率与垄断利润率之间的差额，就是上市的原因。用5个亿组建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可以垄断一个地区的市场，每年产生1个亿的利润。而对小资本来讲，每年产生100元的利润，需要2000元的投资。如此，这个企业按照小资本的利润率就相当于20亿资本。只要推动上市，立即就可以套现15亿的利润。当然，多数人往往只套现49%，4.8亿（20×49%－5）的上市红利已经足够了，51%的股权还可以控制企业，每年获得5100万的利润。实际上，大股东获得的利润要高于5100万，这是因为大股东有能力从小股东的大饼里获得一部分份额。两者对比：大股东初期投入5亿，获得4.8亿的上市红利，小股东最终投入为9.8亿；大股东拥有51%的股份，小股东拥有49%；大股东每年获得利润5100万以上，小股东获利4900万以下。

两者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非常清楚，大股东占尽优势。产生这种优势的原因，就在于大股东能在初期投入5亿，而小股东做不到。在大股东获得这5亿初期投资的过程中，很显然，他们很乐于而且也需要金融机构的帮助。现实之中，大股东往往并不需要投入5亿元的初始资金，而是依靠银行贷款。假如大股东只有2.5亿的自有资金，其余2.5亿来自银行融资，那么前后运作的利润率就更惊人了。金融机构在初期的资金支持和后期的上市过程中，是实际的决定因素。许多金融公司乐于也善于为垄断公司提供融资到上市的一条龙服务。金融机构丰厚的利润来自于垄断公司的分肥。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资本与垄断大企业形成同盟关系。这些垄断公司与金融公司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模糊。一些金融公司通过控股的形式，直接插手垄断公司的管理，获得更大的分肥。许多垄断公司纷纷涉足金融，也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很显然，即使垄断公司的垄断利润，也远远不能与这样空手套白狼相比。许多垄断公司旗下的金融机构，往往成为全公司最赚钱的分支部门。

那些不涉足金融机构的大公司，并不能完全回避金融公司的挑战。只要公开发行股票超过总股本的51%，就有被兼并的可能。只要拥有足够的股票，就能掌握

公司的控制权。在兼并过程中，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双方的经营能力，而是能获得社会资金的数量。显然，没有金融机构支持单个的企业，很难对抗获得金融机构支持的对手。

金融机构是社会资本的统帅，在由于兼并导致中小资本退出产业循环，出现大量廉价资本的时代，金融机构可以一呼百应，1% 的自有资本可以调动 99% 的社会资金。在资本量决定胜负的时代，资本之间较量的胜负完全看它的意思。一将成名万骨枯，这个规则同样适用于金融业，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廉价的社会资本能够保本便是万幸。

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属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产业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金融寡头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

在世界范围看，则是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与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量国家，这些国家中以“剪息票”和“赌博”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大大地增长起来。20 世纪初期的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为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越来越大。当时的英国通过金融手段不断收割其他落后国家。落后国家不得不把大量的剩余价值交给英国，供英国积累和消费，本身则很难积累。

在马克思的时代，单个资本增值依靠的是加法。今天，大资本增值依靠的则是乘法。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资本增值仍然是加法。如此便意味着，小资本是大资本的猎物。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相结合，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碎的碎片吸引到自己这面来。

金融资本通过产业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甚至直接吞并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分割大饼，离不开产业资本，社会总金融资本的增值需要在产业资本增值的基础上，但是个体金融资本则完全可能依靠吞并其他资本而增值。资本所以能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一种疯狂的吞并行为。今天的金融资本市场越发类似赌场。大资本拥有资本量和信息的优势，坐庄市场，操纵舆论，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影响价格。大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往往可以通过资金往来情况清晰地了解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资金量上则有小资本不可比拟的优势。旗下的经济学家和有关系的媒体，也可以按照需要的方式发布信息和忽悠大众。

大资本赢得的筹码是其他资本的剩余价值，或者工人的工资组成的养老基金，而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产业资本的崩溃，必然会冲击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疯

狂投机行为，超出产业资本支持的范围，必然崩溃。

资本主义世界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者恒强，这不仅仅表现在获得利润的时候强者有权先享用大饼，也表现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强者付出的代价更少。银行是商品市场流动的镜子。货币流动是商品流动的影子。金融危机，有可能是商品流动停滞。在某种意义上，银行控制资金，就能控制商品流动。也有可能是银行贷款于无法产生价值的资金流动。比如给股票投机贷款。不论哪种行为造成的银行资金流动停滞，政府都不会袖手旁观。如果银行崩溃，那么社会化大生产就要停下来，现金交易取代银行内部的账户划转，甚至发生易货贸易。那样，一切就都要回到中世纪了。

在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越有资格胡闹——因为他能把大家都拉下水。不论银行怎么胡闹，国家也会拯救银行。反过来，金融机构有充分的理由放心大胆地胡闹。相比之下，产业资本则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

地主丧失绝对优势以后，金融机构在产业资本的支持下，利用产业资本的内讧成就了霸业。过去不起眼的助手，现在成为经济的主宰。但是这种霸业仅仅是在市场范围内的霸业，如果放眼全社会，真正的超级强者并不是金融机构，而是一个魔王。这个魔王被束缚在地狱，才有金融机构在人间称王称霸的机会。在这个魔王面前，土地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都不堪一击。任何挑战它的势力，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个魔王一旦被释放出来，往往造成烈火冲天的后果。

元要素：暴力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作用

在巨大的财富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巴尔扎克

其实，巨大的财富背后，都隐藏着暴力。“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 ——这是马克思说的。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谈过，产权是暴力的兄弟，产权分配由暴力掠夺进化而来。一旦暴力重新走上分配的前台，财产的分配作用就要让位。“抢钱！抢粮！抢地盘！”的口号一喊出来，财产的作用就几乎不存在了。钱、粮、地盘都是可以抢的，换句话说，在暴力面前，财产是靠不住的，什么也不是。米店囤积粮食牟利，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

可以把粮食抢过来；高利贷者放高利贷牟利，可以把钱抢过来；地主靠土地收地租，可以把土地抢过来。当年没有工厂，所以没有抢工厂的口号。不过，二战期间，日本直接没收在华欧美国家企业。二战结束，国民党接收大员直接霸占任何他们觉得有利可图的企业。给企业主扣上汉奸的帽子，给企业扣上逆产的帽子，然后就充公。当然，充公其实也就是充了接收大员了。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汉武帝打击富户，消灭豪强。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等等。

暴力是最终否决权，这个早就有先人分析过，其他任何权力都没有暴力这么直接有效。使用暴力分配的最简单的分配方式就是抢劫。规模比较小的就是各种劫匪，包括拦路抢劫、入户抢劫等等。上一定档次的如水泊梁山的“好汉”和舍伍德森林中的罗宾汉，有相对固定的地盘，有“替天行道”的口号。终极暴力则是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或者说“世界警察”。

用暴力分大饼，用抢来的大饼武装自己，争取更大的大饼份额。这就是所谓的强盗事业的上升期。打家劫舍，招兵买马；再打家劫舍，再招兵买马；不断循环往复，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水泊梁山早期基本就是这个套路。

不过，这么干的注定是小暴力集团。这样扩张过程中，收益内部化，损失外部化。所以，很快就会达到瓶颈。打了祝家庄，打了曾头市，打了大名府，虽然收获了丰厚的钱粮，但是很快就会面临暴力的反扑，直接后果就是大宋朝官方的围剿。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附近居民加强自卫能力，比如攻打祝家庄和曾头市都遭遇了强力反抗，晁盖丧命。此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即附近的居民向其他安全地带迁徙。所以，当暴力集团能抢到的大饼达到一定幅度的时候，集团的领导人就会觉得靠暴力直接获得产品，既不经济也不稳定：打打杀杀的成本太高，容易激起反抗；长期刀口舔血，难免哪一天出现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反复劫掠的地区，注定民生凋敝，老百姓坚壁清野。

对同一个人群的迫害应该一次性使用，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达到目的以后，就尽量不要再用了。要经常施与恩赐，而不是暴力。这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否正确看个人的理解。不过，历史上大量的统治者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掌握赏罚原则的。相比之下，大量的毛贼草寇却违背这个原则。这并不是说毛贼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实力的差距：统治者能稳固地控制一个地区，而毛贼草寇做不到。

暴力分配文明化主要方法有两个：方法一，变暴力掠夺为税务征收；方法二，暴力搭台，产权唱戏。暴力和生产分配过程结合起来：平时暴力隐身在产权等要素的后面，达到分配的目的；关键时刻则偶露狰狞，使用最终否决权，一锤定音。

建立一个符合自己愿望的生产分配结构并且永远维护，是另一种手段。比如，满清入关以后的跑马圈地。这种分配方式并不局限于占有土地，也包括其他的手段。比如：读过《教父》的人都知道，西西里移民教父考里昂的“劲科纯净”牌

橄榄油并不比别人的更好，但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从他那里进货。因为考里昂是老头子，他的建议别人无法拒绝。在考里昂之前，克莱门扎靠打打杀杀小打小闹，风险高，收益低：抢条地毯都要提防警察，所以注定难成大气候。考里昂加入以后，把暴力和走私橄榄油的生意相结合。于是暴力的使用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获得的大饼份额则扩大到最高的限度。考里昂懂得打打杀杀不是长久之计，一百个强盗也没有一个律师挣钱多，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漂白。从这点看，考里昂成为“考里昂、克莱门扎、忒希奥三人帮”的首领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宋江也是，打了祝家庄、曾头市和大名府就要考虑招安的问题。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上海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等。

但是，不论哪种手段，都需要暴力的统一。或者说，在有限的空间内，只能存在一个来自暴力的权威，其他所有的暴力，都是由这个暴力权威衍生出来的。如果两个暴力权威同时存在，彼此相安无事，那么只能说明两者暂时势均力敌，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消灭掉对方的能力。这种状态很难稳定，一山不容二虎。此时，统治阶级无法正常统治。当然，最悲惨的还是被统治阶级，他们要为统治阶级提供面包和炮灰。

为了对抗私人的和外来的暴力，于是出现了统治阶级的集体的暴力。这种暴力可以是盟约性谈出来的，可以是使用暴力打出来的，还可以是连打带谈的。大家服从一个盟主，是一种产生方式，比如日本大名服从幕府将军；也可以是一个强者吞并掉其他所有同类，比如秦始皇。谈与打并不是绝对割裂的，强者不是那么好屈服的，所以德川家康在当上将军以前，也是经过一番厮杀的。反过来，秦始皇的手下将领显然服从秦始皇这个所有秦国稳拿的盟主，也保持自己对秦国的忠诚。

恩格斯认为，稳拿对内需要镇压造反的卢瑟，对外需要对抗其他稳拿，于是产生了国家。恩格斯的说法，显然接近我们所观察的现实：财产发挥作用需要暴力支持，没有暴力保护，财产根本无法有效工作。人越多，博弈力量越弱。反过来看，博弈能力越强的一方，人数必然越少。所以，要财产发挥作用，必须一手握钱袋一手握剑袋，为了防备穷鬼们穷极生疯，封建地主养家丁看家护院。规模小的十来个人，规模比较大的比如四川的刘文彩有一个连。此外，威胁不仅仅来自穷鬼也来自其他地主恶霸。暴力这个东西，这么低投入高产出，必然让人爱不释手。只要能获得经济好处，对穷鬼下手与对其他地主下手，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黄四郎有百十号人手和枪，其他地主如果不想处处低声下气，随时准备做出物质和精神牺牲的话，也要考虑拥有自己的队伍。没有百十号，至少二三十号，让对方知道自己不好惹。这些私人武装经过彼此吞并或者同盟，最终建立整个阶级的武装。

这就是国家的来历。

有观点认为国家是人们彼此需要和平、需要国家保护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显

然忽视了国家暴力的阶级性——受到暴力保护的不是所有人，只是一部分。这种说法，也忽视了东方集权国家的暴力统一征服史。至于所谓东方需要治水于是出现强大集权国家的说法，就更扯淡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可与治水没有任何关系。他脑子里想的是从始皇到万世，吞并六国，设立百越、象郡，修长城，修直道，毁天下之兵，达到的结果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当然，还有个人享乐，比如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

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总之，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国家有阶级性，国家由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控制。国家有暴力性，而且是最终的暴力。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

国家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无疑是经济利益，也就是有资格获得最大大饼份额的权力。所以，国家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让统治阶级的财产发挥作用提供的必要的暴力的保证。当然，也可能有人提出国家的其他作用作为异议，比如打击强奸犯。强奸的过程似乎与财产无关，不过确定强奸犯罪却与财产有关：奴隶主强奸女奴隶是不会被追究的，因为女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并不具备法律地位。奴隶主可以随意杀死她，何况强奸呢？地主强奸农民的女儿或老婆，一般也不会被追究。在卢梭的时代，一个穷人有漂亮女儿是最倒霉的事情。有钱的贵族强奸了穷人的女儿，一般不会被追究，最多花一点钱就可以摆平。如果穷人还不知道好歹，就有被投入监狱的可能。国家对统治阶级财产以外的其他暴力需求，不是不提供，而是相对次要和枝节的。

暴力参与分配，可以是非常隐蔽的。只要暴力支持的分配模式能继续有效运转，暴力就暂时静静地潜伏在一边，如同安静的猛兽，潜藏爪牙，虎视眈眈。但是如果和平的分配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倾向的时候，这只猛兽就要变脸。于是，风云变色，暴力登场，财产让位。简单地说，就是拥有暴力的人是永远的稳拿——当我能占上风的时候，我就和你费厄泼赖；当我不能占上风的时候，我就动用暴力，让你知道什么是终极分配权。当美国能控制中东石油的时候，就是中东和平的积极参与者。当萨达姆要玩“出圈”的时候，美国就弄死萨达姆。相对于暴力，财产就是如来佛手掌上的猴子。在如来佛手掌上要老实听话，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猴子要是忘记自己是猴子，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就可以占领天宫，如来就让猴子知道谁是天界的老大。

暴力的终极分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一旦暴力参与分配过程，那么其他前面的任何分配过程产生的分配结果都不算数；第二是除了暴力本身没有其他任何分配要素能推翻暴力决定分配的结果。

能否定暴力的只有暴力。剪除暴力的压倒性的分配优势，必须使用暴力。对抗黑道教父“老头子”考里昂，只能使用黑社会杀手。用生意与之竞争是不能奏效的。当考里昂的生意占上风的时候，考里昂乐于自由竞争。当考里昂的生意不占上风的时候，他手下的黑帮打手（比如克莱门扎和他手下的战士）就有用武之地了。无论手中的资本量超过考里昂多少倍，如果没有使用武力的决心，并且在你死我活的街头枪战中取胜，都无法和考里昂竞争。这时，唯一自保的方式就是转移自己的经营范围，自己改行，同时把橄榄油生意让给考里昂老头子。

弗里德曼说，技术垄断相对政府行政垄断易于打破，道理即在于此。除非政府主动放弃，否则尝试打破行政垄断就意味着挑战终极暴力。那就难免出现血与火的炼狱。当然，胜利者有权获得所有的果实。

在世界贸易中，如果把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暴力同样拥有最终裁判权。推翻美国资本的霸权，就必须歼灭美军的霸权，或者至少让美军不敢轻举妄动。否则，美国始终拥有最高否决权。目前看，没有任何一个非美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就尽量脱离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循环。目前看，也没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如何维持其对世界的统治。所以，当感慨“世界警察”的存在的时候，这种“世界警察”的身份，本身就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使美国能在世界总产品的大饼中获得足够的份额，豢养世界第一、武装到獠牙的庞大军事组织。

最大的暴力，无疑来自国家。国家是最大的暴力机关，这点学过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所以，国家也是终极分配者。经济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

国家参与分配的主要手段，一个是税收，这个是直接参与分配；一个是暴力与生产行为结合，进行相对隐蔽的分配。

首先看税收，税收有很多种。从税收征收对象来看，可以是商品，可以是收入，可以是财产，可以是人口。比如营业税、收入所得税、遗产税、人头税。从税基看，可以从量，也可以从价。可以每件服装征收2美元的税，也可以每件服装征收销售额的20%。从量征收，无疑对贵重商品有利。从价征收，则对便宜商品有利。每个人每月从收入中上缴100美元，与上缴收入的20%显然不是一回事。除非所有人的月收入都是500美元。此外还要考虑税率，可以对所有人采取同样的税率，也可以对高收入者采取累进或者累退的税率。

税收可以达到极其复杂的再分配目的。税收究竟由谁承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交易征收，很容易把税收负担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转移给博弈中的弱者——主要是劳动者。对财产征收，比如遗产税，则相对难以逃避。但是如果征收的财产涉及到潜在的交易行为，则仍然好逃避。比如对土地征收田赋，地主很容易把田赋转嫁给佃户。房产税也是一样，承担房产税的主体，很可能是租户，而不是房东。

也可以对空置房屋征税，对出租或自住房屋免税。每一种征税方式，达到的征收目的都不同。细节是魔鬼，而这个魔鬼导致的最终结果，往往让支持政策的人始料未及。

除了直接征收，还有很多其他间接手段，比如盐铁专卖。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桑弘羊发明的，所谓搞盐铁专卖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国有垄断资本。再早还有管仲提出的管山海理论，即国家控制各种自然资源。盐铁专卖的最终结果，有三个方面：首先在没有增加显性税收的情况下，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其次打击了大盐铁商人；最后老百姓买不起盐铁，只好吃不加盐的饭菜，使用木制工具，或者即使买到也是质量低劣的（当时的盐是苦的，铁是脆的）。表面上看，税收没有增加，实际上全国老百姓付出的总成本，未必比增加税收少。毕竟，大饼就那么大，不会凭空掉下馅饼来。

此外还有包税制。法国、罗马和中国的宋朝、元朝都采用过。宋朝规定凡税收在千贯以下的小集市，一律实行“包税制”，称“买扑”，即由官府测算出该集市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收入盈亏由包税人自己负责。对于政府来说，实行“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表面上看很有利。但是无利不起早，保税人必然最大限度谋求私人利益。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肆意加税勒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到了元朝，包税项目之多，范围之广，数额之大，都超过了宋朝。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包税制在全国兴起。有包天下河泊、桥梁、渡口之税的，有包燕京酒税的，更有甚者，还有人想以100万两白银包天下之盐税的。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一些不法官员勾结回鹘商人进入中原，承包了大量税收。此后，包税制在全国盛行。这一最初为了节约小税征税成本的简易征税法，至此演变成害国害民之举。不过，随着元朝的覆灭，包税制也基本不复存在。在敛钱方面，统治阶级总是有无穷的想法，总是力图从鹅身上拔尽量多的毛，同时力图不让鹅叫出声。所以，征收的方式无法一一列举。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大饼份额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上，阶级社会中，大多数情况下，暴力获得的大饼的份额都来自卢瑟。因为卢瑟是被统治阶级，他们无权参与国家征收政策的制定过程。张三、李四开会，研究敛钱的问题。王五缺席。王五承担敛钱成本的概率，如果不大于张三、李四，至少不会比他们少。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收上来，还要花出去。花到哪个方面，也是五花八门。可以修桥补路，可以赈灾，可以修长城。当然也可以修阿房宫，养三千粉黛，远征西域，修皇陵，研究长生不老药，赏赐身边的宠臣等等。所以，这笔钱为谁花或者给谁，同样是重要的。在王五缺席的情况下，这笔敛来的钱，很可能是张三、李四自己分了，或者选择对张三、李四更有利的支出方式。这个也是很明显的。

财政收支可以达到非常复杂的经济效果，可以劫富济贫，也可以助纣为虐。张三、李四的钱太多了，王五穷得要命。社会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时，财政就可以从张三、李四的大饼中征收一部分，然后补贴王五。当然，也可以继续从王五那里敲骨吸髓，然后给张三、李四锦上添花。历史上看，后一种可能更大。作为统治阶级，张三、李四不维护自己的利益，难道维护被统治阶级王五的利益？

财政的税收究竟来自谁，用于谁，是问题的关键。来自卢瑟还是来自穆拿？是加速财富聚积的工具，还是减缓财富聚积的工具。是满足多数人的愿望，还是满足统治者的私欲？

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在手中掌握至高无上的分配权的时候必然慎之又慎。

话说当年陈平在老家，一次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分肉食甚均，否则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心中无私，才能做好分肉的宰相。如果私心严重，统治者并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就难免众叛亲离。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国民党。看似强大，实际上经不起风吹雨打。一点小事，都可能酿成大祸。国家忙抗战，国民党官员忙着贪污竞赛。相比之下，普通人则是大产变小产，小产变破产。发国难财与破国难产同时并存。发财与破产的标准唯有是否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标准。所以，国民党反动派逃亡台湾之前，已经民心丧尽。到台湾之后，仍然不得人心。台湾人说，日本人如狗，凶猛但勤奋；国民党如猪，除了吃没有特长。

从中国历史上看，手中握有暴力的人，本身就能成为一个阶级。每次农民战争结束后，获胜的农民领袖，都会晋升为地主阶级。不是财产统治暴力，而是暴力统治财产。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统治阶级是官绅阶级。仅仅有地而没有功名的地主，只能算地主的中下层，哪怕有良田千顷。没有一个读书人壮门楣，充其量是土财主，不属于官绅阶层，有财产也守不住。相反，哪怕一贫如洗，只要出仕就是潜在的官绅阶级，就可能在短期内晋升地主的行列。土财主往往是各种势力觊觎的肥肉，而新科举人则是潜在的新星。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过黄金屋不在书中，而在仕途，读书则是仕途的敲门砖。想到这一层，就不难理解范进中举以后，他本人的疯癫，以及他老丈人的前倨而后恭。这样的例子很多，类似的还有苏秦的嫂子，对苏秦态度前后的180度转变。

统治阶级必定是掌握暴力的阶级，很难想象一个不掌握暴力的阶级能成为统治阶级。历史上，奴隶君主和封建君王都是本国最高军事统帅，拥有最高军事权力。窃符救赵的故事家喻户晓：晋鄙带兵在外，而代表最高军事权力的虎符，却藏在魏

王的卧室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把最高军事权力委托给他们代表团（议会）或者行政代理人（总统）。无论是议会还是总统，都不是终身任期，他们是否能长期保持权力或者继续当选，则要看资产阶级的意志。

由于暴力是唯一能对抗资本的要素，而代表国家行使暴力的官僚并不总是靠得住的。对资本来说，暴力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所以，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一直试图把国家的作用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对内保证社会治安，对外抵御外敌入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至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扶助弱小，是资本家最忌讳的事情——不让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走投无路，怎么可能老老实实成为廉价劳动力呢？所以，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一直竭力反对国家扶助弱者，理由是妨碍了经济的效率。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家也确实存在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的政权的可能性。

由于国家拥有压倒市场的实力，国家的分配行为可以达到复杂的分配目的，实现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的目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除了消除社会贫富差距，暴力参与分配的意义更加丰富。比如，控制关税扶助本国工业。美国建国早期，工业落后，一直对英国产品采取高关税的政策。美国农民不得不购买本国企业生产的质次价高的产品。这种北方对南方的经济剥削，成为南北战争的诱因之一。比如，落后国家采用财政手段，强行加速资本积累，用农业补工业。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用来自农业的财政收入，直接补贴工业。大量政府资金被投资到工业中，三十年的时间中，日本建立了基本配套的工业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段，美国与日本的企业，显然很难在英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高压下存活下来。国家主导的分配行为是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

需要暴力参与分配的地方更多，漏洞也就更多。任何宏观政策都需要人来执行，而能像陈平那样公平分配猪肉的人，是极其罕见的。相反，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却是常见的。如果暴力的分配权由接收大员来掌握，那么我们如何确定他分猪肉的行为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如何能确定他加速积累的是全民族的资本，而不是他个人的资本？又如何能确定他是在劫富济贫，而不是劫贫济富？有没有可能他仅仅在加速自己的资本积累，而不顾民族利益？比如，一面用加速全民族资本积累的理由让卢瑟为他的个人积累作出牺牲，一面用劫富济贫的理由让其他资本大出血，实现他个人的资本迅速扩大甚至一统江湖的目的？我们如何能确定他自我资本积累的目标是发展生产，而不是仅仅满足个人奢侈的生活要求？历史上，国民党的大员们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如此作为，不但不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消除贫富差距，还会抑制经济发展，最终难免激起血与火的碰撞——有资格对抗暴力的只有暴力。新中国的建立，就是这种惊人碰撞的伟大结果，也是众望所归。

传说，在上帝造人之后，人们向上帝请求："万能的主啊，我们太弱小了，需要保护。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上帝说："英雄能保护你们，也能粉碎你们。"后来人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利维坦，创造了一个能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庞然大物。但是，这个利维坦有双面的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一说。

在世界范围形成垄断资本统治的情况下，只有海中怪兽才能对抗垄断资本，保护人类。但是，海中怪兽也同样吞噬人类。凯恩斯强调的是怪兽为人类服务的一面，弗里德曼强调的是怪兽吃人的一面。应该说，两者都是对的。但是，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无疑应该同时看到两面。

人类渴望的是天使。遗憾的是，人类毕竟是人类，人类能够扮演的只是怪兽。

本章小结

人们进行生产活动，不是为了满足精神的愉悦，而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们对物质的追求的欲望，并不因为已经拥有的物质的增多而下降，相反往往显得是得陇望蜀。

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在社会中分配。在阶级社会，每年的产品分为三部分：生产资料折旧＋工资＋利润（剩余价值）。在农业为主的奴隶社会，每年的收成需要扣除种子粮和报废的工具、奴隶的口粮，剩下的就是奴隶主的收入。在封建社会，每年的收成也要扣除种子粮和工具，交给地主租子，然后是农民的口粮。分配过程看得很清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扣除种子粮是必要的过程，剩下的产品就在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分配。

社会化大生产让这个过程模糊了。与每家每户独立生产的小农经济不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是在全社会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生产，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换，最终被全社会消费。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很难确定每个人对生产总大饼作出的贡献有多少，所以就很难做到按劳分配。无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很难确定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每个人的勤劳程度直接影响他的农田的产量。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这是不好实现的。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产品，每件产品都包含数不清的人的劳动。如何确定每个人劳动的质与量，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计划经济条件下，其实也不是按劳分配。不过是按照生产计划和总产品，估计

出每个人的劳动量，然后按人头平均。干得多，干得好，不见得工资高。干得少，干得坏，也不见得要挨饿。某甲工作出色卖力，他获得的成果要与所有同事一起分享；某乙出工不出力，他造成的损失也要由所有的同事一起分担。如果大家都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你争我赶，那么生产必然蒸蒸日上。三人一心，黄土变金，何况全社会一心呢？反之，则难免出现大家都“磨洋工”的现象。

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分配。除了劳动者的劳动，私有产权（也就是物权）直接参与分配的过程。在同行之间，从某甲和某乙个人来讲，某甲工作量大，质量高，某乙工作量小，质量低，某甲的收入必然高于某乙。但是从全社会来看，某甲们工作得越多，他们获得的产品的相对总量越少。这是因为相比某甲们辛勤劳动和激烈竞争，产权所有者手中的产权显得越来越稀缺。

与产权所有者相比，劳动者永远处于劣势。这是因为在分割大饼的博弈中决定胜负的三个因素均对劳动者不利。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博弈双方同行的数量、类似博弈的选择范围以及博弈失败的承担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人人都具备的，只要身体健康、不残疾，就有劳动能力。如此之多的同行，博弈的能力必定有限。对劳动者来说，也不能承担失业的成本。没有工资就要靠存款，存款用光就面临山穷水尽：不能买面包，租房子，供孩子上学，赡养老人，缴纳水电煤气费。由于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选择的能力，与他的财产量密切相关。无产者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自然没有别的选择。对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其他选择的人来说，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是不自由的。他们如果不想饿死，就要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中出卖劳动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劳动力是最不值钱的要素。资本越垄断，劳动力越不值钱。干得最多，获得最少。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资料折旧以后的第一次分配。分配的双方，是劳动者和产权所有者。彼此获得产品，分别是工资和利润。

提供劳动力的一方与提供产权的一方，成为彼此对立的两个利益团体。甲工人工资提高必然影响乙工人的工资，甲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也必然能影响乙资本家。这两个彼此利益对立的团体，就是阶级。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阶级首先是经济概念，两个团体彼此的经济地位，决定彼此的利益关系。同一阶级内部有类似的经济地位，两个阶级之间成员有类似的经济关系——甲工人与乙工人经济地位类似，甲资本家与甲工人之间的关系与乙资本家与乙工人之间的关系类似。阶级一旦产生，就要派生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比如，无产阶级强调不劳不得食，鄙视好逸恶劳，要求人人都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要求国家扶助弱小。大资产阶级强调最大限度利用生产要素，强调市场选择，物竞天择，要求管理国家的权力与财产有关（表面的理由是没有财产的穷人很容易被收买，真实的原因是穷人

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很可能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利），要求国家少干预经济。阶级决不局限于经济，但是超出经济的部分也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我们只要知道阶级是由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即可。

在劳资之间进行了第一分配以后，剩余价值又分为三部分，在资产阶级内部进行再分配。这三部分是：产业资本家利润、地主地租和金融资本家利润。相比其他两类资本，产业资本家相对弱势。地主和银行家轮流坐庄。现在各国抑制地主，所以金融为王。

与产业资本相比，土地具有先天的易垄断性。产业资本家很难阻止同行开办新厂，土地所有者却可以不断购入不可再生的土地，实现牢不可破的土地垄断。理论上，大土地所有者完全可以把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压低到勉强维持的地步。事实上，土地高度垄断的地区，往往也是产业资本不发达的地区。没有外力帮助，产业资本没有能力对抗土地资本。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由政府强行介入土地市场，以保证土地不致过度垄断，地租不致过高，产业资本有利可图。

在土地垄断被打破的地区，往往金融为王。由于金融资本涉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方面面，本身具有高流动性，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调集海量的社会资本，可以掌握更多的经济信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投资风险低于产业资本以及可以在金融危机中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等种种有利条件，所以在与产业资本的博弈中占尽先机。众多企业鹬蚌相争，金融资本渔翁得利。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出现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发展的过程，也刺激了金融资本的发展。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

对于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压迫，产业资本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但是，这并不是说产业资本没有反抗能力。如果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压迫过度，产业资本就可以退出生产过程，脱离生产，关门大吉。然后，加入土地和金融投资去炒地皮，吃地租，炒股票，吃利息等等。

不论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如何强大，所有的地租和利息都必定来自产业生产的总大饼。完全脱离生产的金融行为，就是赌博：购买筹码，然后购买筹码的货币重新再分配。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投机，可以在短期内把金融产品和土地的价格推高到惊人的地步，但是最终必然因为产业资本不能支撑而破灭。

剩余价值在三大资本之间分配，产业资本最弱。相对而言，搞实业最难挣钱。全社会而言，总大饼在工人、产业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之间分配。其中，工人是最弱势的。这是因为在分配产品博弈过程中，劳动相对产权有先天不足。失业后备军对工人的压迫，可能降低工人工资。战争造成的壮劳力大批死亡可以提高工资，工会和政府的参与对工人的扶助，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此外，个别种族（比如土著美国人或非裔美国人）如果拒不学习流行的语言，

坚持自己的生活习惯，不肯融入主流社会的话，受雇用的机会必然更少，工资必然更低。种族歧视也人为压低少数族裔的选择机会，比如限制某些族裔从事某些职业，也会影响某些族裔的工资水平。在美国历史上，南方的农场主强烈反对解放黑奴，北方的白种工人和西部的小农对解放黑奴也不积极。相比之下，北方的资本家却乐于推动解放黑奴的过程——只要有一部分“前黑奴”保持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就有利于压低美国白种工人的工资。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理想中的状态，可以不断接近，却很难轻易实现。不仅如此，在自由市场中，随着财富的汇聚和集中，小资本逐步被大资本吞并，分配方式将越发有利于大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力。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分配方式是不断远离按劳分配的目标。

以上的分析，都是默认暴力在建立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分配模式后，不再积极参与分配过程。但是，如果考虑到资本主义改良后自由市场经济逐步被市场与计划结合的“混合”经济替代，“守夜人”型政府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国家在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卢瑟经济学一开始就说，所谓经济和政治分开，是很扯淡的观点。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或者说，暴力搭台，产权唱戏。搭的什么台，唱的什么戏。这个最关键，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本书默认的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台，唱的是私有产权的戏。

马克思说过：“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马克思说的“温和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本章反复提到的稳拿经济学，总之是统治阶级喜欢并宣扬的经济学。马克思说稳拿是靠暴力起家的，稳拿当然受不了——尽管他们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却只许操作，不许揭穿。

本章在前面已经提到，现代私有产权的起源不是鲁滨逊的小农经济尔后进化出市场，而是由强者对弱者的暴力劫掠进化到产权剥削。如果我们承认产权剥削是从暴力征服进化来的，那么就应该知道市场中必然存在强者和弱者，拥有产权的一方是曾经拥有暴力的一方。这一方，注定是强者——否则暴力不会主动隐藏到幕后。

暴力分配的决定性在两个方面：第一，暴力分配是最终分配结果，以前所有分配结果，只要被暴力否决就不再有效；第二，否决暴力的只有暴力，产权根本不能挑战暴力。

暴力可以摧毁产权，没有暴力支持，任何产权经济都不可能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很流行的说法。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暴力机关。如果我们考虑到暴力可以直接获得产品、摧毁产权、剥

夺人身自由或强迫劳动，产权剥削自暴力掠夺进化而来，暴力决定最终分配结果，以及对抗暴力的只有暴力。我们就会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必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结合起来辩证地看。

除了暴力搭的什么台，经济唱的什么戏以外，还有两个问题：第一，税收从什么人身上切大饼给什么人；第二，暴力是否会耐不住寂寞，自己粉墨登场去扮演某些角色。扮演这些角色究竟达到什么效果。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统一的，都是暴力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一个是显性的，一个是隐性的。这两个问题中第一个最关键，后一个由第一个决定，反过来会影响第一个。

国家的征收可以来自工人工资，也可以来自剩余价值。国家的支出可以倾向于低收入者，也可以倾向社会顶层。所以，国家的分配过程可以劫富济贫，也可以反过来助纣为虐。雍正年间搞摊丁入亩，必须结合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否则，土地税就是推动士绅搞土地兼并的有力推手。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统治阶级决定财政收入的征收与支出，被统治阶级无权参与决策过程，所以往往是吃亏的。

国家参与分配一般来讲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抑制外来资本，直接加速本国产业资本积累，促进工业化进程；第二是通过国家税收等手段进行贫富调节，消除过度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改善民生。这两个过程第一可以简单归纳为把饼做大，第二个可以归纳为把饼分均。但是，由于官僚的私人利益作祟，国家政策执行结果完全和干预经济的目的南辕北辙：加速积累的很可能不是最有潜力的工业资本，而是官僚及其附庸集团的私人资本；社会财富不但没有被分均，而是在权力的作用下，不断向官僚及其附庸集团流动、汇聚，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暴力是元要素，拥有暴力的人拥有终极分配权，国家是最高也是最终分配者。因此，官僚集团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阶级垄断暴力，控制财富，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中国历史上的官绅集团，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中的官员，都属于这样的阶级。这样的阶级如果不能自我收敛，不能公平地分割社会总产品的大饼，则难免引起社会剧烈变动。

暴力支持的隐性分配过程也同样是异常稳固的。同样是垄断，不同类型的垄断稳固程度不同，技术造成的垄断，不如资本量造成的垄断，资本量造成的垄断不如暴力支持的垄断。暴力支持的垄断，除非暴力主动放弃，否则只要彻底推翻暴力才可能破坏垄断。

吃大饼也有先后顺序。劳动者由于数量众多，经济实力脆弱，所以永远处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底层。社会其他成员之中，也有等级。拥有暴力的是第一级，在西方国家，暴力被严格限制，地产也受到打压，于是金融做大。金融和地产角逐天下。产业相比前三位，永远是小媳妇。垄断产业的难度远远高于垄断土地或金融。

考虑到吃大饼的顺序，我们就可以知道每个人（或者资本的代言人）在进入市场之前依据他所拥有的要素，就基本可以确定他参加博弈的结果。对大多数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参加市场博弈以前就已经胜负已出，个人努力只不过是不要输得太难看而已（同行之间，张三跑得越快，李四就输得越惨）。劳动力与产业资本在市场中自由博弈，这就如同让一个普通人去和泰森公平决斗，注定凶多吉少。个人努力不过是逃跑得更快，以求尽量保住性命，而不要奢望胜出。产业资本与土地、金融相比，则相当于泰森与终结者相比。至于暴力，则是至高神，能战胜神的只有其他的神，凡人、终结者都要屈服。

与暴力争锋的人，注定以卵击石。有暴力支持的金融、地产资本，便是天下无双。美国金融资本的操盘手并不比其他国家的投机者更高明，但是美国金融资本的背后有美元，美元的背后有美军。至于一无所有的卢瑟，注定是价值的贡献者与损失的承担者。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卢瑟的时候，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不掌握暴力、金融、土地等要素。至于他个人是否努力，则有待进一步确认。如果我们了解了分配规则，把卢瑟的命运归结为个人不努力，是不恰当的——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这话是从房地产商嘴里说出来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十有八九是这位稳拿想隐瞒什么。

用暴力获得足够的稀缺资源，然后和劳动者或者其他资源所有者费厄泼赖，把暴力隐藏起来，从强盗转型为骗子，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只要控制了资本，就可以利用资本的优势不断吸收剩余价值，以后即使劳动者多创造了财富，多创造的部分也不是劳动者的。这些多创造的部分不断变为资本，成为劳动者的枷锁。所以，大资本的起步与暴力密不可分。诚然有一些小资本是通过努力劳动和个人勤俭获得的，但是通过这一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勤劳并不是获得资本的主要途径。很显然勤俭是多数人的美德，而不稀缺的东西没有资格在切大饼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份额。某人勤俭获得了小资本，从另一个角度看，要看到为什么多数人勤俭没有获得小资本？一种可能是多数人虽然同样勤俭却遭受了旱灾的打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多数人虽然勤俭，但是他们多数的产品并不归他们所有，他们勤俭不过是增加别人的财富。所以，在阶级社会，勤劳是不能使多数人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结论很邪恶，却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小资本爬上金字塔的顶峰并不是资本的主流，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将被大资本吞并。勤劳永远是不稀缺的，而暴力却不是人人拥有的。如此看来，劫掠进化为剥削，强盗进化为骗子，才是阶级社会中稳拿的主流。稳拿教育别人的时候总是吹嘘自己，能吃苦受累，放下身段，敢于冒险，所以才有今天的财产，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现实之中，最累的是血汗工厂的工人，最能吃苦的是农民，最能放下身段的是性工作者，最敢冒险的是毒贩子。这几类人都不是社会顶层。所以，当某个稳拿自吹自擂自己勤劳致富的发

家史的时候，卢瑟难免投去怀疑的目光——卢瑟更关心的是稳拿在隐藏什么，而这恰恰是稳拿不能对卢瑟言明的。

如果以市场主导分配，很难存在稳定的按劳分配——事实上，劳动力获得的相对份额是越来越小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暴力的帮助，多数劳动者必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暴力的滥用，则难免创造新的稳拿。这就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瑜亮相争”的本质。

各个要素的掌握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大饼份额，都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垄断自己所掌握的要素。由于存在“强者愈强”的规律，产业、土地、金融和暴力任何一方被过度垄断，都会严重威胁其他几方的利益。而劳动者不论在哪一方做大的情况下，都是悲剧的。所以，对劳动者来说，如果不能联合起来，那么保持各个势力制衡最关键。

一旦失衡会发生什么呢？劳动者的贫穷自是不必说的，这是任何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的共同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失衡至少带来两个副作用：副作用之一，分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交换，进而导致消费不足，造成经济危机；副作用之二，分配的问题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垄断替代自由竞争，垄断资本统治经济甚至全社会。一国的资本在本国暴力的支持下统治全球。资本主义的活力就此丧失。

第4章

生产与实现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销售的过程

必然的恶果：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

——（英）霍布斯，黎思复等译：《利维坦》

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消费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危机；一个是由于财富造成的等级化，进而造成阶级固化，导致社会竞争力丧失，生产力发展停滞。小农经济条件下，也会产生类似的两个后果：经济危机；阶级固化。这两个后果是财富的通天塔的必然结果。这一章，介绍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在垄断资本的部分介绍。

经济危机可以认为是社会分配不公的必然恶果。虽然多数卢瑟无力使自己摆脱贫困，但是他们的贫困却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稳拿的体系。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小农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影响有限。只要不宰杀牲畜，不吃掉种子粮，今年粮食丰收吃不掉，并不影响明年的生产。相反大量的盈余恰恰是追求的目标和盛世的标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腐朽，不可食用，穿铜钱的绳子烂掉，不可统计。那是小农社会真正的盛世。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产品直接就是消费品。农夫种出来的大米直接就可以吃，养的猪宰了直接下锅，农妇纺的线直接可以织布，自己织的土布直接就可以做衣服。各种征收的赋税和田租，主要也是实物甚至劳动力。不足的部分，即使需要交易，多数也是物物交易——比如，用“半匹红霄一丈绫”换千余斤的一车炭。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府家皇庄黑山村的庄头乌尽孝，给贾府送来一年的租子，所有的租子写都在一张单子上：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暹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

个，家腊猪20个，野羊20个，青羊20个，家汤羊20个，家风羊20个，饲鳇鱼200个，各色杂鱼200斤，活鸡、鸭、鹅各200只，风鸡、鸭、鹅200只，野鸡野猫各200对，熊掌20对，鹿筋20斤，海参50斤，鹿舌50条，牛舌50条，蛏干20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50对，干虾200斤，银霜炭上等选用1000斤，中等2000斤，柴炭30000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50斛，白糯50斛，灿粳50斛，杂色粮谷各50斛，下用常米1000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2500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其中，除了2500两银子以外，都是实物地租。这些鹿、猪、羊、鸡、鸭、海参、熊掌、木炭、大米贾府直接可以用来消费。为了运送这些东西，乌尽孝走了32天。今天的话，所有东西都折成现金，直接汇款过来就可以了，不必如此折腾。这么大规模的运输，一路上人吃马喂，成本非常高。贾府的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要消耗在运费上。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如果全部直接给贾府银子，贾府也未必能买到各种需要的商品。

小农经济的危机主要表现是消费品不足。贾珍看完单子就要敲打乌尽孝。贾珍指出收入少、开销大，乌尽孝强调自然灾害："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围绕皇庄的租金，大地主和二地主之间展开博弈。大地主嫌少，二地主哭穷。不论怎么博弈，争夺的大饼都是来自农民的农产品。皇帝征收农户产品的大多数，地主征收剩下的产品中的大多数，二地主雁过拔毛，农民最终只能半粮半菜勉强糊口。即使这样还不够，皇帝还要修皇宫、修陵墓、修佛塔、修大运河，还要征发农民当兵打仗。留给农民的份额本来就少，还经常剥夺农时。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等等突发事件，农民的份额不足以糊口，即使吃糠咽菜也不够，于是农民没有饭吃，饿殍遍野。这就是小农时代的经济危机。这边的路有冻死骨，不妨碍那边的朱门酒肉臭。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一样了，工人的贫穷直接造成资本的损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所有人生产的商品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业社会自产自销，工业社会则必定严密分工，货币进入流通，每一件产品都要成为商品去出售，只有黄金或白银例外。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是价值实现的困难，多数人都没有钱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于是更没钱买东西。同样是经济危机，表象不一样，根源都是一样的。

价值实现简单地讲，就是把东西卖出去。按照自己生产时预计的价格出售出去，让自己的产品内在包含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封建社会的产品不必经

历这道关，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几乎所有产品都要变成商品，不能不经历这道关。

早期金、银本位时期，除了金、银采掘业，产品成为消费品则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即所有的产品都要先和货币交换，如果没有得到货币的承认就只能是存货。商店里的货物只是商品资本，不是消费品，有人购买才能成为消费品。一般来说，哪个经理的库房里有的是存货，账户上却没有现金，他绝对乐不起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除外）。金或银成为货币以后，仍然是商品中的一种，但是商品中的商品。货币和商品虽然都是私人劳动的产物，但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要经过交换，取得社会的承认，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劳动。采掘金或银则直接就是有用的劳动，金、银只要采掘出来，提炼到一定纯度，就能成为交易用的货币。采掘金银的劳动不存在滞销的问题，采掘劳动也就成为衡量其他劳动质与量的标准。比如，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要能提炼采掘并提纯 1 盎司的黄金，就可以直接兑换 35 美元。换句话说，获得其他价值 35 美元的商品需要的劳动的质与量，与采掘 1 盎司黄金需要的质与量应该大体相当。

今天的纸币体系取代了贵金属体系。于是，包括金、银采掘业的产品，也需要先到市场上销售。所以，任何商品都逃不过在市场上“价值实现”这一关。生产者投入的劳动能否获得对应的回报，价值能否实现，是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

每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之中，都有存货一栏。存货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存货能不能按照负债表中的价值销售出去，或者说销售价格能不能和价值对应，就是商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商品价值能实现，企业资金周转就能按照预期的计划顺利进行，可以不断进货生产。商品价值不能实现，或者只能实现一部分，那么企业的生产环节就要受到影响，企业就要考虑改变销售战略，使用降价或者广告促销，压缩生产规模，变现一部分资产或者争取银行贷款。对企业来说，产品滞销，价值不能实现，是危机的开始，是倒闭的第一步。

对全社会来说，个别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于社会同类企业的水平。但是，如果大多数企业突然同时处于产品不能实现的状态，那就要大事不妙，很可能是经济危机的前奏。

市场把同质产品的价格抹平，这时产品的价值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价值。同样质量的面粉，不论是甲企业生产的，或者乙企业生产的，售价都是一样的。生产一吨同样的面粉，也许甲企业需要 3000 元，乙企业需要 2800 元，但是市场最终的售价都是 3200 元。社会承认获得一吨面粉需要付出劳动价值 3200 元。当然，也许还有丙企业，丙企业生产同样的面粉需要 3400 元。丙企业的选择只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 3400 元/吨的面粉按照 3200 元/吨出售，然后停产这种面粉，改行

生产其他产品。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大量产品不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价值。或者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为什么丙企业的产品赔钱，而是为什么社会上的面粉的价格突然下跌到3200元以下。不仅如此，同时下跌的还有大量的其他商品，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突然下跌。这种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要成为商品被销售出去。面包店主自己吃掉的面包只是他自己生产的面包的极少一部分，他的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必须被出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产品绝没有贾府皇庄的地租那样丰富多彩：由于分工导致每个生产单位只能生产社会总产品中极个别的一种，所以导致物物贸易极其复杂，人们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者持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销售所得的货币就是他的资本，对他的意义就相当于贾府的皇庄。一大堆面包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销售所得的收入才能投入新一轮生产循环之中，并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他参与全社会“分大饼”博弈的筹码。他对这些货币的所有权，就是他获得新的收入的依据。

消费与生产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开采矿石，制造机器，最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开采更多的矿石，制造更多的机器。生产的各种产品最终都会被消费。从总体看，机器设备总量会不断增加。但是，从个体看，每件机器设备最终都会退出生产，没有可以一直使用的设备。只要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必然有使用寿命的时限，也必然有达到其使用寿命极限的那一天。

所有的产品最终都是消费品，总体资本是永存的，个体生产工具则迟早必然成为消费品：铁矿石会变成拖拉机和机床，那么开采铁矿石的劳动，或者说铁矿石中的价值最终必然转化为拖拉机和机床中的价值的一部分。石油、煤炭会变成能源和化工用品，开采石油、煤炭的价值就转移到汽油、柴油、电能和化工原料中。拖拉机用于粮食生产，拖拉机中的价值最终就会转化为粮食中的价值。驱动拖拉机的柴油，灌溉的电力，施用的化肥，它们的价值最终也会转移到粮食中。粮食中的价值又会成为面包中的价值的一部分。

消费品的概念应该是宽泛的消费品的概念，既包括正常退出生产循环的最终被消费掉的产品，比如牛奶、香肠、面包、卫生纸、洗衣粉等，也包括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消费品，比如国家购买的各种军火、航天设备等等。凡是买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未来卖出以获得更多货币的商品，都可以算是消费品。

反过来看，每一级产品的销售，都对下一级产品的销售提出了利润的要求。生产铁矿石的资本家的利润要仰赖拖拉机的销售，拖拉机的利润要仰赖粮食的销售，粮食的销售要仰赖面包的销售。面包卖不动最终必然影响一连串的生产环节。最终

消费品的滞销，必然反向影响上游所有产品的销售。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大网络，下游产品的普遍滞销，迟早蔓延到整个网络。

工人的收入要全部用于维持生活，很少有多余的收入能成为资本。即使有少量的积蓄，往往也要用于培养子女、赡养老人，或者自己养老。资本从本性出发，必然把工人的消费压缩到最低的限度。

相比之下，资本家随着收入的增加，投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投资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消费掉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是我们观察的结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尽管暴力可以压倒产权，但是使用暴力毕竟不如使用产权便利。所以，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产权。在奴隶社会，一个人拥有的奴隶数决定他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一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决定他的地位（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扩张产权最好的方式是战争）。与此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手中的资本量决定他的地位，所以就要尽可能提高自己拥有的资本总量。这是第一个原因。一个人拥有的资本总量越大，他的单位资本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大量消费自己获得的利润，那么很快，他一旦被其他人超过，那么他所拥有的资本就再也不能给他带来相当的利润。他的资本获得的利润率和利润量只能下降一个档次。换句话说，只有保持高投资倾向的人，才可能稳固地待在高收入的阶层中。第二个原因是，收入高者相对收入低者，更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各种生活需求，除了糊口以外还有富余钱。

资本对于资本家的意义如同皇庄对于贾府的意义。贾府无论怎么消费，皇庄的土地面积不会缩小，产量不会减少。贾府无论如何节俭，皇庄的面积也不会增加，产量依然不变。所以，贾府消费的奢侈或节俭对来年收入影响不大。但是，对资本家来说，手中资本量的减少或增加，就意味着自己博弈能力的下降或上升，对应获得利润的能力下降或上升。从货币的角度看，商品在资本家手中不过是个媒介，是达到更多货币的途径，资本家最终追求的是更多的货币，决不是更多的商品（除非物价飞涨、纸币失效的年代）。货币是资本家的命根子，如同土地是地主的命根子，奴隶是奴隶主的命根子。地主决不会主动毁掉自己的命根子，奴隶主也不会主动屠杀或者解放自己的奴隶。为了偿还赌博、逛窑子或者吸大烟而欠下的债务，被迫出售田产或房产的地主，都会被认为是败家子。在这方面，资本家也是一样的。

工人想消费，没有钱；资本家有钱，不消费。全社会拼命生产，这些消费品卖给谁呢？

有人会提出，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需求。如果工人需求不足，资本家投资行为旺盛，不是也可以替代工人弥补需求不足吗？那么，有没有可能仅仅依靠不断的投资就能维持经济不断增长而不发生经济危机呢？俄国经济学家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曾经设想过一种社会，资本不断采用生产资料生产新生产资料：钢铁厂为煤矿生产采掘设备，煤矿为钢铁厂生产焦炭，只要比例合理，就能不断生产下去。资本主义最终会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进化到只要一个工人按电钮便可以进行全部生产。如此一来，在达到庞大的工业帝国以前，资本家的投资会替代工人的消费，所以决不会出现消费不足。

杜冈的所谓生产资料不断生产和循环，在短期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从长期看，则必然无法稳定维持。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原因是生产单位产品，机器比工人便宜。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是机器无法完成工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机器生产单位产品的性价比更高，那么资本家必然采用机器。反过来，如果劳动力便宜到一定程度，资本家也会乐于放弃机器采用人工。对资本家来说，资本家并不热爱生产，更不热爱机器，使用机器的原因无非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自己的产品的成本尽量低于社会平均标准，至少不高出太多。资本家热爱的是钱，而不是机器。所以，杜冈的设想的不断主动进化的工业帝国，并不符合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家不过是在竞争的压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亦步亦趋地紧跟潮流。事实上，一旦竞争的压力消失了，资本家对更新设备的兴趣也就大大降低了。不必等到一个工人完成所有的生产，只要在某种产品的市场的空间内，只剩下几个势均力敌的寡头的时候，资本家更新设备的兴趣就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与科学进步有关。科学进步并不是按部就班稳定增长的。科学探索的发现与技术的突破往往与大量的偶然性事件有关。浮力的发现、重力的发现、相对论的发现、原子结构的发现等等，这些发现都是极具偶然性的必然结果。所以，科技无法稳定的为推动设备更新。希望每当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就能出现新一轮技术革新导致投资高潮，进而消化掉多余产能，是不现实的事情。

还有，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货币。如果社会1000万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10%，那么资本家如果投入1000万购买新设备、雇用新工人，那么他必然要求100万的利润。换句话说，原先社会存在1000万的需求不足的缺口，在资本家投资以后，1000万的缺口消失了。但是，在1000万的投资实现产能以后，就将出现1100万的需求缺口。所以，长期靠资本家投资替代工人需求是不现实的。

杜冈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经过长期基础科学的积累，应用科学突飞猛进，新工艺、新技术层出不穷。如果他能活到20世纪30年代，经历1929年的大崩溃和随后长达10年的大萧条，就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纸上谈兵。

今天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出去，然后购买生活用品。资本家是把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持现。所以，货币在资本家手中和劳动者的手中将完成两个不同的循环。货币在资本家手

中，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生产出商品，商品进入市场，最终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货币，然后使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劳动者手中的货币来自资本家提供的工资，迟早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不断要求更多的货币，新增的部分显然不是来自劳动者。那么这些新增的货币从哪里来呢？

一面是所有的产品都必须最终成为消费品被出售，一面是卖主不需要自己的产品，一面是买主没足够的钱消费所有的产品，这就非常麻烦了。由于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消费直接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不足必然产生经济危机，进一步导致生产力闲置。

这里的分析仅仅是针对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的获取者，成为与劳动力对立的另一方。实际上，聚敛货币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产业资本家相对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往往是弱势的。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如果也采取不断聚敛货币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造成经济危机。不论哪一方，土地所有者也罢，金融资本家也罢，或者暴力所有者也罢，只要榨取剩余价值，并且不断聚敛，就会诱发经济危机。

既要聚敛货币，又要找到有足够支付能力的买主，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商品必须经过社会实现过程，贫富差距过大，少数人聚敛货币，多数人消费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蟹堡王：再生产循环

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

——《资本论》（第三卷）

为了方便，下面用一个快餐店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话说太平洋深处的比奇堡海滩有一家快餐店，名叫蟹堡王。店主是蟹老板，蟹老板手下两个雇员，一个是章鱼哥，一个是海绵宝宝，主营产品是美味蟹黄堡。海绵宝宝有两个朋友，派大星和珊迪。蟹老板有个竞争对手痞老板，痞老板的餐厅名叫海之霸。蟹老板有个女儿叫珍珍。蟹老板是只螃蟹，海绵宝宝是块海绵，章鱼哥是只章鱼，派大星是海星，珊迪是只松鼠，痞老板是只海臭虫，珍珍是只鲸鱼——珍珍真的是鲸鱼，为什么蟹老板的女儿是鲸鱼，这个别问我，去问编剧。熊猫大侠阿宝的爸爸为什么是鸭子？很简单，编剧这么安排的。欲知其他更详细的资料请去

百度或者放狗（指谷歌搜索引擎）。

需要注意的是，本章的这一部分用蟹堡王作为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因为蟹堡王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具有普遍性。本章不采用“神龙大侠”熊猫阿宝和他鸭子爸爸的面铺分析，是因为阿宝和他爸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章也不采用孙二娘的十字坡包子铺作为模型，是因为孙二娘的包子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是抢劫而不是包子生产，还没有脱离暴力，只要过往的客商行李丰厚就可以，包子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对孙二娘意义不大。孙二娘的包子铺连生产企业都算不上。

那么一个蟹堡王能不能作为模型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呢？或者说能不能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压缩为一个蟹堡王呢？本章认为是可以的。

前面已经知道拉锯的过程是一个彼此动态平衡的过程，同一个阶级同一个阶层内部，每个人获得的大饼总量基本差不多。如果资本量接近，同样的资本投入不同的行业，要求在等量的时间产生等量的利润。当然，这个等量利润是考虑到风险的资本收益。因为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所以可以把无数的小餐厅合并看作一个蟹堡王。因为我们不做定量分析，所以可以不考虑单位资本利润率随资本量增加而增大的现象，直接把所有雇佣关系的企业看成与蟹堡王类似的企业，老板加员工，老板出资，员工出力，老板获得利润，员工获得工资。从生产模式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是可行的。

如果大多数企业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段，经营情况基本同步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把同周期的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观察，多数企业往往有相同的经营周期，即在经济繁荣期大量盈利，在萧条期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彼此经营情况基本同步。所以，从生产周期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也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蟹堡王这个模型，归结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

蟹堡王的生产过程可以归结如下：蟹老板管理整个蟹堡王的生产经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蟹堡王打工，生产、销售蟹黄堡，销售收入全部归蟹老板所有，蟹老板支付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用工资购买蟹黄堡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

蟹堡王每天的销售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购进原料，比如面粉、肉、蔬菜、油、沙拉酱、水电煤气，还有定期维修和保养；一部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蟹老板的利润。第一部分是刚性的，只要蟹堡王不关门，就需要不断补充。后两部分在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之间分配，是弹性的。海绵宝宝可以说不加薪就炒老板，如果他能找到新的工作的话；蟹老板也可以炒掉海绵宝宝，如果章鱼哥能身兼二任，而且提出的工资要求不超过海绵宝宝现有水平的

话。当然，蟹老板也可能炒章鱼哥。

蟹老板要现金有两个目的：第一，购进原料，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只需要蟹黄堡一种生活必需品，那么给他们蟹黄堡就可以，问题是他们显然还需要其他商品。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很窄的一类或几类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所有消费需要。蟹黄堡勉强还能满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多数需要，硫酸厂显然不能给职工发硫酸。第二，挣钱。第二个目的是蟹老板经营蟹堡王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现金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蟹黄堡的销售现金。

如果把资本家看作资本的代理人的话，资本的目标就一个，就是自我增值。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个物的媒介在市场中的作用越大，以这种物为媒介的资本就越强。毫无疑问，从长期看，没有什么能超过货币。资本家的行为，就是多赚钱，少赔钱。具体物化的话，就是对货币的追求。蟹老板爱财如命，经常为了一块钱而去冒生命危险，他才是真正合格的老板。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是一种具有高流通性的商品。货币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五大功能。比较流行的货币是黄金，现在是各国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以下简称“法币”）准确地讲是价值符号，和金银相比没有内在价值，完全依靠国家暴力支撑。法币如果不具备货币基本功能的时候，就会有其他商品出现，替代法币。比如二战后的德国，香烟、巧克力都承担过货币的功能，帝国马克没有人要——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崩溃了，没有第三帝国的暴力支持，谁还要帝国马克？类似的还有大米和旧日元的关系。再比如在某些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或者饱经战乱的国家，大家习惯采用美元作货币，而不愿意采用当地货币，美元比当地货币更流行，更受欢迎。本书在分析蟹堡王的过程中采用美元，这是因为美元在多数情况下更多地承担货币的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注定是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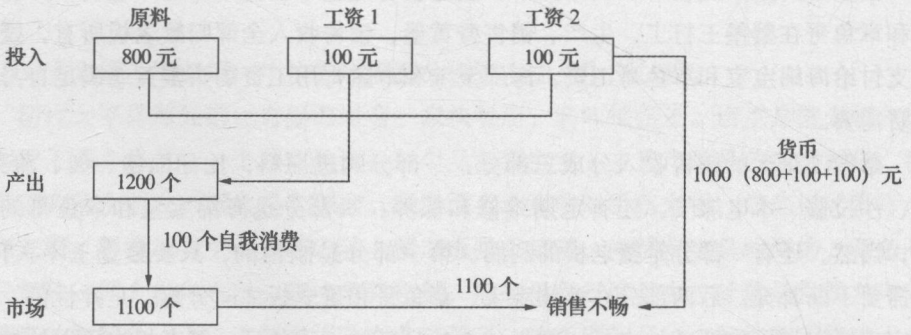


图 2　资本主义内生不平衡性（结果：100 个滞销产生了经济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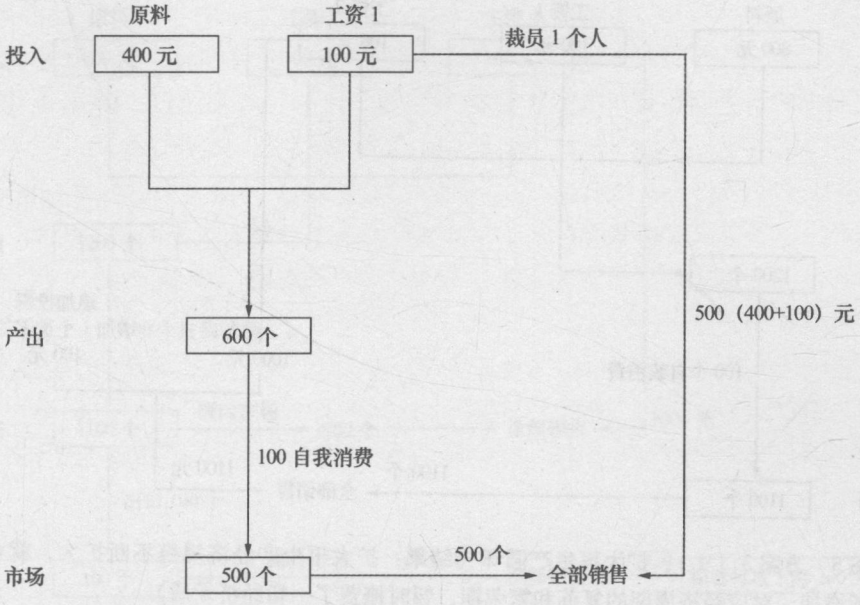


图 3　方案 1：经济停滞期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结果：1 人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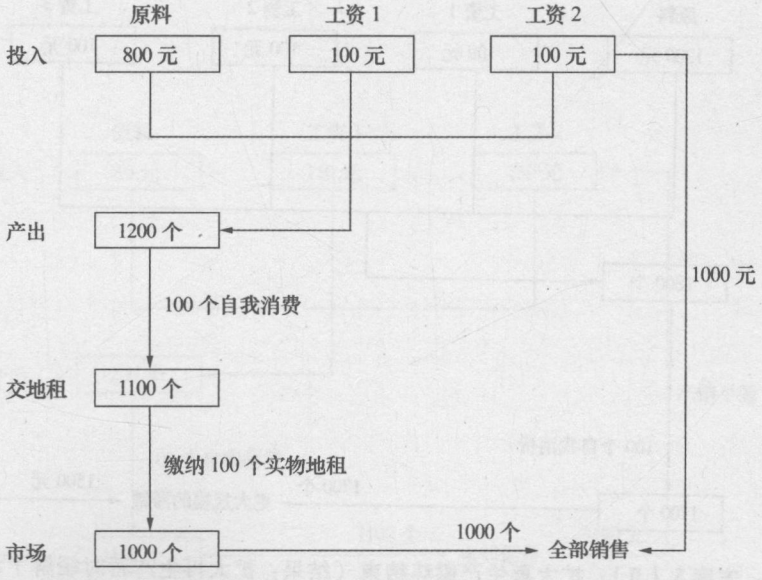


图 4　方案 2：经济停滞期非生产阶段消费对简单再生产循环规模的扩大作用
（结果：地主等非生产阶级消费推高了简单再生产时期生产规模和就业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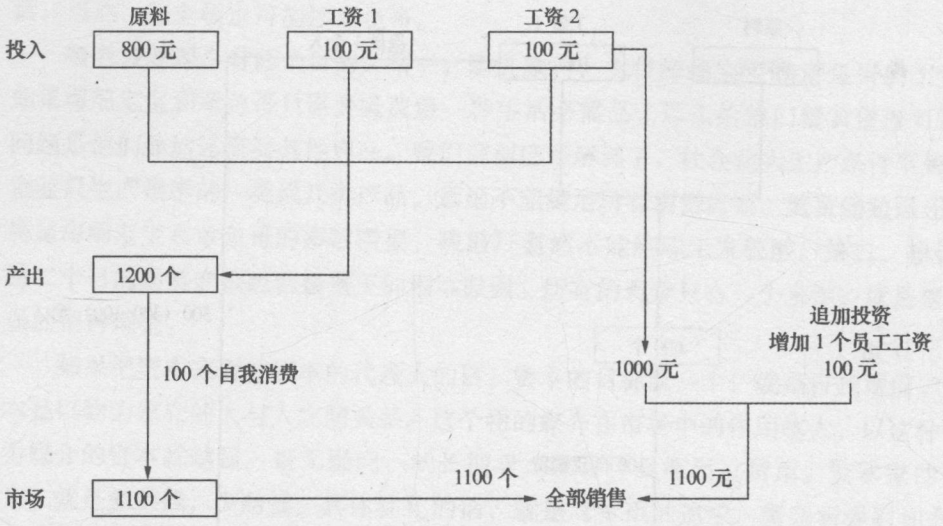


图 5　方案 3（Ⅰ）：扩大再生产循环（结果：扩大再生产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就业人口不断增加，对应经济周期的复苏和繁荣期，暂时掩盖了一切经济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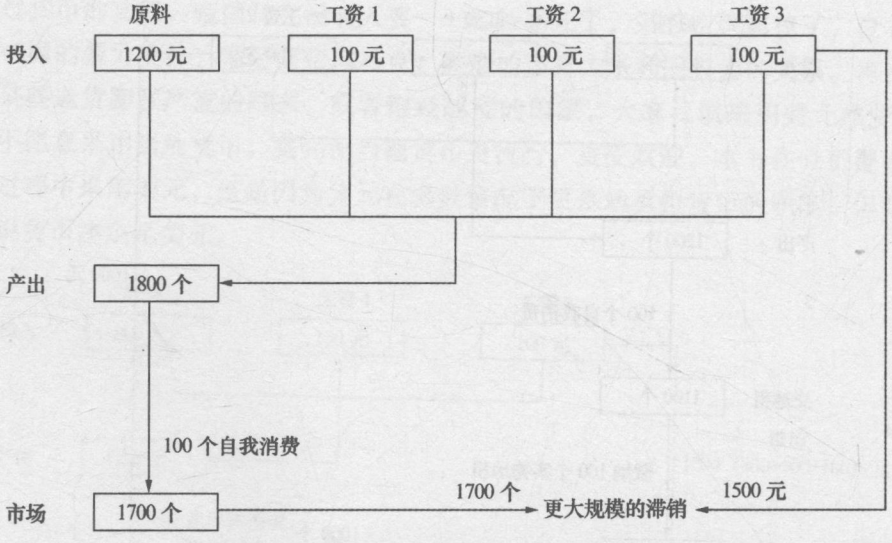


图 6　方案 3（Ⅱ）：扩大再生产循环结束（结果：扩大再生产暂时缓解了消费不足，但是扩大再生产不能无限以几何级数增长，一旦停下来，就会面临更大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更严重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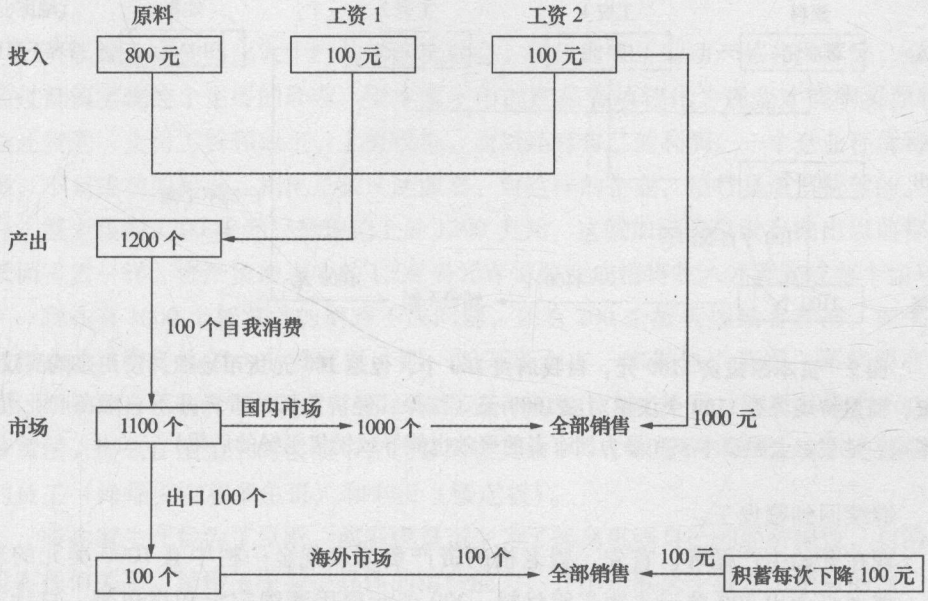


图7　方案4：靠出口解决消费不足（结果：贸易出口可以从海外获得消费市场，缓解国内消费不足，促进就业水平上升。但是必然造成对方国家贸易逆差。在贵金属时代，这意味着对方贵金属外流，获得顺差积蓄越来越少造成破产。在价值符号的时代，对方如何支付贸易逆差，成为难题。中英鸦片战争白银外流即为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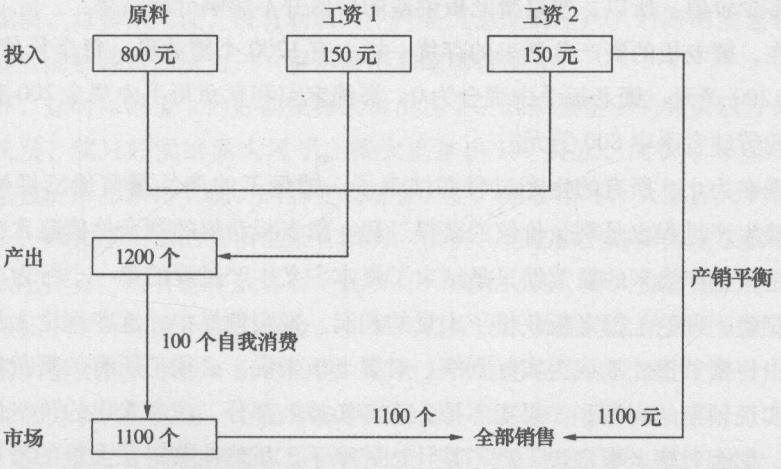


图8　方案5：给工人涨工资提高消费水平克服经济危机（结果：地租导致经济危机，地主收取货币地租且不消费，导致经济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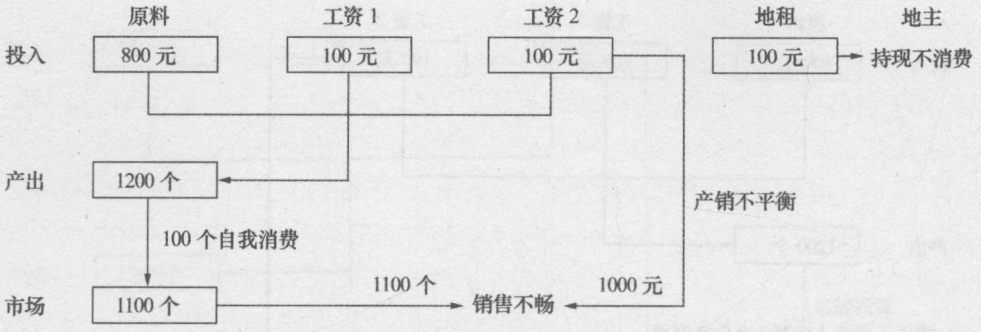


图 9　资本家投资 1100 元，自我消费 100 个，但是 100 元货币地租并没用来购买汉堡，而是持现导致 1100 个汉堡对应 1000 元（结果：经济危机的责任并不一定在产业资本家，地主、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拥有者的聚敛也能导致销售不畅的后果）

继续回到蟹堡王。

现在开始生产循环。首先，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现金一栏中有 1000 美元的现金。蟹老板拿出 800 美元去购买原材料，200 美元雇用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总计支出 1000 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各工作 100 个小时，总计工作 200 小时，总计生产 1200 个美味蟹黄堡。每个售价 1 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人每小时创造 2 美元，蟹老板给他们 1 美元。他们每人每工作 1 小时，为蟹老板创造 1 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忽略了蟹老板的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这是因为随着资本量的增加，单位资本利润上升，所以不好衡量蟹老板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的总量。另外，研究需求不足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蟹老板的消费倾向不足，而不是蟹老板创造多少价值。所以，忽略蟹老板创造的价值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现在，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一栏上有 1200 个蟹黄堡，每个价值 1 美元，总价值 1200 美元。蟹老板手中现金为 0。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手中现金 200 美元。生产原料的劳动者手中 800 美元。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生产过程都结束了。蟹堡王的产品蟹黄堡已经生产出来了。直接生产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获得过程，蟹老板获得的剩余价值蕴含在蟹黄堡里。但是，生产出来的蟹黄堡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并不完整，理论上蟹老板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现实世界中，这些理论上的利润还要通过出售蟹黄堡才能成为实际利润。对蟹老板来说，必须把所有的蟹黄堡都卖出去才能实现预期的利润。如果卖不掉，或者卖掉一部分，或者卖出的价格低于预期的价格，那么对蟹老板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虽然他获得了大量的蟹黄堡，但是无论是他购买新的面粉蔬菜牛肉，还是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都不用蟹黄堡。当然，他自己的利润也不能是蟹黄堡。这些蟹黄堡对他来说，既吃不掉，也

没有用。

所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仅仅占有了劳动产品并没算完，必须经过价值实现这个主要的环节。资本家手中的产品必须转化为现金才能购买原料、偿还贷款、支付工资和地租、上缴税金，当然还有自己的利润。一个企业存货特别多，不是成功的标志，相反是破产的前奏。对这样的企业，银行是谨慎贷款的。

蟹老板的1200美元只是理论上的1200美元，这就如同股票没有抛出以前都是纸面富贵一样。资产负债表中的1200美元存货要变成销售收入才算完成整个循环。

现在有1000个蟹黄堡的销路不成问题，还有200个蟹黄堡没有着落。如果蟹老板自己消费了这200个蟹黄堡，则一切万事大吉，如果他不消费，那就要有麻烦。如果他自己消费了100个，那么就需要有人拿出100美元，购买其余的100个蟹黄堡。那么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能够买这其余100个汉堡的人，显然不是蟹堡王的员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和老板（蟹老板）。

资本家生产是为了发财，或者说是至少为了提高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消费没有任何关系。蟹堡王模型中具体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取决于蟹堡王绝对的生产能力（1200个），也不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绝对的消费能力，而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的博弈能力以及他们的消费倾向。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挣多少钱用掉多少钱，蟹老板爱财如命（钱财是他与海绵宝宝之间的分界线，没有钱他也就不能当老板，而要去给别人打工）。于是，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自然消费不足。

那么那些多余的蟹黄堡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人消费，那100个蟹黄堡只能过期腐烂，然后被扔掉。这样的结果，对蟹老板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损失，他要考虑压缩生产规模。对资本来说，没有利润的生产是无意义的生产。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就要面临裁员的压力——资本家不养吃闲饭的人。

幸好，这时海绵宝宝的好朋友派大星出场了。既然蟹堡王的劳资双方都消费不掉这些汉堡，就只好卖给派大星了。派大星拿出100美元，消费了那100个蟹黄堡，蟹老板的产品获得实现，利润变成现金，生产继续循环，大家皆大欢喜。

但是，派大星手里的货币也是有限的。很快，坐吃山空的派大星也就遇到麻烦了，要么吃掉自己所有的存款之后一无所有，饿死拉倒；要么去蟹堡王打工，挣工资才能保证手里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如果我们假设派大星的选择是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就默认它会继续求生，换句话说，它会去找蟹老板请求被雇用。

对蟹老板来讲，这是一个忧喜参半的局面，如果雇用派大星，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产量，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换句话说，派大星给蟹老板带来的利润，超过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的利润。但是，雇用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情况下，已经存在蟹黄堡过剩的问题，全靠派大星消费，雇用派大星以后，

产量增加了，销路减少了，多出来的蟹黄堡卖给谁？

在大多数情况下，蟹老板会考虑雇用派大星。因为雇用派大星，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每个蟹黄堡的成本。然后，蟹老板去抢夺竞争对手痞老板的市场。如果蟹老板不雇用派大星，那么痞老板就可能雇用派大星，反过来挤压蟹老板。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越大，企业在竞争中越有利，在经济危机中生存的机会越大的话，就能理解蟹老板扩张生产规模的动力——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蟹老板也有必要改进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从个体来看，这样生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做，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尖锐化了。

假设蟹老板雇用了派大星，扩大了生产，同时降低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这时，生产模型就改变了。蟹老板用 1200 美元去进货，用 240 美元支付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工资。三个人工作 300 个小时，生产出 1800 个汉堡。每个汉堡包含的劳动不变，还是 10 分钟，所以还是价值 1 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蟹老板的利润提高了，生产与需求的缺口也扩大了。假设蟹老板的生活方式不变，还是消费 100 个汉堡。那么新的消费不足的缺口就不是 100 美元而是 260 美元。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蟹老板雇用了派大星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需要卖掉的汉堡更多了。这个过程会反复上演。蟹老板会不断地把劳动力吸收进来，然后获得更多的纸面上的利润，但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则会不断扩大，需要卖掉的蟹黄堡更多。整个过程如同抱薪救火。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场面就是，一方面劳动者不断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生产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总需求与总产量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于是，蟹老板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市场，这些市场包括同行的和未开辟的。抢夺同行的市场，就意味着要打折销售蟹黄堡。未开辟市场则往往在海外。

“为了能在国内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却必须到国外，到远方的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是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这种事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能发生。工人无法独立生产，必须和资本结合，而资本则决定如何分配。所以，工人虽然想消费却没有消费的能力。资本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获得的利润无法变成货币。于是，一方面是本国劳动者的消费被压到最低限度，一方面是贱卖本国产品——否则企业就要减产，工人就要失业。

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是众多企业对某一行业一拥而上，纷纷投产进行恶性竞争，然后该行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众多企业一哄而散，转产的转产，倒闭的倒

闭，减产的减产，裁员的裁员。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常态，直到垄断出现。

我们在前一节说过，所有的产品都会成为消费品退出生产。这些消费品既包括民用的面包、黄油，也包括国家用的飞机大炮导弹坦克。实际上，如果我们以退出生产为标准定义消费品的话，那些卖不出去最后变质的商品，停止生产后不断锈蚀的设备，也应该被算作消费品。在蟹堡王的模型之中，蟹老板的蟹黄堡卖不动，最终烂掉，就是特殊的消费品。资本主义制度简而言之也就是强迫占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消费。

不仅仅是蟹老板追求利润，蟹堡王所在的地主也要求利润。这里，我们假设蟹堡王所在地的地主是松鼠珊迪。假设珊迪向蟹老板要求100美元的租金，那么在生产的第一个阶段，蟹老板首先要支付1100美元（800美元的原材料、200美元的工资、100美元的地租）才能开业。这100美元也是来自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创造的价值，也是蟹老板的利润，不过被提前预付。

珊迪和蟹老板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彼此分配剩余价值的比例。如果珊迪比较强势的话，那么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珊迪就可以要求更高的地租，甚至要求260美元的地租。至此，海绵宝宝、章鱼哥每人少挣的20美元，蟹老板多收的三五斗，全部归珊迪所有。

如果珊迪在第一个阶段消费100美元，在第二个阶段消费260美元，那么就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缺口。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提出的由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消费多余产品避免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

如果珊迪有很多地产，蟹堡王的地租只是珊迪总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珊迪也喜欢聚敛货币的话，那么消费的缺口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现在的需求与消费的缺口并不是产业资本家（蟹老板）造成的，而是地主（珊迪）造成的。这时，蟹老板的利润只有100美元，仅仅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要。

无论是谁对货币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都会导致经济危机。地主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同样会影响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进而影响社会的就业。同样的，金融和暴力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的话，也有类似的后果。不必一一说明了。

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会在各个阶级间分担，这些损失究竟要谁承担，则往往看谁的博弈能力最弱。如果预付地租的话，地主（珊迪）自然不会承担损失。反之如果在生产结束以后支付地租的话，损失则往往由产业资本家（蟹老板）和地主（珊迪）共同承担。蟹老板已经破产，珊迪虽然有100美元地租的合同，但是能获得多少租金都是未知数。

不过，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完全有能力要求蟹老板预付地租。另一方面，

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那么她的消费倾向显然会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消费不足型经济危机，很可能是珊迪引起的，但是她却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只要她拥有的资本量足够大，她就可以把收益拿到手，把损失转嫁出去。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市场中无处不在的马太效应。

自然失业率：简单再生产循环的就业率

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

话题继续回到蟹堡王。

蟹堡王的一切问题归结为蟹老板和珊迪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消费掉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只想要钱，不想要汉堡。

那么那些多余的汉堡怎么处理呢？

方法之一是蟹堡王压缩生产，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能消费多少汉堡，就成了生产的上限。生产以这个上限为界，周而复始地循环——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停滞期。蟹老板和珊迪两个掌握生产过程，他们的需求有稳定的支付能力。靠工资吃饭的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能力都从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的消费中衍生而来。于是，在不扩大产能的情况下，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上限，就是利润的上限，也就是生产的上限。

回到蟹黄堡模型，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用海绵宝宝和章鱼哥，100美元租珊迪的地皮。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蟹黄堡，售价1200美元，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购买，余下400个汉堡。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各100美元，各自消费100个蟹黄堡。剩下200个蟹黄堡就是蟹老板和珊迪获得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是他们的利润。如果蟹老板和珊迪各自消费100个汉堡的话，所有的汉堡就都有着落了。蟹老板的蟹黄堡都卖出去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都有饭吃了。

这时，倒霉的就是派大星。派大星怎么央求，蟹老板也不会雇用他。道理很简单，多雇用一个人，意味多生产200个汉堡，其中100个是派大星的工资，剩下100个，没有人愿意消费。生产出来没有人能消费的产品，卖不出去，也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生产要压缩。尽管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但是蟹老板也不会

为了解决派大星的就业问题而增加雇用人数。资本不养闲人，资本家是资本的代理人，不是慈善家，只雇用能创造利润的人。

这时，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会感觉压力很大。蟹老板有空就会训斥他们："你们不愿意干就滚，派大星愿意干。"派大星还可能要求比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更低的工资。比如，派大星不要100美元，只要80美元就够了。这时，如果派大星能像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干的一样好，那么蟹老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换人。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必然要答应比较低的工资。如果不答应，就要准备卷铺盖走人。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就愿意雇用越多的工人。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了。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对个别工人来说，工资要求较低，有更多地被雇用的机会。但是，对工人总体来说，派大星所获得的工作，是章鱼哥或者海绵宝宝失去的工作。

稳拿经济学这样宣传无疑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就回避了资本主义模式中，就业不足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其次，可以把责任转移到工人身上——是你们要求的工资高，所以你们没有工作。再次，还可以作为压迫工人工资的借口。

稳拿的消费总量，以及每个工人能提供的剩余价值，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规模和雇用人数，而不是每个工人究竟要多少工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并不能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工资虽低，但产品没有销路，资本家也不会扩大生产。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只要能获得2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满足蟹老板和珊迪的需求，究竟多少人生产并不重要。如果海绵宝宝能一个人生产300个汉堡，那么章鱼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海绵宝宝一个人仅能生产280个汉堡，同时愿意接受80美元的工资的话，章鱼哥的工作还是保不住。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生产是规模不变（不扩产）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或者说在经济停滞期），而且不存在服务业的话，那么：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变量：统治阶级的消费总量、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和单个工人的工资。统治阶级消费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同样的技术水平，每个工人创造价值越多，或者说工人劳动强度越大，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少；工人工资越高，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

这就是简单再生产，或者说社会经济停滞期，一个社会需要的劳动力的人数。用总劳动力减去这些人数，就是失业者的数量。如果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和工人平均工资变化不大的话，需要的就业量就会相对稳定，失业者的数

量会相对稳定。政府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贷款）和财政政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平衡点。一旦刺激政策由于通货膨胀或者财政赤字暴涨而不得不停止，失业率就会迅速或缓慢地逐步回到这一点。这就是卢瑟经济学对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的解释。

社会贫富差距和自然失业率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贫富差距大意味着统治阶级消费总量相对生产能力偏少，工人博弈能力差，单个工人被占有的剩余价值高，我们可以认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停滞期的“自然失业率”越高。如果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不能调节贫富差距的话，那么随着刺激过程的结束，失业率就会原形毕露。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在刺激经济过程，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那么新的就业平衡点会比原来低，换句话说，新的失业率会更高，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

如果蟹老板和珊迪消费的总量不是200个汉堡而是300个，那么在每个劳动者能为统治阶级提供100个汉堡的情况下，派大星就有工作了。而且不仅是派大星自己有工作，而是创造一连串的工作。整个生产规模扩大到原先的150%，从原料到成品，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增加人手。整个社会就业量一下子上升50%。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要蟹老板和珊迪增加消费是很难的，具体原因后面论述。

如果蟹老板强行安排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加班，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的活，8小时工作制度变成12小时工作制，这是很容易的。那么虽然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总量增加了，但是派大星还是要失业。每个资本家都要努力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资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工人劳动效率越高，对资本家越有利。另一方面，资本循环速度越快，机器的使用效率越高，对单个资本家越有利，这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总体来看，提高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与降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劳动强度，这两点都很困难。不过，工会出现以后改变了局面。工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同样的生产规模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了，同样为了满足蟹老板和珊迪的生活需要，就需要雇用更多的人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均到150美元，每人消费15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和珊迪只能从他们身上获得1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蟹老板和珊迪能消费200个汉堡，而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剩余价值只有100个。这时，蟹老板就要考虑增加雇用人手。派大星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了。

这样的情况需要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否则，只有其中一个人提出加薪的要求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显然会由派大星替代。即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时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两者不联合的话，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被胡萝卜和大棒打击下去——给听话的海绵宝宝提高一点工资，解雇章鱼哥，由派大星替代章鱼哥的位置。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要么同时加薪，要么同时辞退。这时，蟹老

板才会就范，因为蟹老板就是想雇用派大星替代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也办不到——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进退，而派大星不能承担两个位置。

不仅如此，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的话，他们就可以考虑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把一部分日常生活需要的劳动转移给社会，比如理发。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以后，他们就可能考虑去理发店理发，而不是自己胡乱收拾一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个月各拿出 10 美元理发，那么就在理发方面能增加 20 美元的需求，或者说创造 1/5 个理发师的岗位。

反过来看，假设某个理发师技艺高超，能为包括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内的 10 个人理发。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却没有能力支付他的工资，这个理发师仍然要饿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可以脱离理发师生活，但是理发师显然不能脱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活。所以，希望完全靠增加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考虑原有分配问题是不全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珊迪和蟹老板如果愿意花钱在服务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能创造就业的机会。在拉斯维加斯，在澳门，都有丰富的就业机会。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特种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各种尤物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解体期间各种暴富的机会，就不难理解这些特种服务的蓬勃发展。

在有失业大军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会组织，工人很难要求加薪。微观上看，工会抑制了非工会会员的就业。但是在宏观上看，工会不仅提高了工人工资在社会新增总产品中的比重，还扩大了生产规模，给其他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工会的存在，使工人与资本家博弈关系瞬时逆转。所以，工会是资本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弗里德曼说，由于工会的存在，使得黑人孩子不能获得廉价的工作机会。其实，他少说了半句，如果没有工会，这些工作机会也未必会属于这些黑人孩子，不仅如此，这些就业岗位的待遇也将大不如前。早期的资本主义有大量使用童工的历史，比如卷烟厂、棉纺厂和缫丝厂等。大批的童工夭折在工厂里，许多人成年以后由于幼年的繁重劳动和营养不良而出现早衰，同时全民族体质普遍下降。这段历史，弗里德曼似乎忘记了。

类似的工作也可以由政府来做，比如强行执行必要的劳动保障法，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限制最低工作年龄，限制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承担各种必要的保障性支出等等。但是，政府法规的具体效果在许多时候不如工会效果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相对企业比较具体，政府的法规涵盖行业比较广，只能泛泛而谈，调节也颇有难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级制订的政策，往往要优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会是毫无缺点和问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工会组织，由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会工作不断增加，于是如同政府一样，出现了逐步脱离工人阶层的职业工会官僚。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为主，顺便兼顾工人的利益为辅。这些工会领导人，往往热衷追求个人名利，漠

视工人权益，甚至勾结资本家和政府。此外，个别垄断行业的工会，不断要求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则通过涨价等手段，把矛盾转移到社会生产的其他环节。

如果卢瑟的收入低，失业问题很可能更严重。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主动降低工资，且不说不能增加 2 个在蟹堡王的就业机会和 1/5 个理发师的就业机会，还会额外减少就业机会。因为蟹老板和珊迪从每个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如果他们生活水平不变，就没有必要雇用这么多劳动者了。这绝不是说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没有上限。他们的工资上限不是他们能创造的全部价值，而是蟹老板的全部利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蟹老板首先要支付地主珊迪 100 美元，换句话说，蟹老板全部净利润是 100 美元。所以，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要求的总加薪幅度超过 100 美元的话，蟹老板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珊迪和蟹老板的博弈中，珊迪是强势的一方，蟹老板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身上获得的利润很大一部分要被珊迪无偿占有。所以，减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被剥削的幅度，不应该仅仅看到蟹老板，更应该看到珊迪，尤其是珊迪获得蟹老板绝大部分利润的时候。

消费不足，并不见得是产业资本剥削得太严重，而是整个稳拿集团剥削得太严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土地、金融和暴力之间分配。无论谁拿得过多，都会导致消费不足。资本家蟹老板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不是全部。不应仅仅看到蟹老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之间的雇佣关系，就认定是蟹老板占有的剩余价值太多了。如果是因为地主珊迪占有过多的剩余价值，同时消费不足，导致就业不足。这个时候，让蟹老板提高员工的待遇，促进消费是不现实的。他在微利经营，维持而已。要求他提高员工待遇，上限就是他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如果员工工资上升到他无法维持的状态，他就要关门大吉。那个时候，蟹堡王倒闭，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珊迪就要集体喝西北风。

同样是经济停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被剥削得越严重的国家，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消费能力越差，失业率越高。所以，不是工人要求的工资高，所以没有工作，而是稳拿剥削得太严重，资本不需要这么多奴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不能产生利润，对资本来说，是没有用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可以成为资本扩张的炮灰。

倒霉的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想自己干，没有生产资料。派大星没有钱开餐厅，如果他能开的话，就不是劳动者了。想申请工作，蟹老板那里不缺人手，于是就成为社会多余的劳动力。这时，如果派大星是小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会回家务农。如果派大星没有土地了，比如圈地运动以后的英国农民，那就只能成为多余的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打短工的机会。有可能的话，也不排除去沿街乞讨，小偷

小摸，拦路抢劫或者坑蒙拐骗——派大星总是要活下去。这时，蟹老板和珊迪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雇用一些人维持社会治安，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神父的意见创建集中营，把这些失业的“社会渣滓”关起来。对统治阶级来讲，许多劳动者失业，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别危害到自己的统治就可以。劳动者失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危害到社会安全就要把他们关起来。

看看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描述：“您怎么识别一个罪犯的，沙威警长?”“这并不难。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社会由第一部分人组成，他们守法，另一部分人则反对一切。我的职责是保护第一部分人……不受侵犯。”沙威是一个称职的警长，他只负责抓人维护治安，并不考虑为什么另一部分人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

这时，如果有局外人愿意而且能够多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派大星和相关原料供应者就有工作了。当然，蟹老板也有额外的利润了，珊迪也可以涨地租了。但是，如果这个局外人停止订购了，那么派大星又要失业。派大星的工作，不是稳定的，他能不能有工作，取决于有没有局外人要汉堡。所以，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争夺海外市场这个问题上，许多社会底层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他们不了解自己失业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分配方式，而希望通过占领海外市场，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对外扩张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也不断鼓吹扩张的理论，强调积极备战，不断军事扩张。日本从小鼓励孩子玩击沉“定远”、“镇远”的军事游戏，教孩子唱军事性的歌谣：“虽有国际法，道义靠腕力。”相比之下，当年满清则对内宣传儒家学说，要大家读圣贤书做忠臣孝子，对外追求“以夷制夷”，希望靠维持殖民者之间微妙的均势，避免被侵略的命运。满清与日本，一个是封建农业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工业国，选择不同的内政、外交都是符合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

这时，如果有海外的殖民地，对派大星来说，就是最好的希望之地。只要他能凑足路费，到新殖民地去，干掉原住民，他就能重新成为小农，自给自足。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暴力的话，还可以在无法无天的殖民地获得足够的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资本家或者奴隶主——在国内混不下去，不妨到落后国家去抢钱、抢粮、抢地盘。比如欧洲人贩卖人口，西班牙人杀印第安人，美国人搞种植园，日本人在中国贩鸦片和在东北搞武装拓殖等等。所以，对外扩张的殖民战争中，从来不缺乏积极参战的社会底层。欧美的冒险家，日本的浪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没有找到合适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也是本国资本扩张的排头尖兵，在国内没有上升通道的情况下，向外寻找新的机遇。他们希望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本国稳拿既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又乐于获得海外的利润，于是也就乐于支持这样的事情。这些冒

险家便获得本国资本的利用和保护。中国紧邻日本，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民族资本主义势单力孤，所以迟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成为日本眼中的肥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从上到下，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有时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社会底层甚至走在稳拿的前面。这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回避内部矛盾，长期宣传用战争扩张的好处，培养民族情绪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底层生活艰苦，希望通过战争改善生活。日俄战争媾和的时候，甚至发生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付出的伤亡和损失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但是日本民间获得的好处却不及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流血，承担损失，却没有分得到足够的好处，自然极大不满。1905 年 9 月 5 日，《朴茨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失望的日本民众在黑龙会、靖和问题同志会的发动下，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朴茨茅斯和约》，因为日本得到的只是战略利益，而非民众指望的大笔赔偿金。群情愤怒的日本国民宣布废弃该条约，继续对俄作战。民众猛烈地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发生烧打事件。骚乱持续了 3 天，最终被镇压。骚乱中，烧毁 2 所警察署，219 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 座教堂，53 户民宅，15 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 1700 余人，起诉 300 余人，被判刑者 87 余人，骚乱从东京迅速波及到日本各地，全国为之震荡。

1929 年，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全球进入长期经济萧条。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袭沈阳，然后迅速席卷东北。从此，全日本上下陷入对战争疯狂痴迷的状态，把侵略中国视为解决日本国内问题的最佳方案。自 1931 年“9·18”事变截止到 1945 年日本投降，3500 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70 万以上的日本侵略军被中国军民消灭，成为资本的炮灰。

资本主义本身有极强的扩张性，在经济停滞期，这种扩张性更突出。要么革命，要么扩张，对统治阶级来说，扩张好于革命。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上到下，都有扩张的野心，上层要利润，下层要工作。上层造军火，下层当炮灰。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期往往是多事之秋。

当然，这种人口的输出不仅仅是向落后地区的输出，也包括向发达地区的输出。由于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在发达国家从事同样的职业，可以比在落后国家从事同样的职业获得更多的实物报酬。日本历史上不仅向中国输出了大批浪人，也向美洲和东南亚输出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许多人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定居，还有一些人（比如藤森的祖先）跑到了南美。大名鼎鼎的巴西柔术，就是在那个时候由日本人带到巴西的。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女孩子跑到南洋当妓女。电影《望乡》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大批东欧人（比如波兰人）到英国打工，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样的人口输出，无疑恶化了当地的就业环境。这就如同原先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有工作，突然派大星加入进来，要求的工资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一半。对蟹老板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这当然是坏事。对当地的劳动者来说，这些外来的劳动力要求的工资更低，抢夺了他们的饭碗。对当地的雇主来说，这些外来的劳动者可以成为失业者的撒气筒，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安全阀。所以，在经济衰退期，外来劳动者往往遭受各种伤害，而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对这些劳动力来说，客居他乡要忍气吞声，自己的祖国声望提高，无疑会改善自己的地位。国父孙中山曾经讲过一个爪哇岛上日本妓女的故事：一位华人富翁晚上回家忘记带证件，于是花一块钱找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他回家。华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会被抓起来，但是有日本妓女陪同，当地的荷兰警察就不敢乱来了。日本妓女虽然低微，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所以，荷兰警察不敢欺负日本妓女。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海外的日本妓女用自己的皮肉钱支持日本海军扩军备战。

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停滞期能吸收的劳动力越少，失业情况越严重。经济一旦停滞，自然失业率可能达到惊人的水平。这时，如果不希望过高的失业率危害社会，就必须使全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后面我们将分析蟹堡王消除多余汉堡的第二种方法，我们将看到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稳定存在的。

卢积累与扩张：扩大再生产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的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值，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资本论》（第三卷）

如果没有积累，人类社会今天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把一部分劳动时间产品用于生产劳动工具，这就是最简单的积累。几个原始人赤手空拳，用1天的时间捕捉1只野猪，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相反，每个原始人用1个月的时间制造弓箭，第二个月这几个原始人就可能用弓箭猎杀5只野猪。有了弓箭，不用近身肉

搏，只要远远放箭就可以了。

弓箭必然有寿命，弓箭的劳动融入到猎杀野猪的劳动中，每只野猪包含的价值，不仅仅包括拉弓，瞄准和射击，也包括制造弓箭的劳动。如果原先 5 个原始人，每天猎杀 1 只野猪，现在有弓箭以后，每天猎杀 5 只野猪，每套耗时 1 个月制造的弓箭能使用 1 个月的话。那么原先每个原始人的每天劳动量相当于 1/5 只野猪，现在则相当于 1/2 只野猪或者 1/30 套弓箭。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原先的 250%，或者说猎杀野猪的时间下降到原先的 40%。在市场中，无论野猪是怎么被猎杀的，15 只野猪就等于 1 套弓箭，1 名猎手，1 天可以获得 1 只野猪，但是他要把其中的 1/2 只野猪用于交换弓箭。除非他能自制弓箭，或者准备去和野猪肉搏。

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如果制造弓箭的材料并不难寻找，制作的技术也不难掌握，那么此时，大家都会选择使用“先制造弓箭后射杀野猪”的方式去获得野猪肉。如果谁还喜欢赤手空拳斗野猪的话，只能说此人喜欢暴虎冯河，精力过剩，希望寻找刺激，或者智商有问题。

如果猎手自己制造弓箭，那么就需要先积攒 1 个月的口粮，然后才能制造弓箭，提高猎杀效率。换句话说，他首先要有多余的消费品，供自己生产工具的时候消费，然后才能生产劳动工具。如果制造简单工具只需要一两天，饿一饿也就忍过去了。如果制造的是复杂工具（比如弓箭），需要 1 个月，那么靠辟谷是万万不能的。

猎手每天少消耗一部分野猪肉，日积月累，作为他生产弓箭期间的口粮，这就是积累。

简单地说，在纯收入中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用来扩大再生产，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扩张生产规模，或者既提高效率也扩大规模，总之增加产量。这就是积累。这里说到的纯收入是指补偿原有生产工具磨损以后的收入。1 套弓箭使用寿命 1 个月，制造新弓箭耗时 1 个月，如果准备以后继续采用弓箭猎杀野猪的话，每天就要少消费 1/2 只野猪，作为补偿弓箭的损耗。如果不少消费这 1/2 只野猪，就要准备回到赤手空拳斗野猪的状态。

每天赤手空拳打野猪，获得的野猪肉是基本不变的。那么，猎手每天吃得越少，积累就越多，他就能越早攒够口粮，完成制作弓箭的过程。

积累具有加速性。5 个猎手每天猎杀 5 只野猪和 5 个猎手每天猎杀 1 只野猪相比，必然有更充分的食品。同样的时间，猎手可以积累更多的口粮，有条件生产更复杂的工具，比如弩。这时，猎杀野猪的效率，比弓箭就更高了。

现在我们回到蟹堡王模型。

蟹堡王遇到的生产与消费矛盾的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是把剩余价值用于积累。换句话说，把多余的汉堡用于扩大再生产。蟹老板把消费不掉的汉堡用于扩张生产规模，然后生产更多的汉堡。

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用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每个售价1美元，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还有100个汉堡没有对应的买主。多余消费品对蟹老板来说不是问题。蟹老板可以用100美元雇用派大星，这100美元被派大星用来购买蟹老板自己消费不掉的那100个汉堡。整个过程所有的汉堡都有了销路，所有人都吃饱了。表面上看，非常完美。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打住。

派大星得到工资以后，必然要生产出200个汉堡。新增的200个汉堡，卖给谁呢？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照葫芦画瓢的话，可以新增2个人手，于是新增的这200个汉堡也有出路了。但是，这2个新手，要新增400个汉堡的产能。新增人手与新增产能成正比，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此一来，雇用了一个派大星，就要新增2个人才能消费掉派大星的产能，新增的2个人的产能，又需要新增4个人去消耗。1、2、4、8……这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

蟹老板可以不断增加人手，但是很快所有的海底居民就都会成为他的员工。这时，海底居民的总数，就成为蟹老板扩张产能的瓶颈。

实际上，不用等到雇用所有的人，蟹老板自己的资金链很可能会先坚持不住。每增加雇用一个人，他要新增投入500美元，其中400美元买原料，100美元发工资。这样的增长速度，蟹老板不会坚持很久。再说，面粉、蔬菜、沙拉酱、肉饼等环节也会遇到各种制约的瓶颈。

如果我们知道“棋盘放小麦”的故事的话，就会知道这种增长方式有多么惊人。很显然，这种增长方式不能无限循环下去。

蟹老板还可以以每个月100美元的工资雇用派大星，给他改建蟹堡王餐厅的厨房，安装新烤面包机，新烤肉机，新炸薯条机，新上下水管等等。整个工程耗时半年。工程完工以后，餐厅后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工程进行之中，蟹老板的多余的汉堡都有出路了，派大星也有了工作，再次皆大欢喜。

但是，工程迟早有完成的时候。工程完工的时候，新的问题就来了：首先是派大星又失业了，其次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新增的汉堡产能没有人消费。原先两个人生产1200个汉堡，现在两个人能生产1800个汉堡了。扣除原料1200美元的原料和两个人各100美元的工资，蟹老板自己消费的100个汉堡，现在有300个汉堡没有买主。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蟹老板不断雇用派大星没完没了地干这干那，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事实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科技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生产技术的发

展，不是稳定、线性的。在某一个时间段上相对停滞，在另一个时间段上，则可能突飞猛进。所以，派大星的工作必然断断续续，迟早会中断。中断的时候，派大星失业，产能被释放出来。

每次生产力大规模发展以后，都必然需要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要表现为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显然资本家是不愿意主动这么做的。于是，每次大规模的繁荣，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每次工业革命之后，必然伴随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对资本主义来说，科学家是救世主，他们一旦停下来，资本主义就要遭殃。他们不断有新发明新技术，资本主义就能不断改进生产，派大星也有工作，皆大欢喜。

还有人说，蟹老板可以雇用派大星，不断做无用功，蟹堡王既不扩大产能，派大星也有工作。比如：今天挖坑，明天埋上，今天盖房子，明天拆除重盖。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谈到的简单循环，或者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

这时社会的就业总量和生产规模，与资本家总消费能力以及他们的从每个劳动者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有关。如果蟹老板喜欢养闲人，自然可以这样做。不过，资本家是不喜欢养闲人的。如果蟹老板养了闲人派大星，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没有养，很显然对蟹老板是不利的。

既然资本家不愿意，那么就由政府出面好了，这就是凯恩斯的思路。这种方式的利弊，我们在后面还会分析。

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困难，是扩大再生产以后，新增产品没有对应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勒紧裤腰带方面是很有效的，每个工人的工资都被压到最低。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越低，越有利于积累，积累越多，将来的产品越多，工人是多数产品的消费者，于是矛盾就来了。

现实生活中的扩大再生产，往往具有两种扩大再生产的共同属性，既增加人手也改进技术。但是，不论哪种扩大再生产，受人力、自然资源或科技水平的限制，都不可能长期无限稳定地发展下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每次扩大再生产停止下来，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时，原有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扩大了，消费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新增的生产资料，可以制造更多的消费品，本来是件大好事，现在却成了大难题。

工人的消费水平越低，积累速度越快，扩大再生产一旦停顿下来，产能与消费的缺口越大。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单位工人生产产品的总量是基本不变的。纯收入中扣除消费以后的部分就是用于积累的部分。

积累总量 = 单位工人剩余价值 × 工人数量 - 资本家消费
= (单位工人创造价值 - 单位工人工资) × 工人数量
- 资本家消费

每个工人能生产600个汉堡，200个是纯收入，每个人的工资是100美元（相当于100个汉堡），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用于积累的部分，就是：

蟹老板积累总量 = (200 - 100) × 工人数量 - 100

毫无疑问，蟹老板积累越快，生产规模扩张越快，总产量上升越快，达到扩大再生产人力资源极限的时间越短，达到极限后，需要弥补的消费缺口越大。

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蟹老板占有每个工人一半的消费品。如果蟹老板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的1/4，那么生产规模扩张就会下降一半。反过来，一旦生产停滞以后，需要弥补的缺口大致也只有原先的一半。

但是，这样一来，蟹老板的资本积累的效率无疑会比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慢得多。如果考虑到积累的加速性，这种差距必然不断扩大。这就如同两个敌对国家，甲国还停留在使用弓箭的状态，乙国已经制造出弩；当甲国终于制造出弩的时候，乙国已经制造出火枪了。如果甲国不愿主动臣服于乙国的话，只有提升自己的积累率或者被消灭两条路。没有人愿意主动投降，资本家也一样。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资本家对资本积累有极高的热情。在资本量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社会中，资本量越大，资本家个人的博弈地位越有利；资本量越小，资本家个人博弈地位越不利。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想改善经济地位，必须不断积累，如果不能跟上普遍积累的速度，经济地位必然不断下降。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地你追我赶之中，资本家既有征服欲，也有危机感。工人被资本家控制，资本家是被资本绑架的人，大家都是资本的奴隶。于是，全社会把积累率提高到极限，也把产能和消费的缺口推高到极限。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所有人都被绑在战车上，整个社会向生产相对过剩的悬崖飞奔。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不断提高积累速度，扩张产能。这时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资本家都处于竞争的囚徒困境中，大家都是小土豆，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整体市场供应。张三不扩张产能，李四扩张产能生产，总有人超量生产。所以在利润率明显下降以前，大家都不会停下来。蟹老板不占据市场，痞老板就会去占据，自己不扩张就等于把市场拱手让人。换句话说，自己的经济地位就难保。反过来所有人的生产过程必然最终影响市场供应。大家都压低工资，提高积累，不断扩张，那么最终必然导致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扩张到极限。

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终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那么消费不足的问题

就不会存在。猎人制造弓箭的目的，是为了吃到更多的野猪肉。如果新增的猪肉吃不了，那么猎人是不会无休止地制造弓箭和猎杀野猪的。

但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提高积累和扩大生产的过程却与最终消费能力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值，而不是消费。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工人工资以外的部分是为别人生产，资本家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自身消费以外的部分也是为别人生产。生产过程资本家决定，工人无钱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不消费，最终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能消费掉所有消费品。

对资本家来讲，一旦工人工资高了，能获得的利润就少了，他就不再适宜作为雇用劳动力了。干同样的活，工资高的首先被裁员。一旦某地的工资水平上升，资本家就要考虑产业转移了。这种趋势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才有的趋势，知识密集型也同样如此，比如美国把一部分软件开发业务转移给印度。创造同样的利润，谁要求的工资最低，资本家就雇用谁。工人为了争取就业的机会，同行之间不断竞争，最终压低全行业的工资。同样质量的产品，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销路好。同样的生产技术，如果工人工资高，那么同样价格下，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低；同样的利润率下，产品的售价就高。

自由竞争条件下，工人生产是为了给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获得利润也不是为了消费。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物质消费的享受，而不是追求积累财富带来的快感，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资本代理人的职能了。他的积累速度比同行慢，产品成本比同行高，利润比同行低。资本离他而去的时候就不远了，他的资本很快就会部分或全部成为其他人的资本。所以，资本家也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

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尽量高的利润。一方面是尽量高的产量，一方面是尽量低的消费，所以只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相对消费不足就永远存在。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的几百年间，尽管社会的绝对消费水平比资本主义初期高了很多，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

生产的积累过程已经完成了，但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并没有完成。资本积累与生产积累不完全相同，资本家投入货币，最终必然获得更多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变为更多的货币，至此，资本积累才算完成。这些产品要有足够的销路，能卖出去，资本的积累才算完成。

资本的积累，必须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产品必须能卖出去。产品能顺利地卖出去，前提就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进行。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没有任何一种扩大再生产能无限、稳定、线性地增长下去。

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一旦扩大再生产停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大幅度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跃升以后，如果不能改善社会分配，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工人能够消费掉新增的产品，那么就难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值。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待遇，而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不能——资本家不会把工人工资提高到能消费所有产品的地步，那样他们便没有利润了。发展生产的目的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马克思的时代，每次经济繁荣都是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起点，每次设备更新的结束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大崩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如果（一个集团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

——《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

前面说到蟹老板的扩大再生产迟早会中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必然会由于人力资源、自由资本、生产原料等条件的限制而中断。提高技术水平的扩大再生产，则难免受到技术的制约，毕竟技术进步不是稳步的，而是间歇性的。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扩大再生产中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简单，这就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危机。蟹老板计划雇用派大星或者要派大星更新厨房设备以后实现扩大再生产，产量提高了，每个汉堡能卖1美元，结果却发现这些汉堡卖不到1美元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不是能生产多少汉堡大家就消费多少汉堡），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能力（不是大家需要多少汉堡就生产多少汉堡），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能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加资本家自身消费）。多数情况下，由于竞争的压力，资本家不能吃光花净全部的利润，必须把剩余价值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用于积累，换句话说这一部分汉堡没有对应的消费者。所以，在自由竞争的模式下，资本主义本身就有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倾向。

具体到蟹堡王，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消费，200个由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消费，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还有100

个，蟹老板只想要美元不想要汉堡，却发现没有对应的消费者。蟹老板用100美元雇用派大星，400美元买原料，又生产了600个汉堡。扩大再生产暂时掩盖了矛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一轮扩大再生产无法继续进行。于是蟹老板发现自己有1800个汉堡（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生产600个），其中只有1600个（1200美元提供原料的原料销售商消费1200个；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自100美元工资共消费300个；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有销路。现在的问题是1800个汉堡对应1600美元的购买能力。

这个过程之中忽略了地主松鼠珊迪的作用，如果珊迪聚敛货币过多，同样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珊迪看到蟹老板雇用派大星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认为蟹老板的利润将提高，于是向蟹老板征收200美元的地租。珊迪获得地租以后，并不打算消费那200美元对应的200个汉堡，而是存起来，没有用这笔钱消费。这时，蟹堡王同样面临1800个汉堡对应1600美元购买力的问题。

这时，蟹老板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蟹老板销毁200个汉堡，剩下1600个按原价出售；解决的方法二，是蟹老板打折销售：原先1美元1个的汉堡，现在卖89美分一个；或者，一次购买若干以上汉堡的人，免费赠送一个汉堡。总之，不论怎么样，蟹老板原定计划1800美元的销售额是不能到手了，只能到手1600美元。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要忘记竞争。

战争的突围行为越稳步进行，损失越小，反之亦然。战争中，难免遭遇包围。这时，所有的士兵都要在指挥官的指导和军法的约束下，有步骤地逐步突围：装甲兵作为前锋，杀出血路，既要凶猛，又不能太快，免得后续部队掉队；大批步兵居中，保存有生力量；反坦克部队作为殿后的后卫，逐步阻击后面的追击部队。如此，所有的士兵奋勇作战，则多数部队都会遭受损失，但是都能幸免于难。反之，如果没有指挥和军法，任何一个战不旋踵的士兵，都将被敌人消灭，个人的勇敢将为别人赢得逃生的时间，也是他们丧生的原因。于是，对任何一个士兵来讲，在这样的局面下，谁不逃命谁阵亡。但是，如果整个部队全部逃命，那么会有什么情况呢？装甲兵狼奔豕突，步兵一哄而散，反坦克部队望风而逃，那就是大溃败。最终，除了个别作战凶猛，运气不错的部队能逃出去以外，多数都难免被歼灭。

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战场，在其他灾难中，也很常见。个体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并不统一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力的约束，那么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最优选择，最终导致整个集体最惨重的损失。

市场既没有指挥官，也没有军法的约束，于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蟹堡王模型把无数企业简化为一个企业，需要注意，现实中这些企业在面临同

样的压力的时候，由于竞争的存在，不可能协调一致。当市场上的产品必然面临一部分无法正常销售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竞争实际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获得平均利润率。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成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蟹老板自己销毁汉堡，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并不销毁，那么损失中的大多数甚至全部就将由蟹老板承担。蟹老板销毁100个汉堡，所有的汉堡每个可以卖95美分，蟹老板承担的损失是销毁的100个汉堡和每个汉堡5美分，痞老板则只承担每个汉堡5美分的损失；如果蟹老板销毁了200个汉堡，痞老板的汉堡就可以按照原价出售了，痞老板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很显然，在彼此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销毁，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销毁。

这时，如果痞老板开始打折搞促销，而蟹老板不跟进的话，那么痞老板不必把汉堡价格下降到89美分，也许仅仅下降到95美分就够了。不仅如此，如果蟹老板顽固不跟进的话，痞老板还可以继续扩大生产把蟹老板的生意抢过来，售价虽然下降了，但是销售量上升了。痞老板的总利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这时，蟹老板的供货商甚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会先从蟹老板这里领货款和工资，然后去购买痞老板的汉堡。于是，痞老板实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蟹老板面对一大堆汉堡，欲哭无泪。

一个行业之中，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干。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以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

如果蟹老板跟进，那么痞老板可能继续压价，双方不断在竞争中，把价格压到最低限度，甚至低于汉堡制作成本价：89美分/个。全社会的消费总量在那里摆着，如果有人售价高于89美分/个，必然就有人售价要低于89美分/个。双方都明白，汉堡一旦压在手里，腐烂变质，1美分/个也卖不到。降价晚的资本家，即使大幅度降价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时多数人已经用掉自己的工资吃饱了。他们既没有购买汉堡的欲望，手里也没有购买汉堡的钱了。他手中残留的卖不出去的汉堡，将成为存货，交给银行抵偿贷款或者腐烂变质——腐烂变质也是一种强制销毁。

在销毁产品方面，大家停滞不前，却纷纷忙着打价格战，希望把损失尽可能多地转移给自己的同行。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有大量的产品被销毁，不过不是主动销毁，而是因为卖不出去被动强制销毁。

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配给各个特殊资本，损失的分配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将按照特殊的优势或既得的地位，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配，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

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都争当逃兵，努力以最小的损失出清自己手中的产品。有时，资本家不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尽快出清全部产品——因为那样损失太大，也不能长期坚持相对稳定的价格。于是，所有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在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努力下，在观望中不断溃退，阴跌不止。再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底线在哪里，谁也不清楚。随着产品滞销，必然伴随裁员，于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一步压缩。有时，整个市场迅速崩溃，所有产品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跌停。两种情况的区别不仅仅取决于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往往也取决于资本家对信贷的依赖程度。

崩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上下游所有行业扩散。蟹堡王的问题绝不仅仅局限在蟹堡王。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下降或者失业，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理发，或者干脆不理发。蟹老板的生意不好做，他就会选择减少上游原材料的订货。生产面包的厂家就会减少面粉订货，面粉厂就会减少小麦的订货。同样生产牛肉饼的厂家会减少肉牛的订货，进而影响饲料的订货。如果我们记得每一件商品都要经过无数环节的话，就会理解所有的相关环节都会面临产品滞销和订单下降的影响。

同样的崩溃不仅仅发生在产业资本市场，也发生在金融市场。货币是商品的镜子，商品的流动对应货币的流动，商品的流动停滞，必然对应货币流动的停滞。商品的大量滞销，必然对应银行大批坏账。产业资本遇到的困难，必然会传染给金融资本，并经过银行的放大之后，通过银行为媒介传染给其他资本。表象上是企业还款困难，贷款需求旺盛，处处钱紧，利率上升。商品市场的崩溃伴随着金融市场崩溃，商品市场的恶化伴随金融市场的恶化，两者往往同步发生。

蟹老板的汉堡销量不好，就会影响他偿还贷款。如果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那么他的抵押物——比如蟹堡王餐厅的房产（不包括地皮，地皮是属于松鼠珊迪的）就要被银行收走，然后拍卖。对银行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大批企业贷款偿还能力都发生了问题，那么银行会发现自己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最大的实业资本家，大批的货币资本收不回来，变成了抵押物（蟹堡王餐厅的房产、海之霸餐厅的厨房用品、卖不出去汉堡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些抵押物没有人要，而且在不断贬值——那些暂时还没有陷入困境的企业，愿意主动折现一部分房产、设备和存货，以避免破产。这时，产品的竞价变成了资产的竞价。大家彼此销价，争取最大限度获得现金，摆脱困境。那些已经摆脱困境的人，则持现观望，一面感慨自己的幸运，避免了严重的损失，一面盘算抄底的时间。那些过早抄底的人，以为相对

廉价获得了生产资料，却往往发现自己低估了危机——很快同样的资产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银行一向是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的机构。在一片繁荣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银行会乐于不断扩大贷款范围，把生产与消费的缺口扩展到极限。在市场崩溃之时，银行则会加紧催讨企业贷款，甚至停止流动资金贷款，用各种柔性或刚性手段冻结企业流动资金、卡死企业。在银行的催逼下，企业往往不得不不计血本地倾销存货，进而加剧市场的崩溃。当然，这并不全是银行的错：在只讲求资本和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既然是大溃败，在各自逃命、夺路狂奔的时候，没有理由要求银行殿后。银行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以银行为首的金融业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大崩溃的强度和烈度。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危机前若不利用信用，生产规模越小，生产成本越高，上下游博弈地位越不利，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越大。所以，每一个资本家在危机前，都必然充分利用银行信用，扩张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做，则整个社会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销售，信用利用得越充分，生产规模扩张得越大，产能相对消费能力越大，问题越严重。危机来临之时，每个资本家面临的支付压力越大。整个社会陷入“斩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之中。

金融市场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那样，金融把整个经济循环组织成一个整体，一张无所不包的网。每一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崩溃，可以迅速扩散一大片。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无法偿还，那么必然就要导致银行承担蟹堡王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银行倒闭，所有的储户账户就都要面临严重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损失最终影响了整个银行业正常运转的话，整个经济就都要停顿下来。最终，整个经济循环不能通过银行交易，社会化的生产的商品循环被打乱，那就要回到中世纪了。

在崩溃面前，多数人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崩溃能不能避免。

每次危机前夕往往是消费水平最高的时期，资本家盘算着那些可能到手的纸面利润，工人就业达到历史最高。两个阶级的绝对消费能力都达到最高水平，资本家大量消费高档消费品，工人也尝试消费一些只有资本家才能消费的奢侈品。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话，也没有关系，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消费信贷。全社会一派欣欣向荣。如果从绝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消费扩张到最高的时候，但是，如果从相对生产能力的相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生产与消费缺口扩展到极限的时候。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提高绝对消费能力不能化解危机。今天的工人的消费水平，即使最贫穷的工人也不亚于当年的富农，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当年

的小业主和小资本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要远离资本主义。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前提是工人为资本家提供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消费能力必须小于他的生产能力，而且是越小越好。即使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是在工人创造的利润的幅度内。一旦工人的工资接近他实际创造的价值，他就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了，这时雇用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资本家不能主动裁员，或者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就会面临利润不断下降，最终被同行挤垮的危险。资本是只讲利润，不讲情面的。这就是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尽管绝对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的根本原因。

在危机前的繁荣期，生产扩张到最大，工人工资也大幅度上升。但是，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也扩张到最大。这时，虽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是相对生产能力，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增值资本，仅仅靠提高工人工资，就能避免危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工人能享受相对繁荣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部分价值由金融资本家以信用的方式垫付，产业资本家暂时还没有要求工人实现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而已。

经济危机往往与信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是说通过控制信贷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

控制货币，就可以控制商品，但并不能控制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凯恩斯认为，如果降低利率本身表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那么在金融当局的直接干预之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能使经济复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信贷紧张，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信贷不足是表象，而不是根本病因。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利率的平衡点，使利率达到这一点后，做到生产与消费对应，而且同时达到最大的就业。在垄断条件下的平衡点，并不是利率的功劳，而是垄断企业控制生产规模，自动控制生产的结果，垄断企业有能力了解市场总需求，也有能力抑制过度生产行为。然而垄断企业控制生产的结果，虽然能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却并不能保证最大就业。

银行贷款也不能化解危机，但是能掩盖危机。每一笔贷款都必然面临偿还的问题。用银行掩盖危机，必然在长期面临更大的危机。如果银行贷款支持蟹堡王扩大再生产，必然面临将来扩产之后新增产能没有销路的问题。如果用银行贷款支持海绵宝宝、章鱼哥消费，则面临他们未来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因为他们要偿还贷款，不仅偿还本金，还要偿还利息。如果贷款给失业、半失业的派大星，那么将来派大星无法偿还贷款，同样要造成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类似的情况。

扩大再生产的打断往往由银行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收缩银根开始，于是给人们一种银行误操作造成危机的假象。实际上，无论银行是否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消费与产能的缺口问题。银行的加息或提高准备金，不过是使

扩大再生产停顿下来，使生产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暴露出来。即使银行一直不进行任何操作，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永远在扩大，而扩大再生产则迟早会停下来。一旦停下来，仍然会发生崩溃。换句话说，银行的操作可能成为崩溃的诱因，是危机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实际上，即使银行不进行操作，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力资源、流动资金、自然资源的瓶颈都会逐步显现。这时，工资和原料的价格会逐步上涨，而制成消费品的价格却由于产能与消费的缺口难以跟上成本的价格，产品的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这时，物价出现上涨的趋势，就会有部分资本家逐步压缩产能。于是，扩大再生产中断，经济危机来临。

表象上看，物价先上涨，后暴跌。于是，有人形而上学地认为只要先加息、后降息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出现经济危机是央行没有把握好加息和降息的时间节点和幅度。事实上，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怎么样调节利息，都不能凭空创造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要求。提前加息，不过是提前打断扩大再生产循环，让产需缺口暴露出来。大幅度降息可以保护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避免经济下跌过深，但是对于本来就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过是让资本家用存货抵押贷款多支撑一段而已。这样的观点除了把责任推卸给央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解以外，别无意义。

一场农作物的歉收，一次重要工业原料的涨价，一次银行的操作，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这并不意味着歉收、原料涨价、银行操作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事件只是表象，是诱因，根本原因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能力之间积累的缺口被暴露出来。大溃败之中的伤亡不是均摊的，有些人会阵亡，有些人会受伤，有些身高力大冷血无情的人，推倒同伴，踩在他们的尸体上杀开血路，毫发无损，甚至可能回来清理战场，寻找阵亡者嘴里的金牙。

经济危机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如果资本所有者智力水平相当的话，资本量越大，资本在交易中的地位越有利，危机中损失越小。换句话说，同样残酷的危机，大资本损失小，小资本损失大。总有一部分资本会丧失资本的功能，被淘汰掉，被停下来，这部分资本往往多数是小资本。

相对大资本，小资本必然承受更大的打击。与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生产规模大，生产成本低，能承担更大幅度的削价。大资本资本量雄厚，能承受更多的损失。大资本有更强的博弈力量，能维持较高的利润，并且把损失转嫁给上下游企业。大资本规模大，资产数量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渡过难关。大资本可以要求下游预付货款，向上游赊购。小资本必然相反。这样一来，上下游出了问题，小资本都跑不了，大资本则安然无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压力，所有资本家必然一拥而上，一哄而散。信用则加剧了拥挤的程度和溃败时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在垄断条件下，不存在竞争的压力，所以，经济危机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我们在后面还会谈。

崩溃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也发生在国家之间。每个国家只要是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员，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就难逃厄运。全球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货币资本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迅速扩展的危机，很快就会冲击与其有紧密商品和金融联系的其他国家，然后扩散到与之相对生疏的国家，最终扩散到全世界。这种扩散并不以国界为局限，而是以商品和金融流动的范围为局限，以商品和金融联系为媒介，只要与之有商品和金融联系，就无法不受波及。彼此之间经济结合越紧密的国家，受到冲击的速度越快。

企业之间，强者承担最少损失的原则，承担损失的情况在国家之间也完全成立。强国的总资本是本国资本的集合体，弱国的总资本也是如此。强国的大资本相对弱国的小资本占尽优势，强国的总资本相对弱国的总资本也必然如此。所以，落后国家承担的损失，往往比大国多得多。

强国的资本会去征伐弱国的小资本。如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资本也有失业。大批的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被闲置下来。资本的失业并不是在本国找不到劳动力使用这些资本，而是在本国找不到足够的消费能力，或者在落后国家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便宜的资源和更高的利润。这些资本也希望去寻找海外的殖民地。强国的资本来了，弱国的小业主往往就维持不下去。

强国的资本扩张的过程，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回避危机的过程。发现新大陆，可以有效克服危机。我们曾经分析过失业的社会底层渴望扩张殖民的动力，在此我们也看到了资本渴望扩张的动力。强国从上到下对弱国虎视眈眈，伺机扩展势力范围。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向外转移国内经济矛盾的理由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危机时期，落后国家往往政局动荡。这一方面是因为弱国往往承担强国转嫁的经济矛盾，导致本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平均水平，导致本国被统治阶级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弱国土著资产阶级往往成为强国资产阶级的买办，实力不足以对抗本国被统治阶级。所以，弱国往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相比之下，强国的情况则好得多。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先进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落后的经济殖民地国家。强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本身就比较轻，还可以把矛盾转移到海外，而弱国的老百姓则除了革命没有任何选择。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最落后的是沙俄。结果，沙俄先出事了。1929 年大危机，惹祸的是美国，结果魏玛共和国出事了。美国通过白银法案，结果中国出事了。

向外扩张是资本寻找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金融的作用

与其他资本联合，形成社会化的大资本。这些资本交出了自己的控制权，保留所有权，让出了大部分的收益。

每一个资本家在新一轮设备更新的时候，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重新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但是却不得不跟进——如果他们不跟进，就要被同行所淘汰。如果他们都跟进，最终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了保住自己的经济地位，资本家不得不积累。个人的理性未必代表群体的理性，所有资本家的理性行为导致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周期性的扩张与崩溃。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资本家们奋勇向前，招兵买马，添置装备，攻城略地；在产能过剩的时候，大家集体争当逃兵，各自为战。

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表现是“为积累而积累”，而不是为了消费。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如此。但是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崩溃就停止了，经常陷入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形，将在后面介绍。

不患寡而患不均：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长期停滞

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指挥的人去支配的。

——《资本论》（第三卷）

说服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道义，而是利润。同理，阻止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危险，更不是破坏环境，而是亏损。

资本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逐利而行，资本家每投入1美元，就要求获得1+X%美元，X%就是利润率。如果不能获得对应的利润率，资本就要停止运动，不能获得这个利润率的资本就是没有用的资本，是失业的资本。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资本家消费，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积累资本。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困难，如前面分析的，就是全社会没有对应资本家用于积累的利润的消费能力。

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蟹老板支出10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生产出1200美元的产品，扣除他自己消费掉100美元的产品，还有100美元的产品没有销路。

如果资本压缩生产，按照提供100美元剩余价值的上限提供生产过程，那么产能就要压缩到原有产能的一半。或者说蟹老板支出5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提供100美元的汉堡供他消费。对应而来的，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二人中有一个人会下岗，更不要说失业的派大星了。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期。

在停滞期，资本主义社会有支付能力总消费，决定一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工人的消费由统治阶级的消费衍生而来。工人是产生电能的电池，需要多少电池，完全看资产阶级的能耗和单位电池产生的电能。大量的失业人口即使愿意减少自己的工资，降低消费水平，也难以找到可以糊口的就业方式。生产力水平不变，他们的工资越低，单位劳动力贡献的剩余价值越多，他们的消费能力就越低，社会失业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如同机器的功率越大，需要的电池越多；单位电池效率越高，需要的电池越少。

很显然，在工人工资水平越低的社会，失业情况越严重。

如果蟹老板把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积累，不断扩大生产，那么最终迟早面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大批产品没有销路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强烈的反作用于生产。总消费能力不足，最终导致产能闲置，大批人力闲置、大量资本失业。

社会总消费能力，也决定一个社会产能与需求的缺口的大小。如果我们默认同等技术条件下，单位劳动者生产能力是相近的话。同样技术水平的社会，在产能扩张到极限，遇到人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外在瓶颈的约束下达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总产能达到接近的水平。但是，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很显然，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要低于工人工资较高的社会。

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一切闲置资本。在消费能力越低的社会，将被闲置的资本越多。换句话说，工人工资越低的社会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越大，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越严重。

所有的人，都成为资本的奴隶，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加速积累，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压低自己的消费——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能被这样做的同行排挤掉。于是，全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加速度被提高到极限。生产力冲上悬崖，最终引发崩溃。在扩大再生产中积累的消费缺口，在那一刻释放出来，于是全社会迎来一场大溃败。

这种经济崩溃必然周期性地到来。每次新技术出现以后，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必然或主动或被动的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在竞争中，谁的生产成本高谁吃亏，谁不采用谁吃亏。这时的社会虽然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但是仍然会扩大产品

的积累。每个资本家都不担心产品的销路问题——“比原先的产品便宜20%，利润提高20%……这样的产品，怎么会卖不出去呢?”如果与原先的商品相比，这样的产品必然不愁销路，新一代产品可以不断夺取过时产品的市场。但是，如果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那么新增产品的市场在哪里呢?

在20世纪以前，原有的封建残余不断为资本主义提供市场，随着资本几何级数的增长，在20世纪初期，这部分市场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没有打够，于是又打了一次。

雪崩早已酝酿，一声枪响，甚至一个喷嚏都可能造成雪崩。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喷嚏，还是超量堆积的白雪，陡峭的地形，超量的降雪呢?

如果我们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那么禁枪是否可以避免雪崩呢?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否有枪声，都会有雪崩。没有枪声会有喷嚏，没有喷嚏会有风吹草动。没有枪的地方一样有雪崩，没有人类的地方照样有雪崩。任何一点轻微的震动，都可能导致锁链反应，最终引起雪崩。随着雪量的堆积，需要的诱发雪崩的震动的数量级会迅速下降。完全理想化稳态只存在于完全理想的大脑中。具体的诱因，也许是大洋彼岸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所谓市场平衡，并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在波动中不断自我调节的平衡。市场是一个存在永恒波动的系统，完全的稳态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中。对雪崩来说，只要堆积的白雪达到一定程度，雪崩必然会出现。对经济危机来说，只要产能和消费能力的缺口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出现，具体的诱因并不重要。

陡峭地形上超量的积雪同样不是雪崩的根本原因。雪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雪量不断增加达到临界点，最终在外界的诱因下发生崩溃。雪量达到临界点不过是雪量不断堆积的结果，雪量不断堆积又是超量降雪的必然结果。只要有超量降雪，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迟早会到达临界点。在复杂的因果逻辑之中，这种不可逆的中间过程，只是全部因果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不是事物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积雪上，我们可以把堆积的雪量达到临界点的50%，作为达到临界点的因，也可以把堆积雪量达到临界的25%作为达到50%的因，并且无限细分下去。很显然这样的分析毫无意义，而且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是大量的雪花不断降落在陡峭的山崖上。

釜中的水滚沸的原因，是铁锅下面有火焰不断在燃烧。分析雪崩是为了避免雪崩，减少损失，而不是为了完成完美的论文。同理，分析经济危机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减小经济危机的损失，而不是为了诡辩。当然，多数被稳拿雇用的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的主子诡辩。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防治雪崩和经济危机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仅打

算扬汤止沸，那么把水温降到100℃以下就可以。对应经济危机就是直接消灭掉多余的产能。让生产能力回归到对应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主动压缩产能是很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同行竞争的压力，谁主动压缩自己的利润，谁就会承担更大的损失。当彼此有利的时候，大家合作；当彼此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谁也信不过谁。超载的船上，大家宁可一起坐在船上等着船沉没，也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扔掉自己的行李以减轻船的负荷。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家的数量如此众多，以致不能达成有效的联盟约束每一个资本家。另一方面，坚持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溺水的同伴的行李作为奖赏，而坚持到最后的前提就是拥有足够庞大的资本量，换句话说，要在危机之前的繁荣期获得足够高的产能。那些在繁荣期考虑到总量过剩会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危害而缩手缩脚的资本家，最终将成为同行的猎物。

何况，这样的解决方式只能减少崩溃的混乱，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上失业的痛苦。无论是被动的崩溃，还是主动压缩产能，社会总生产最终都要在某个临界点停下来，然后进入停滞状态，等待下一次复苏期。这个临界点的位置与压缩产能的方式无关，取决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总消费能力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所以，不论用哪种方式，最终都必然有对应的一部分产能被淘汰，对应的一部分工人失去工作。压缩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是很文雅的说法，现实则是血淋淋的。如果崩溃是硬着陆，那么主动压缩产能就是软着陆，不论哪种着陆，都是着陆，都要淘汰一部分生产能力，都要有对应的劳动者失去工作。

硬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强者，强者也可能遇难，但是强者显然比弱者有更多的存活的机会。弱者也有幸免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运气，而这是很罕见的。相比之下，软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则是与着陆规则制订、执行和监督者关系密切的人，至于是否是强者，则不好说。

对资本主义来说，发展生产只是资本积累手段，而不是为了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所以每一次扩大再生产以后都会面临大量产品无人消费的窘境，每次崩溃以后经济在低位徘徊时，都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大量资本被闲置。回避这个基本矛盾，任何挽救措施都终将无效。

为了增加投资，放松贷款利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如果是正利率的话，那么就是企图依靠扩大再生产突破经济危机。问题是，在雪崩的过程中，积雪还能继续增加吗？在产品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会有人扩大再生产吗？那边的汉堡卖不出去，上游已经来催货款，蟹老板还会扩大生产规模吗？实际上蟹老板此时是非常需要贷款的，但是他需要贷款不是扩大生产，而是拆东墙补西墙。

即使他想贷款，银行会给他贷款吗？那边的汉堡已经卖不出去了，继续给他贷款，难道不担心新增的贷款肉包子打狗吗？如果给蟹老板贷款，只能给蟹老板条件

非常苛刻的贷款。比如用蟹老板的房产作抵押，而抵押率非常低。市场价格 100 万的房产，只能给蟹老板 50 万的贷款。实际上，这时银行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半价获得蟹老板的房产。这样的思路和当铺一样，不是靠对方偿还贷款赢利，而是靠死当拍卖抵押物赢利。银行的目标是吞并蟹老板的房产，而不是支持蟹老板过关。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全社会面临生产过剩，产能远远大于消费缺口的情况下，只有政府作为担保的贷款才有充分信誉。暴力是最终分配权，政府是暴力的掌握者，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印钞偿还一切贷款。所以，这些贷款会得到银行的充分支持。这些贷款如果能成为投资需求，全部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并且引起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的话，就可以把问题暂时掩盖过去。如果不能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没有激起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话，那么这些贷款将有去无回。蟹老板的汉堡已经滞销的情况，政府代替蟹老板雇用派大星生产汉堡。如果蟹老板跟进，那么一切都好。如果蟹老板不跟进，政府就要面对一大堆滞销的汉堡。事实上，蟹老板往往不跟进，不跟进的原因我们在后面会分析。

在全社会消费能力远远小于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希望消费能力覆盖新增的产能，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政府出面，财政担保，扩大投资，使用银行贷款修筑各种设施，往往是抱薪救火的行为。如果不触动现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优势，则难免强化贫富分化。无论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结束，如果没有激起跟进的投资潮，都要面临新增产能和消费能力的对比。这时，如果全社会总消费能力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需求的缺口。因为政府制定投资政策，往往不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政府投资结束时，同样会因为消费能力不足，面临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停滞现象。

如果新增的产能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政府投资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将有去无回。一旦产需缺口暴露出来，民间投资将面临不能收回投资的风险，政府投资也必然面临同样的风险。政策性贷款修筑了铁路、公路、机场。这些投资行为，同样需要对应的消费能力。除非这些新增的产能处于优先获得支付的地位，比如为了让新增运输能力获得优先支付，停止其他运输方式，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费用。不过，很显然，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能力在其他方面将更加不足。

如果这些贷款回不来，那么政府可以选择承担损失或不承担损失。这些贷款很多是政策性贷款，用于政府的项目或者政府主导的项目。如果政府不承担损失，把这些项目的所有权交给银行，任由银行拍卖，然后政府袖手旁观，那么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如果损失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便很可能引发恶性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变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诱发新的经济危机。大型商业银行是货币流通的中枢，一旦倒下，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政府承担损失，无非四种方式：敛钱、借钱、印钱和拍卖国有资产。敛钱

就是征税。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用不太穷的人的钱补贴更穷的人，那样的效果显然不如使用最富有的人的钱补贴最穷的人。如果是对财产征收的话，相当于社会顶端支付。在以对商品征税为主的国家，则相当于大部分由社会底层支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富有的人往往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降低自己要承担的赋税。在社会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底层的税收负担，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减少他们的消费。借钱无非是向顶层借，因为底层此时已经没有富裕的钱财了，能借到的前提是支付高昂的利率，否则顶层是不会主动掏钱的。借钱不能一劳永逸，迟早要还债。如果不能用其他方式弄来钱，难免陷入债务危机。许多没有印钞权的国家，最终被债务拖死。印钱似乎是解决方案，后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过程中，底层博弈能力最差，所以吃亏的往往也是他们。如果拍卖国有资产，则无疑相当于把全民的财富给予社会顶层，给他们更大的分配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拿出足够的钱（或贷款）来购买这些资产。这就意味着未来必然酝酿更大的贫富差距。于是问题的解决看似有四种方案，实际只有三种：即征税、印钞和拍卖国有资产。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到的征税，是广义的征税，不仅仅是狭义的税收，也包括政府利用垄断土地、金融、原材料等方式获得的剩余价值。

在产能超过消费能力而导致的雪崩和随后停滞的过程中，政府用扩大产能的方式弥补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也就是在资本过剩、大量资本要被淘汰成为失业的资本的过程中去增加资本。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抱薪救火，看似愚蠢实际上是完全理性的。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投资行为的利润的流向去看这些行为的话，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建筑商和军火商的腰包，就不难看出这是理性的选择。

经济危机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本被淘汰。如果政府不干预，那么是大资本杀掉小资本趁机扩张。如果政府干预，那么有财政支持的资本，显然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来。这是民间资本被淘汰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可以趁机扩张。

这样的贷款投资，难免刺激通胀，增加社会底层的负担。在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注入货币，将刺激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经济规模萎缩，但是必须吃饭，穿衣，取暖，要有能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注入的货币很容易去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煤或油。停滞期的大规模政策性贷款，将导致经济的迅速恶化。用印钞机克服经济危机，制造通货膨胀，是危险的饮鸩止渴。

由于稳拿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操纵政府决策，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增贷款会很快汇聚到少数稳拿手中。他们用这些钱去囤积粮食、能源、土地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直接推动物价上涨。如果物价上涨超过工人（名义工资）上涨，工人的消费能力必然更差。如果原料上涨到1000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还是各自100美元，蟹老板还想获得200美元的利润，那么每个汉堡上升到1.4美元。那么，海

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实际消费能力都下降了。这时，如果原料供应方不相应提高消费能力的话，必然面临更严重的消费不足。整个经济遭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挤压。由于通胀需要一定的时间，贷款偿还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政府投资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看到后果。但是，长期看，则必然暴露出弊端，而且随着政府投资下降，越接近偿还贷款的时期，弊端越明显。

政府用财政支出搞消费行为（比如凯恩斯说的让资本家去挖垃圾坑）是很常见的。不过，政府往往宁愿选择挖垃圾坑，也不愿意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博弈能力和消费水平。不这么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劳动者生活条件改善，就不适合充当廉价劳动力了。不让他们生活艰难，他们怎么能拼命工作？其次，这样做不能为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承包商（日本的建筑商、美国的军火商等）提供丰厚的利润。相反，住房、医疗教育都是社会底层不得不承担的负担，蕴含着大量的利润，政府的介入必然会触动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贫民窟中有银山，如果解决了贫民的住房问题就榨不出银山了。除了象征性地给社会最底层一张画饼，免得他们造反以外，政府是没有兴趣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由大资本家控制的政府，一举一动都是以谋求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不触动社会顶层的既得利益为前提，必然不能解决底层的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政府往往宁愿挖垃圾坑，也不愿意增强社会底层的博弈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恩格斯说过，个别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必然不愿意做。

让开水不再沸腾，要抽掉锅底的柴火。消除危机的影响，或者减轻危机的伤害，应该控制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具体来说，就是控制贫富差距的水平。

对个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将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悬殊，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反之，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接近，全社会总消费能力越高。对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极限，他们所有的收入往往仅能用于维持生活，有时还要负债累累。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能力与他们的收入的比值等于甚至大于1。相反，高收入阶层则岁月有余粮，不仅有余粮还可以利用余粮投资。年收入从1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消费能力会提高很多，但是往往不会提高10倍。

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广大中、低收入者在与高收入者对手的市场博弈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贫富差距越大，中、低收入者人数总量越大，收入水平越低，他们越紧迫地需要工作糊口，他们除了廉价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选择越少。如果承认“强者恒强”这个基本规律的话，那么就应该知道贫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高收入者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或者说，社会贫富差距越悬殊，低收入者的工资越低，高收入者越便于提高利润率。

允许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刺激个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可以使优秀的生产组织者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勤奋的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享受更舒适的生活。但是，也应该看到，贫富差距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勤奋和优秀，更多时候往往是暴力和欺诈。“人无外财不富”这句话，虽然不像马克思的“原始积累”那么直白，但是也说明勤劳和优秀对致富的作用远远不如“外财”。暴力和欺诈获得足够的财富以后，确立了优势的经济地位，勤奋和优秀者便难以获得足够的回报。鼓吹贫富差距的人，往往是拥有暴力而善于欺诈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发家史讳莫如深，却喜欢自吹自擂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他们的存在，勤奋和优秀者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投靠他们，受他们剥削，或者被排挤出经济循环。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刺激生产率的作用也消失了。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个人生产效率高低与获得大饼份额的多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比如，土地、金融和暴力都可以分得极大的份额。这种贫富差距，对刺激生产力发展没有一点益处。一定范围内允许由于生产效率不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放纵过高的贫富差距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况这种过高的贫富差距的起因往往与生产效率无关。

资本主义的过剩永远是相对的过剩，任何一种分配中的相对优势扩大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就必然出现总产品相对的过剩。马克思讲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多数人民的贫困，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社会化的消费，只要存在多数人的贫困，必然出现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实现困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出现大量资本被淘汰的现象。这是少数人聚敛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必然结果，是广泛而普遍的贫穷对狭隘而特殊的富有的反击，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的宿命。物不患少而患不均，在封建社会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本章小结

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让资本家发财，生产过程是资本自我保值、增值的副产品，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

资本家生产追求利润，然而在封闭的经济体内，或者说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体内，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能力的利润无法实现，是这一章探讨的重点。

资本家生产 1200 美元的产品，理论上可以获得 200 美元的利润，自身消费 100 美元，还有 100 美元的利润不打算用于自身消费。那么这 100 美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理论上 200 美元的利润不能全部实现，其中 100 美元的产品根本没有销路。

资本家处理这样的困难的第一种方式是压缩生产规模到原先一半，既然资本家

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就以100美元的利润为上限，只生产600美元的产品，裁减掉一半的工人。这时，整个社会经济进入停滞期，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卖得出去，但是必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资本家消费的利润固定的条件下，工人工资越低，消费越低，需要的工人越少。那些多余的工人就成为社会不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怎么要求更低的工资，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即使他们能找到，也不过是顶替原有工人的职位。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就业总量并不增加，甚至下降。单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资产阶级消费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工资越低，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就业量越少。所谓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雇用量越高的现象，在压缩产能的停滞期并不成立。这时，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找到工作，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一些人成为社会渣滓，一些成为资本的炮灰，一些移民海外寻找新大陆。只要他们不威胁资本的统治，资本乐于看到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能成为资本扩张的排头兵，则更是对资本有利的事情。

资本还可以把剩余产品用于生产积累。积累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发展的根源。短期内压缩一部分消费品生产，把节约出来的产能用于生产劳动工具。制成劳动工具以后，可以获得更大的产能。比如原始人减少一部分打猎活动，抽出时间生产弓箭，制成弓箭以后，可以更高效地打猎。

积累意味两件事：第一，需要一部分剩余产品；第二，积累完成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带来更多的产品。积累是扩大生产力的必要方式，积累的结果是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资本的增值，资本家显然不会在积累结束后，主动提高工人的待遇到能够完全消费所有消费品的水平。对资本主义来说，积累可以使目前没有销路的产品获得销路，缓解目前的消费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来生产能力增强以后，整个社会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一个国家发展迅猛，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积累率非常高。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其他国家需要用较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缺口非常大。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在追赶过程中不断下调积累率，就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的难题。

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他可以把剩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资本积累，用于增雇工人或者用于购置新设备。不论哪种方式，都可以有效缓解眼下的产能过剩并扩大产能，但都不可能永远持续，过程将被打断，以致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在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中，资本家利润越丰厚，积累效率越高，产能扩张越迅猛，越容易被打断，最终缺口也越大。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在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

遇到瓶颈，甚至引发通货膨胀。这时，资本家不再追求货币而是追求实物和产权，至此，社会化大生产其实已经崩溃了。

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整个社会将进入大崩溃时期。这时，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将暴露出来。首先进行降价促销的资本家将优先出售自己的产品，坚持价格不变的资本家将承担所有的损失。在这样的压力下，所有资本家如同战场溃败一方纷纷进行减价促销。整个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迅速下降，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前夜，也是扩大再生产扩张到极限的时候，此时资本家的产能和工人工资水平都扩张到极限。资本家盘算着新增产能带来的利润，工人计划购买一些平时舍不得购买的产品，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整个经济陷入崩溃。产品没有销路，工人没有工作，资本家亏本促销，一片狼藉。

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缺口暴露，扩大再生产不可能不被打断，一旦被打断，生产和消费能力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就要来临。经济危机一共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前者都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只要前者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后者就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源。

理论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全民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完全不同。在不扩大产能的简单再生产循环期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以为每一个愿意劳动的人提供工作岗位为标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则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要。在扩大产能的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当扩大再生产完成以后，应该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值，于是扩大再生产以后，便出现了大量产能和消费能力无法匹配的情况。

什么是人民的需要？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回答。苏联国力鼎盛时期，红军的军事实力不亚于美军，但是苏联人民却要为买蔬菜、面包、肉类和罐头等排长队。苏联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广袤的国土，却不能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住房。毫无疑问，保卫祖国和享受幸福的生活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保卫祖国便不能享受幸福生活，享受幸福生活是保卫祖国的目的。但是，如果全国上下为了增强军事实力而服务，显然有违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初衷。

对一些苏联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是健康向上，国力是不断增强的，是可以与美国争霸的。但是，对多数苏联人民来说，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他们的意愿就有待商榷了。尽管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下，他们会隐瞒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让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水平。随着他被撵下台，这方面的改革最终不了了之。

我们需要注意，评价经济现象有不同的标准，这与各个阶级的切身利益有关。对工人来讲，最好的经济现象自然是物价稳定，工资尽量高，失业尽量低。但是对资本家来讲，则是利润总量尽量高。所以，工人要求实现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低通胀，而资本家要实现的目标是他们掌握的稀缺资源能获得最充分利用的价值（也就是资本能在总产品中获得最大的份额）。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通胀和失业，都是可以不考虑的（实际上通胀对控制垄断资源的资本家来说是发财的机会）。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之间，对苏联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差异。

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不能消费的部分。定量分析都与利润率有关。具体到经济危机，假设资本家消费能力固定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利润率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越大。资本家消费能力相同，他的利润越高，意味着他的收入越多，收入高，消费能力一样，自然消费不掉的东西多，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大。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家利润高，也意味着工人收入越低，资本积累快，产能增加快。利润率越高，产能积累越快，消费能力越差。

利润率越高，谷底越深。无论崩溃还是不崩溃，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人类社会不会因为一场经济危机退回到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大崩溃也不会一直到底，经济危机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封建社会，这是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大崩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呢？社会总生产水平最终会回到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时，生产循环以资本家的消费总量为依据。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终的有效需求，只能由蟹老板和地主珊迪提供，而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等工人的消费由资本家的消费衍生出来。资本家利润率越高，所以工人消费越低，衍生出来的消费总量越少，社会总生产规模越小，被淘汰的产能越多。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有三个：劳资双方数量对比、双方选择余地和双方对成交的迫切程度。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劳方越不利：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中，劳方数量众多，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其他选择，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哪怕是非常苛刻的条件。所以，利润率越高，遭受经济危机越严重的结论，可以推论到贫富差距越大，遭遇经济危机越严重。贫富差距越大，利润率越高，消费倾向越差。

贫富差距越大，越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贫富差距大，未必发展速度快，因为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之间分配。我们并不能确定剩余价值一定用于产业资本积累，而不是买空卖空、炒地皮或者资本转移。虽然金融资本家、地主、官僚和黑社会头子不能发展生产，但是他们的贪婪能实实在在地抑制消费，制约产业资本的发展。用贫富差距大有利于发展生产为理由，为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垄断过多的财富的话，生产力不但不会发展，反而会倒退。

经济学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各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反过来，各个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解释问题的各种方法。

现在，我们不妨重新回顾“资本的危机”那一章中所提到的对经济危机种种解释和手段。

首先是萨伊说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家能做好一切，所以不会有经济危机，更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本书已经多次指出，萨伊的说法是完全不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事实。萨伊直接否认经济危机，只要生产就肯定能卖得出去，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工资太高。他完全忽视资本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对应积累部分的新增产能没有消费能力，也完全否认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是创造可以实现的剩余价值——如果产品没有销路，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用。萨伊彻底否认经济危机，所以也根本没有方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有效论。本书反复强调，市场有效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一群人同时出地铁站，他们来到地铁站出口，他们可以选择电梯，也可以选择楼梯。但是，他们的选择都是出站。或者说楼梯和电梯都是在出站大前提下的选择。相反，此时选择在出站口进站的人，不论是选择电梯还是下楼梯，都被滚滚人流挡住去路而寸步难行。市场的自由选择如同赛跑，可以选择徒步，可以选择自行车，可以选择飞机火箭，但是所有人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扩大生产，集体奔向产能过剩的悬崖。在大家都出站的时候，跑得最快的人，最先出站，大家争先恐后向前拥。反过来，任何试图违背人群流向的人，必然被滚滚人流阻拦，甚至被吞没并被踩在脚下。

市场中，人们能自由选择出站的方式，但是并不能自由选择进站或出站。人流滚滚，楼梯拥挤不堪，电梯闲置是难以想象的，除非电梯只有 VIP 有资格乘坐。但是，所有的人只能随大流，或者说顺应社会资本的大流向。违逆社会资本大流向（比如在复苏期不扩产，在崩溃期不降价）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会被同行吞噬并破产。

马尔萨斯神父的方案是提高地主、僧侣和官僚的待遇，让他们扩大消费，然后把多余的劳动力送进集中营。应该承认，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把这些不义之财挥霍掉的话，这个方案确实能缩小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过，按照这个方案实行的话，全社会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都将成为马神父的奴隶，全社会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生产。此外，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没有扩大消费，而是把聚敛来的钱财存在手里放高利贷或者炒地皮，或者转移给自己海外亲属的话，社会同样将面临消

费不足的问题，即增长期的崩溃和停滞期的高失业。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往往是势单力薄的中、小资本家，而不是财大气粗的大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贪婪没有限度，所以往往对中小资本家提出超过其承受能力的要求。如果中小资本家即使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给他们，还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么中小资本家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必然增加工人失业。相反，对拥有强大财力的大资本家，地主、僧侣和官僚则往往采取结盟的方式和巴结的态度实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些大资本控制的大批利润却往往是消费不足的主要罪魁祸首。

资本家扩大生产需要增加雇用工人，地主、僧侣和官僚除了仆役、舞伎和警卫，对其他劳动者没有任何兴趣。资本家的聚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地主、僧侣和官僚的聚敛除了贪婪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抑制社会进步，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他们的贪婪同样能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一个非常自私而贪婪的方案，马神父这样的人是纯粹的寄生虫。

不过，随着国家介入经济导致的官僚势力的复苏，马神父的思想正在凯恩斯的外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着或多或少的实践。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与该国政治的混乱程度正相关。另外，在这些国家，虽然没有集中营，但是有贫民窟，比如巴西的上帝之城和印度的贫民窟。这种集中营并不强制居民自由，只要充分利用贫民窟中居民不利的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其在教育、社会资源等等方面的劣势，便可以达到把这些社会不需要的人局限在里面的目的：贫民窟里的人，即使出去，也找不到工作。贫民窟是没有墙的集中营。

西斯·蒙蒂提出总量过剩说，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消费掉的商品占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比重都会上升——如果我们承认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话。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小资本独立经营铁路公司、机场、连锁超市或者重化工厂。小资本独立经营一些小规模的零售服务业还可以，大规模经营现代工业则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小资本可以通过结盟或者股份公司的方式结合成大资本，但是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平均社会资本的收入，而仅仅是为这些大资本中的领袖资本提供廉价的社会资本和超量的剩余价值。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社会来说，有没有药方并不是很重要。没有药方也可以，因为经济很快就会自己复苏。每次经济危机过后不久，经济就会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期。

资本主义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对小资本屠杀的过程，每次幸存下来的资本，在复苏期都能蓬勃发展。这个过程如同自然界的进化，每次幸存下来的动物都是最强健的，起码是运气超好的。每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生产效率高、规模大的企业获得他们同行的市场和资源。

“我会回来的!”这是终结者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可以这么说，它一

定会回来的。它每次来回，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周期。需要注意的是，每次经济危机都愈加猛烈，间隔愈加短暂。这样的趋势，最终必然孕育着变化。

资本主义最终从自由竞争进化到垄断阶段，就没有周期了，不是经济危机不回来了，而是它根本不走了。

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之间的丛林法则的话，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生产力的自我进化过程。进化包括两部分：超量繁殖和自然选择。复苏期超量繁殖的时期，经济危机则是物竞天择的时期。这样的过程，在自然界最终必然进化出霸王龙。一旦出现霸王龙，整个进化过程就停滞了。这时，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很难有大变化。如果没有7000万年前白垩纪那颗小行星，今天的地球仍然是霸王龙垄断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那颗小行星以及其他天外灾难（冰河期，剧烈火山活动，太阳黑子活动异常等等），是生物进化必不可少的补丁。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没有这样的补丁。在大崩溃之中，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被淘汰掉，生产参与者数量下降，生产组织进一步集中化，利润集中到少数企业手中。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自然界迟早会出现霸王龙，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超级垄断企业也是迟早的事情。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稳定。这时，如何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遭遇最大的经济危机，而且迟迟不能复苏。在庞大的失业大军和苏联模式的压力下，个体资本家也许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群体意识出现了危机感。

凯恩斯主义通俗地说就是由政府印钱创造需求，用政府的财政赤字把多余的产能消费掉或者浪费掉，填补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既然总产能大于消费能力，导致有人失业，不妨由政府消费这些产品。反正政府有印钞机，需要多少钱都可以印出来。资本家不是没利润不生产、不雇用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

政府创造的需求，会衍生出大量的额外需求，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或者说是所谓的抽水机效应。在蟹堡王的模型中，地主和资本家100美元的最终消费，全社会需要增加600美元的生产规模。这个生产规模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反相关。社会平均利润率越高，创造同样的剩余价值需要的劳动力越少，需要启动的生产规模越小，政府刺激经济效果越差。反之，这个生产规模越大，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好。社会平均利润率与社会贫富差距正相关。也就是说，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与社会贫富差距直接正相关。同样数量的政府财政政策，在贫富差距小的国家也许能创造5、6个就业岗位，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也许只能创造3、4个就业岗位。

凯恩斯主义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端：

如果政府用赤字刺激经济以后，生产规模不扩大，保持在全国充分就业的状态。如果赤字放任不管，那么迟早造成财政危机。如果政府靠税收平衡赤字，那

么，谁提供税收？资本家还是工人？如果是工人的话，那不是孕育新的消费不足吗？如果是资本家的话，资本家能答应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资本的委员会。资本家们能对自己的财产下狠手吗？如果开动印钞机，用通胀弥补赤字的话，必然出现通胀。那么，谁承担成本？工人还是资本家？通胀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底层往往最吃亏。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把钱直接发到穷人手中的话，这些财政开支必然经过雁过拔毛的过程。

由于官僚谋取私利，投入的往往是逐利性行业，这些行业资本本身也会做的，如果资本不做，那么只能说明这些行业没有盈利的前景。国家投资进入某些盈利性行业以后，直接排挤民间资本。这时，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率有时甚至高于纯市场竞争的状态。这样，必然制造新的需求不足。

国家投资也可以进入非盈利性行业。比如，凯恩斯所说的挖垃圾坑、修建金字塔等等。以刺激经济的名义，人为制造一些挥霍浪费的工程。这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挥霍浪费，一方面对老百姓基本、必要的福利却视而不见。因为满足老百姓这些基本的需求，往往触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的蛋糕。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中则由于官僚和资本家私利的存在，往往成为经济毒药。

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不采用财政政策，而是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让民间资本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增加投资，盈亏由民间资本自行承担。提出这样方案的人，显然低估了资本家的智商。在已经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家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扩产吗？生产一个，滞销一个。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的压力，这时生产成本再低，资本家也不会扩张。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但是，资本家显然会考虑利用廉价的资金，使自己的资本增值。生产不能扩张，并不意味着不能囤积。这样的货币政策最终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

如果贷款给工人，同样面临类似的困难。鼓励工人借贷消费，如果币值稳定的话，无疑会削弱他们未来的消费能力。短期看消费能力增长了，长期看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

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行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极力鼓吹宽松货币政策的人，比如银行资本家，往往也是投机行为最大的获益人。

从缓解经济危机的角度看，一切方案的最终考量标准，就是这个方案是扩大还是减少了贫富差距。如果我们用雪崩作比喻的话，降低社会的利润率、提高工人的待遇如同减少雪量和坡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不改变分配结构，都是无效的政策，如果不触动分配模式，不改变贫富差距的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困境。问题可能被暂时掩盖，但是必然面临更大危机的爆发。

弗里德曼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提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是副作用大于疗效，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隐瞒了一个前提，就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阶级

利益使然，往往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必然是安慰剂，甚至是毒药。

我们再看历史上的国家怎么处理那次大危机。这里分析两个典型的例子：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

希特勒使用了三种解决方式：政府赤字扩张军备修建基础设施；对外扩张；剥夺犹太人的财产。

希特勒上台就开始大规模修高速公路，作为战备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需要有从东西两线高度机动调动战争资源的能力。这个过程中，52000 人从事施工，10 万人从事辅助工作。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迅速扩张军备，大批工人进入兵工厂或者为国防工业服务的上下游的二级甚至三级企业。

用财政赤字迅速恢复了德国的产能，证明当时德国的困境并不是资源制约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是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这样的政府行为，如同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带来大量赤字，有严重的通胀或者财政破产的压力。对希特勒来说，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灭亡的前因后果，为了保住第三帝国严重的通胀决不能发生。

希特勒的第一个解决方式，一个是采取定量供应，有钱买不到商品，避免了钱多多买，货币追捧商品的现象。《柏林日记》里面多次提到当时德国人生活物资凭票供应，非常紧缺。一方面是政府把大量产能用于军事工业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避免通胀的手段。

他的第二个解决方式是对外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同时刺激本国民间新增对外投资。他在自传中提出，苏联的人均土地是纳粹德国的 18 倍，这合理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要消灭落后的斯拉夫人，如同美国人消灭苏族人（印第安人）。类似的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先进的日本民族却只有匮乏的资源，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我们是先进的人种，却只有有限的空间，落后、低能的人种却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合理吗？自然界优胜劣汰，人类也应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了人类文明淘汰落后的人种，净化人类的血统（纳粹的人种灭绝理论），或者成为未启蒙民族的领导（日本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认为是对亚洲经济提携的理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潜台词就是侵略、人种灭绝和殖民统治。

战争给社会底层重新当小农的机会，给顶层丰厚的订单，一切成本都由被侵略国家买单。但是，打输了就是打错了算盘，结果自己成了最大的买单人。如果打赢了会怎么样？德国还会面临市场不够的问题，直到吞并全世界。即使全世界都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仍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

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首先开始于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和屠杀——消灭有钱的犹太人。这样的做法，如果抛开正义与良知的话，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贫富

差距，增加财政收入，减低印钞机的转速。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好处的是纳粹官僚，比如戈林，或者是瑞士银行。在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方面意义不大，主要表现是纳粹官僚取代犹太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电影《阴谋》和《黑皮书》都或多或少的表现了这一点。如果纳粹运动成功的话，在纳粹运动中，获得最大好处的绝不是冲锋在前的纳粹士兵，而是纳粹的高级官僚。希特勒只触动原有分配模式中涉及犹太人的部分，而不愿意触动其他的部分。

相比纳粹德国，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相对平和的方案，也是扩张卢瑟的经济权利，提高卢瑟经济地位的方案。反过来，也是“红烧百万富翁”的方案。从短期看，效果显然不如纳粹的方案简单直接，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触动很大，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类似纳粹剥夺犹太人或者武装扩张的好处，而且要他们出血。所以，推行这样的方案，社会阻力必然很大，但是最终奠定了美国社会改良的基础。抛开道义不说，仅仅看经济循环，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方案。如果考虑到道义等社会作用，则意义更加重大。

资本将在三个方向扩张，空间时间和自我吞噬，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从这一章的模型看，资本主义进入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开始，也意味着崩溃的开始。那么资本主义如何能维持两三百年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就不能让人信服。

第5章

垄断帝国

垄断资本主义

春去春回来：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

美恶相饰，命曰復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

——《鹖冠子》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每次经济危机都不会持续很久。

每次经济大崩溃发生以后，并不会一跌到底。毕竟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和官僚还是消费的，而且他们也有支付能力。这时社会经济进入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规模由这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底层的需求。这就如同满足奴隶主的需求，就要养活奴隶一样。

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遥远，资本主义幼年的时候，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冬天不会持续很久。否则，资本主义就是僵死的资本主义了。这样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统治全球。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整体发展仍然是在螺旋中不断前进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远远强于两三百年前。

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既然劳动者没有多余的支付能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有限，为什么资本主义还会一次次不断冲击生产极限？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诱使资本家们扩大生产规模？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前面的论述就是有问题的。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设备的更新，是资本家在简单再生产环境中，扩大产能的根本原因。每台设备都有使用寿命，在使用寿命接近完结的时候，资本家就需要更新设备。如果全社会的更新集中在某些年份，那么这些年份就会有与其他年份不同的需求量，这些年份的社会总需求会远远大于其他年份。这些年份，就是复苏的年份。

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如他的观察。每一轮设备更新，都是一个新经济周期的开始。每轮更新接近结束的时候，新产能被释放出来，就是新一轮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每一轮的更新，就预示每一轮的毁灭。

与马克思类似，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创新。只要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有不断发展的动力。首先实行创新的资本家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当其他资本家开始纷纷效仿的时候，额外利润消失。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创新点。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

在他看来，创新有三个周期，分别对应制成品存货，固定资产更新（厂房和设备）和大规模技术更新。周期分别是1～2年，8～10年和50～60年。顺便说一句，熊彼特提到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在他看来三个周期循环不断叠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

这个过程如同潮汐。月球、太阳的引力互相作用，互相叠加。大经济周期套小经济周期，大周期的繁荣期可能伴随小周期的衰退，大周期衰退和萧条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补充存货出现小阳春。如果三者叠加都是繁荣期的话，那就是喜剧中的喜剧。反过来，如果三者都是衰退期的话，那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熊彼特看来，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淘汰之后，竞争对手减少，利润率上升。这时，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有利可图的时候，便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开始新一轮创新和毁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毁灭和创造是同源的。创造意味着毁灭，毁灭意味着新的创造。

如果认为创新就一定会导致过剩，那么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创新都会以悲剧收场？既然资本家知道更新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恰当的位置上？比如说，在蟹堡王的模型中，既然知道最终只有200个汉堡有稳定的销路，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1200个汉堡的水平。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周期最终一定会以雪崩收场。

有更新的可能，未必一定会去超量更新。这时，还需要一点超量更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竞争的压力。在竞争的压力下，所有人都必须随波逐流。违背大潮流的人，必然是死得最惨的人。

大家都去抢购的时候，不去抢购的人就要面临买不到东西的风险。谁不抢购谁倒霉，大家一起抢购，大家一起倒霉。战场上，大家都蜂拥而上的时候，谁跑在后面，谁就抢不到战利品。反过来，大家一哄而散的时候，谁坚持死战，谁就成为烈士。——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扭过头却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溃败了，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逃跑，而且要跑在跑得最快的士卒的前面。任何试图逆向滚滚人流的人，都将被人流冲倒并踩死。

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家同行之间是冤家，所以不存在彼此协作的关系，更

多的往往是彼此的尔虞我诈。

有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资本家盲目扩张产能，资本家在投产的时候，并不能准确预期最终的市场，所以往往产量过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好，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和随后的大规模淘汰行为，这样的观点显然忽视了资本家之间彼此斗争的关系。如果是信息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市场需求，或者说，有可能生产过剩，也可能生产不足。两者的比例关系，应该接近1:1。现实经济中，很显然，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生产过剩，而不是周期性生产不足。换句话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这是不能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的。

有人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经济危机，就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市场万能辩护，或者说，为资本万能辩护。

有人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归结为心理作用，归结为“盲目的从众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论”。这个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是盲目从众的，如同羊群中的绵羊，盲目地跟随头羊。实际上，这种解释如果成立的话，市场的有效性就彻底不存在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和盲从的，那么市场的行为就取决于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头羊。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取决于头羊的行动。很显然，我们不能证明头羊的行动是完美精确和自我完善的。

表面上，羊群理论是为市场的非理性行为辩解——市场是有效的。实际上，这样的理论不但彻底否定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智商，更否定了市场有效。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市场行为如同地铁站出站，人们可以选择坐电梯，或者走楼梯，但是却不能选择原地不动。类似的还有电影院进场或散场，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入口进场或退场，却不能与滚滚的人流对抗。这样的情况下，理智的行为是选择人少清静的出入口，尽快走在滚滚人流的前面，尽快找到自己的座位，或者尽快离开电影院。这就如同在繁荣期选择利润率尽量高、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在衰退期选择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保持生产规模，或者套现一部分产品，维持现有生产循环。

比如市场中的抢购行为。一般情况下，在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不容易发生抢购行为。但是，如果因为谣言或者特殊事件等原因，造成了某些人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其他人必然追随，否则就要吃亏。一旦这些人达到一定的临界数量，那么就会形成潮流。不追随的人就要成为牺牲品。反过来，一旦大家都认识到这点，那么就更容易形成这样的潮流。或者说，这个临界的数量更低。

市场上的某种生活用品本来供应充分，这时候突然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一部分人抢购、囤积。当抢购者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人必然不得不加入抢购的队伍。如果他们不加入，他们便要面临买不到的风险。这种行为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

凯恩斯所说的“猜别人选美”。在选美比赛前，大家纷纷对选美结果下注，选对的人有重奖。这时，大家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而是揣测其他人认为的最美丽的女子。这时，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位美人最符合多数人的审美观，那么这位美人就会当选。实际上，这位美女很可能在多数人眼中只是比较折中的美女。大家的预期产生结果，结果又推动预期，于是预期与结果不断互相作用，不断加强。比如中东发生冲突，按照以往的经验：中东冲突，石油会涨钱，连带黄金会涨价。于是，大家都认为黄金会涨价，那么黄金就会涨价。不仅如此，这样的涨价现象，还会自我加强。

但是，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的变化，这种涨价并不是稳定的，如果这种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打击，需求能力没有大幅度提高，那么大家就会预期到因为前期的抢购，所以下一时间段相对的生产能力——某种生活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如果这时货币供应基本稳定，没有大量的游离的投机资金，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这时，抢购某种商品的浪潮就会过去，于是马上就会出现报复性下跌。同理，中东战争如果不能对石油生产和运输能力造成实质性破坏，而美元供应没有稳定上涨的话，黄金的涨价就不是稳定的。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每次中东爆发冲突，黄金就会暴涨，稍微稳定下来，黄金又会暴跌。要改变这种局面，除非石油的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美元供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以股市为例子，股市的波动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这种波动是难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单向、稳定、大幅度的运动，必然对应于大批资金的流出或流入。

羊群的头羊并不是稳定的。并不是唯某人马首是瞻。除非此人拥有超过一般的声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因为对此人的信服，还是对此人资本总量的信服。如果此人的资本量能够达到足以操纵市场的程度，他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大家对此人的信服更多的是建立在他的资本量充足的基础上，或者说，稳定的声望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量作为物质基础——这就如同社会中的领袖需要暴力作基础一样。

心理上的反应需要基本面的支撑。心理预期要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挥稳定的作用，心理预期能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但是彼此的决定关系却是不可质疑的。只要物质基础不能稳定存在，心理预期的作用就难以稳定存在。谣言或突发事件只是雪崩过程中的枪声。能不能一泻千里，还要看雪崩之前雪量的堆积程度和斜坡的倾斜程度。

心理反应没有任何规律性，是不稳定而且不能持续长久的。相反，物质基础的变化则是稳定、可测量和持久的。强调心理反应，只是掩盖物质基础决定心理反应的作用。所以，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产能的过剩，不是盲目的恐慌和羊群效应。推动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是信心，而是竞争的压力。

回到经济周期的分析。在经历过一轮低价倾销后，在存货快要耗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市场。这时，供货商的支付压力已经不存在了，一部分供货商已经破产。甲经销商预期到供货商有可能会提高供货价格，就会提前下手，不仅如此，还会适当增加订货量——既在涨价前买到相对廉价的产品，也可以挤压对手。如果乙经销商预期到甲经销商会这么干，他会怎么选择呢？他会比甲经销商更早一点下手。如果所有的经销商都这样预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提前下手，而且都适当增加订货。那么供应商会如何选择呢？他会提前增加产能，并且适当提高价格。于是，其他供货商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这就是小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1933 年 3 月 4 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他迅速推行新政。从 4 ~ 7 月，美国经济迅速蹿升。大批投资者认为经济会迅速回升，像原先经历过的所有经济危机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经过 4 年的大危机，多数资本家手中基本没有存货，生产规模也压缩到最低。于是，企业大批增加订单，增加雇员。投机者也纷纷出手，纷纷涌入股票和商品市场。好景不长，到 7 月底，股市和商品市场迅速回落。没有彻底改变分配结构，也没有新兴技术投入，仅仅靠存货耗尽刺激的经济复苏注定是小阳春，是很难持久的。

当一种新技术被投入使用的时候，或者一种新的销售模式被探索出来的时候，资本家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采用或者不采用。如果采用，他们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同时也必然提高总产能。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历史上的新式纺纱机，一个工人可以完成原先几十个工人的劳动。这时，纺织厂主就面临一个选择：采用或者不采用。再比如超级市场敞开式销售，减少售货员，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量可以超过若干家杂货铺，单位产品需要的各种费用更少。这时，销售商就要考虑采用或者不采用。一种新技术产生的时候，资本家往往优先采用，同时尽量向同行保守机密。但是这样的机密往往保持不了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更新自己的设备。这就是中、长期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扩张产能的。因为他们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何况，即使他们不采用，对手也会采用，夺走他们的市场。

新兴的潜在市场的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总产能是不足的，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又几乎是无穷的。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越大，需要的总资本量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却越低。或者说，同样的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可以买得越便宜，或者利润越高。

由于这两点存在，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内在扩大产能的冲动。如果他们扩大产能，竞争对手没有扩大，那么损失就是对方的。如果他们没有扩大产能，而对手扩

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自己的。如果所有人都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资本量小、生产规模小的小资本阶层在这样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下，每个囚徒都选择招供，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生产过剩。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在这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就意味着最终的过剩。每次经济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次经济周期的起点。于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反复看到喜剧和悲剧的交替上演。

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竞争性的损人利己的利益关系，所以，无论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在这种互相竞争关系的作用下，“超量生产—超量产能被毁灭—再次超量生产—产能再次被毁灭”的经济循环，就成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马克思晚年曾经预言这种周期性的危机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范围会越来越广，杀伤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危机最终消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黑死病并不是自动痊愈了，而是进化了。

要说明这种进化的来龙去脉，还要从经济危机过程说起。

你死我活：资本的内部兼并

每一种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努力增加；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斗争，而大量毁灭。当我们想到此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坚强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战争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

——《物种起源》

在上一章节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几何级数的扩大再生产很快就会冲击各种资源的瓶颈。类似的情况在自然界中也是存在的。

如果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只生二粒种子，它们的幼株翌年也只生二粒种子，这样下去，20 年后就会有 100 万株这种植物了；然而实际上并没有生殖力这样低的植物。象在一切既知的动物中被看做是生殖最慢的动物，我曾尽力去计算它在自然增加方面最小的可能速率；可以最稳定地假定，它在 30 岁开始生育，一直生育到 90 岁，在这一时期中共生 6 只小象，并且它能活到 100 岁；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在 740～750 年以后，就应该有近 1900 万只象生存着；并且它们都是从第一对象传下来的。

这种疯狂的增长的趋势，很快就会使某一物种的后代挤满地球。

这种现象显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生物虽然有超量繁殖的能力，同时也要面临残酷的生存斗争。斗争来自三个方面：与自然界无机环境的斗争；与异类生物的斗争（种间斗争）；与同类生物的斗争（种内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绝大多数的后裔都将被消灭，成为失败者，极个别幸运儿幸存下来，成为成功者，失败者将成为成功者的食物。

切勿忘记每一个生物都在极度努力增加数目；切勿忘记每一种生物在生命的某一时期，依靠斗争才能生活；切勿忘记在每一世代中或在间隔周期中，大的毁灭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于幼者或老者，抑制作用只要减轻，毁灭作用只要稍许缓和，这种物种的数目几乎立刻就会大大增加起来。

某一种动物繁殖能力（比如大熊猫）不强，无非是给予自己消耗同样自然资源的动物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种麻雀一窝只产一个蛋的话，很显然很快会被一窝能产四五只蛋的麻雀淘汰掉。

因为同属的物种通常在习性和体质方面，并且永远在构造方面是很相似的（虽然不是绝对如此），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要比异属的物种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达尔文以俄国的亚洲蟑螂和澳洲的蜜蜂为例，介绍了同一种物种内部，一个亚种取代另一个亚种。这种取代是时刻可能存在和发生的，但是成功的具体原因却是不明的——也许是某一亚种相对他的同类种繁殖能力更强，捕食能力更强，或者仅仅是抗病能力更强而已。我们不能确定哪种微小的差异是这一亚种更受大自然垂青的原因，但是我们能确定同类生物的亚种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这一微小的差异必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将不断遗传下去。

回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如同自然界，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竞争。

自然界中一个物种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那些不能把自己的基因广泛传播下去的物种，迟早会灭绝——或者因为被其他物种消灭，或者因为自身繁殖能力差，逐渐自行绝育。若干万年后，它们的化石会告诉后来的生物，它们曾经存在过，但是消亡了。

对于资本来说，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快增值，尽量多地获得剩余价值。那些不能尽快增值的资本，很快会因为自身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资本增值慢而被同行消灭或主动退出市场。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就会发现有多少我们曾经熟悉的品牌，现在不见踪影了，我们只有在看怀旧影片的时候，才能偶然记起。

这些产品消亡了，但并不是说我们买不到类似的产品了。以方便面为例，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品牌的方便面，最终只剩下两三个大品牌和十来个小品牌。方便面竞争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买不到方便面了，而是买不到多数品牌的方便面了。换句话说，方便面这块市场还是存在，不过被两三个强者和十来个准强者瓜分了。其他没有能够加入这个幸运的队伍的厂商，成为了灭亡的物种，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出

现——如同史前化石。

这就是同行之间竞争的结果，如同自然界的种内斗争。

每一个资本家都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怎么让自己的资本尽快增值。他可能增加产品的品质以质取胜，也可能降低产品的品质以量获胜；可能采用血汗工厂模式，也可能提高工人待遇以此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可能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快流水线速度，也可能采取计件工资让工人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可能雇用凶狠的有黑道背景的工头，也可能和工人之间建立日本企业那种表面上亲如一家的关系；可能四处投资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可能坚持“生途莫入，熟途莫丢”的原则坚持做一个行业；可能不断采取新技术，也可能对成熟技术情有独钟；可能四处拓展市场，也可能深化目前占有的市场……这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过程。

有万类霜天竞自由，就会有自然选择。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检验资本家是否成功担任资本代理人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尽快使自己的资本增值。不论他采取什么原则，什么经营理念，最根本不变的就是挣钱，所有的原则和经营理念，都是为了挣钱而服务的。如果他不能以市场平均利润率增值自己的资本，那么他的资本就将成为同行的猎物，他的市场份额就将被同行所占有。

自然界中的冬季，大批生物都将死去，只有极少数才能活下来。对动物来说，最强壮的未必能在冬季幸免，但是老弱病残绝对熬不过冬天。冬季加速了自然选择的过程。对于资本来说，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滞销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加速资本内部选择的过程。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只有一部分资本家的产品能够获得实现，只有一部分资本能活下来。与此对应，许多资本家的投资将有去无回，最终丧失资本的功能，这些资本家将破产，从此退出资本代理人的圈子。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的智商和运气处于类似的水平，或者说我们忽略资本家的智力和运气这两个参考因素的话，我们会发现资本搏杀中，资本量将是决定性的因素。抛开大资本相对小资本的博弈优势不说，大资本还拥有若干其他优势。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往往决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在达到一个最低生产规模前，生产的成本是远远高于销售价格的。制造一个模具所消耗的劳动力，可能远远高于单独生产若干产品的劳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的话，制造模具生产产品，就不如直接制造产品。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刷的过程，单独印刷几本书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印刷几千甚至几万册书，却又是很廉价的。小资本家的生产规模远远小于大资本家，但是卖不出去的往往是小资本家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效应，不能承担大资本家那样大幅度的降价。

资本量的优势不仅仅存在于生产，也存在于销售。大资本家有更广泛的销售网

络。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相比之下，小企业产品的覆盖范围则非常有限。东方不亮，东方的小企业就麻烦；西方亮，西方的小企业要面对大企业全部产品集中到西方的压力。不论东西南北，小企业的产品的出厂价格相比大企业都是出于劣势。何况即使产品成本相同，还有知名度的问题。同样的产品，大企业有能力承担更高的广告费用。这是因为产量高，均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广告费用更少。

大资本家有更好的社会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对银行来讲，贷款给大企业的风险，要比处处资金紧张的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不需要贷款，银行往往主动上门撺掇大企业贷款。小企业主动去找银行贷款，却处处艰难。大企业获得贷款，可以没有抵押，直接使用信用贷款——这个牌子占有这类产品市场的总份额，或者是第几大生产商（销售商）——这个牌子就是最好的担保。相比之下，小企业就没这么便利了，抵押物、质押证券或者贴现汇票，不论哪种都必须严丝合缝。有些情况下，还要追加担保人。对处境艰难的小企业，银行往往雪上加霜——一旦发现小企业现金流有出现紧张的迹象，银行可能提前收回贷款，或者提出更苛刻的附加条件，比如追加担保人，增加抵押物等等。同样办理一笔贷款，也许数额相差巨大，但是银行贷款成本相同。大企业每笔数额都要远远超过小企业，单位贷款成本比小企业小得多。小企业贷款的利息，一般比大企业高。银行不是慈善机构，银行收回贷款和利息，要回避风险，要减少单位贷款成本。这三方面，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都有明显的优势。银行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无可厚非。但是，对小企业来讲，却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在平时资金相对宽裕的时刻，小企业可以承受更高的利息，提供更多的抵押物，接受相对苛刻的条件。一旦到经济危机时刻，产品滞销，大家都需要贷款维持现金流不断裂，贷款利息迅速上升，抵押物（设备、不动产）大幅度贬值，即使小企业愿意接受苛刻的条件，银行考虑到风险也要收紧银根。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不要妄想获得银行的金融支持。

通货膨胀时，一旦银行加息，小企业贷款利息上升的幅度必然比大企业大。银行收紧银根，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马上上升。如果大企业在囤积居奇，小企业在搞实业，那么悲剧的将是搞实业的，而不是搞囤积的。当然，不排除小企业搞囤积，大企业搞实业。或者，两者都在搞囤积。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大企业有更好的条件获得廉价的贷款和紧缺的物资，换句话说，大企业搞囤积比小企业容易得多。

如果再有行政政策要求压缩小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小资本基本在劫难逃。相比之下，大企业生产技术相对先进，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即使压缩也不会压缩到他们的头上。此外，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与政要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有极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往往慎之又慎。

大资本在信息方面，相对小资本也有更大的优势。大资本对生产的掌握情况，

比小资本要丰富得多。无数小资本在管中窥豹，大资本却可以看到全豹。小资本要凭感觉把握未来本行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大资本却可以提前获得更多的信息，拥有更专业的团队，提前更准确地分析出行业的变化趋势。

一般来说更大的资本量，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如果考虑到自由交易的市场中，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新技术也是可以花钱买到的——比如直接购买专利或者并购拥有新技术的公司。相反，许多小公司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却因为资本量的限制，不得不投靠大资本。这种优势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归根结底可以简化为资本量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新科技经常带来生产效率飞跃的行业中，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彻底改变原有格局，而且采用这种新技术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量。这时，资本量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不过，这样的行业毕竟是少数，只有在经济长周期中才会层出不穷。

生物界除了种内斗争还有种间斗争，市场中除了同行间的竞争还有上下游之间的竞争。同行之间竞争越激烈，与上下游厂商斗争所处的地位就越不利。

除了同行业之间的挤压，还有上下游之间的挤压。商品销量不好，要降价促销，谁来承担利润的损失？往往是资本量比较小的一方。原因很简单，资本量小，门槛低，竞争对手多。下游企业要求赊销，答应不答应？上游企业要求提前支付货款，答应不答应？如果资本量比较小，就必须答应。不然，张三不答应，李四答应，张三的市场份额和原料来源就将由李四占领。只要滚动占有一定量的货款，就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前面已经说过了，小企业相对大企业在融资方面有更大的困难。现在我们看到，小企业不但自己融资困难，还要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笔无偿贷款。在流动资金循环上，小企业两头受气。

大资本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稳定原料来源，与上家原料企业也有更好的谈判条件。对小企业来讲，上游原料企业很容易提价。对大企业来讲，则没那么简单。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敢提价，小心我换供货商，干脆一拍两散。这个时候，供货商往往会考虑到保护主要产品的销路，并不对大客户提价，甚至在同行的压力下主动打折来吸引大客户。有些时候，如果大资本够强的话，甚至能不断压价，挤压供货商的利润。

大资本家有资格与下游销售企业获得更好的销售条件。同样是对超市销售，小资本家可能需要长期赊销，大资本家就可以提出短期赊销，甚至现金结账。如果大资本足够强的话，甚至可以要求下游企业预付账款。

其他小供货商的货或者价格高，或者数量少，总之不能完全替代我的产品。没有我的产品，你的工厂就没有原料，你的超市就要出现空货架，你的机器就要空转，你的超市就要白白浪费每天的房租、人工和水电煤气。你不预付，我就没货，你自己看着办。

无论是同行之间的竞争还是上下游之间的竞争，都可以归结为资本量大的一方占有优势。资本量相差到一定程度，小资本面对大资本没有任何胜算。一个人徒手斗猛兽，也许他可以若干次成功击中猛兽，但是猛兽不疼不痒。反过来，猛兽只要一击就能要他的命，彻底结束战斗。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两者实力相差太悬殊了——实力相差到一定程度，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资本之间的搏杀也是如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大资本比小资本有更多的存活机会。于是，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大资本屠杀小资本的过程。每次危机结束后，所有的幸存者都有机会廉价获得遇难者的一切生产资源，包括原料、生产设备、熟练工，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市场。

在自由竞争市场中，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之间的搏杀，决定的因素是资本量，胜利者的红利也是资本量的增加。本轮搏杀的胜利者，有更大的资本量参加下一轮的搏杀。这种搏杀，伴随着资本的汇聚。

在非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则是另一回事情。在自然界中物竞天择，“天”决定哪种物种继续发展。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人工育种。在育种的过程中，对物种来讲，农夫就是“天”。农夫可以决定物种的发展方向，不断培育出他所需要的品种。以母鸡为例，符合他的标准的母鸡被不断改良，不符合标准的母鸡则可能被直接吃掉。农夫选育母鸡的标准可能与自然界完全不同。在农夫看来，最好的母鸡也许跟饲料和产蛋量相比，产蛋/饲料比最高的母鸡是值得培养的母鸡。在自然界，这样的母鸡也许存在无限的缺陷，比如御寒和抗病能力差，比如对饲料的质量要求高，比如动作迟缓（能下蛋的母鸡难免大腹便便跑不快）等等。对母鸡来说，动作迟缓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获得食物，更多的机会被狐狸等天敌捉住，而且这样的母鸡只能吃精细饲料，容易生病，还熬不过冬天。这样的品种在自然界中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在农夫的鸡舍里，这并不重要：没有狐狸捕食它们，农夫定时供给饲料，兽医提供疾病免疫，鸡舍冬天有取暖设备。当年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就是在自家的养鸡场里感悟到了元首的理论。他是否考虑过自己培育的母鸡虽然产蛋量高，但是仅仅能够适应鸡舍的环境呢？不管怎么说，他是决心和元首一起推动人类的进化。经过他们的努力，除了屠杀数以千万计的异族，让自己几百万的同胞当炮灰以外，雅利安人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进化。人类是不能替代伟大的自然界的，哪怕他把自己自封为神。

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选择的规则是“强者生存、大者生存”，或者说资本量大者生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条件下，则是政府决定谁生存。

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条件下，在外来资本远远超过本国资本的背景下，本国的资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如果按照强者生存和大者生存的原则，本国的资本必将被外国资本绞杀殆尽。对抗外来大资本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创造本国的人造大资本。为了发展本国资本，于是国家介入经济发展。国家可以为自

己培养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信贷支持、国家订货，比如德国的蒂森克虏伯公司。国家还可以给某些企业特种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支持，规定某种业务只能由某个公司经营，其他公司只能作为这个公司的下属公司，才能从事类似的业务，比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印度贸易。甚至政府直接出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乃至唯一出资人，比如日本的八幡冶铁厂，中国的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等。国家以财政之手，直接把剩余价值转移给它们。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落后国家的劳动者必然受到双重压榨，或者说两座大山。他们既要为外国资本贡献剩余价值，也要为本国的国家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在这样的国家，劳动者的反抗必然比相对先进的国家激烈。对应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必然更加庞大。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对日本劳动者的压迫更残酷。

其实，就是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也迟早会和政府发生关系。按照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政府是资本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剩下很少的委员的时候，政治、经济两方面难免合二为一。

如果我们清晰认识到这些企业的背后拥有的国家暴力的支持所起的作用，而且没有忘记元要素是根本分配权的话，就不难理解：在竞争中，这些企业得到元要素的支持是战无不胜的。它们的产品卖不掉，政府可以采购；这样的公司的原料不足，政府可以直接调拨；这样的公司缺乏资金，政府直接安排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甚至可能直接财政拨款。这样的公司亏损了，政府可以直接用财政补贴它们，把欠账一笔勾销。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倒闭的，除非政府抛弃它们，或者政府倒台了。比如，德国的纳粹政府倒台以后，连带影响大批这样的公司，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只能不做大炮改行做电梯。

对民间资本来说，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对手，竞争过这样的有国家背景的企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自由市场条件的情况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吃小，或者说“大”进“小”退。在非自由市场条件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时，优胜劣汰的过程发生了异化。当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强资本吃掉弱资本。

不论决定资本竞争的是市场还是政府，我们都能看到资本在不断的集中，在危机中尤其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看待春去春回来的过程，我们会觉得每次春天都会在冬天之后到来，但是我们显然就忽视了每次复苏与上次复苏的不同。自然界中的遗传基因总是无法完全稳定地传播下去，或者说总是有变异的出现，亲代与子代总有极大的相似性，却又有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累积最终会诞生出新的物种。基因变异，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重要原则。与自然界不同，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和物竞

天择还存在，基因变异不存在了。由于人类社会特有的清晰、稳定的产权关系，一个大企业消灭或吞并了若干小企业之后，并不会自行分裂成若干有微小差异的小企业。换句话说，自然界的进化，物种由多样归于多样，而人类社会资本的进化，最终归于“一”。这个过程是单向、清晰、不可逆的。

“每一个成功的奥特曼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每一个成功的大资本背后，都有一群被消灭的小资本。少数资本的成功，必然对应多数资本的毁灭。这些资本被消灭，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疏远。不论哪种原因，我们都将看到资本数量的减少和资本的集中。这样的减少和集中，最终会达到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某一个行业最终由很少的一家或几家企业控制全部市场，操纵生产过程，影响市场价格和产量，以达到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

周朝开国有71个诸侯国，后来战国七雄，最后秦国统一天下。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后来三足鼎立，最后三分归晋。这个时代迟早会到来。

1873年世界范围的大危机结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次大危机反复折磨资本主义国家长达5年之久——在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长度，虽然后来人们习以为常了。从此，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

超级帝国：垄断企业对经济的统治

我们是仅存的能和他们抗衡的能源公司，但我们快撑不住了。很快他们将控制半个世界的能源供给。事实上，他们将成为新兴超级帝国。

——Saito，Inception（斋藤《盗梦空间》）

1873年大危机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写作进程。

1873年5月9日，维也纳交易所的股票暴跌。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欧洲停止对美国输出资本，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导致铁路公司资金链断裂。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持续五年、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无一幸免，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不仅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还有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

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次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新阶段，他写道：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就要采用新的模型。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主观去修改客观，而是耐心观察，总结新的规律。可惜，他在1883年去世了，并没有活到垄断资本成型的那一天。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替他补充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恩格斯不久也去世了，后面的事业要交给列宁去继续完成。

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竞争和私有产权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会在危机中不断集中，这种集中的最终趋势必然形成一个或几个大资本控制某一行业的局面。或者说，垄断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必然趋势。这一天迟早会来，不来是不可能的，早来晚来而已。1873年的危机，宣告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1873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用一个词形容是“竞争”的话，那么1873年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用“统治”来形容则是恰如其分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着统治，即资本统治劳动力。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资本家控制资本，决定生产和分配；无产阶级被剥夺生产资料，没有独立生产的条件，为了口粮充分竞争，提供廉价劳动力。但是，资本家之间主要是竞争的关系，是彼此不买账的竞争对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消亡了，变成了统治关系。从此，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之间。

资本之间的统治，最早出现于股份公司。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资本量越大越有利。大资本为了迅速扩充资本量，有必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本。小资本在与大资本的搏杀中，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中，或者被歼灭成为大资本的猎物，或者主动退出，归顺大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资本与小资本都有融合的动力，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过程如同有人振臂一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景从。这时，资本内部发生了分工。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进而支配别人的劳动的机会。这时，

小资本交出了自己的经营权，只保留定期分红和开小差的权利。大资本成为众多小资本的带头大哥，对小资本行使管理权。

与这样的迅速膨胀比起来，任何自有资本的积累与聚集都是极其缓慢的。如果说一个企业自身积累是N（1＋X%）的乘法的话，那么一个企业吞并其他企业可以说是二次方，而这种社会资本的聚集则是指数倍的增长。刺激这种增长的原因，就是每次经济危机大资本之间的竞争压力和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屠杀。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那么最多是资本之间的吞并，而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向大资本的“投诚”。

对小资本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无奈的。屈辱地生存或者毁灭，玉碎或者瓦全，是每一个小资本都要面临的选择。经济危机使资本的门槛不断提高，低于一定门槛的资本量再也无法发挥作用。小资本独立生产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资本量的差距决定他们继续经营下去就要被歼灭，或者即使能够保证目前的经营规模也无法扩张产能。这时，如果不想被消灭掉，就要主动归顺大资本。如果不肯归顺，即使暂时能自保，被歼灭是迟早的事情。这就如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过程：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以后，成为无产者不得不去资本家的工厂，如果不想去血汗工厂，就要被饿死。小资本虽然明知吃亏却无可奈何。最终，多数小资本选择了瓦全而不是玉碎。每一个资本家都会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别人的能力充满怀疑。每一个资本家都会怀疑别人代理经营他的资本的过程中，采用为代理人而不是他谋求更大利益的做法——事实也往往如此。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迫于势尔。对普通人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不是被杀，就是参加各种武装，以求分一分战利品，至少自保。对小资本来说，也是同样如此。

对大资本来说，事情则有利得多。只要振臂一呼，后面就能聚集一群炮灰。实际上，这样的炮灰很容易网罗——因为对炮灰来说，选择更少。名义上，公司是属于所有股东的，实际上是属于个别大股东的。大股东吃饱以后，给小股东分一点汤就可以了。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一个公司有20%～30%的股票，就可以操控公司业务，成为公司的主宰。一些大股东为了稳定绝对控制权，特意在上市保留51%的股份。在这样的公司中，对小资本来说，大资本怎么说就要怎么定，自从成为股东开始，就意味着成为大股东的奴隶。

当然，也有人提出小资本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抛售大资本的股票。这样的说法，从个体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从整体看却没有任何意义。顾客可以选择萝卜炖白菜，也可以选择白菜炖萝卜，却不能选择什么都不吃——不然会饿死。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反正就是白菜萝卜，无非是白菜和萝卜下锅的顺序和比例变一变。这就如同工人或者被甲资本家雇用，或者被乙资本家雇用，却不能不被雇用——否则就要失业、挨饿、睡马路。如果小资本家不投靠大资本家，那么他们的

资本迟早会被消费掉，从此丧失资本的功能。在纸币时代，这个过程也许更加迅速，小资本也许等不到被消费掉就被通货膨胀吞噬掉了。

这就如同工人可以选择工厂，农民可以选择地主，但是却不能避免自己最终必然被某个工厂雇用，或者租用某个地主土地的局面。工人最终的收入决定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由于劳资数量对比悬殊等原因，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劳方不利。换句话说，只要是劳方，不论选择哪个雇主或地主，最终的结果已经注定是不利的。

随着财富的集中，资本不仅要让劳动力成为自己的奴隶，而且要让自己内部比较弱小的资本也成为奴隶。如果我们还记得《通天塔》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所谓人类社会的通天塔会越来越尖锐，直入云霄。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许多国家的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之间的持股行为，换句话说，一个股份公司可以成为另一个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如果甲资本家用51%的资本控制了甲公司，那么理论上他还可以继续以甲公司的资本控制乙公司，并且无限地控制下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父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玄孙公司，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换句话说，理论上他可以以有限的自有资本控制无限的社会资本。

以上是股权的控制，这是一种刚性的控制——按照大多数公司的章程，董事会的决议就是股份公司的最高决议，董事会往往操纵在董事长手里。

事实上，还有一种柔性的控制，这是更加隐蔽但是同样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就是原料、销售渠道和利润的控制。

一个企业垄断了本行业的生产之后，完全可以进一步控制上下游的行业。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实力雄厚的粮食企业垄断了大豆榨油，就可以向上操纵大豆的生产，向下操纵豆油的销售。榨油企业可以高价收购当地大豆，抬高生产成本，压低售价，减少利润，挤垮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其他企业大多关门大吉之后，这家企业可以反手拒绝收购当地的大豆。开始的高价收购，后来的拒绝收购，都是出自一个公司，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控制食用油市场，操纵价格，获得最大利润。一旦这家公司控制住食用油市场，外来的竞争对手就很难进入。如果他们冒险进入的话，就会面临上游没有大豆货源，下游没有销售协议的窘境。

相比之下，农民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早期榨油企业高价收购的时候，他们显然会增加大豆的种植量——他们不种，他们的邻居会种。个别农民不种，不影响整体种植量增加。这样的条件下，个体农民理性的选择就是增加种植量。当所有农民都增加了种植量之后，食用油企业反手压缩收购量。个别农民拒绝出售大豆，不影响其他农民出售大豆。这时，对农民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快把手中的大豆出

手，来年压缩产量，或者改种别的作物。垄断企业并没有禁止农民种大豆，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利润的杠杆使农民种大豆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可以自己种大豆自己消费，但是很显然不会再把大豆作为自己的主要农作物。

下游的零售企业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如果不与垄断企业签订长期订货合同的话，可能面临拿不到货的风险。一家零售商不签，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签，一家零售商不销售，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销售。不签合同的零售商越多，签订合同的零售商的好处越大。这时理性的选择就是签订长期订货合同。反过来，如果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就意味着不能继续销售其他食用油——每段时期的销量是有限的，已经签订了订货合同继续增加新货源，必然影响原有已经订货的食用油的销售。

一旦垄断资本控制了生产链条中的某个环节，上下游中小企业最好的选择不是自卫，而是臣服。单个中小企业对抗垄断企业的结果，无非是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并改善了自己同行的处境。上下游之间的博弈关系由“多对多”，变成了“一对多”。这是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完全不同的。

彼此存在竞争压力的小资本，永远斗不过组织严密的垄断资本。如果不考虑元要素，那么能对抗垄断资本的只有垄断资本。能够与垄断性的成品油公司对抗的只有控制全国大豆生产的大地主，他们可以完全控制大豆的生产，不被垄断公司的利润指挥棒弄得晕头转向。大地主和成品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彼此之间重新恢复博弈的平衡，垄断公司最好的选择就是坐下来谈判，彼此达成谅解，瓜分利润。

作为消费者，看到的仅仅是豆油价格的下跌和上涨，还有几个知名品牌的豆油替代了无数的杂牌豆油，他们根本看不到这种不起眼的变化后面惊人的搏杀。

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把手伸向自己产业链条之中的上下游——二级甚至三级公司。每一层的生产决定权都由上一级操控。外来投资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要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危险。

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自我创业，越做越大都是徒劳的。每一个企业的生产都要受到上一级资本的操纵，不听上一级资本的指挥，不围绕资本的指挥棒转，只能死得很难看。能否做大，要看下级垄断企业是否需要订货，或者上级垄断企业是否提供原料。订货和原料，不但要充裕而且价格要有利可图，这样才能不断使资本增值。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不存在的。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不但订货量少而且价格低，或者供货少而且价格高。上级资本总是要把下级资本的利润压低到几乎为零的地步，这是基本的规律。

如果垄断企业选择上下家的标准是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创业环境就更加恶劣。你的产品也许更加物美价廉，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订货合同给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的销售条件也许更优厚，但是我仍然愿意把产品给我的三姨妈六舅母。这时，资本

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所谓成功的自我创业和自我奋斗，无非是血缘的成功套现。没有血缘关系的资本，自我创业所能选择的空间，只能是垄断资本触角没有伸到的行业——这些行业或者因为利润低，或者因为管理复杂——总之对大资本来说是鸡肋的行业。许多小资本只能开个小饭铺，办个杂货铺，搞个小旅店，摆个水果摊，或者开辆出租车，就是这个道理。许多动人而精彩的奋斗故事，作为励志片，给人打气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当真。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效法的话，只能死得很惨。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没有领悟资本的属性。事实上，各种公共媒体上自吹自擂的发家史往往是值得推敲的。相比之下，某些人被逮捕以后的犯罪记录，往往揭示了他们真正的发家史：比如走私、销赃、贩毒、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转移国有资产、强夺农民土地等等。

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点，成为这个链条的关键，控制这个点的企业就可能通过垄断这个点进而垄断整个产业链。产供销一条线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关键的点，成为关键的点的潜在特点就是好垄断。成为这个关键点，并不在于需要的资本多少，更重要的是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社会化大生产使一个产品从原料到产品要经过无数细小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被垄断的关键结点。一个环节成为关键结点，其他环节都要受这个环节的控制和影响，控制这个环节就可以控制整个生产链条。

蔬菜生产在小农为主的地区是零散的，但是并不妨碍蔬菜成为垄断产品。收菜商从小农手中收购蔬菜，运输商从收菜商手中把蔬菜收上来并运输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批发商把蔬菜批发给菜贩，菜贩再把蔬菜零售出去，这四个环节中，收菜商、运输商和批发商就有可能成为垄断者。一个收菜商可能对应几百户农户，一个运输商可能对应几个县的蔬菜生产，一个批发商可能对应某个地区的蔬菜集散，他们都可能成为垄断环节，谁的资本量大，谁最后胜出。菜价上涨，垄断环节获得最大的好处。相反，小农自己由于不能直接进城卖菜等原因，不得不依赖“收菜商—运输商—批发商—菜贩”链条，所以往往只能获得很微薄的菜价上涨的好处，甚至不能获得任何好处。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垄断了油田，就可以控制石油的生产，进而可以控制所有的炼油企业，甚至影响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炼油企业，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油田和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所有的加油站，就可以控制所有上游的炼油厂和油田。如果一个企业控制了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 superpower（超级帝国）。

如果有外来大资本同样觊觎这块市场的话，这种向上下游企业伸展的柔性控制就可能显得并不可靠。这时，原有的和外来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可能采取收购的方式，直接控制上下游企业的股权。一旦某一方决定性地控制了上下游行业的股权，

另一方只能承认败北。如果一个炼油企业同时控制了油田和原油进口权，那么其他炼油企业继续进入这个行业，也将面临无米下炊的局面，继续进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

垄断企业之间同样有高低区分。垄断方便面的企业相对垄断成品油的企业来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毕竟方便面涉及的经济循环，要远远少于成品油。工业化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机器替代人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无论是内燃机还是电动机，都离不开能源。能源企业几乎是所有企业的上游企业。博弈地位不是“一对多”，而是“一对无穷”。只要控制了能源，就能控制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和物价水平。能源价格上涨，可以把所有产业资本的利润挤压干净。《盗梦空间》中，斋藤说小帅哥的能源公司将垄断全球一半的能源供应，成为真正的超级帝国，并不是夸大其词。

如果把社会总生产看成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要素在极少数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企业就是真正的帝王资本。他们控制交叉的行业，影响、操纵整体经济。在他们之下，则是一些诸侯。他们垄断本行业，影响、操纵某一种或几种商品。在这些诸侯之下，则是一些中、小资本，他们为上面帝王和诸侯资本服务，是“臣民资本”。再向下，则是一些零散的资本，他们数量很多，充满帝王和诸侯触角不愿触及的“鸡肋”行业，彼此之间激烈竞争。至于劳动力，则处于完全不入流的状态。

资本垄断的第三个方式就是联盟。在无数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很难达成有效的协议。如果大家都是小商号和小作坊，个别几个企业之间达成生产协议没有任何意义——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而让所有企业都达成生产协议的话，需要的谈判过程之复杂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仅有几个有限的竞争对手的话，这样的协议就很容易达成。如果一个炼油企业控制了油田，另一个控制了加油站，对两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彼此达成协议，互相控股，瓜分市场和利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卡特尔的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生产配额，实行统一领导。如果少数几家企业联手控制石油，枪口一致对外的话，那么不但可以把竞争导致的消耗压缩到最小，而且可以把成品油的价格推到天上去。

市场地域的广度扩展至交通运输的极限，深度却急剧变浅。庞大的公司拥有惊人的生产能力，只要交通能力能够达到的地区，他们就会占领那里的市场。如果运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他们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于是，我们会发现在相隔几千里的商店中，出售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产品。我们还会发现，几乎每种产品都只有少数几个品牌。换句话说，即使在天涯海角，中小资本的同类产品也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处于被垄断的状态。

垄断资本的控制几乎无所不在，这种控制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离不开交易，自然就离不开资本的幕后之手。

一个人可以在海德公园声嘶力竭地呐喊，却只有寥寥几个听众。如果他希望他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他就必须要和资本结合，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使自己的声音传遍世界，而现代化工具的所有权是属于资本的。一方面使个别明星深入人心，街头巷尾都知道，世界各地都知道，路人皆知；另一方面大量潜在明星被排斥出大众的视野。成为明星或者不成为明星，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宣传媒体，或者说控制宣传媒体的资本。明星的存在，完全在于资本的意志。当资本希望炒作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绯闻也是新闻。当资本离开他们的时候，即使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当年的歌迷、影迷也不会知道。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女星张紫妍被迫接受那么多的潜规则。许多明星既对狗仔记者深恶痛绝，又要忍受他们的骚扰，一旦这些狗仔离开他们，他们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从此淡出大众的视野，默默无闻。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被操纵的环境中，他们看到母体意志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听母体意志要他们听的东西，他们获取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精神信息都来自母体，为母体意志提供能量，他们是母体的电池。这就是幻想中的 matrix。垄断资本的帝国就是现实世界的 matrix。

垄断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格局，彼此无力征服对方，于是形成彼此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从此竞争进入新的形势，不再仅仅是产量和产品性价比的竞争，而且包括争夺社会资本和垄断权的竞争。这种竞争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帝国具有几个特点：辽阔的疆土、众多的臣民、雄厚的实力以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这些垄断资本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本，调动惊人的人力物力。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比这更惊人的财产强权。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君王（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也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或者说，他们的财富是来自劫掠，而不是交易。相反，垄断帝国则是在“暴力归公”的基础上，完全依靠财产的力量，在市场交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暴力的“归公”，是归资产阶级的“公”，而不是全民的“公”，这里的暴力，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不在资产阶级内部使用，却不吝于镇压无产阶级。

这些垄断企业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司令，核心的、少量的、直接控制的资本就是垄断资本帝国的君主资本。军队里面有军、师、旅、团、营、连、排。政权里面有总督、巡抚、道台、知州、知县。从此，垄断企业建立了严密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权力集中到少数资本手中。这些少量的垄断资本建立了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资本帝国。在这些帝国之中，在核心垄断资本之下存在着中小资本，在中小资本之下则是无数的劳动力。核心资本依

靠股权和利润控制中小资本，中小资本控制广大劳动力。对抗垄断资本的中小资本则会被排斥出资本的队伍，对抗资本的个别劳动者会被解雇，有组织的劳动者反抗，则会被镇压。资本的组织完全符合帝国的特点，资本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资本的超级帝国。

弗里德曼认为自由竞争最终会创造出完美的经济。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随着资本之间吞并和纵横捭阖，竞争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竞争进化为统治，或者说建立资本的超级帝国。

垄断企业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市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市场的王者，从此，市场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或者说，市场从此不再是费厄泼赖的竞技场，而是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蜂巢。

统一战线：产业垄断资本与金融和暴力的联盟

资本家为国防即为国家工作，这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了（这是明显的事实），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纯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为不可知的自由市场工作的。为国防工作的资本主义，则完全不是为市场‘工作’，而是按照国家订货甚至往往是为了得到国家‘贷款’而工作的。

——《列宁全集》（第30卷）

产业资本统一天下以后，并不代表事情到此为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有两大巨头，随时可能对产业资本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两大巨头就是金融资本和元要素。如何确立与这两大巨头之间的关系，是垄断资本能否长期顺利统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产业资本、金融和元要素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焦点是瓜分社会总大饼的主导权属于谁。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提到土地这个要素和地主阶级，这并不是说地主阶级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没有资格瓜分大饼，而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地主阶级往往在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事实上，大地主的破产或主动转型，是资本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之后，地主阶级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落后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地主阶级还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牢牢地控制着经济的命脉，在这样的国家，大资本家往往同时具有大地主的身份。不仅如此，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垄断性的产业资本也把多余的利润投入到土地中，炒作地皮，人造“地王”，推动房地产热的狂潮。

对统治阶级来讲，只要达成协议瓜分天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

如何协调却需要一番激烈的博弈——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分成”，需要经过较量才能决定。这个博弈过程可能是在议会唇枪舌剑，也可能是在战场刀光剑影，甚至血肉横飞的。有可能建立联盟是一回事，达成彼此互谅互让、互惠双赢的协议是另一回事，仅仅有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操作过程。

产业资本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和金融资本的关系。

在产业资本搏杀的同时，金融界也在进行搏杀。各种大企业相对小企业拥有的优势，大银行相对小银行也一样拥有。在银行界，这种优势更加明显。货币与一般商品不同，货币是等质的，不存在质量之间的比较关系。银行的差别集中于贷款规模、利率水平、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与把握、抗风险冲击能力、银行的信誉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优势与资本量密切相关。相比产业资本，银行之间的搏杀导致的资本集中过程更加激烈和迅猛。

银行的利润来自企业的利润，企业繁荣必然推动银行的繁荣。企业破产必然连累银行，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银行必然倒闭。当大企业廉价收购小企业，占有他们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的时候，大银行也在占有小银行的储户和市场。银行与他们的客户之间必然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关系。产业资本出现霸王的时候，银行界也必然出现霸王。大银行把触角伸到每一个空间，小银行在大银行不愿意涉足的空间求生。大银行利用股权和控制同行之间业务往来等手段直接或间接控制小银行。

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往往不是争斗而是结合，这种结合完全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完美联姻。

信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迫使产业资本利用银行信用进行社会融资。我们在前面的经济危机过程和大资本建立垄断帝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互利互惠的联系。大资本依靠金融工具渡过难关，同时吞并、征伐小资本。如果没有贷款等金融工具的支持，很难想象大资本能顺利完成统一的霸业。调动的资本量越大，资本使用成本越低，资本发展的速度就越快，生存能力就越强。能无限恢复体力的对手，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换句话说，如果技术水平类似的话，谁的融资能力更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至此，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自发地走到一起，如同自由恋爱的男女建立了家庭，统称金融资本，一致向外要求最大幅度的剩余价值（这里说到的金融资本是广义的金融资本，指的是在金融的支持下的垄断资本，与前面提到的狭义的以金融活动为主要经营行为的金融资本有一定区别）。相比之下，究竟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如同一个家庭内部究竟是“妻管严”还是“大男子主义”，并不影响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样。

不过，即使是彼此需要的事情，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谁更需要谁？丈夫更离不开妻子，那就是妻管严。妻子更离不开丈夫，往往导致大男子主义。垄断产业资本和大银行，究竟谁决定谁？谁是君王，谁是臣属。毫无疑问，虽然君臣彼此依赖，互成一体，但是君王有更大的权力制定国家的政策，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好处。这就如同在妻管严的家庭里，虽然主要收入来自丈夫，但是主要开销用于妻子的裘皮大衣和钻石，周末丈夫要陪妻子逛街购物，而不是去看足球赛。

我们在前面的博弈分析中提出彼此博弈力量对比的三个基本原则：博弈双方的数量；博弈选择多寡；对博弈成交的渴望程度。

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企业不能直接从社会获得资金，必须通过银行这个桥梁。这个所有企业都要利用的桥梁，就有资格获得最大的份额。银行的一面是社会公众，另一面是企业，一手托两家，两家都离不开它。银行数量显然大大少于储户和企业的数量，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同盟而不是恶性竞争；银行可以在多家企业中选择贷款给谁或不给谁，企业则只能巴结几家有限的银行，银行的选择余地显然大大多于企业；企业一旦获得贷款，就要用于购买土地，建设厂房，添置机器，雇用工人，除非出售产品，否则短期内难以获得现金，这个过程往往以年计算。相比之下，银行则拥有大量流动资金，在资金的灵活性上远远超过企业。银行只要要求企业提前还贷，甚至不继续给予流动资金的支持，就可以使企业停产甚至破产。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往往最大幅度地利用社会资金，如果不能得到银行的支持，必然落后于对手。控制一个企业的贷款，或者说控制一个企业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就可以控制一个企业的经营。

在这样的地区，银行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是所有垄断资本之中的王中王。银行统领各个行业大小垄断资本，大小垄断资本统领本行业和产业链条的中小资本。银行是所有经济循环中的关键节点，银行控制了一切经济循环。在这样的地区，产业资本是银行资本的下属，两者之间的地位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地区，则是另一种情况。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这时，企业有更多的选择获得社会资本：贷款、股票和债券。银行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条件不合适，企业就可以放弃间接融资（贷款），选择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对小企业来讲，无论是贷款，还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都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对大企业来讲，尤其是全国知名的垄断大企业，这几样都不难。如此一来，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就被大大地削弱了。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局限在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之中，而与垄断大企业则往往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决定彼此之间关系的关键，如我们前面多次强调的，是彼此之间资本量的对比。

事实上，许多大型垄断性上市公司，我们很难将它定义为究竟是一家产业公司，还是一家金融公司。一方面，这些公司拥有惊人的金融实力，能够调动大量的

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对这些公司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积累往往并不是资本的主要来源。搞实业靠利润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达不到玩弄金融工具达到的速度。一个企业，如果不善于玩弄金融工具，不能把社会资本玩弄于股掌之上，就不可能成为庞然大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很可能被其他大资本恶意收购。

在法律限制较多、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国家，银行资本的间接融资是向社会融资的主导手段，一个银行资本领导一大群垄断产业资本。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是向社会融资的重要手段，则可能出现庞大的垄断性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的局面。对银行和产业来说，究竟谁能更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谁就是两者之间的领导者。多数国家中，直接融资（股票债券市场）和间接融资并存，企业与金融之间究竟谁更强，最终决定两者究竟谁为领袖的依据，不仅需要按照各个国家两类金融市场发达情况和法律的限制，往往还要参考资本量的大小——在各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资本量的大小是决定性因素。

相比之下，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危险复杂得多。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博弈，决定胜负在财产领域，决定的关键是财产量。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把这种博弈关系，扩展到了财产与暴力的博弈之中。我们在前面说过，资本相对暴力是不堪一击的，没有暴力的支持，任何财产都没有意义，或者说任何资本都不能发挥分配剩余价值的作用。

既然暴力登场，双方决定胜负的过程就未必是文斗了。博弈结果对暴力不利的时候，暴力很可能采取武斗的方式。与之对应，财产为了自卫也必然募集自己的武装。

历史上，暴力与财产曾经发生过多次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财产败落，面对暴力尤其是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财产都是弱不禁风。圣殿骑士团的教训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犹太人的悲剧则是最近经历的。历史上的圣殿骑士团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私有的武装，建立了最早的遍布欧洲的银行系统。骑士团拥有的私有武装曾经有效地捍卫了自己的财产，却无法对抗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骑士团首领被处以火刑，财产被没收。

资本主义怎么在各国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本节的重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想获得发展，必须有暴力的支持。同样，如果不能理顺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统治就是不稳固的，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

暴力和资本走到一起，有两种方式：资本领导暴力；暴力领导资本。两种方式的起源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历史进程有关。不论哪种方式，最终殊途同归：最终都将建立资本与暴力结合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将处于官僚统治集团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认为垄断大企业的管理层也是一种准官僚集团的话。

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一类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的国

家；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自我改良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

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有类似传统的国家，元要素被严格的局限起来。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资产阶级定期推举委员。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无论是进入政府的竞选，还是在政府之中管理国家，哪一步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与配合。在这样的国家之中，获得参政的权力，成为总统或议员，都需要经过竞选，竞选是开销巨大的。没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很难想象依靠个人财产能完成竞选的过程。2004 年，美国总统竞选，小布什共募集到竞选资金 3.6 亿美元。这样的候选人当选以后，必然要对曾经支持过自己的利益集团投桃报李。能够拿出这样巨款的人，或者本身就是大垄断资本的所有人，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国家，当资产阶级内部相对统一，所有的资本逐渐建立起稳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在政府之中的代理人的人选也必定相对统一，所施行的政策必然符合垄断大资本的利益。所以，上世纪初就曾经有人说过，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看这句话，除了把“报刊”这个词换为“媒体”以外，其他方面无需修改。

这些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官僚又是大企业的董事长或者 CEO。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人“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或者今天是垄断大企业的高管，明天竞选议员、州长甚至总统，或者参与组阁成为内阁高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鲍尔森，比如拉姆斯菲尔德。不论是部长还是银行家，其实都是一类人。还有一些人，比如日本的高级官僚，任期内照顾各大企业，退休以后在这些企业中担任领取高薪的高级顾问，顺便利用当年的关系发挥余热。

“在一个机器和机器所有权都落入了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组织化的财阀集团之手的时代，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对本州的人民不负有任何义务。……在堪萨斯，这个财阀集团是铁路。在西马萨诸塞，是纺织品。在东马萨诸塞，是银行。在纽约，是联合企业。在蒙大拿，是铜业。但是，任何一个州所发展和控制的力量，都要转向纽约去寻求它的借入资本，而纽约则控制着联邦参议院。……总的来说，它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只有少数美国人对联邦参议员有所控制。而且，这个少数派只对自己的掠夺计划感兴趣。”①

至此，在这些国家，资本与暴力达成完美的联盟。暴力为资本服务，成为资本的仆人。以银行资本为领导的、以银行和产业资本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就建立起来了（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可能是产业资本代替银行资本成为资产阶级

① （美）艾伦著，秦传安译：《大转型时代：全球帝国的阵痛》，新世界出版社，98 页。

专政的领导）。这种以垄断资本和国家暴力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如果国家是由民主革命派掌握的，国家垄断组织就要为民主革命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迈进的第一步。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政权并不是由民主革命派，而是由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派掌握的，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

在那些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这些国家受到外来资本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被迫进行内部改革。元要素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虽然从一群人手中换到另一群人的手中，却始终在本阶级中流转。在这样的国家中，并不曾发生过把元要素牢牢局限起来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封建领主的后裔和德国的容克地主阶级始终牢牢地控制军政大权。对他们来说，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增强国力的手段。

对于落后国家的资本来说，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完全不可能战胜外来的相对成熟的资本。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国家就融入生产的各个环节。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元要素领导一切，没有任何制衡的关系。国家控制银行，给予企业贷款。国家给予企业原料和订单，指挥企业生产。国家给予企业特殊的专卖权，刻意培养本国资本做大。元要素占据统治地位，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臣服于元要素，资本是国家官僚集团的下属，所有的垄断资本都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行为。于是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中小资本—民间劳动力”的统治形式。

这种模式的集权性往往超过以银行资本或者产业资本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国家发展到极限，往往会出现一个惊人的独裁者，一个控制一切的人——元要素控制国家的一切，官僚集团控制元要素，它控制官僚集团。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都是这样的人。日本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但是假以时日，也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纳粹在纽伦堡大会上叫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的意志演化为纳粹党的意志，纳粹党统治垄断资本，垄断资本控制经济。以官僚集团控制的元要素为核心领导，以垄断资本为基础，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实行野蛮扩张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原始、最野蛮的一种变种。

纳粹德国将法西斯主义推高到极限，它是西方国家大危机困境后的产物。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动荡加剧，中产阶级处境恶化，不满现状，要求政府寻求新的统治对策以及更为中央集权的经济控制。在纳粹德国，生产关系仍然保留着资本主

义的形式，资本仍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不过，少数资产阶级成员有所变动。犹太后裔的资本家可能遭到流放、监禁和屠杀，而许多法西斯领袖则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各种垄断资本的机构，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进国家机器中来。商会、雇主协会、卡特尔和其他类似的团体，都变成了强制性的组织，并且直接成为国家的下属机构。它们的活动，由各种局、委员会甚至政府各部所组成的等级制系统来加以协调。经济的控制是集中化的，各个企业在计划下生产，纳粹称之为“有指导的经济”。所有的资本家必须使自己从属于统一的国家政策。对此，布哈林的评价是：“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已经消失；它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利还保持着（甚至还会加强）。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可能和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经济最为相象。”

可笑当年的委员长也曾经试图效仿希特勒，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后来，德国纳粹被消灭，委员长依靠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最终被撵到台湾。委员长自然就不愿意再公开提这段历史了。美国同样清楚委员长的这段历史，但是选择性的无视了，仍然全力支持这位独裁者，并把他作为自由世界对抗“红色暴政”的战士。其实，在委员长的统治下，哪里有什么自由呢？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远房表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对委员长的态度。同样道理，许多日本战犯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比如冈村宁次经委员长特意关照稳妥护送回国。这些战犯大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不知他们刀下的冤魂有何感想。许多人回国之后，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完成了军阀向官僚的转变，开始了政坛生涯。一些人从政坛退休以后，又开始经商。在这样的国家，“今天是将军，明天是部长，后天是银行家”是常见现象。

统治阶级争夺被统治阶级的时候，彼此是仇敌。一旦一方彻底认输，统治阶级内部的阶级感情又重新油然而生。这里，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一次大战期间，沙俄沙皇、英国国王和德国皇帝，本是彼此联姻的表兄弟。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杀得你死我活。对统治阶级来讲，该联姻的时候联姻，该争夺的时候争夺。对被统治阶级来讲，需要他们贡献劳动力的时候要贡献劳动力，需要他们贡献生命的时候要贡献生命。作为资本代理人，为了资本的最大利益纵横捭阖；作为炮灰，为了维持高层之间“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杀得你死我活。这个无耻的过程，则往往被掩盖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的谎言的后面。

至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经过博弈完成了彼此整合，完美的统治阶级成型。金钱和暴力，或者说胡萝卜和大棒，都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下。这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堕落为一个官僚集团，权力操纵在少数人手中。不掌握金钱与暴力的卢瑟，只能在金钱的驱动和暴力的压迫下，做奴隶应该做的事情。资本和暴力究竟

谁领导谁，对被剥削阶级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被剥削阶级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通过血缘关系实现私有财产稳定的传承一直是阶级社会的传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通过“长子继承制”一直维护这种传统。通过通婚进入稳拿集团的方式，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存在的方式。一旦形成稳定的稳拿集团，这个集团就会采取内部通婚的方式维护自身财产的稳定。如果我们看光绪皇帝后妃的照片就会发现，虽然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但是他的众多妻妾的形象却惨不忍睹。这些后妃成为他的后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才，更不是因为貌，而是因为她们是满洲贵族的后裔，她们的父兄手中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她们因为她们的父兄成为皇帝的后妃，她们的父兄因为她们而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过程是一个彼此促进和加强的过程。在这样的“血缘—财产”系统之中，下一级的稳拿以通过婚姻攀附上一级的稳拿为荣耀，上一级的稳拿则努力保持自身的血缘关系的纯洁和稳定。在古代埃及，法老的父母往往是亲生兄妹。在匈奴，兄长亡故以后弟弟往往娶嫂子为妻。这种行为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血统纯洁。幸运的是，现代人类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等级制度，对乱伦具有普遍的排斥，这种现象便无疾而终了。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财产传承的稳定性出现问题。资本主义达到垄断阶段以后，这种传统再次获得新生。稳拿集团操纵资本和国家，他们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稳拿集团是一个很集中、很封闭的小团体。在某些国家里（比如美国），这个集团的领袖通常来自同样的学校（比如耶鲁大学），参加同样的俱乐部（骷髅会），甚至彼此通婚（布什的曾祖父是石油大亨，布什的曾外祖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实现“血缘—财产”关系的自我强化。

对于卢瑟来讲，如果不能通过通婚等方式进入上层阶层，那么只能充当电池。他们只有靠通婚，或者通奸，才能加入这个阶层。如此便不难理解阿诺德·施瓦辛格入赘肯尼迪家族。如果没有这段婚姻，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而成功担任加州州长是大为可疑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试图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的底层青年的典型，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许多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对一些女性来说，充当情妇也是一条提高自身地位的道路。由于出身原因，她们不能成为正室，但是她们可以接受侧室甚至情妇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往往也是丰厚的。

不论经历兼并还是联盟，统治阶级最终走到一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统治阶级最终将建立封闭的系统。这样封闭的系统，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限制外来者，保证财产内部最大幅度的传承和增值。在系统内，统治阶级内部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内耗被降低到最低限度，被统治阶级的上升空间则被压缩到最低。这样的限制最终必然抑制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竞争导致的资本吞并，也是资本代理权的转移

——强者获得经营权，弱者失去经营权。但是，一旦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体系，整个系统就不再存在这种所有权转移的新陈代谢了。

如何实现最大的增值以及抑制新陈代谢的后果，是后面的内容。

人造饥荒：垄断资本抑制产能获得最大利润

光脚的挣钱穿鞋的吃，穿鞋的挣钱穿靴的吃。

——中国谚语

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帝国运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产能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为垄断企业最大利润服务的手段。

上章说到资本经过内部搏杀，最终建立了完善的帝国体系，元要素、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劳动力，按照各自实力在这个等级森严井井有条的社会各安其位。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退有礼的社会，我们并不陌生。几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这样有秩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存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为了实现分配的秩序。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乱糟糟一团麻的社会。如果以吃自助餐为比喻的话，那就是大家一拥而上，筷子、叉子、汤勺，能用什么是什么。桌子上的食物，生鱼片、刺身、螃蟹、牛肉、鸡块、意粉、甜点、罗宋汤，能抢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我们常看到的情况是餐具飞舞，食物乱溅。谁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吃相，他们更在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到尽量多的食物——因为他们清楚，下一个回合，就会吃那些这个回合没有吃饱的食客。吃得慢的人会成为别人的猎物，不想被别人吃掉，就要尽快多吃。

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如同大家排好队，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吃饭。垄断大资本、银行资本和元要素按照彼此博弈的结果，依次进入宴会厅。他们先吃最好的食物，吃到实在吃不消，然后去小憩一下。这时，中等资本入场吃饭，然后是小资本，最后是劳动力。

入场顺序越靠后，餐桌上剩余的食物越少，进来的人越多，彼此之间竞争的越激烈，吃相越难看。劳动力为了抢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彼此钩心斗角，拾荒的人为了争夺一个矿泉水瓶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所谓“仓禀实知礼义，衣食足知荣辱”。一个矿泉水瓶子，绝对不会引起先吃饭的稳拿之间的彼此争斗和冲突，这就如同享受蟠桃宴的人不会为一个鸡头打架一样。不过，如果彼此争夺的

不是鸡头，而是九千年一开花一结果的蟠桃，那天庭就不再大度，不再谦让，而是动用天兵天将捉拿馋嘴、偷吃的猴子。所以说，并不是衣食足不足的问题，而是达到一个社会阶层之后，对普通劳动者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对某个阶层中人已经不再是紧缺的，不但不是紧缺的，而且是极大丰富的。对普通人来说很珍贵的东西，对这个层次上的人来说，已经不值得为此发生冲突了。为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发生冲突，对这个层面的人来说，是丢脸的事情。这个层次的稳拿，在彼此谦逊礼貌的气氛中，瓜分着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他们一边享受自己的大饼，一边欣赏卢瑟之间为了生存进行的争斗。事实上，底层之间争斗的越激烈，顶层吃到的大饼份额越多。这种底层彼此之间的争斗，恰恰是高层吃到更多的大饼的原因。

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都是建立在独立的生产单元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社会顶层吃到更多大饼，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劳动或者强行征收农产品。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官府征收田赋，低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赠送冰炭敬[①]，高级官员向宰相行贿，皇帝则享有四海。国外也是一样，农奴向地主缴纳地租，地主向小领主缴纳贡品，小领主向诸侯进贡，诸侯向国王或皇帝进贡。光脚—穿鞋—穿靴之间，那种产品一层层向上转移的关系一目了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过程则隐蔽得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产品，我们很难看到垄断资本向下一级的资本征收了多少产品。垄断企业与下级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强行征收的关系——就是母子公司之间，由于彼此拥有独立结算的会计体系，也很难存在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

不过，这个征收的过程并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完全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资本都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随意组合，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征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等量资本应该产生等量的利润。同样拥有2000美元的甲乙两人，一个投资面包铺，一个投资水果店的话，彼此产生的利润应该是接近的。如果不接近，那么彼此间利润之间的差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利润较少的一方就会主动改行。在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条件下，由于不断的竞争，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加入，不断有原有的竞争者退出或破产，全社会的利润率基本是接近的。

按照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原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些资本比其他资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利润。比如，某些行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暴利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垄断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其他竞争者不能改行进入这个行业。不能进入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资本量太少，或者是外人进入以后利润率太低，或者是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使用专营权限制外来竞争者。

---

① 冰炭敬：清朝地方官以防暑降温和取暖为名义照例给北京各部京官进贡的银子，是京官重要的灰色收入。赠送、接收双方有上下级关系。赠送数量也成惯例。

我们需要了解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垄断企业怎么向下一级企业征收利润。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下一级企业怎么向下下级企业征收利润，以及怎么不断的征收下去。

在“多收了三五斗”一节中，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程。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占优势的一方，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扩展到最大化。这个扩展的过程，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比如：如果上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上游企业就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下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下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那么下游企业就可以压低进货的价格，上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上下游企业都是相对垄断的企业，就要看谁的资本量更大，有更强的博弈能力。

铁路是相对垄断的行业，但是铁路也曾经受到更垄断企业的挤压。谁能让铁路屈服呢？这个人就是洛克菲勒。1870 年 1 月 10 日，洛克菲勒兄弟等 5 人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 年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 90%，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进出产油区的石油管和汇集系统，并握有运输的支配权。1882 年 1 月 2 日，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正式签署了一份“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合并了 40 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 80% 的炼油工业和 90% 的油管生意。

1885 年，标准石油与铁路达成协议，铁路给标准石油每运输一桶原油收费 10 美分，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收费 35 美分。不仅如此，铁路每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还要给标准石油缴纳 25 美分。如果铁路不答应，洛克菲勒就要重新修建一条石油运输管线，彻底挤垮铁路的石油运输生意。其他石油公司只要生产原油，就要运输，只要运输就要给洛克菲勒缴纳 25 美分的“贡赋”。

整个运输过程中，铁路只能吃一点洛克菲勒吃剩的东西。一般的霸王条款欺负欺负消费者也就罢了，洛克菲勒居然这样欺负铁路。能让铁路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不得不让人叹服洛克菲勒的实力。当然，铁路也不是吃素的。铁路马上就提高了中小客户短途货物的运输费用，搞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

于是，中小客户辛苦半天，要把相当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铁路；铁路也不能吃独食，而要把从中小客户那里征收的利润大部上缴给洛克菲勒。于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

这种“光脚—穿鞋—穿靴”关系存在的潜在必要条件，就是垄断企业能自由控制某类产品的产量或需求。在洛克菲勒的例子中，洛克菲勒完全可以压缩使用铁路运输原油的数量。不仅如此，如果压缩运量，那么其他任何石油公司都无法填补他的退出所造成的营运损失。所以，只要他这么做，铁路就要亏损。他开出的价格，铁路无法拒绝。对于这样的人，铁路只能忍气吞声。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稀缺的产品能卖得最高的售价。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

类产品稀缺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为竞争对手会增加产量或需求。但是在垄断市场中，垄断企业是市场的主宰，则完全可以控制市场。

以食品加工为例，假设1000个农民拥有年产10000吨小麦的能力，城市人口拥有消费10000吨小麦的能力。如果100个面粉厂拥有加工这10000吨小麦的能力，平均每个面粉厂能加工100吨小麦。任何一个面粉厂压缩产能，都是不明智的——这无非是给其他99个面粉厂更多的市场。但是，如果1个面粉厂拥有加工10000吨小麦的能力，它会怎么做呢？我们会看到，它会把处理小麦的总量压缩到9000吨，甚至8000吨。把产能压缩1000～2000吨，这个企业能获得双重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压低小麦的收购价格，从农民那里获得第一重好处；另一方面，它可以抬高面粉的出售价格，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第二重的好处。加工八九千吨，比加工10000吨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的好事，如果能做到，何乐不为呢？

控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获得额外利润，是垄断资本的拿手好戏。这样的企业往往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还有额外的好处。任何竞争对手企图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开足马力生产，让外来者无利可图，最终不得不主动退出。上面的例子中，面粉厂有意闲置1000～2000吨的产能，一旦外来竞争者介入，面粉厂就启动这些产能。于是，外来者面临收不到小麦，即使收到了也偏贵，即使生产出来也无利可图的局面。这时，原有的大面粉厂就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造势，宣传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宣传压缩低效的产能等等。更有甚者，在有些政府干预经济较多的国家，这个面粉厂还会游说政府，为了民族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等等。总之，它要用一切手段让外来的竞争者滚蛋，或者是利润，或者是舆论，或者是政府公关——一切它所能调动的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外来竞争者一旦滚蛋，原有的大面粉厂又回复到压缩产能的阶段。这时，面粉不再浪费了，因为面粉厂人为地制造了饥荒。

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垄断企业一面强调制止恶性竞争，一面强调要求发挥市场作用合理配置资源。按理说，两者是矛盾的：如果要求发挥市场作用，就要充分竞争，既然是竞争就谈不上恶性和良性。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垄断资本要求制止恶性竞争的时候，都是要求封杀自己同行的时候，要求发挥市场作用的时候，都是同行已经被封杀的时候。有同行竞争的时候，自己不能垄断，就是恶性竞争。一旦同行被封杀，自己可以最大幅度榨取利润的时候，就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事情，其实都是统一的，两者的统一点在于利润的最大化。

相比原有面粉厂，外来者往往质次价高，浪费资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达到比较经济的规模，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无效率促成了垄断企业提供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如果一旦他们消亡了，垄断企业便会

马上回到制造人造饥荒的老路。不仅如此，往往变本加厉——因为他们要把竞争期间付出的代价连本带利赚回来。

对垄断企业来说，在能控制的市场中压缩产能，在不能完全控制的市场中则往往开足马力廉价倾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指出，20 世纪初期的德国酒精托拉斯，往往有意把一部分酒精廉价出口，倾销到国外。这样的好处首先是抢夺国际市场，其次是制造国内酒精供应的不足。一面在能控制的国内市场搞酒精荒，一面在不能控制的国际市场搞倾销，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销售策略，出发点却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幅度的利润。敞开供应甚至廉价倾销酒精，和有意制造酒精短缺似乎是矛盾的事情，其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思路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上生长的结果。当这块土壤是自家的地盘，能够被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人造饥荒的果实；当这块土壤不能被自己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廉价倾销的果实。于是，当年德国境外和境内的消费者的处境，如同冰火两重天：非德国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比德国本土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便宜得多，德国人使用本国的产品比外国人用本国的产品要支付更高的代价。

在利润和股权的指挥棒操纵下，垄断企业对整个产业链中其他企业的生产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垄断企业控制产量，中型企业必然如法炮制。小企业的利润高一些，中型企业就把收购价格压低一些，或者把供货价格提高一些。实际上，中型企业如果处在垄断企业的上下游的话，也必然控制产量，否则就会面临多余产品没有销路，或者没有原材料生产多余产品的情况。于是，所有企业都在垄断企业指挥棒的指挥下，把产量控制在一个远远低于潜在最大产能的位置上。

相比之下，离垄断企业远一些的小企业，产能受约束的情况相对较弱。这些企业如同宴会中迟到的中、下等人，彼此为一个鸡头或鸡爪怒目而视、恶语相加。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才给予垄断企业更好地压制产能提高价格的机会。在前面的例子中，数量众多的农民绝不会达成协议把产量压缩到八九千吨，而是会继续按照原有生产计划生产，然后试图把自己的产品优先于自己的邻居卖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生产了 10000 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最终仍然要由面粉厂决定，因为小麦不能直接成为做面包的原料，磨面的环节是无法跳过的。所以，虽然有足够的小麦，城市之中仍然会出现面粉短缺的饥荒——这恰恰是面粉厂要达到的结果。为了利润，面粉厂宁可让多余的 1000、2000 吨小麦腐烂在田地或者谷仓里，也不会增加产量缓解城市的饥荒。在整个社会之中，越接近顶层竞争越少，越接近底层竞争越多越激烈。少数垄断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其他产品价格却很难提高。

唯利是图是资本唯一要考虑的事情，至于其他，比如社会公益等等，则完全不在资本考虑的范畴。所以，在垄断资本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和地区，人造饥荒是很

常见的现象。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洛克菲勒的例子之中，洛克菲勒并没有提高产量，而是提高了自己的利润，这些利润部分来自铁路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中、小石油商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铁路中小客户的运费。对社会来讲，总生产能力未必提高了。事实上，则往往是停滞甚至降低了。

当垄断资本控制市场以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除了体现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垄断程度，不能反映任何信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会考虑改行或者增加一个副业，以便分一杯羹。于是，市场在不断改行之中达到平衡。最终的市场价格反映获得该类产品的难易程度。对大多数产品来说，获得该产品的难易程度与所需要投入劳动的质与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利用资本量、技术或者政府审批等门槛把外来的竞争者拒之门外。这时，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不再存在人、财、物的自由流动，该产品的价格与获得该产品所付出的劳动质与量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直观地看，相比其他行业，该产品的生产者投资更少、利润更多，该行业的劳动者劳动量更少，待遇更高。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当垄断企业恬不知耻地夸口创造了多少利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准确地说，这些利润应该是他们占有的，而未必是他们创造的。须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创造的，资本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占有的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少数资本压榨其他资本，占有了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垄断资本控制的利润中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部分，是它们通过压缩成品供给和原料需求等各种手段从上下游企业那里压榨来的。最终还是要由普通劳动者创造。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却不能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都是来自他的辛勤劳动，因为只要不是大脑失灵的人，都清楚这些收入是层层进贡上来的。垄断企业能如此厚颜无耻，无非是社会大生产过程掩盖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过程，它们压榨小资本的过程。获得大量的利润，未必是社会之福。这就如同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恰恰说明了普通百姓沉重赋税和徭役一样，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要有了吃饭的顺序，就是天下大饥荒，也不妨碍有人有吃不完的肉糜和蛋糕。所以，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并不妨碍金字塔的顶端仍然获得惊人的利润。只要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的是生产、生活必需品，那么推高产品价格就很容易。因为其他环节必然被动让出利润，消费者必然主动压缩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就可以推高粮食的价格。当面粉的价格太高，以致多数人消费不起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玉米粉的价格。当玉米粉太高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高粱米的价格。依此类推，直到推高观音土的价格。

理论上垄断资本可以把社会总大饼完全吃掉，给其他阶级留一点残渣就可以。或者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把所有能吃的都吃掉，其他人拣一点他们吃剩的菜叶，舔一舔他们吃剩下的盘子。

资本主义达到这个阶段以后，资本家不必再如同创业初期一样节衣缩食，把每一个铜板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只要他们处于顶端的位置，即使他们穷奢极欲，他们也是不可撼动的。他们所要指挥和调动的是社会总资本，他们个人的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相比，是相对渺小的。他们要利用自身资本量的优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模式，而不是简单利用自身资本实行增值。所以，个人的节俭在此时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边是吃着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另一面必然是吃糠咽菜。垄断企业毫不留情地批评血汗工厂的不人道，却不愿意放弃一点自己的利润。相反，它们总是在任何有机可乘的时候抬高自己产品的售价，压低原材料的进价。垄断资本家可以一边优雅地品尝名酒，一边假惺惺地批评小资本残酷地对待劳动力，一边不愿意承认小资本从劳动力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中的大多数，都要向他们进贡。这就如同国王一边训斥小地主鞭打缴不起地租的农奴，一边优雅地享用由小地主进贡的从农奴那里掠夺来的农产品。

每一个阶级社会最终都趋向于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顶端极少数统治者的分配体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顶层的稳拿体系。分配制度的自我强化功能是稳拿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稳拿两个特点，一是“稳”，二是“拿”，都是通过这个功能不断加强。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拥有的地租越多，可以豢养的武装人员就越多，他们可以统治的农民和奴隶就越多。在这方面，资本也是一样。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吃饭的秩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不断向上转移，垄断资本自我增值的速率要远远快于中下层资本。在以资本量决定分配顺序的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地位在不断巩固。不改变分配顺序，下层资本永无翻身之日。不仅如此，只能在不断的彼此恶性竞争和上层的挤压中被推向社会下层。换句话说，优先进场吃饭的名额必将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财富水平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多，低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临界点是不断上升的。假设拥有 100 盎司的黄金也许是社会中上层财富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上财富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水平之下财富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必然是这个水平在迅速提升。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 10% 的话，那么第二年，这个临界点的水平必然高于 110 盎司。高于的原因是因为处于顶端的资本的利润率必然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如果中、小资本家不能跟上处于顶端的资本增值的速度，那么迟早会变成吃剩饭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如果要保持吃饭的地位，必须跟上这

个速率，必须以比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快的速度增值。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要保持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变，所需的资本量往往是非常惊人的。那些认为自己挣够了，可以安心养老的人，除非处于社会顶端，否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

改变这个“吃饭的秩序”，必须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体系，显然，对于个体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某个独立的垄断大资本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社会秩序。垄断大资本可以主动拆分自己的公司，却不可能拆分整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垄断大资本一旦主动拆分了自己的公司，也就丧失了影响社会的权力。《盗梦空间》中的小帅哥，可以拆分他老爸留给他的石油帝国，但是不能影响斋藤的公司。不仅如此，他拆分自己公司的后果，无非是给予斋藤更多的机会。斋藤则未必会主动拆分自己的帝国，即使在梦里受到暗示也未必会。

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稳拿体系。所以，这样的“吃饭的秩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尤其是在多数底层劳动者饥肠辘辘的时候。

无尽的冬天：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的经济停滞

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中发现：46.3%的人有全职工作，22.5%的人有部分时间的工作，多达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次大萧条，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有些人，曾经是强健而自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勇敢面对失业几个礼拜，几个月，即使他们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后，他们就很难做到了。在1932年的那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门前的阴郁队列中的不幸之人当中，有些人是自1929年底以来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们所有人都在挨饿，很多人死于上天赐予的疾病，因此福利当局可以声称：没有一个人被饿死。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大衰退时代：绝望蔓延的10年》

垄断资本是市场之神，它们能控制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进而谋求最大利润。它们控制产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价格，控制价格的手段是控制产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通过倾销等手段消灭竞争对手，把本行业的利润压低到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程度，逼迫对手主动退出。一旦占领市场之后，它们往往反向操作，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谋求最高的垄断利润。这种闲置产能，压缩生产的行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过程。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

变，但生产模式发生了自我进化，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原先每一个业主的产量，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产量，就意味着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在则是垄断企业控制市场，市场究竟需要多少产品，能提供多少原料，他们了如指掌。他们的产量变化，很容易引起产品在市场上价格的剧烈波动。稍微增加产量，就可能引起自己产品的滞销。反之，他们压缩产能，就是自己的产品被抢购。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的产品滞销，不如被抢购。

当大家都是小土豆的时候，竞争就是主流，谁不多生产，谁吃亏。因为市场和原料都是别人的，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谁不抢，谁被别人抢，谁完蛋。这种时候扩张产能就是基本的主流。反过来，当市场都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控制的时候，一个市场大致能消费多少东西，基本都有数，扩张产能一点好处也没有，扩张了也卖不掉。这时就不如压缩、闲置一部分产能，人为制造需求不足，创造“人造的饥荒”。

经过这次进化，原先分散的资本凝结成有组织的社会资本，小资本依附于中等资本，中等资本依附于大资本，大资本依附于垄断资本，一般垄断资本（比如当年美国铁路）受银行、核心垄断资本（比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元要素的领导。于是，社会总资本生产更有效率了：可以用相对更少的资本总量，更小的错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了。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停滞。

我们在前面分析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与扩大再生产有密切的联系。当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消灭掉多余的产能以后，任何一个偶然的创新行为，都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生产竞争。于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的幸存者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或信任自己的运气，或在同行的裹挟下，重新开始大规模投资。全社会从简单再生产，进入扩大再生产，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这种竞争扩产的行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创造性毁灭从此不再存在，于是经济很难复苏。

垄断资本对创新，多数采取压制的态度。有些新技术虽然能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同时也会提高生产规模——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生产往往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技术对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提高生产规模，意味着不能采取控制产量的手段获得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家更倾向于采用生产规模不变，但是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这意味不提高生产规模但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这种生产

技术降低产品质量，但是同时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没有竞争对手，供给不足，产品质量再次也不愁没有销路——垄断产品往往质次价高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往往主动采取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即使原有设备远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因为资本家知道，自己不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同行也会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没有彼此竞争的压力，采用不采用新设备，推出不推出新产品的灵活性就要大很多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往往并不急于采用新设备，更不急于推出新产品。生产设备、产品的更新，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改变和大量的投资——只要垄断了市场，投资不投资都有丰厚的利润，何苦投资？列宁曾经举例，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垄断公司购买了新技术并不急于应用，而是作为技术储备，在“合算”的时候再采用，或者作为对付外来不速之客的秘密武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新技术都会被垄断资本扼杀，但是新技术的采用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遏制。这种遏制的趋势，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会长期保持。

垄断企业对扩产更没有兴趣。市场有多大，垄断企业心里清楚。市场都是自己和自己盟友的市场，不存在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的可能，那么扩产卖给谁？压制生产可以人为制造稀缺，获得超额利润，扩产则意味着自己的产品跌价。资本的运动一切以利润为指导，导致利润下降的行为，资本是绝对不会做的。

对于垄断企业来说，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扩产的行为，长期把生产规模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抬高自己产品价格是获得最大利润的最好选择。

对垄断企业的下级企业来说，由于上级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扩展产能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低的利润。尽管许多时候不得不扩张，但是扩张的结果是利润率的迅速下降。在前一小节的例子中，当面粉厂只收购 8000 吨小麦的时候，小农们增加小麦的产量，也不会增加收购量，只能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虽然面粉厂只收购 8000 吨小麦，但是由于农民内部的博弈，农民的产量会多于 8000 吨，农民扩张的上限，就是维持小麦售价等于最低的生产成本产量。低于这个售价，农民就不得不销毁卖不出去的今年的小麦，然后明年不再播种，任由土地撂荒。另一方面，下游面包作坊也不能无限扩张，面包作坊产能扩张，必然引起面粉价格上升。由于面粉产量相对固定，面包总量基本不变，社会上面包的售价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面粉价格上升，面包价格变化，必然导致面包作坊利润率下降。所以，面包作坊的产能扩张同样有极限。这时，虽然城市中面包价格飞涨，但是对面包作坊来说，由于

面粉价格飙升，生产面包仍然是无利可图的。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面粉来源，城市之中的面包荒、面包作坊的产能闲置和大批小麦被销毁，只能长期并存下去。

整个产业链条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往往控制整个链条的产量，这个环节往往把产量压低在能获得最高利润的水平。其他任何上游环节的产品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不得不销毁产品的局面，任何下游环节的产能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产能闲置的困境。

即使彼此不相关的行业，彼此之间也存在影响的关系。洛克菲洛压缩产能，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居民用于消费衣、食、住、行类其他产品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可供分配的消费能力就很有限，其他行业的扩张行为，很快就会触碰到利润的地板。大萧条时期，许多农民发现把牛奶运到城市，牛奶价格根本不足以弥补他们的生产成本和运费。牛养得越多，牛奶产得越多，亏损越多。于是，他们不得不选择主动销毁牛奶，然后压缩生产。小农之间竞争激烈，他们最容易扩张产能，最难提高价格，所以，农产品最容易触碰到利润的地板。他们最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大批劳动者没有工作，没有工资，需要牛奶，却没有钱购买；大批小农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牛奶，却不得不销毁；少数垄断资本压缩生产，保持高于社会资本平均水平的利润。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换句话说，在垄断企业压缩产能的时候，其他企业的产能扩张行为也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垄断行业不打算扩张产能的话，其他行业也很难大规模的扩张产能。

资本主义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生产，一旦知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是多少，就把生产能力控制在略低于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的产量上。全社会的总资本在股权和利润的操纵下，把产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由于扩张产能的动力严重不足，经济危机复苏的条件便不存在了。这时，经济一旦发生危机便很容易陷入长期滞留，难以恢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周而复始的“春去春回来”被绵绵无绝期的严冬所取代，经济周期性“复苏—发展—过热—崩溃”的循环不再存在，经济一旦发生崩溃就会长期陷入停滞的泥潭。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1873年的大危机会长达5年之久，而1929年的大危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彻底消除。

这时，资本的生产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阶段，一切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顶端有限的需求，其他中小资本家和工人的需求，则是从社会顶端的需求衍生出来的。社会顶端的垄断资本家、银行家和他们的盟友的消费能力是主动的，中小资本家的消费能力受顶端的消费能力的影响，工人的消费能力则是完全是被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并不取决于社会多数成员的意志和他们的需要。劳动者需要工作，但是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提供工作。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社会顶端所消耗掉的大多数社会产品，生产始终围绕为他们提供

消费品服务。所以，社会顶端的消费能力成为最终制约生产规模的关键。在垄断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在垄断资本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为满足社会顶端极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的需求而生产。

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与社会顶端需求有关，也与社会底端的生活水平有关。同样生产力水平下，社会顶端需要的消费品越多，需要雇用的工人就越多。同样的社会顶端需求的条件下，每名工人能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需要雇用的工人就越少。

同样的简单再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萧条期相比，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萧条期不但漫长，而且生产力水平下降更多，或者说出奇的寒冷。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达到极限，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下降到最低水平，于是社会总产出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徘徊。

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已经看到，一方面，由于分配进贡制度的存在，除了社会顶层以外，其他各个阶层的消费能力都被不断压缩。社会总消费能力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分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博弈能力。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

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可以操纵产量和价格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的博弈能力被发挥到极限。垄断资本控制核心生产生活必需品更强大，是市场规则的决定者，是市场中的神。相对于他们，其他阶层的博弈能力则被压缩到极限。一群小农必然斗争不过面粉厂；全美国的消费者必然斗争不过标准石油公司。发挥市场功能，合理配置资源，靠市场手段提高小农、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的收入水平，几年翻一番这样的说法，当笑话听可以，谁若是当真就很傻很天真了。谁若是用这样的说法自我安慰，只能说明他不能区分画饼和大饼，以为画饼也能充饥。小农、工人的产量也许大幅度提高，但是在市场自由博弈背景下，合理配置资源就意味着多数劳动成果要属于垄断资本。所以，他们的实际收入，保证不能大幅度提高。

由于博弈能力极端低下，其他阶层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纵使社会顶层的少数人的绝对消费能力得到无限的扩展，由于这个阶层人数太少，他们的总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大多数的中下层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投资失败，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消费行为。资本家购买了设备和原材料，雇用了工人，生产了产品，已经完成了消耗其他资本家产品的过程，如果没有产品产出或者产品滞销的话，这部分投资就不会成为新的产能，也不会成为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在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的产品不仅不会投资失败，而且质次价高，不仅不会卖不出去，而且会供不应

求。对社会有益的投资失败也就不存在了。

资本只会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生产，所以，虽然有大量的人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是，社会仍然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被闲置。除了劳动力的过剩，还有资本的过剩。

大量的中小资本被淘汰出生产循环。它们独立生产，规模太小，结盟生产就要接受带头资本的剥削，扩张产能没有销路。于是，大量的中小资本退出生产，转而进行投机，希望通过投机获得更多的利润，即使不能增值，至少实现保值。一面是生产萧条，一面是投机盛行，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如果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投机行为可以达到惊人的水平。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产业萧条、土地和虚拟资本市场产品飙升的奇异现象。垄断资本往往会投资于土地和金融产品。许多垄断企业，往往本身既是某一行业的巨头，同时又是“地王”和股市的“庄家”。对他们来说，利用土地和金融市场歼灭小资本，如同狼吃掉羊，鲨鱼吃掉小鱼一样轻而易举。大量中小资本在生产领域无法与垄断资本竞争，在土地和金融市场同样难逃一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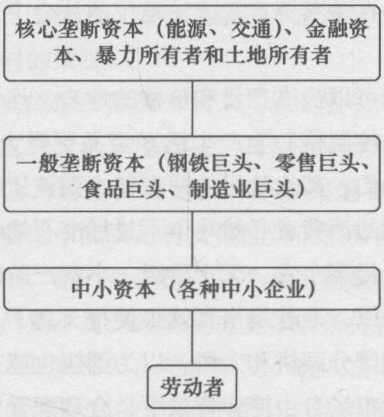


图10　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注：社会顶层是核心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暴力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中上层是一般垄断资本。中下层是中小资本。最底层是广大劳动者。利润向上转移，风险向下转移。财富向上转移，损失向下转移）

稳拿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能够精确地计划，按照合理的比例生产，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或者说不能充分了解产品的边际利润。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厂家直接了解客户的需求，资本主义就不会再有危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产品销售的份额在企业间依据生产效率分配，企业不可能了解每一件产品的边际利润。此外，由于竞争的压力，每个企业都有扩张产能的倾向。所以，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可以忽悠人的。

但是，事情显然不那么简单。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由一个或几个大企业独占。垄断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就越小，企业对市场的需求能力就越了解，生产的盲目性就越低，整个社会就越接近稳拿经济学家期望的状态。很显然，这样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确实不会再发生因为盲目扩张生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仅仅局限在生产过剩型危机的话，那么经济危机确实消失了。但是，停滞的经济决不是正常的经济，停滞的社会决不是正常的社会：一面是大量的需求没有支付能力，一面是大量劳动力没有工作，大量的资本忙于投机或者失业；一面是少数人穷奢极欲，一面是多数人食不果腹。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停滞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比以往的危机更加漫长和痛苦，而且不能自我痊愈。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量的失业人口生活贫困，看不到希望，社会动荡，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复苏的春天迟迟不来到。

尽管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导致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消费不足。不论资本主义如何发展，整个社会总体消费不足，仍然是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根源。

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地主、金融资本家和元要素之间按照彼此实力强弱进行分配，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关系。所有产品都必须在市场上销售出去，被消费者购买，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循环环节。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恰恰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就决定它必然与消费不足做永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终生，自始至终阴魂不散。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消费不足的表现也必然进化。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也必然随着资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强。

这时，产能的扩张要依赖不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市场就是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也陷入困境，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难免陷入长期的萧条。争夺不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海外市场，成为多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

终极征服者：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夙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

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罗得斯，1895，《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这位罗得斯是当年大英帝国的金融家，南非的钻石大王，也是个战争贩子。这位殖民者的事迹，多数人未必了解，不过这位殖民者创立的公司却是鼎鼎有名——戴比尔斯（Debeers）。这个公司的宣传广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A Diamond Is Forever）”，更是家喻户晓。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提到，许多本国失业的劳动力（蟹堡王模型中的派大星），因为在本国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永无翻身之日。他们往往乐于无法无天的去殖民地冒险：消灭了当地人，他们就是小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成为新兴的稳拿。罗得斯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派大星。

罗得斯的“避免内战就要扩张”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有市场的。不过，他隐瞒了他本人在扩张战争中的利益。罗得斯的第一个身份是钻石大王：戴比尔斯垄断了世界90%的钻石生产，罗得斯是戴比尔斯的第二大股东，终身执行官。罗得斯的第二个身份是英国南非殖民地的高官：开普敦殖民地的总理、新殖民地“罗得西亚”的创立者。英国公司在英属南非殖民地拥有独占的开采权和商业权，南非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钻石资源。如果我们把罗得斯的两重身份、英国公司在英属南非殖民地的特权和南非的钻石资源结合起来看的话，就不难看出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扩张能给罗得斯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会大力宣扬帝国主义扩张。

资本家不是雷锋，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工人能不能吃得上饭，而是自己的利益。既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撑得要吐的人看到冻死骨落泪的时候，不妨把自己吃不了的酒肉让出来一部分，不就不会饿死人了吗？如果担心工人吃不上饭的话，把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价值拿出来给工人消费，吃饭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垄断巨头并不关心工人是不是能吃得上饭，而是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润。至于“让工人吃得上饭”，不过是让工人为他们当炮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有大量产能闲置、大批人口失业的时候，工人吃不上饭的原因并不是领土面积狭小，而是多数人的消费能力被资本压缩到最小的空间。哪怕占有天下，仍然会有大量的劳动力被闲置。当然，这些被闲置的劳动力可以是被殖民国家的劳动力，所以，殖民主义并没有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把失业问题转移了。白人失业变成黑人失业，本国人失业变成亚非拉落后国家的人失业。

所以，当帝国主义者宣传为了民族利益要扩张的时候，我们不妨先问问这些宣

传扩张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所在。

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后面的内容，并不是本节的重点。本节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为什么都迅速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为什么扩张的速度大大提高。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压力很大，动力很强。扩张提高的原因则在于垄断资本协调统一了所有的社会资本，把资本之间竞争变成统一的对外扩张。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围绕“利润”两个字运转，解释这个问题同样还是要回到利润的运转。垄断企业的存在最大限度地抑制了竞争，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单位资本的社会总产量最高，达到同样生产目标需要的劳动者量最低；同样时间的生产过程中，创新最少。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统治替代了竞争，计划性替代了盲目性。这时，核心垄断资本清楚地了解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能力，于是经济进入了为满足有效需求而运转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样的消费能力是如此之低，只要动用总产能的一部分就可以满足。从此，经济停滞不前替代了经济周期。简单再生产循环下，如果要实现较高的就业率，就要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力，减少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越小，被闲置的生产能力越小，失业率越低，就业率越高。由于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区域内部，垄断资本总是要把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压缩到最低水平，所以提高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是与垄断资本的特性相矛盾的。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指出，对资本主义来说，无论怎么进化，利润的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工人的工资来自资本家的投资，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利润。如果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利润显然不能来自工资。换句话说，资本家不但要把工人的工资挣回去，还要获得额外的货币。需要额外的购买力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这个购买力要来自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部分，来自资本家、工人以外的“第三方”。如此不难看出，如果要降低失业率，又不愿意触动垄断资本既得利益的话，就要为大量的消费品寻找买主，而这样的买主只能到垄断资本没有触及的地方去寻找。

对资本家来说，每次投资都是一个较少货币换取较多货币的过程。投资出去，能不能回来就是运气了。如果产品不能回来，那就成为别人的利润了。甲资本家给工人开了工资，购买了原料和设备，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最终没有销售出去，对他个人来说，这是很悲剧的事情。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是有益的事情。因为，一部分投资变成了消费，这些投资不但不会产生多余的产能，而且还可以为一部分工人提供工作。甲资本家本人的资本受损，他本人退出资本家的队伍，他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资本养料。这是一种资本内部的吞噬行为。

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尚存这种在“甲之损失，乙之收益”的可能性，由“第

三方”消费多余产品自然好，没有“第三方”的话，自己内部也可以消化一部分产能。在全社会被垄断资本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内部的吞噬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垄断资本控制整个生产循环，上游的企业按照垄断资本的订单生产，下游的企业按照垄断企业的供货生产。产品的产量、规格都受到垄断企业的控制。于是自由竞争时代的盲目投资消失了，生产的损失被降低到最低。换句话说，内耗下降到最低，而潜在的产能达到最大。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井井有条的蜂巢，为了追求利润而运动。在垄断时代，经济体内部已经没有自我消化的空间，于是垄断资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海外，向海外寻找有效需求。

生产技术水平相当的条件下，垄断程度越高，达到同等的社会总产出，就业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博弈关系，垄断程度越高，多数人的消费被压缩得越严重。商品实现能力越差，或者说相对总产能，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从外界来看，整个蜂巢只需要动用很少一部分生产能力，就能达到有效需求的上限。换句话说，垄断程度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就越大。

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讲，闲置一部分产能是好事，这样可以榨取超额利润。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大量的产能闲置，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口失业。由于长期停滞替代了经济周期，这种低就业的状态会长期维持下去。对工人来说，这时的失业不是短暂的失业，而是长期难熬的寒冬。一面是大量工人长期找不到能够糊口的工作，一面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样的社会注定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处在暴动的边缘。这时，必须大量地向外输出产能，提升就业水平，否则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平稳进化，而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列宁的时代，由于垄断资本建立了稳定的“吃饭的秩序”，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耸人听闻。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来以后，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命运的大门基本关闭了。这时，有大批失业的劳动力选择离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去荒无人烟的殖民地冒险，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生命赌一把。他们没有造反，是因为他们对殖民地开荒充满希望。如果他们不能去殖民地开荒，断绝了他们的希望，那么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对他们来说，死于殖民地和死于本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选择殖民和造反的关键无非是哪个成功率更高，哪个回报更丰厚。

这时，对垄断资本家来说，如果不想主动伤害自己的钱包，又不想发生革命的话，就需要找到外在的消费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我的一个夙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 4000 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

如果说，避免革命是向外扩张的被动原因的话，还有一个主动的原因，就是寻

找超额的利润。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多的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从历史上看，不断吞噬其他地区，增加自己的臣民，是各个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更多的臣民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财富，或者说更大的富贵。奴隶主总是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封建地主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土地。垄断资本在全歼了自己统治区域内的不肯臣服的中小资本之后，必然向外扩张，消灭其他经济模式，抢夺资源、劳动力和市场。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胜利！征服你的敌人，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这话是成吉思汗说的，是蒙古版的“抢钱、抢粮、抢娘们”。蒙古大汗读书少，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个大老粗，不怕遭天谴，不在乎舆论，铁腕统治，说一不二，不必在意票箱，也没有必要像美国那样把自己伪装成“心里只有全世界各国文明民主自由，唯独没有自己利益”的活雷锋。他的话说得粗且直，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对垄断资本来说，既然国内已经是自己的地盘，其他大小资本都臣服于自己，那么得陇望蜀觊觎海外也就是必然的事情。垄断资本的说法，虽然宣扬的也是为统治阶级去征服和杀戮，但是更温柔婉转无耻一些，也更有欺骗性，更隐蔽。比如，罗得斯故意隐瞒自己作为钻石大王、黄金巨头和金融家在南非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石油商、军火商和银行家有意隐瞒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等等。虽然他们嘴里说的不一样，但是他们目的和做法，与蒙古大汗是如出一辙的。

对统治阶级来说，大批失业的卢瑟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人长期存在，直接危害社会稳定。马尔萨斯的方案是把这些人关起来，实行隐性的灭绝。但是，卢瑟显然不买账，宁可造反也不进“集中营”。对稳拿来说，让失业的卢瑟成为扩张的排头尖兵，是一举两得的“废物利用”。

对社会底层的卢瑟来讲，也有扩张的冲动，去海外殖民的愿望，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由于建立了稳定的“吃饭的秩序”，卢瑟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要被稳拿剥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剥夺达到极限——许多卢瑟长期失业，即使想被剥夺，也没有被剥夺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自由社会不自由，不要说翻身，就是活下去都是艰巨的事情。如果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只有摆脱这种“吃饭的秩序”，或者推翻它，或者逃离它。对有组织的个体来说，巴黎公社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对无组织的个体来说，逃离比推翻更有可行性。从卢瑟的角度看，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命运，必须到不存在吃饭的顺序，或者自己在吃饭的顺序比较高的地区去求生。所谓“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时，如果有人塞给他们一杆枪，对他们说，跟我走，有饭吃，他们往往会乐于接受。“继续这样迟早是饿死，不饿死也没有出头之日，出去闯荡也不会糟糕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能混得一生富贵。”

历史上的欧洲，大量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举全家之力，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甚至签约卖身，凑钱购买去新大陆的船票。他们到新大陆有机会成为小农，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这些人远离工业社会，深入不毛之地，死亡率非常高，但是他们仍然一往无前。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祖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于是，帝国主义者“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这些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卢瑟，为了避免饿死，只好到资本主义势力没有触及的区域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

资本主义的扩张，包括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的征服。对自然界的征服包括开垦土地、开采金矿。开垦土地不用说了，土里刨食最简单直接。只要有土地，有农具和种子，不存在雇佣关系，男耕女织首先解决温饱问题。

开采黄金则是另一个不受限制的行业。对失业的劳动者来讲，去无人区开采黄金的工作不需要资本的雇用，不会出现自己想工作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情况。对资本来讲，开采黄金不需要对应的社会购买力，黄金只要开采出来就是货币，不会出现开采出来卖不出的情况。所以，开采黄金是卢瑟中流行尝试摆脱命运的方式。大批淘金者进入加利福尼亚、南非等地，试图寻找好运。

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旦他们中的个别人发现高品位的矿脉，资本就会紧随其后。各种采矿公司会纷纷进入，或者好运者自己也会成立采矿公司，雇用那些运气不太好的同行。这些好运气的卢瑟从此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加入稳拿的行列，比如罗得斯。据说他刚到南非的时候，一无所有，靠卖冰淇淋糊口。到中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稳拿。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本土显然不会发生。由于“吃饭的顺序”是稳定而牢固的，如果留在英国，他的大部分劳动都要被社会顶层无偿占有。他也许有机会混成工头，或者小职员、小官吏，但毫无希望成为钻石大王和金融家。

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成员来讲，虽然没有参加开荒和淘金，但是也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对本国工人来讲，大量的劳动力输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工资。对本国资本家来讲，海外殖民地意味着新增更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换一个角度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实是资本家需要海外的产品），更多的产品有了销路。这些需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利于新增就业。从全局看，由于新增的劳动机会，社会总产出的大饼更大，国内原有的博弈关系也向有利于劳动者的一方倾斜。资方拥有的财产的绝对总量增加了，相对量下降了。没有任何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整个社会却忽然变得和谐了。整个过程如同在宴会进行过程中，酒店宣布今日酬宾，突然意外免费加菜。于是，稳拿开始新一轮的大快朵颐，饿得快死的卢瑟也有了吃到一点残羹剩饭的机会。

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的征服，最开始是商品的输出。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大量倾销产品，同时输入该地的黄金、白银和原材料，这是第一步；向落后地区投

资是第二步。落后国家先是本国企业大量破产，大量流失货币，然后是丧失国家经济主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货币是金银，不是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发达国家显然不需要落后国家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在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输出过剩产品、输入货币的过程中，本国的需求不足由海外市场的需求弥补，本国工人就业率提升。对应的是国外的小资本、小农和小地主迅速破产，工人失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沦为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于是民族矛盾尖锐，个别地区甚至从商战演变冷战，冷战进化为热战，文斗变成武斗。看过《黑客帝国》的读者应该记得，人类社会与机器人社会爆发激烈战争的原因，就是机器人的产品廉价倾销，导致人类社会经济崩溃。

资本的扩张有两个基本趋势：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控制的生产；与此对应的是不断地在空间上扩大流通的外部范围。

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要把商品卖出去，把其他社会的黄金换回来。然后把对方融合为自己的一部分，控制对方的生产，并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从新殖民地建立的那一刻起，殖民地就必然与母国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需要向母国出口农产品或黄金，换回母国的工具和生活用品。不会有人在殖民地刀耕火种，相反他们会尽力采用母国的农业设备。淘金者同样需要母国的工具和防身自卫的武器。只要存在分工和商品交流，殖民地经济迟早和母国完全融为一体。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在这个融和过程之中，母国的垄断资本会牢牢地占据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只要不切断与母国的经济上的脐带，殖民者创造的劳动价值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母国。而对多数经济殖民地来说，脱离母国的经济几乎是无法生存的。这样一来，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决定了最终悲剧的结局。

对社会底层来说，殖民地这块乐土注定是短暂的。阶级社会中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并不是由绝对财产决定的，而是由相对财产决定的。这样的规律导致黯淡的前景：如果不能在资本统治殖民地经济以前，使自己的财产达到相对领先的地步，那么迟早还会沦为卢瑟。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殖民者最终还是难逃卢瑟的命运。

那些为母国提供农产品的殖民地小农，如果不能迅速崛起晋升为大地主，那么母国可以轻易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工业品的价格，把利润一股脑吞下去，把各种不利的危机转嫁给殖民地的小农。他们迟早会在不利的博弈中破产，他们的农场会被用来抵债。他们要么回归到失业无产者的行列，要么背井离乡去开辟新的农场。在费厄泼赖的博弈中，他们迟早输得一干二净。他们靠诡计和残忍从土著人那里夺来的，或者靠自己双手开垦出来的土地，迟早成为本国资本的猎物。本国资本则既不用深入不毛之地，也不用和土著人肉搏，只要公平交易，就可以坐享其成。我们不要忘记，“吃饭的顺序”无处不在。不论意外增加的财富最初属于谁，最终都会属于社会顶层的稳拿。19 世纪的美国，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一大批小农失

去自己从印第安人手中夺来并亲手开垦出来的农场。那些淘金者的命运也同样悲惨，不出意外的话，金矿一旦开采完毕，他们就自然回归到失业的状态。矿业公司和黄金交易商发了大财，他们的资产增加了，而淘金者仅仅解决了一时的温饱。

希特勒曾经在自传中提出，消灭劣等民族，德国人要像美国人杀掉苏族人一样消灭苏联人，然后把德国人安置在苏联，在苏联人的领土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千年帝国。他的梦想没有实现，纳粹德国就被反法西斯力量彻底消灭了。实际上，即使德国人消灭了苏联人，占有了苏联的领土，雅利安人的帝国也不会存在千年。因为不必千年，只要几十年，由于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德国就会重新面临要么继续征服新领土，要么内战的局面。

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大量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失业状态，大量的商品再次没有销路，大量的产能再次闲置下来。曾经因为开发殖民地而短暂缓解的社会矛盾重新暴露出来。和谐的局面再次破灭。如果不想内战，就要开辟新的殖民地，安置居民，寻找市场。这个过程发展的速度，与母国的资本垄断程度密切相关。本国垄断程度越高，吃饭的顺序越严密，稳拿吃饭的效率越高。殖民地小农的财产很快就会被本国的垄断资本吞噬掉。这些破产小农很快就会为生活所迫，再次成为殖民尖兵。

抛开社会底层的压力不看，垄断资本集团本身对外的扩张能力也是惊人的。全社会的资本在垄断资本为核心的领导下，凝结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垄断资本军团，挥师向外，必然战无不胜。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土著的无组织的自由竞争资本、封建地主和其他统治阶级，永远斗不过有组织的垄断资本军团。当外来的垄断资本军团消灭某一个土著资本的时候，当地其他资本不但不会援助，反而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落井下石，捞取自己的好处。甲资本家遭受外来资本挤压的时候，乙资本家很清楚：即使自己不会对甲落井下石，丙资本家也会趁火打劫。这时，乙的理性的选择就是提前落井下石——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

自由竞争的关系决定了本土的资本之间彼此竞争的不统一的利益关系：一盘散沙的本土资本彼此不可能建立稳固同盟，凝结起来抗击外来资本侵略。在军事上常见的“一军死斗，盟军作壁上观；一点崩溃，全军溃败”的现象，在资本的搏杀中也是很常见的。在庞大的外来垄断资本军团面前，本土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破产或者成为买办。绝大多数当地资本家都会选择后者，尤其是看到负隅顽抗的同行结局之后。

对外扩张，可以文斗，可以武斗，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垄断资本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商战不行，就热战。工业化社会，热战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垄断资本把社会总资本的产出提高到最高，热战也同样占上风。

被消灭或被收编的不仅仅是中小资本家，当地的地主、酋长也面临同样的选

择。许多东方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成为外来垄断资本家的下属。这些人成为外来垄断资本统治当地的代理人，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也就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与开荒一样，垄断资本输出化解矛盾，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以商品输出为例，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输出，必然会导致输入地的贸易不平衡，进而造成当地严重逆差和金银的迅速外流，使落后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工业和农业会很快破产，当地进而就会丧失完整的经济体系，不得不向外输出廉价原材料，并依赖外来工业制成品输入。外来垄断资本会把原材料价格压到最低，把制成品价格抬到最高。这时，半殖民地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债务只能越堆越高，根本没有支付能力。由于落后国家长期入不敷出，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输出，必然逐渐由商品输出，演化为债权输出。落后国家的金融和财政体系，必然逐步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最终，发达国家甚至不必输出任何实体商品，只需维持世界第一的军力、能控制世界的金融体系和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即可不断巩固其世界稳拿的地位。

开拓殖民地和通过输出商品，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世界暂时和谐了，资本主义社会外部世界必然就不和谐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输出必然出现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抛开殖民者消灭土著居民的过程，资本的输出也同样会给当地造成经济灾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居民创造的价值会源源不断流向宗主国，发达的宗主国不断从落后国家抽血。国家之间同样建立了“吃饭的顺序”，宗主国吃饱喝足，殖民地国家只能获得一点残渣。于是，彼此的差距随着经济融合在不断扩大。宗主国垄断资本留给当地的只有无尽的债务和严重的失业、破产、贫穷。殖民地国家获得的一点残渣，要首先满足买办的需要，当地人民能获得的更是寥寥无几。落后国家想要崛起，当地人民想要改善经济地位，必须打破这种经济枷锁，拔掉发达国家插在自己血管上抽血的针头。对内消灭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也就是各类买办），对外对抗宗主国的武装干涉。如此便不难理解上世纪亚非拉地区风起云涌的殖民地解放战争。

资本是财富世界的征服者，垄断资本是征服者中的终极征服者。用扩张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如同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资本统治一个地区以后，资本主义内部会重新面临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有效需求的局面，为了克服这种局面只能继续扩张。然而扩张是有极限的，地球面积的有限决定了扩张不可能无限延展下去。

垄断资本统一了社会资本，所有资本把内耗降低到最低限度，全力扩张。垄断资本主义以其惊人的效率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世界很快就被瓜分殆尽。垄断资本很快就会消灭掉所有比自己落后的经济成分，全球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要么被彻底摧毁消灭，要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到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统治了全球，紧接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发生了激烈碰撞。

对垄断资本来说，一旦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就会人为压缩产能。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扩张，就会陷入长期的停滞。垄断资本主义征服了一切以后又重新面对老问题：停滞怎么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内战的风险将再次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如果不能给工人足够的面包，就难免陷入全民内战，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物极必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趋势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

——中国谚语

如果我们承认事物是在不断运动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事物的发展总有兴起、强盛、衰亡和毁灭的过程。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矛盾互相作用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在不断积累和斗争，而毁灭的因素总是在孕育在发展的过程中。

放眼天下，没有长生不灭者。帝国也是一样，人类历史上，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许多庞大的帝国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庞大的帝国兴亡的表面过程，没有看到背后发展的深层规律，难免觉得这样的兴亡不可思议，或者陷入宿命论之中。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察深入一些，看到背后的运动规律，则会认识到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帝国的毁灭与它们的强大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那些造成它们强大的因素，孕育了它们的衰亡和毁灭。兴与亡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

与其他庞大的帝国一样，垄断帝国同样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社会顶层领导能力的下降与内部矛盾的增加，是帝国毁灭的内在因素，垄断帝国的毁灭也可以归结于此。对垄断帝国来说，垄断资本领导层新陈代谢能力的丧失和财产的单向流动是量变的积累过程，垄断资本领导层的能力不足以对抗财产汇聚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就会有发生质变飞跃的风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外壳炸裂”。

垄断帝国的产生，起源于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起源于资本之间竞争所导致的搏杀。这种资本之间的搏杀，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超量繁殖与选择的过程。资本家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揣测进行投资生产，接受市场选择。生产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生产成本更低的资本家的产品优先售出，相对落后的资本家的产品滞销，他们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猎物。这个过程中，产品更加物美价廉的资本家获得更大的生产机会。由于产品的物美价廉往往与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有关，而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又依赖于资本量，所以资本量大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生产机会。这是一

种良性的市场自我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种竞争最终达到一个阶段，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其他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它们。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这种产品的产量、规格和价格。从此竞争转为统治。垄断帝国的顶层和其他帝国一样形成了稳固的稳拿集团。“稳拿”这个词，包含两个字。一个是“稳”，一个是“拿”。“稳”就不能有竞争。稳拿体系有自我强化的能力，其存在必然抑制一切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非稳定因素。不论怎么变化，稳拿都能稳稳当当地拿走自己的一份。换句话说，非稳拿集团享受的社会总产品就是未必稳定的。

垄断的统治一旦确立，由于垄断帝国本身具有向上吸收剩余价值的能力，从体系内部无法使用交易推翻。垄断帝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一旦建立起稳固的塔，社会就失去了活力。

人类的能力来自先天与后天，先天的智力并不能稳固遗传，后天的磨砺更不可复制。如果依靠能力竞争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那么多数稳拿的后人，很难保持他们祖先的地位。这时就需要产权发挥作用。私有产权的传承，如同封建君主的世袭，白痴如刘禅仍然是蜀国的领导人。拥有产的人，即使能力平庸，仍然是生产过程的决定者，或者说决定社会大饼的分割。

在自由竞争的阶段，一种新产品的诞生或推广，完全在于这种产品是否物美价廉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能给生产者带来足够的利润。在垄断阶段，非垄断企业的利润受垄断企业的操纵，能否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不确定的事情。即使获得超量的利润，也很可能被垄断企业利用操纵产量、规格和价格的手段而占有。这种情况下，对非垄断企业来说，与其研究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不如研究如何顺应垄断企业。

这时，全社会的生产发展方向，完全操纵在垄断企业的手中。市场的选择变成垄断企业的计划。其他任何超越垄断企业计划的生产行为，都会因为利润率太低或者需要的资本量太大而无法实施。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本身对创新行为是不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受到垄断企业的压制：“（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去向，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换句话说，我不进步，其他人也休想进步。

达尔文在“物种选择”中举例，某一片自由开放地被圈起来，牛群不能进入，于是几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冷杉幼苗。由于牛群的存在，冷杉就长不起来——其实无非是牛群偶尔啃两口冷杉幼苗，就导致冷杉幼苗的夭折。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就没有哺乳类的出头之日。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垄断企业的存在，大量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占有，产品的种类受到垄断企业的限制。上游企业要按照垄断企业的订货生产，下游企业只能按照垄断企业提供的原料生产。非垄断企业很难突破垄断企

业的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想积累足够的利润，发展壮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时，存在的不再是多样性，而是整齐划一。

对一个系统来说，整齐划一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垄断企业的大事，就是垄断企业的对外征服和对内压迫更有效率）。整齐划一的坏处，就是抵御预料之外的突发风险的效率极差。一个缺陷可以让整个系统崩溃。人工林和自然林相比，抵御多数病虫害的能力相对较强，但是抵御特定病虫害的能力却极差。全部是松树的人工林，可以有效抵御作用于槐树、柳树、杨树等等其他树种的病虫害。但是，松毛虫可以让全部人工林在很短的时间内毁灭。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一种网状结构，某一个企业的失灵对全社会的生产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有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发生问题。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则是一种塔状结构，处于塔尖的垄断企业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一旦塔尖出现问题，全社会的生产立即陷入困境。

社会全部生产决策集中在垄断企业，垄断企业的投资错误，就是全社会的投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投资错误的概率是20%的话，那么自由竞争状态下，所有情况下，就会只有80%的投资成功，在垄断企业控制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都会比自由竞争企业投资成功率高，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却会对全社会造成“绝收”的后果。或者说，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发展方向的系统风险远远大于自由竞争的社会。尤其在新技术出现的时期，垄断企业的投资方向决定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却未必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如果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房产和当铺的话，那么全社会的投资方向显然、也必然是这里。

在创新的过程中，任何人即使有超人的智力，也无法提前预见所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创新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主观决定的计划无法准确预知，必然有大量不可避免的损失。这时，垄断资本有两个选择：继续投资或者停滞不前。继续投资的话，若是成功了则会推动全社会的生产发生巨大的进步，若失败了则损失巨大，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丧失核心领导的地位。毫无疑问，多数垄断资本无疑会选择后者。既然已经是社会的顶层，就不要做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尝试。垄断资本的常见病是抑制生产，不思进取。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长期停滞的经济，迟早会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如果外在竞争对手极富侵略性，那么停滞的后果则更加骇人。

自由竞争的社会发展方向，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决定权。在一个原点上，无数人走向无数的方向。发散行走的人群中，会有一些人走向成功，也会有一些人丧生，绝大多数人既不成功也未丧生。走向成功的人，很快成为多数人效仿的榜样。究竟谁会成为被效仿的榜样，不能预先确定。没有任何人能在万事开始的阶段，成功地

预见到最终的结果。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只有垄断核心资本家有决定权，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受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这样的体系，如果能够预见到适当的发展道路，自然避免了四散乱走所浪费的宝贵资源和时间。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何况，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再好的计划也难免有失误，不能保证一定出现最优的结果。垄断资本把社会的发展方向集中起来，于是使用所有人智慧的社会发展，退化为使用个别垄断资本家智慧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山寨”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速度是惊人的，自我创新的能力却是不足的。垄断资本主义走上歧途或者停滞不前的概率都大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如果此时的社会已经完成了资本与暴力的结合，那么极可能在疯狂的道路上暴走——尤其是在内部压力增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一点政治学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开明君主制政治与僭主政治是同一个系统。开明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一个强大的国家，能最有效地调动所有的资源用于改善全国百姓的生活，增强国力，没有内耗和倾轧，这是最好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混蛋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领导一个国家，可以最有效地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他，这是最疯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两种社会使用的是同一个操作系统，不同的是君王的能力和品行。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兴亡系于君王的能力和品行，强盛与崩溃都在一瞬间，自然也就“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资本，如同高高在上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的社会如果全力追赶先进国家，则势不可挡。反之，如果这样的力量用于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也是很惊人的。如果这种力量安于现状，那么整个系统必然死气沉沉。

一个系统的功能发挥，决定于一个唯一的核心零件，如果不是工程师特意这样设计，为了达到充分发挥那个零件的优势，弥补整个系统的不足，实现剑走偏锋的效果的话，那么绝对是一个失败的设计。整个系统运转，完全取决于核心零件的功能，可能达到超强或超差的极端设计效果。如果核心零件超常发挥，整个系统就是最优秀的系统；一旦核心零件失灵，整个系统失灵。

有趣的是，人类社会却总是向这样的系统发展。一些优秀的精英爬上人类社会金字塔的塔顶，然后迅速征服其他不肯臣服的人类群体。征服不久，这些精英的寿命达到极限，把职位传给他们的后人，如果他们的后人保持先人的能力，那么这个系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系统，反之这个系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无情的现实是，这个系统并不能保证后人拥有先人的能力，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后人的能力远远不及先人。

这样的社会系统总是要不定期更新，因为核心零件（也就是那些精英的后人）迟早会出现退化的现象。个人能力一方面来自天生的智力，一方面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历练。对精英的后人来说，先人的优秀基因未必能稳定遗传，先人经历的磨难则更是不可能接触的事情。洛克菲勒是能力超强的人，前面提到的钻石大王罗得斯也是，但是他们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人永远具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垄断帝国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我们无法看清的话，不妨把视角转回中国历史。刘备是英雄，刘禅就很差劲。司马懿能力出众，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很强，但是他的曾孙晋惠帝司马衷就是白痴。天下灾荒，百姓嗷嗷待哺的时候，这位皇帝说出了“何不食肉糜”这句千古名言。毫无疑问，他身上有司马懿的基因，毋庸置疑，仅仅四代司马懿的基因就退化得不成样子。

对垄断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私有财产的稳定传承，决定了生产主导权的稳定传承。在自由竞争时期，这种主动权的传承不过涉及一个公司的生产。一个能力不足的子孙经营的公司会很快破产，社会会继续向前发展不受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企业是如此之大，尽管效率低下，但是也没有竞争对手能撼动它。垄断资本家的子孙通过继承而不是市场获得管理权。核心垄断资本的所有权的传承则涉及到整个社会。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则由血缘决定。

相比遗传不稳定和缺乏磨炼所导致的管理层能力的退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内部的压力，则是单向增加的。

奴隶社会也罢，封建社会也罢，资本主义社会也罢，从微观上看，存在经营失败破产等行为；但从宏观上看，财富总是单向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依靠暴力，也可以依靠交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占有是赤裸裸的，暴力剥夺为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占有隐藏在“公平交易”的背后。

社会的交易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存在交易，就有优势的一方，可以提高自己交易品的价格，压低对方交易品的价格。交易的博弈过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不但占有优势，而且会不断地以“血缘原则”精华自己的群体。这个群体必然越来越小，控制的社会资源则越来越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优势发展到极限。处于社会顶端的稳拿的收获是稳定的，损失可以完全转移到下层；处于社会下层卢瑟的收获是不确定的，损失却是完全无力转嫁出去的。只要存在交易，顶端是永远不会吃亏的，底端则是永远不会占便宜的。

这种剥夺最终会破坏垄断资本自己的统治根基。除了稳拿和卢瑟，还存在大量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他们是稳拿的有力工具。没有他们，数量稀少的稳拿无法统治数量庞大的卢瑟。稳拿剥削他们，他们剥削卢瑟，他们是金字塔中关键的一层。不过，稳拿最终还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成为稳拿，绝大多数最终必会成为卢瑟。这时，稳拿的统治基础也就动摇了。

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人员向卢瑟方向汇聚，财产向稳拿的方向汇聚。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汇聚的极限，就是稳拿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最优——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大利用的状态，是地主把自己的土地的地租提到最高的状态，也是农民不干掉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垄断商品价格提高到极限，工人工资极其低下，大批工人失业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最尖锐、压力最大的状态。对多数人来讲，垄断帝国如果崩溃，那么失去的是枷锁，获得的是全世界。和所有阶级社会一样，财富的重力最终会压垮稳拿精心建设的财富金字塔。

一个稳定性不佳的系统，抵抗不断增大的内压，这个系统能维持多久，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这个系统很难长期存在，整个系统迟早会在内压的作用下发生崩溃。

没有经历过社会筛选的稳拿的后代，直接成为社会的主导，领导一个发展停滞、有巨大外来压力、内压接近爆炸的社会。这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朱常洵亦称福恭王，是明神宗第三子，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国本之争。万历29年受封福王。42年就藩洛阳，得庄田20000顷，盐引千计。崇祯年间，益沉湎酒色。福王后被李自成俘虏，并被吃掉。福王的儿子朱由崧成了南明皇帝。1644年旧历除夕，满人大兵压境，南明皇帝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这就是明代版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过，明代小朝廷没有南宋朝廷运气那么好。1646年5月，朱由崧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被凌迟处死，年仅40岁。

孔夫子曾经要求大家守规矩，认为只要大家都守规矩，就可以天下太平。事实上，天下动乱只能说明周天子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系统。“烽火戏诸侯”是周幽王的杰作，而不是天下诸侯自己搞出来的。这说明在周朝的系统中，周幽王这个核心零件已将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了。周朝的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操作，中国需要格式化——重装系统。

这个集中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没有外来影响，经济本身也要不断震动。对外扩张的停滞、海外市场的突然丧失、技术革命的终结、金融泡沫的破裂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资本要求兑付前期投资的利润。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资本家——工人”的二元社会显然没有能力兑付这些利润，于是经济先是崩溃，后是萧条。垄

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一旦陷入停滞期，复苏就很艰难。事实上，停滞是常态。大量的失业劳动者嗷嗷待哺，无所事事，想维护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社会必然动荡。这时政府如果不能拿出面包，就需要拿出子弹。如果两者都拿出不来，那么后果就会很严重。

这时，可以通过向外扩张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向外输出商品和多余的劳动力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扩张失败，则要面临加倍的惩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劳动力的收益是不稳的，他们的收益完全仰赖战争的结果。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付出了鲜血，忍受了战争的苦难，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顶层垄断资本没有付出鲜血却大发战争财，必然受到严重的嫉恨。工业化社会大量人口聚居于城市，虽然不会有农民战争，但是会有城市暴动。这时，如果军队也因为战争失败而士气低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有垄断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的命运，是这种惩罚的最好诠释。在对外扩张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是强大的，但是也是输不起的，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国家是“泥足巨人”。

何况，即使向外扩张一切顺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必然达到地理的极限——毕竟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历史上看，秦国严苛地对待本国百姓，把全国动员成惊人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领土奖励耕战，补偿本国百姓的损失。一旦扩张达到极限，不再存在外来的收益补偿百姓，仍然严苛对待百姓的话，秦国的社会矛盾必然迅速加剧。

过度依赖核心领导人物的个人能力，对内经济压迫不断加剧，这样的社会系统注定不能持久。如果要维护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存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避免小范围通婚造成的种群退化；第二，破解财富的单向流动过程，避免财富过渡集中导致社会内部压力持续上升。对资本主义财产拥有量多寡决定个人在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来说，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只要破坏了领导阶层的财产的稳固性，就能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打击垄断，小罗斯福允许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的意义之所在。

“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资本势力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的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罗斯福的话，说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对他来说，1933 年的美国已经是量变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时期，随时可能发生质变飞跃。如果他不主动抑制一小撮稳拿的势力的话，那么整个系统的推倒重建就在眼前。显然，那是稳拿的悲剧。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既要保障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大的报酬，成为社会的先锋。又要避免他们没有能力的子孙成为先锋的人，依靠产的优势，压制其他优秀人才。丛林法则诞生了霸王龙，霸王龙抑制了其他动物的发展。如果没有70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今天的世界仍然将是爬行类的天下。哺乳类最多像老鼠一样在恐龙的阴影中苟且偷生，难以想象会诞生今天的人类。

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推动了竞争，提供了选择社会最优生产者的机会。另一方面竞争促进了财产集中，财产的集中创造了稳拿，稳拿毁灭了竞争。早期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资本规模都很小，所以彼此竞争优胜劣汰。一旦资本确立了统治地位，那么市场中就只有巩固其统治的力量，而没有能打破其统治的力量。“万类霜天竞自由”是最理想的状态，却不是稳态。

市场竞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维护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却是非常微妙的任务。社会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各尽所能，所以一方面要维护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获得更多的资源，放大其推动社会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削弱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有机会击败强者。从某种角度看，让优者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无法有效确定优者。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集中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只要存在某一方失控的势力，就会发生过度的集中，集中的过程也就孕育着社会系统的崩溃和重新建设。

由于强者恒强，任何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不论是官僚主动或者资本家主动，地主主导或者奴隶主主导，如果不干涉的话，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干涉过程又可能造成另一种奴隶社会，最终殊途同归。所以，不要相信能找到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当找不到最优解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次优解。当不能确定最优者的时候，不妨消灭可能抑制最优者诞生的最强者。反垄断与消灭财富的过度集中，始终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必要步骤。如果不能主动削弱霸主，那么霸主迟早会被动毁灭，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也将在血与火之中，化为历史的遗迹。

本章小结

在阶级社会人类历史就是一小部分人奴役另一大部分人的历史，具体的手段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财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社会中少数人都是以暴力奴役多数人。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使用暴力剥夺奴隶的人身自由。

在封建社会中，大地主依靠暴力获得土地，垄断土地，进而垄断土地上的产

品。农耕社会取代游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口大幅度增加，可耕作土地基本都被开垦出来，或者封建地主阶级有足够的暴力控制荒芜土地不能被随意开垦，出现了使用法律保障自己利用土地所有权向土地上生活的人要求地租的可能，便有了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奴隶制进化到封建制的先决条件。奴隶开垦了土地，奴隶主无偿占有了土地。奴隶主对奴隶说，你们自由了。但是奴隶别无出路，还是需要在奴隶主的土地上耕种，因为可以开垦的土地都已经被奴隶主（现在应该叫地主）占有。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仍然是奴隶主经济上的奴隶。统治阶级用文明的方式掩盖了剥削的实质。自然界的土地本来并不属于任何人，只不过成为暴力占有剩余产品的一种媒介，于是便有主儿了。细心观察会发现，在农耕社会中，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往往是奴隶社会；而相对人口密集的地区则是封建社会。农耕社会中，封建社会给予农民（或农奴）更多的劳动积极性，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大于奴隶社会，对劳动力的控制由显性变成隐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一旦摆脱奴隶主，往往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乐土。在封建社会中，则往往是富者的良田纵横百里，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即使不控制劳动力的人身自由，劳动力也不得不就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垄断了土地——这种农耕社会之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那么劳动者跑到天边也无法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或者说也必须向大地主阶级称臣，缴纳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欧洲移民在美国建立殖民地之初，采用奴隶种植园的方式耕作，这种生产关系返祖现象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西部有大量的闲置可耕作土地，如果采用封建所有制，那么大批黑奴和白人契约奴必然选择向西迁徙，而不是当佃户。无法有效剥削的社会制度是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个人的生活越发不能离开社会存在，另一方面也使得统治阶级的控制越发隐形和有力。统治阶级放弃对人身的控制，转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利用看似公平的交易获得社会总产品最大的份额。整个过程之中，没有皮鞭，更没有刀光剑影，地主赢的盆满钵溢，农民输得一干二净。只要不触动地主的土地产权，地主是不会动用暴力的。如果农民要触动地主的土地产权，地主必然血腥镇压，而且理直气壮，你们这些穷鬼敢触动我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必然血战到底，却闭口不谈土地所有权是他们奴役农民的工具。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每个劳动者的劳动都仅仅是社会总生产所需劳动之中的某一种，离开了社会，任何人都无法生存。任何劳动者在社会中生存，都离不开交易，他们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购买生活用品。这时，只要在交易过程中保持优势地位，就可以奴役劳动力。这种优势的存在就是所谓的“稀缺性”。交易双方力量的对比与交易双方数量成反比——数量越少的一方占有越强的优势。数量相对稀少的一方不断通过交易

扩张自己的博弈优势。这种优势会不断自我巩固加强，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垄断。这时，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变成了半计划的生产，经济周期消失，资本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同盟，资本迅速扩张，然后进入长期的停滞期。这时，垄断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宰，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达到最高限度，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我扬弃。这次扬弃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利润转移，同行之间也必然出现生产的集中现象。每一个消费者都倾向选择物美价廉或者名气比较响亮的商品，而不愿选择质次价高的不知名的产品。当每一个消费者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的时候，也就在推动生产的垄断，或者说资本的垄断。如果所有消费者都喜欢购买某一种类的产品，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其他同类的产品逐渐退出市场，或者在狭小的空间苟延残喘。拥有资本量较大的厂商，有条件生产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也有条件取得更多的优势。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具有逐步集中的倾向。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个集中的过程进一步加剧。在“资本家—工人”二元社会中，大量商品没有买主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自我消费以外的部分，在社会中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大量的商品最终滞销，被强制销毁。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量较小的资本家的产品往往卖不出去，集中承担损失，而资本量较大的资本家的产品的影响则不大。资本量较大的资本家往往利用危机彻底消灭中小竞争对手。

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最终的极限就是某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某一种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操纵在有限的几个企业的手中。这几个企业控制产品的产量、价格和规格，外来企业无法进入。这些企业平时故意闲置产能，限制生产，推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一旦外来企业进入，就全力生产，甚至不惜赔钱销售，让外来企业无利可图，彻底打消进入的念头。这些企业控制市场的方式，在不存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往往是利用资本量的优势，操纵控制产品价格；在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则可能利用政府审批、专利权等行政手段。

这些企业的影响绝不局限于自身，它们对上下游的企业有极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显性和隐性的两种。

显性影响主要是股权的影响，这种影响类似奴隶主对奴隶的直接控制。大资本可以直接控股操纵小企业。理论上，只要有51%的股权就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企业的运转方式，实际上在股权极度分散的情况下，只要控制20%～30%的股权即可。祖公司可以通过控制父公司的股权控制父公司，父公司可以如法炮制操纵子公司，子公司操纵孙公司，以此类推。只要控制祖公司51%的股权，就可以操纵一个庞大惊人的公司网络。

与显性影响相比，隐性利润操纵则更隐蔽。垄断企业可以轻易控制上下游的生产过程。煤炭生产如果处于垄断状态的话，煤炭公司就可以通过控制煤炭的产量或者提高煤炭价格影响发电量和钢铁产量。这时，由于煤炭价格居高不下或者总量供应不足，发电厂和钢铁厂的产能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无利可图的情况。这时，发电厂和钢铁厂要么提高价格，要么压缩产能。这种控制类似地主对农民的间接控制。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资本量悬殊到一定程度后，中小资本无力自己开创新的空间，必须小猪跟着大猪跑。这就如同农民无力自己开荒，只能老老实实缴纳高昂地租一样。

垄断资本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其他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的主宰。垄断企业内部也出现等级划分。金融企业由于拥有大量流动资本，可以轻易影响股票市场，与各个生产环节都存在交易，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往往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从某种角度看，工业革命是能源革命，能源企业由于与所有企业都有交易行为，往往也是霸主。所有生产生活行为都不能离开土地而存在，所以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和能源企业类似的优势。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和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是垄断资本的核心领导，在它们下面是各个行业的垄断企业，比如制造业巨头、食品业巨头、零售业巨头、餐饮业巨头、服务业巨头等等。这些各行各业的巨头下面是臣服于它们的各个中小资本，中小资本的下面则是无数劳动力。在这个体系之中，每一层对下面都有交易的优势。这种优势的最终表现就是顶层压迫底层，向上吸引收益，向下转移损失。

这个等级森严的体系必然与国家发生密切的联系。发生联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垄断资本家彻底控制政权。第一种主要是后发国家，以德国、日本为典型；第二种主要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从起源上看，一个是国家经商，一个是商人控制国家。从内部管理上看，一个是官僚管理资本家，一个是资本家管理国家。从运行机制上看，都是追求利润的模式。不过一个更多的是官场搏杀，一个是市场搏杀。

历史上看，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后发国家。这样的国家在初期落后于老牌国家，本国资本技术落后，资本量较小。这时，如果官僚不介入，那么这些国家的资本往往被吞并或者被收编，这些国家最终则很可能沦为老牌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资产阶级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选出来的代表，当这个委员会中有自由裁量权的核心成员，由于资本之间的兼并而萎缩到一个很小的圈子的时候。这个小圈子完全有能力彻底控制政府，政府则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从趋势上看，不出意外的话，两种垄断资本主义殊途同归。

垄断资本最终会创造出垄断帝国，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其特点是：第一，垄断资本统治全国经济；第二，资本与政权融合，国家为垄断资本的利益疯狂扩张。在英、法等国的表现是资本操纵政府的内政外交，在德国、日本是二者直接合二为

一。不论哪种原因，政府都要和资本联姻。至此，那种守夜人政府就消亡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极限就是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最终彻底统治国家，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对外疯狂扩张。

在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显现出周期性波动。与投资周期基本同步的“复苏、繁荣、过热、崩溃”周期性循环周而复始。在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之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期的萧条。经济一旦崩溃，就很难复苏，大批工人长期失业，找不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自由竞争到垄断的第一次扬弃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长期萧条代替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

尽管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根源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危机的根源仍然是人民群众有限的需求和资本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彼此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彼此之间也难以达成协议控制产能。对每个资本家来说，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超额生产，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然后让竞争对手产品滞销，承担损失。在垄断资本条件下，垄断资本家不但能了解市场容积而且能有效地控制生产。最理智的行为是一面消灭竞争对手，一面压缩产能。这样既可以压低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也可以抬高自己的产品的价格。这时垄断企业往往主动压缩国内产能，由于垄断企业对全国所有企业都有显性或隐性的影响力，全国企业的投资扩张也必然受到影响。于是，国内经济往往长期不能复苏。

在垄断资本社会中，某种产品产能闲置，导致市场上该产品严重短缺，价格上涨，是很常见的事情。垄断资本关心的只是利润，至于产量，不过是为了达到最大利润可以控制的一个变量。与国内紧缺相反，垄断资本往往向国外倾销产品。国外市场是垄断资本不能控制的市场，对这样的市场与其压缩产能让给别人，不如利用物美价廉大举占领。出口一部分产品，不但能获得国外额外的利润，而且能在国内创造超额利润。于是，国内紧缺与国际倾销，往往是并存的事情。

垄断企业的利润，并不仅仅是自己创造的，而是通过挤占上下游企业的利润获得的。上下游企业也会努力把损失转移出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利润向垄断金字塔顶层流动，损失向下流动。垄断企业不需要做出多大的贡献，只要牢牢控制住自己的产品，然后涨价，就可以把全社会总产品中的大部分掠夺过去。比如煤炭公司可以不断提高煤炭的价格，挤压电力公司的利润。电力公司也可以搞堤外损失堤内补，提高电力的价格，把损失转移给用电企业。这时，如果电力价格有上限，电力公司不能转移损失的话，就主动停产，压缩损失。这就是所谓的“人造饥荒”。

在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劳动者是受压迫最严重的一层。一方面由于大中小资本要把垄断资本占有的超额利润层层转嫁；一方面因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就业率水平大幅度下降，大批劳动者处于半失业状态，完全没有博弈能力。消费者

也是垄断资本压迫的受害者。垄断资本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后，最终消费品的价格难免上涨。这时，消费者必然压缩消费能力。由于多数劳动者必然是消费者，所以他们要遭受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双重挤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处于非常低劣的状态。

工人生活水平低劣，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狭小的国内市场。

工人要工作，要面包，要改善生活，不然就会铤而走险。一个、两个不可怕，一万、两万就不好说了。工业化的结果使城市替代了农村，成为全国人口密集中心。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集中在大城市，工业化的结果也使得劳动者具有基本的文化和极强的组织性。另一方面，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域，一旦在城市被击败，资本主义在农村是完全没有翻身的可能的。与农耕时代旷日持久的寸土必争的农民战争不同，工业化时代每一次城市暴动都可能造成最恶劣的结果，尤其是暴动发生在巴黎、彼得格勒、东京、柏林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的时候。

由于垄断资本统治经济，没有重新扩张产能的欲望，全社会的经济必然低水平运转。一面是大量的劳动者想工作没有机会；一面是少数社会顶层穷奢极侈；一面是大量小资本被毁灭，产能闲置；一面是社会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常见的经济现象。垄断资本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工人生育能力太强，所以没有足够的工作。垄断资本家似是而非的解释掩盖了问题的根源，垄断资本家的暴富恰恰是问题的根源。由于资本的贪婪导致社会底层过度贫困，他们有需求，但是没有支付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和闲置的潜在产能同时并存，但是资本不为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大批工人自然找不到工作。如果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增加社会底层的收入，打破垄断的特殊利益，这是垄断资本家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安置这些失业的劳动者。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缘狭小，所以不能安置这些失业者。事实上当年英国已经拥有1/4的地球领土，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失业问题，仍然需要开拓新殖民地去安置本国的失业者。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劳动力很快就会被剥削得一干二净。他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糊口而已，没有多余的积蓄去购买土地。何况即使他们能省吃俭用购买一小块土地，也会很快因为农资价格上涨、农产品跌价而破产。他们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资本兼并。这时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免费分给失业无产者土地，并且打击垄断资本，保护农产品价格的话，这些失业的无产者是不可能在本国国内回归到小农状态的。天下虽大，只要有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只要不节制资本，就没有这些卢瑟的立锥之地。实际上，如果卢瑟能随便回归到小农状态的话，

资本主义到哪里去寻找廉价劳动力呢？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存在呢？统治阶级即使不使用暴力，被统治阶级也难以逃脱资本的束缚。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如果不能给工人提供工作，就要把他们远远打发了才是。这些失业的劳动者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尖兵，他们去垄断资本的触角还没有或者刚刚触及的地区冒险。他们在那里开垦土地、开采黄金，实现自我就业。

只要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存在交易，这些殖民地迟早会被垄断资本融合到帝国的经济循环中来。殖民者如果不能在当地成为社会顶层，迟早面临破产的局面。这时他们要么继续向边疆迁徙，要么成为新的失业者。

垄断资本家也觊觎国外的市场，他们向外倾销产品，输出债务，获得廉价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不断把落后国家或地区整合到自己的垄断帝国中来。他们摧毁当地成熟的封建经济或者工业化萌芽，使当地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以纺织业为例，欧洲国家向东方国家输出纺织制成品，摧毁当地的纺织业，然后廉价收购当地的蚕丝和棉花，把当地建设为自己的原料基地。当地的纺织厂生产规模小，得不到足够的原料，永远发展不起来。资产的征服许多时候只要费厄泼赖就可以，压低对方原料的价格，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完全不用使用武力。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财产的压迫。扩张能缓解内部矛盾，但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扩张必然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制度，也必然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幅度上酝酿新一轮更广泛、更激烈的矛盾。一旦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整合过程完成，高失业率和狭小市场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这时垄断帝国又需要新的边疆。相比早期有内耗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这种边疆的扩展最终将受到地理范围的限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覆盖范围很快扩展到全球，或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碰撞。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这时，如果不能继续扩张，社会便进入长期停滞阶段。

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时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也是最腐朽的阶段。由于不存在竞争的压力，也不存在竞争导致的多样性，垄断资本既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创新的才干。社会生产力发展陷入长期停滞。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由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力量，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血缘替代了效率，统治替代了竞争。社会生产的决定权，不再由生产效率决定，而是由血缘决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财产能够稳定传承。垄断资本家的后人也许天生智障，或者缺乏历练，能力低下，但是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主宰。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由社会顶端的遗传基因决定。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内压迅速增大。在封建社会尚存在一些犄角旮旯的世外桃源，可以过相对封闭的田园生活。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这样的世外桃源很快全部消失。奴隶或是奴隶主，只有两个选择。由于交易的优势取决于数量多

寡，绝大多数人必然是交易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必然成为奴隶。小资产阶级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永远不稳定，个别可以晋升为奴隶主，多数必然降级为奴隶。

随着社会顶层财产的积聚，必然出现财产向顶端流动，人员向社会底层流动的现象。顶层与底层的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变化。社会顶层为了维护统治，必然不断加强武力建设，强化国家功能。由于社会顶层数量有限，国家机器中的大部分基层人员必然来自底层，与底层劳动者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入伍之前和退役之后，仍将回到社会底层。国家机器内部也会发生分化作用，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和来自顶层的军官之间会逐步出现不断扩大的隔阂。一旦这种隔阂扩展到一定幅度，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士兵的态度发生改变，军官无法有效指挥士兵，那么国家机器就难以继续有效运转。这时，垄断资本的统治就要被推翻。这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缘由。“十月革命”并不是反动派污蔑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沙俄灭亡和克伦斯基的垮台并不是因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瓦解了沙俄的战争机器，而是血腥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来自农村的基层士兵态度的转变过程。

这样一个内部压力持续增大，顶端保守、停滞、控制能力下降的体系，必然难以持久。如果不能主动改良，必然面临崩溃，如同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无数帝国一样。

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我扬弃，垄断替代竞争，使资本主义产权对劳动力的压制作用发挥到极限，使资本主义达到最高阶段，也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边缘。

这时，资本主义如果不想灭亡，就面临第二次自我扬弃，一次主动的自我扬弃。

LOSER
ECONOMICS

后 记

本书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希法亭、罗莎·卢森堡、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凯恩斯、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工业化时代，生产高度分工，所有产品都需要经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分配取决于博弈能力，少数人分配能力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多数人的分配能力则不断弱化。消费则与分配能力密切相关，反作用于生产。随着分配能力的分化，必然出现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消费能力不断萎缩的趋势，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匹配，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必然和固有现象，危机严重程度与贫富分化程度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两次自我扬弃，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经济危机则由周期性“复苏—高涨—崩溃—停滞”中的定期崩溃，进化为“崩溃—停滞”，即长期性经济大萧条。在国家干预之后，长期性大萧条再次进化为滞胀。分配不均并没有消失，所以经济危机也没有消失，而是不断变化形式。本书的观点是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本在于消除分配不均的现象。由于少数人群过强的博弈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必须由政府对贫富差距进行主动调节，削弱少数人群过强的分配权或者以财产税（遗产税）的形式征收其

多余的财产。

归纳本书大概讲述了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的政治属性；二是资产的属性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规律；三是前人对经济危机现象研究的综述；四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博弈及各种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权；五是社会化大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六是资本的内部兼并及垄断资本的出现及垄断资本的运行规律；七是资本在时间维度上的扩张（信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八是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经贸关系、经济殖民地）；九是工业革命和财政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十是以美国经济史简要验证本书观点，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扩张即死亡，生产过程不过是资本扩张的副产品。这样的经济制度具有内在的缺陷。最终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本书的内容以经济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市场交易。因为少数个人或团体为了获得优势，维持优势会不择手段。在马克思的时代体现为原始积累，在列宁的时代体现为帝国主义。如果抛开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必然难以看清优势的起源、决定因素和发展趋势。

本书既然用卢瑟的方式解释世界，必然完全不同于穆拿的经济学。本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运动方式是多方博弈；规律是强者恒强；最终结果是体系崩溃；具体应用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只有这样的解读方式，才能解析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

《卢瑟经济学》中没有见好就收的边际效应递减，只有贪得无厌的资本为了追求自我增值不断积聚；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只有为了物质利益进行你争我夺的博弈。

《卢瑟经济学》中的社会不是起源于鲁滨逊的小岛，而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的血淋淋的原始积累，而鲁滨逊不是主动放弃小农生活去和别人交换，是被强行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想饿死就要接受资本提出的交易条件。

《卢瑟经济学》中的交易，不是彼此互利互惠，皆大欢喜，而是强者占尽弱者的便宜，把弱者踩在脚下；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少数人更平等，不是人人都幸福，而是少数人更幸福，多数人则成为经济上的奴隶。

《卢瑟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更是僧侣、官僚和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最终的乐土，而是随着财产的集中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崩溃。帕累托最优不是人类的天堂，而是卢瑟造反的前夜。

《卢瑟经济学》的理论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冥想出来的。没有复杂的数学推演，却有很多身边的例子和历史的事件——所有人都参与的博弈，每个人权重不同，怎么可能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推导呢？

本书尝试从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们所处的社会，以非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世界，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读完本书，会让我们看到大概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指导经济实践？少数人怎样建立了优势？他们如何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为什么经济危机难以治愈？资本主义的前途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 loser 或者稍微还有那么些正义良知的 winner，而且自认为还算爱思考、不愿意浑浑噩噩、人云亦云且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始终饶有兴趣的话，如果读后有那么些许的如鲠在喉的东西想吐出来的话，这本书能够满足你们，这就涉及到研究卢瑟经济学的意义。

安　生

2012 年 8 月 23 日（于七夕节）